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 字数 2) \$,000

198(年+月第1版 198(年+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5,000

统一书号: 11094•1%\$ 定价: (平)1.)0元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董必武	董必武传记编辑组	(1)
任作民	陈志凌 任 楚	(86)
曾中生	盛仁学 高玉临	(114)
林祥谦	王大同 陈孝华 郑祖溪 林少玉	(147)
曾延生	曾昭试	(168)
郭隆真	罗占元 许庆昌	(177)
茅丽瑛	王正玲 毛和利	(205)
鲁佛民	郑 则	(226)
林锵云	张招英 兰继嫦 李忍子 林秀然	(253)
车向忱	施文魁 车树实	(280)
曹荻秋	司虎春 刘 诚	(322)

任作民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
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都曾与我共
事过一段短时间。他是新芜建委
初期的老委员，是一位对工作认
真负责的同志。

陈云一九八八

陈云同志给任作民烈士的题词

任作民同志是一个老实
的、正派的、忠诚的共產主義
戰士

李維漢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

李維漢同志給任作民烈士的題詞

任作民同志是我党最早党员之一，为了党的事业，曾长期在白区工作。不论在敌人法庭上、监牢里，经受酷刑，但始终站稳立场，奋斗不懈，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为我们青年一代树立了学习的的光辉榜样。

为任作民同志留念

一九八三年春 王首道



王首道同志给任作民烈士的题词

除夕舉酒論生平
融之微笑慰知音
臨別贈言君自重
瞬息竟成隔世人
十年我戰南而北
君則暗渡苦經營
鐵窗風味催人老
魂斷長空杜宇聲
遍體烙痕猶未赤
苛刑加害死復醒
血肉受殘心尤鐵
愧煞乞憐搖尾人
品梳如斯吾黨杰
英風千古鬼神驚
國步維艱傷駿馬
遺志待遂有后昆
月滿寒雲君何在
悠々逝水嗚嗚咽

一九〇二年于延安寫悼任作民同志詩一首
八二年抄贈其長子任楚同志紀念

莫文驊





董 必 武



任 作 民



曾 中 生



林 祥 谦



曾 延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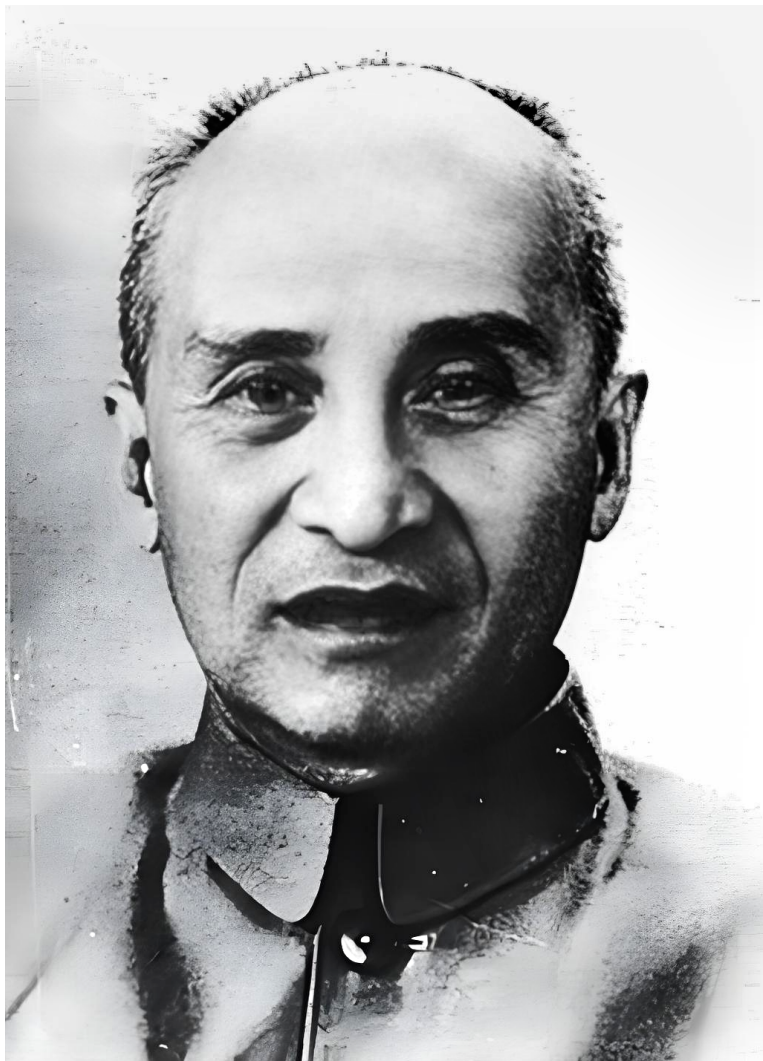
郭 隆 真



茅 丽 瑛



鲁 佛 民



林 铈 云



车 向 忱



曹 荻 秋

董必武

董必武传记编辑组

青少年时期

董必武，一八八六年三月五日诞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斋，号璧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在兄弟八人中排行第三，与四弟董基明先后考中秀才，二人均在黄安、麻城一带教塾学为业。董基文为人正直，鄙视趋炎附势，足不涉公门，在当地有耿直之名。董必武的母亲蔡氏，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劳动妇女。董必武诞生后，全家大小近三十人的生计，主要靠父亲、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父、二伯父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一些钱来维持。家中虽然人口众多，但兄弟间都能互谅互让，和睦相处。

董必武小时，常跟父亲到塾学中去。五岁那年，父亲在县城广善庵教书，学生中有背不出或背不全《三字经》者，他常在窗外朗声代答，一字不差。父亲惊喜他聪明好学，就让他跟读。九岁，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此前，离张杰湾不远的宋埠镇，发生了在当地颇有影响

的所谓“宋埠教案”。这事是因为外国传教士欺侮中国妇女引起的。当地人民愤然烧毁了教堂，打死了传教士。事情发生后，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赔款白银四万二千两，答应重修教堂，并把两位农民带头人判刑投狱，许多人受到责打。当地人民愤愤不平，就把这事编成了花鼓戏、皮影戏到处演唱，歌颂两位农民领袖的勇敢机智和民族气节。董必武看过这些演出后，在他幼小心灵中产生了对横行霸道的传教士的强烈憎恨和对农民英雄的无比崇敬。

以后，董必武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在此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友借阅了不少演义小说和历史著作，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已能写一手文字通达的文章，几次参加县的“观风”^①考试，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学业日益长进，父亲、四叔及家里其他人都希望他考得功名，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一九〇三年，十八岁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应试，中了秀才。按照当地习俗，中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他却故意绕道回了家。

同年秋天，武昌新办的武普通中学堂招生。董必武想弃文习武，便前去报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城，各种事物他都很感新鲜。一次路过抚台衙门，他好奇地走近探视，还未走到门前，就被卫兵抓起来痛打一顿，使他怒火满腔。接着，在武普通中学堂参加口试时，因他长得黑瘦，又穿着父亲一件旧长衫，显得老气些，被考官认为“年岁太大”，未予录取，遂怀

^①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士子，称为“观风”。

着对清朝官吏的仇恨心情离开了武昌。

返回家乡后，董必武开始在黄安城内一所高等小学校任教。由于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加上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使他不能安心把书教下去。一九〇五年春，他放下教鞭，再次来到武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普通中学堂。因学堂下半年才开学，他就与另两位同学一起在武昌司衙巷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自学。这期间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成了他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

日知会的司理刘静庵，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该所被清政府封闭，就隐藏在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名义，广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并组织星期日演讲会，鼓吹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关心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时纷纷云集这里，痛贬时弊，抨击朝政。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的报刊和新书，眼界大为开阔。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名声很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当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主张，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的文笔流畅、富有感情所吸引，一时成为这些著作和报刊的热心读者。

一九〇五年十月，董必武正式进入文普通中学堂。他学习刻苦努力，因原来文史基础较好，得以较多精力攻读英文及数理学科，考试成绩总列第一，受到该校监督（即校长）纪钜伟的赞赏。这个学校在当时也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之一，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都是该校学生。董必武与这些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他虽未加入秘密的革命团体，却赞

成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活动。董必武入文普通中学堂后，仍利用课余时间，去日知会阅读新报刊及一切能见到的秘密印刷品，思考研究当时纷纭的革命主张。刘静庵见他是个有作为的朴实青年，主动给他介绍和提供图书，指导阅读，其中《扬州十日记》^①、《嘉定屠城记》^②给他思想以深刻影响。董必武把刘静庵看做是自己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师益友。后来，刘静庵被捕，虽遭酷刑拷打，数次昏死，仍坚贞不屈，醒后继续痛骂清朝官吏不止，慷慨就义，被人们誉为“铁汉”。这一高大形象，长久深印在董必武的记忆之中。

正在这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在日本创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接着，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一九〇六年四月《民报》第三号专门出了号外，列举两派分歧的根本问题，对改良派展开了全面讨伐。董必武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两派的纲领和主张。经过反复对比，他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而孙中山主张采取革命手段，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还政于民，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自然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世界

① 《扬州十日记》，清扬州人王秀楚著。1645年清军南下，史可法率全城军民坚守扬州，进行抵抗。城破后，清兵曾大肆屠杀十天。王秀楚身历危境，就所见所闻而记之。

② 《嘉定屠城记》，清朱子素著。记叙1645年清军南下，嘉定人民公推黄淳跃、侯峒曾为领袖，坚守城垣，奋战十天，终因众寡悬殊为清兵所破。清军破城后，三次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潮流的先进的纲领。于是，他毅然摒弃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了。

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进入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纪钜伟办文高等学堂。纪想把文普通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是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优，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监督纪钜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初步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一九一〇年十月，董必武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在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纪钜伟和学校的教师都很器重他，希望他继续深造。但他“家无担食之粟，野无附廓之田，食指几三十人，仅赖家大人与季父笔耕以度日……”^①，无力供养他继续求学。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他应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陈逵九的邀请，到该校任英文教员去了。

投身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

^①转引自董献之：《董必武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断》，载《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动起义，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正在黄州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即赶赴武昌。当他到达武昌时，武汉三镇已被起义部队占领，他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这时，清军正在调集大量部队向汉口反攻。十月十六日以后，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董必武从武昌奔赴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①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②。他精神振奋，在前线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十月下旬，因为清军援军不断增加，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孤城，陷于险境。他又积极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援和响应，终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

十一月二十九日，武昌军政府改组，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一起转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在此期间，董必武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参与了重建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工作，并在十一月间被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一九一二年年初，他被派赴黄冈为军政府筹款。完成任务返任后，武昌军政府改为湖北省军政府，他被任命为省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科长。

^①^②董必武：《辛亥革命三十周年》，载1941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版）。

一九一三年一月，董必武离开财务司，先后到宜昌川盐局和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任职。同年夏天，孙中山回国策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他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组织队伍，准备响应。但是，“二次革命”在江西、南京、广东等主要地区刚刚发动，就遭到袁世凯的镇压而失败。黎元洪借机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不能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一九一四年一月，他得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大学学习期间，孙中山正亡命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丧失信心，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数百人。董必武深感国民党散漫不统一的弊病，非常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①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他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中。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五月，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实现他做皇帝的美梦，

^①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载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武汉版）。

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国内反日反袁的声浪迅速高涨起来。六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国，路经上海时与潘怡如等取得联系，准备回湖北在部队中策动反袁的军事行动。

当时驻守武昌南湖的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同乡和旧友。他们到武汉后，就与李愈友等秘密联络同志，策动起事；同时致函辛亥革命时的旧友姚汝婴，希望共同努力。但因布置不周，起事计划泄露，他们的处境异常危险，不得不暂时潜回黄安老家。

董必武与张国恩回黄安不久，被叛徒告密。张国恩乘隙走脱；董必武被黄安县反动知县逮捕入狱，后来由于陈遼九等人上下疏通，三个月后，得以保释回家，但仍受反动当局严密监视，不准出城。同年十二月，袁世凯为加紧防范革命党人反对他称帝，命令各地爪牙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安的反动知县接到密令，再次将董必武与张国恩逮捕，监禁在黄安监狱。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也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黎元洪接任总统后，宣布恢复国会，承认临时约法，各省议会也都要恢复，内务部还通报各省凡在袁世凯当权时因政治关系取消议员资格者都一律恢复。董必武这时出了狱。他到武汉与许多革命党人联系，为詹大悲（原湖北省议员，也因反袁入狱刚刚获释）当选议长进行了大量活动。但因湖北督军王占元以詹的议员资格系由议会除名的，不同意恢复，于是詹大悲的议长当选了，而议员资格还没有恢复，以一场滑稽戏而告结束。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在此期间，他开始读到一些马

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毕业返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他们因承办的第一个案件处理迅速而又获得胜诉，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声誉。

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了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自川返鄂于次年三月抵鄂西，应驻防利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约任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驻在川鄂边界的靖国军黎天才、唐克明部，早有争夺鄂西地盘、吞并蔡济民部队的野心，只因蔡济民的地位和声誉，才使他们不敢轻易下手。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不备，袭击蔡部并将蔡枪杀。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赶了回来，人们尚不明事件的真相。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开了案件的黑幕。同事们对这种革命阵营内部的残杀都感到无比愤怒，公推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

董必武经武汉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孙中山早在先一年五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事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董必武遂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申述了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了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申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巴黎和会正在召开。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属战胜者一方，但在和会上却处于被处

分的地位。上海街头，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仍在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口；无数忍饥受冻的难民，仍然风餐露宿，流落街头。面对此情此景，董必武心如刀绞，悲愤万分。

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春，董必武暂住上海期间，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经过几年混战，双方正在上海议和。各省区不少革命党的活动分子云集上海，在上海组织各该省区的善后公会。湖北省善后公会成立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处房子做会址，公推董必武与张国恩主持会务，住在会所。这样就使他得以接触不少革命党人，了解到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给他总结过去革命的教训，寻求新的道路，提供了方便。

“五四”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很多。正在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董必武，读了这些杂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示。恰好这时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国，住在湖北善后公会附近，常来会所与詹大悲、董必武、张国恩恳谈。李汉俊热情地讲述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来的一些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出版的书刊给他们看。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

俊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二八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主倡这种启蒙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当时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且只有文字上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当时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①。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那年夏天，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差不多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议论天下大事。由于经济上没有接济，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他们将蚊帐甚至身穿的衣服都典当了，有的人仅剩得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因此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次日再穿，长衫两人共用一件，谁外出谁穿。但他们不管这些，一心一意地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董必武在读书时还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经历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中国天空中仍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

①董必武：《忆友人詹大悲》，本组存有影印件。

行不通，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经证明很难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朋友们也有倾向这种思想的，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①。他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还进一步思考了中国革命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他回想在过去的革命中，虽然也常讲唤醒民众共同奋斗，但只喊在口头上，却不去做实际工作。例如，做部队工作，却不去发动士兵和下级军官，仅去争取上层军阀，而这些上层军阀在革命失利时，常常投敌叛变，另寻新主；在革命发展顺利时，常常又另有打算，排挤打击革命力量，篡夺革命果实。由于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常常弄不清楚，所以革命终无结果。俄国的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及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都证明了民众力量的重要。他认识到，要革命，没有民众参加是不行的^②。因之，他得知潘怡如应孙中山的召唤，去作“联段反桂”的上层兵运工作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③的主张。这时，他已经初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考虑国家与革命问题了。

^①参见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简记》（原件存本组）和《忆友人詹大悲》等。

^②参见董必武：《忆友人詹大悲》。另见海林·福斯特·斯诺：《董必武小传》，载《中国共产党人传记》，1972年美国格润乌德出版公司出版。

^③董觉生：《潘怡如先生墓表》。

董必武与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等商量，认为急需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以宣传人民；一是办学校以培养干部。关于办报纸，他们议定要在武汉办一个决不为军阀所左右、而专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江汉日报》，并用白话文起草了宣言和募款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返汉川资中拿出一部分钱，印了股票、章程和宣言。八月间，董必武、张国恩返回武汉筹办报纸。由于原来积极支持办报并答应出一些钱的人中途变卦，撤销了支持，使《江汉日报》终因筹措不起经费而未能办成。办报不成就着手筹办学校。董必武和张国恩、陈潭秋等联合几位进步教师，借用湖北省教育会旧址的几间房子，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大家议定，开办费由创办人捐助，董必武为此在当铺当掉了身上穿的皮袄。一九二〇年三月，私立武汉中学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两个班，共一百多人。

私立武汉中学是一所崭新的学校，教师领取低薪或只拿生活费；向学生收费少；男女生同校同班；国文教学文言白话兼用，准许学生用白话文考试；班设班主任，辅导学生自习和课外阅读；引导学生注意国际国内时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组织学生参与学校的校务领导。董必武教国文，经常选用杂志上的白话文为教材，宣传新思想。这所学校在董必武的领导和推动下，不仅是湖北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后来又成了湖北党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从一九二〇年开办到一九二八年遭桂系军阀封闭，八年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间，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和刘伯垂自上海的来信。信上说，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他和张国恩

同陈潭秋商量后，迅速复信李汉俊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参加，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不久，李汉俊又介绍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从上海来到武昌，帮助共产主义小组工作。董必武与他们接谈，并商量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请他们教外文，以作掩护。但因当时武汉要求学俄文的人很少，计划未能实现。不久，马迈耶夫夫妇即离开了武汉。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一九二一年初，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国事，接近工人，联系青年。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一九二一年六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共产主义研

究小组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小组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讨论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时，他发言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统称为“一丘之貉”的说法，指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有原则的不同，应区别对待。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八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一九二二年初，武汉党的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五个支部，并在武昌黄土坡下街设立了区委机关，董必武任区执行委员。

一九二二年，武汉中学设立了二部，董必武除教书外，兼管校务，还先后在启黄中学、湖北女师、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以教授国文课的便利，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他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的纱厂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及其子弟上学，教他们学习文化，同时又对工人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受到工人群众的极大欢迎，连远在数里之外的震寰、裕华纱厂的工人，也都赶来听课。董必武还通过各种关系接近工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他在汉阳铁厂熟识了很多工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冶铁厂的工人仇国升，经过对仇的认真了解和帮助后，发展他入党，并帮助他很快建立了该厂的党支部。这是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党支部。董必武多次倡导并亲自组织各校学生利用假期回县的机会，进行农村调查，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教育、革新政治的宣传。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取得农民群众的信任，

逐步发动农民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活动。

董必武、陈潭秋等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校为阵地，在学生中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经认真的审查和选择，先后发展了王健、王秀松、戴克敏、魏人镜、陈步云、邓中赤以及王尚德等一大批党团员。一九二三年冬，他将黄安籍的党员王健等组成中共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等各种活动，使黄安的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初步开展起来。被派去的这些学生党员，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都逐渐成长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一九二四年又组织了中共麻城工作组，到麻城开展革命工作。同时，他还要求各学校发展的党员先后返回各县，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这些革命火种，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迅速地遍布了整个湖北大地。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湖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汉口特别市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十七个县的国民党组织。

“从统一战线建立起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止，全省的国民党员发展到一千八百七十七人，其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就有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国民党汉口特别市

党部中，工人党员占大多数，第六、七两区党部的党员，几乎完全是工人。”^① 一九二五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董必武在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动各界群众。一九一五年前后湖北地区相继成立了湖北工商联合会、国民会议湖北促进会、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湖北省教育会、湖北妇女协会、各法团外交后援会、武昌律师公会等团体，并先后出版了《武汉评论》、《湖北农民》、《湖北妇女》和《湖北青年》等多种革命刊物。一九二五年初，董必武遵循党的“四大”关于开展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各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黄冈、黄陂、黄梅、黄安、麻城、汉阳、天门、阳新等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到北伐前夜，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七万二千人，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的组织。

在此期间，湖北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共湖北省党组织发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号召，立即得到武汉学生联合会、武汉国民对外同志会等团体的热烈响应。九月五日成立了武汉反帝大同盟，董必武、陈潭秋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下，九月七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日）在武昌阅马厂举行了各界人民群众反帝示威大游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人民在董必武等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援助“五卅”惨案运动。

^①董必武：《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党在汉口开始筹办《楚光日报》，由董必武化名任经理，共产党员宛希俨任主编，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公开发行。《楚光日报》利用合法地位，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经常刊登有关工人、农民、学生的消息和报道，描述他们的困难，反映他们的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很受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在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二月中旬，董必武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二月底，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并指导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接受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及发展农民运动等决议案；还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名义联合发表宣言，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北政权，反对吴佩孚非法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省督办、杜锡钧为湖北省长。他向会议提出了召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的省政府；统一军队；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民有集会、

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十四项主张，有力地打击了直系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

三月，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派遣前往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和他的部队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功。五月下旬，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七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七、八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八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还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九、十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以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形成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战斗的根据地”^①。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董必武遵循我党方针，又致力于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

董必武继一九二五年十月经办《楚光日报》后，又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创办了《汉口民国日报》，自任经理，并请宛希

^① 1927年1月7日《汉口民国日报》。

俨、沈雁冰等先后任主编，公开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以及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

为了明确新时期斗争的工作方针，一九二七年元旦，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革命，封建制度的铲除，不仅在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封建制度的基础土豪劣绅。”^①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湖北境内党的责任，一方面是团结全省民众的势力，防备反革命势力进攻与袭击，而谋巩固全国革命之新根据地；一方面是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民众作一切自身利益的斗争。”^②最后，他被大会选为实行常委制的省党部三常委之一（其他二人是钱介磐、何翼人），主持省党部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使武汉的工人运动达到高峰。一月七日，董必武以反英大会总主席的身份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的二十万人反英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现虽英租界收归我政府派军队管理，而束缚我们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民族益甚，所以我们要求生存，就要……集中力量，继死难同胞精神，与英帝国主义继续奋斗。”^③代表中国人民表示了奋斗到底的决心。

①董必武：《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宣言》，载1927年1月7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1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董必武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就是要大多数的民众参加，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是谁？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①他认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国民革命没有农民参加和拥护，是不会成功的。他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的身份，把许多共产党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派往各地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份达四十余个；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余县；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掀起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潮。

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一九二七年三月，董必武积极地支持并协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又将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全国各地招收了八百名学员，学习农运理论，从事武装训练，并直接参加革命斗争。这些学员毕业后，坚决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极力破坏、镇压农民运动。董必武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他针对地主豪绅在阳新等地杀害农运干部的事件，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讨论援救阳新、监利惨案的办法。按照会议决定，省党部会同省农协等组织共同派出专人和两连军队开赴阳新，镇压了豪绅暴乱，并发动群众，召开

^①董必武：《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公审大会，枪决要犯十多人。这次行动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使阳新农会会员由数万人猛增到三十万，成为全省农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

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农村的大革命，镇压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这两个条例，给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以法律武器。

为了总结经验，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湖北省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天下午，武汉各界为庆祝农代会的召开，在阅马厂举行三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董必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赞扬和支持了农民运动。大会通过了地租、雇工、县政、武装、工农联合、查办土豪劣绅、农协组织和组织全国农协、加入农民国际、促成省农民会议等三十五项决议案，并选出了新的省农协执行委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把湖北的农民运动推向更加深入发展的阶段，到一九二七年六月，湖北农协会员已达到二百五十万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立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其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各级国民党党部一万五千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厂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

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①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三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等人，通过了提高党权，提高民主，废除主席制，撤销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等重要决议；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对总司令的职权作了一定的限制。这次会议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三月十二日，武汉一百万群众在阅马厂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努力国民革命”，“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独裁”，“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②，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月四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我们目前的大斗争》的报告。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阐述了“革命非武装不可”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光辉思想，指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排除封建势力，“虽然在形式上这是两个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排除妥协分子；我们排除妥协分子，就是反抗帝国主

^①1927年2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3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义。”他明确指出，妥协分子的代表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的方法与利用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的。”从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新军阀的反动本质。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不但是国际间的危险，而且是国内的危险，更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党的危险。各位同志，如果想免除这种危险，要想保持革命性”，就要提高警惕，“党员要武装化”^①，作好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在反蒋斗争新形势下，董必武代表省党部写信给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历数其执行庇护土豪劣绅的错误政策，指出：“半年以来，除经广大群众直接打倒之土豪劣绅外，迄未见贵会依法惩办一人。所谓依法惩办，亦仅徒闻斯语，是政府方面对于土豪劣绅过于优容，适予彼辈以反动之机会。因之阳新、监利、汉川、麻城、夏口、钟祥、潜江等县捣毁党部，焚杀党员之惨案，遂接踵而起。风声所布，蠢蠢思动者，乘机爆发，将更濒于不可收拾之势。此种责任，应由政府负之。”^②四月十日，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当选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其他二人是孔庚、张国恩）并兼农工厅长，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实行常委制，不设主席）。董必武运用他担任省党部和省政府常委的有利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革命斗争。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

^①本段引文均见董必武：《我们目前的大斗争》，载1927年4月5、6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湖北省党部给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信》，载1927年3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同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蒋怒潮。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蠹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①四月二十三日，武汉的革命群众举行了三十万人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在武汉以及两湖地区，波澜壮阔的反蒋斗争，正蓬勃兴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勾结其他军阀，联合封锁和围攻武汉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在他的指使下，湖北地主豪绅走卒、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于五月十七日率部叛变，想乘机袭击武汉。为了揭露和声讨夏斗寅的反革命罪行，五月十八日，董必武主持召开省市两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讨论对付办法，议决通电声讨；武汉三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夏斗寅叛党罪状；发表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推定董必武、詹大悲代表省市党部，出席中央政治会议等六项决议。五月十九日，武汉三镇在阅马厂举行五十万人讨夏群众大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

^① 1927年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出：“夏逆为蒋介石的小走狗……今天讨夏的意义，便是表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决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夏逆打出拥蒋的旗帜，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①与此同时，我党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叶挺率部前往抵抗，经英勇反击，打退了夏斗寅部的进攻。

五月中旬，董必武指出，张联陞等在鄂北叛变，杨森向鄂西袭击，夏斗寅潜袭武昌，许克祥称霸长沙，他们都是受了蒋介石的勾结和唆使，以扰乱北伐的后方。为了深入反蒋，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召开了湖北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会上，董必武作了政治报告，谴责国民党中央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妥协，对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隐忍不言，未能及时讨蒋。他号召对外反帝，对内讨蒋，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运兵华北，迅速讨伐蒋介石，肃清土匪溃兵，建立乡村自治政府等六项主张。六月二十八日，董必武主办的《楚光日报》，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

（一）打倒蒋介石，（二）铲除封建势力，（三）打倒土豪劣绅，（四）实行农工政策，（五）拥护政府最近对土地问题的新策略，（六）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出兵华北。”^②七月九日。湖北省党部发布讨蒋宣言，指出：“我们讨伐蒋介石，在目前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是革命的存亡问题”。“蒋介石是各阶级民众的大敌，是总理的叛徒，是本党的敌人，是革命军的敌人，是土豪劣绅的保护者。”^③

①1927年5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6月28日《楚光日报》。

③1927年7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

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汪精卫集团的怂恿下，麻城县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地主武装红枪会上万人，发动了围攻麻城的反革命暴乱。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麻城县委派王树声前往武汉告急。董必武听取汇报以后，立即召开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主持组织了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命令原在黄安县剿匪的一个警卫营，火速赶往麻城，支援麻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后，董必武又和毛泽东共同商定，派出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百名武装学生，星夜驰援麻城，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五月底，汪精卫集团又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擅自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黄冈和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针对汪精卫集团破坏农民协会的罪行，六月十九日，董必武在省农协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革命确实到了很困难的时期，可是我们就要设法克服这些困难，打破困难的营垒。”^①大会宣言驳斥了所谓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向全省农民发出号召：“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而是要整齐我们〔的〕步伐，向敌人猛烈进攻。”^②接着，中共湖北省委通过湖北省政府颁布了《农民自卫军管理条例》，指示各地迅速地建立起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湖北的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加深入的阶段——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协会差不多普及所有的乡村，黄安、麻城两县还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并通过董必武在武汉购买了一批枪枝弹药。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七月

^{①②}1927年6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十八日，董必武向国民政府辞去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农工厅厅长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

“钧府设立农工厅于本省，原为保护农工利益。日来工会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无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形，实属有辜重寄。现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① 严词痛斥了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

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经长征到陕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府均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董必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地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董必武虽未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与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二十二人，联名在八月一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十一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十二月十七日，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遭

^①1927年7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

到残杀。鉴于情况危急，董必武根据党中央要他去苏联学习的指示，在袁范宇弟兄的掩护下，化装成水手乘轮船取道上海去日本。董必武离开武汉后，武汉的寓所被查抄，跟随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并被投尸江中；黄安老家被查封，家产被没收，房屋被拆毁，家人流亡在外地，有的被害致死。董必武在避居日本期间，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忆录^①，回顾了“五四”时期同李汉俊、詹大悲等一起接受新思潮的经过，总结了同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残杀革命人民的反动暴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一九二八年夏季，经我党在日本的负责人杨贤江接通关系，董必武办好手续，离开日本经海参崴赴苏联。同年八月间到达莫斯科，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同班学习。一九二九年春又转入列宁学院，至一九三一年冬，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习，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离莫斯科返国。

一九三二年夏，董必武经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于中秋节前后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因身患重病直到冬季稍有好转才开始工作。一九三三年二月经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会通过，董必武被委任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后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项英调离后，任代理主任。这年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三月，董必武调该校任教务长，后任副校

^①指董必武的《忆友人詹大悲》，1928年写于日本。《忆友人詹大悲》是我们拟在正式发表时采用的标题。

长。他很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当见到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实事求是，不可盲从，因而及时避免了学员中因思想幼稚可能产生的偏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遭受“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调党校任教务长，董必武同他多次交谈，鼓励他大胆工作。董必武在与毛泽东、徐特立等见面时，经常深谈交流思想，为此遭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他表示宁愿不做党校校长，也不能作不实事求是的检查。董必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践经验，亲自给学员讲课。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他联系中国情况，深入浅出，生动通俗地讲授巴黎公社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他还联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系统地讲授党的建设。学员一致反映，他讲的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大家的印象很深。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先后召开。董必武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他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被任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多次亲自主持审判工作，严肃处理了那些破坏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违反革命法纪的犯罪分子。他要求办案要有严格手续，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防止畸重畸轻。他虽因此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为“文牒主义者”，也毫不在意。由于他严肃地强调了党纪和法制，使根据地内各单位的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和机关工作都得到改善，提高了党的威望。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

误，未能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红军被迫长征。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开始，他被安排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与年近花甲的徐特立担任正副队长，带领三十来名女同志、六十副担架，负责沿途雇请和管理民工，收容、照顾和教育伤病员。他们不顾年老体弱，与队员同甘共苦，克服黑夜行军，天雨路滑，担架多，负荷重，民工少等种种困难，带领伤病员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又面临敌人的重兵围追阻截。在危急关头，董必武积极赞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改向贵州前进的主张。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中央发现董必武在妇女队工作负担太重，调他到没收征集委员会，后又到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对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的决定，董必武竭诚拥护。一九三五年二月后，在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险行程中，年老体弱的董必武，匍匐着爬过铁索桥，拉着马尾巴登上陡坡，始终没有掉队。为了照顾伤病员，他经常把组织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拄着拐棍，安步当车。他还乐观地为百草繁茂但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和长达百里的色既坝设想了一幅将来大可改造的美好远景。他说：“革命胜利后有专人来这里考查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東西发现出来。”^①在部队缺粮、少衣，不断减员的情况下，他组织干部，为筹粮、筹款、打土豪和扩大红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六月下旬，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严肃斗争的关键时刻，董必武又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

^①董必武：《从毛儿盖到班佑》，载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编辑的《红军长征记》。

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边，积极支持北上抗日的方针。他明确指出：张国焘的退却逃跑，是分裂党，是错误的。只有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八月，他调任上干队政委。十月，长征胜利结束。董必武在回忆长征时豪迈地说：

“十三个月的时间，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两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①

长征到达陕北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极需培养大批党政军干部。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决定，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并任命董必武为校长。

中央党校是在一无校舍、二无桌椅和粮盐柴草奇缺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的。董必武面对物质上的困难，坚持与学员同甘共苦，和学员一样吃野菜和小米，住窑洞睡土炕，穿破旧衣裳，处处以身作则。他亲自给在树林、空地席地而坐的学员讲授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并采取先召集散居在各点的班主任集中到校部听课，再回去分别传授给学员等办法，弥补教员的不足。对文化水平低的学员，除一般课程外，还辅以语文、算术等文化课。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判。有的学员对此认识模糊，董必武及时教育大家，把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严加区别，正确处理和团结四方面军干部，使学员们卸掉包袱，团结一致地学习和工作。党校迁到定边后开办了民族

^①董必武：《长征中的女英雄》，载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编辑的《红军长征记》。

班，增加了蒙古族、藏族、彝族、瑶族等兄弟民族的学员。董必武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既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教育他们适应革命环境接受改造。西安事变后，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张学良、杨虎城部下的军官和从上海等地来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的人员，以及通过国共谈判从南京监狱释放的一批革命者，也到延安学习。因为这些学员情况比较特殊，中央决定专门成立红大（后为抗大）四大队，着重团结与教育广大知识青年，董必武兼任该队政治委员。

在陕北期间，董必武除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外，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处理陕北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书记。五人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负责纠正陕北地区肃反扩大化错误，平反了许多冤案，解救了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一九三七年年中，在林伯渠赴西安筹备八路军办事处期间，董必武曾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民面临着“怎样救亡，如何抗日，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的严重而尖锐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董必武在党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一文，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十年内战的历史经验，提出“国共重新合作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惹人注目的问题”。他说：“只有重新合作，才是抗日救亡的前提，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希望，才能与世界和平阵线接近。”针对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人提出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与国民党合作等不利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论调，他以大量事实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以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描绘和马克思主义者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所描写的最合理最幸福、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进行了

对照，赞颂了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认为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自当竭其力之所至以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促使国民党竭其力之所至以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争取平民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争取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民生主义。这在抗日革命战争中是极端需要的。”董必武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辟论述，为破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之思想障碍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国共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于九月先期来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他任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工作。

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首先加紧筹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很快开展了工作。一九三七年底，他和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在武汉“八办”商谈了建立新四军和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他还为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重建湖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而积极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以董必武为首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不久，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湖北省委，下辖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区委；同时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

鄂北中心县委。在董必武、郭述申领导下，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湖北地区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作了《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两次讲演，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传动员、组织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参战的重大意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董必武又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和《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两篇文章，深刻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开放民众运动”，只有“给全国民众以充分的爱国自由才能把全国民众坚固组织起来，才能给他们以训练，并武装他们，使民众和政府、军队打成一片，结成一个不可消蚀的力量，在持久的艰苦的神圣抗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①十月初，董必武向新华日报社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和本报》的讲演，又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指出敌人存在的弱点和我们存在的优点，“乃是持久战可以战胜敌人的条件，握住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点，一定可以使抗战持久下去，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获得最后胜利。”^②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我党提出的“动员一切力

① 董必武：《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载刘天因编《抗战报告丛书之三》，1938年1月初版。

② 董必武：《目前形势与本报》，载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重庆版）。

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的伟大的战略任务，董必武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首先，他十分重视组织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工、青、妇各级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组织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在农村，他通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领导和组织了鄂中农村工作社、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中国农村社等抗日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斗争，使湖北从城市到乡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次，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董必武亲自会见辛亥革命老友、国民党湖北省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立三）、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璜和国民党上层知名人士李书城、李范一等人，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他们共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商国共合作和抗日救国的大业，推动他们抗日。同时，他对广大华侨捐金献物和回国参军参战的爱国行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多次在办事处热情会见侨团代表，勉励他们为支援祖国解放事业而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经常接见各国访华团体、友好人士及援华医疗队，向他们介绍我国抗战形势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周恩来一起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前往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许多国际友人通过实地考察，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一九三七年冬，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遣彭康、

方毅在黄安县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一部分输送到新四军；一部分分配到农村，准备发动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夏，董必武和湖北省委还委托陶铸通过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的关系，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名义，由李范一出面，在应城县汤池、京山、皂市一带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举办期间，同国民党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同我们党内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涉也进行了不少斗争，坚持办了三期。这些学员毕业后，以合作指导员名义，分赴各县农村发动群众，准备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军部成立后，董必武同周恩来、叶剑英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传达了我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并要求他们从黄安七里坪、河南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鄂豫皖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①。王明借口华中与华北的条件不同，对中央这一重要指示置若罔闻，拒不执行。董必武果敢地抵制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五月，汤池训练班被迫解散后，董必武指示陶铸把训练班的名称改换为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培养干部。鄂中沦陷后，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学员，在陶铸、杨学诚领导下建立了鄂中游击区。董必武还派人到香港

^① 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

购进一批驳壳枪，送给鄂中游击区，有力地支援了鄂中的敌后游击战争。

五、六月间，董必武和边章伍等由武汉前往安徽舒城，做长期坚持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高敬亭（即高俊亭）的工作。董必武到舒城后，经过一周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高敬亭提高了认识，表示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新四军军部的指挥，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七、八月间，董必武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河南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以办园林试验农场为掩护，在鸡公山举办武装训练班，训练鄂、豫边区党政干部。董必武指示训练班的领导人，要大搞武装，要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造成全国的抗战形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战。学员毕业后，分配在农村，发动农民，开辟敌后根据地。十月底，武汉失守后，鸡公山训练班结束，学员全部转到大洪山打游击。从此，鸡公山和大洪山地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董必武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武汉失陷前夕，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九三九年六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突袭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留守通讯处，制造了“平江惨案”，杀害该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干部六人、家属四人。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八月，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平江嘉义留守处遇害烈士启事》和《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五律四首，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平江惨案”的真相；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歌颂了涂、罗诸烈士忠贞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兵戎相见、残杀我军的反动罪行；庄严地表示了抗战到底，把日寇赶过鸭绿江的决心。在八月十三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追悼涂、罗十烈士大会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严正提出：为遇害烈士雪冤；以国法严惩凶顽，揭破敌寇汉奸破坏团结的阴谋，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团结危机和坚持抗战等条件，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和准备投降的阴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的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一月十八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董必武同样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江南一叶是奇冤”的诗句。周恩来、董必武的题词和诗，歌颂了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卓著功勋，表达了对新四军殉难指战员的沉痛哀悼，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严重罪行。

三月一日，蒋介石为了制造团结、和平的假象，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我党毛泽东、董必武等七参政员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对于“皖南事变”之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要求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等。三月二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邓颖超以中共在渝参政员名义发表公开信，要国民党立即停止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新四军全体被捕人员；发还所有枪枝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由于国民党未接受这些条件，我党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从而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利用这次参政会粉饰太平，以挽救其政治危机的阴谋。

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周恩来奉命回延安后，董必武肩负起领导南方局的重任。九月十八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这时，我党参政员因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皖南事变”，已有一年多拒绝参加参政会议。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枪匹马地出席这次大会。会议开到第四天（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了自己不在会上进行反共的诺言，在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十八集团军“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董必武听完之后，立即提出质问，并用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援助友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功绩。他的有力反击，使何应钦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乃唆使CC分子捣乱，使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愤然退席，并声明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在场的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对董必武这种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和勇敢机智的斗争精神，无不衷心赞许，极表敬佩。

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根据当时的形势，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

下，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的方针。董必武在传达这一方针时指出：荫蔽是为了保存力量，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决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消极荫蔽。每个党员要更好地把大胆和细心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我党在国统区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而且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同志的转移和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有效地发展了我党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我党的活动受到更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地下斗争、统一战线中上层工作和群众运动有机地密切结合起来，通过讲演会、纪念会、座谈会、聚餐会、祝寿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争取了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大量工作。

为了广泛团结各党派人士，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四年元旦，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提前为董必武作六十大寿，并从延安发来贺电。贺电说：“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彻了辛亥、五四、北伐至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二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

^①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0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①。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元旦那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同志集会，祝贺董必武六十大寿，重庆各界领导人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张申府等纷纷到会庆贺。大家在祝寿活动中，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磋商联合起来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的策略，并利用祝寿机会，先后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作诗、撰文，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誉董必武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而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夕，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广大群众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董必武代表人民的要求，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各党派人士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民主是讨论宪政的先决条件，民主更是今天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不能实现人民总动员，也不能认真的由人民研究宪草，宪草也就不可能实现”^②。接着，董必武分别和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张申府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频繁接触，努力促成在宪政

① 《中共中央电贺董必武同志六十大寿》，载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重庆版）。

② 1944年2月2日《解放日报》。

问题上的联合阵线。为了把宪政运动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四月初，董必武出席了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王云五等人举行的宪政促进会，讨论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开放言论自由等问题。五月中旬，董必武和张志让、张申府、史良、章伯钧、沈钧儒等三百多人举行宪政座谈会，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证言论自由。当时掀起的这股民主与宪政的洪流，有力地冲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的独裁统治。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十二月，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腐朽、没落的本质。广大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纷纷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董必武先后派出我党代表同民盟和西南、广西等地方实力派会商，共同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一党专政；驱逐日寇出中国，恢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实行中央、地方之分权制，在民主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与美、苏、英及其盟国之邦交，共同消灭法西斯，争取实现世界民主与正义、和平等五项斗争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由林伯渠、董必武于九月间分别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和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会议上，适时地提出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宣言，举行集会，表示拥护。十月十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国统区各界社会知名人士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

行知、冯玉祥、李济深、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广大工人、爱国志士、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我党号召。到一九四五年春，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向前发展。

在重庆期间，董必武对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方针，密切联系了各党派领袖人物，除个别接触外，还采取座谈、聚餐等方式，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他也做了许多争取工作，象冯玉祥、李济深等，后来都成了我党的朋友。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他除亲自同他们会谈外，还派我党干部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络，为解放战争后期争取他们起义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讨论和制订联合国宪章。国民党慑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同时还趁机打破国民党历来对解放区情况的新闻封锁，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向全世界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我们的政治纲领。旧金山会议结束后，董必武和随同前去的章汉夫、陈家康等继续在美国会见了华侨代表、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上层人物，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解放区情况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本质，争取了华侨和各国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因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未能出席，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我党中央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刚刚由美国回来的董必武，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并要求他们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前停止向我军的进攻。为实现我党的这一正义要求，董必武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先后拜访了黄炎培、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史良、李公朴、邓初民、李烛尘等，阐明我党的立场和主张，揭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真相，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参加反内战联合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他反复强调：目前主要的议题，应该是停止内战问题，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动员起来，采取各种办法，坚决制止内战。

由于我党代表团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国民党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国共双方分别下达了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上，董必武和我党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月十

四日政协第四次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董必武针对国民党在《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中提出的“国府委员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出，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有指定权、否决权、紧急处置权”等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提案仍然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保障个人独裁的方案。接着，他再次提出我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及改组政府的具体方案。他说，改组政府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结束训政，国民政府委员会应为各党派参加的最高决策机关，要有权决定人选；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席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防止手令制，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要经过会议通过方为有效。一月十五日，董必武又在政协第五次会议上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对施政纲领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人民应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实行地方自治，改组军事委员会等一系列代表广大人民要求的积极主张。在军队问题上，董必武按党中央指示，明确提出：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他说，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目的是要吃掉人民军队，解除人民的武装。同时，他还针对中间势力提出的“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共产党在军事上做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做些让步”的错误主张，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指出：这种主张在客观上就是帮助蒋介石用军队国家化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董必武和我党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又一次教育团结了中间势力，从而极大地孤立了反动势力。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

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五项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董必武和王若飞于二月十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根据党中央对谈判整军问题的原则，他们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一、中国革命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军队在手；二、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才能在内战发生时有力制止内战，切记不能忽视掌握武装之重要；三、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基础上的统一，丧失了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基础，全国民主也难争到；四、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五、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等等。这些意见立即得到了党中央同意，毛泽东在批示中曾给予高度评价：“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①汇报后，董必武和王若飞于二月十三日返回重庆。

国民党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没有诚意，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又十分不利，于是，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指使暴徒破坏二月十日在重庆召开的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较场口事件”。接着又在二月二十二日，借口所谓东北问题，再次指使特务暴徒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在重庆掀起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示威游行”，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了报社工作人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系列极

^①王若飞、董必武：《关于整编军队问题的书面意见》，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端严重的挑衅，董必武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一起，立即挺身而出，和特务暴徒展开了说理斗争，并向受欺骗的青年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受骗青年起来制止内战，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经过说服教育，不少受骗青年认清了国民党的阴险面目，有的立即反戈一击，和特务暴徒展开了斗争；有的给《新华日报》写信，慰问受伤的同志，并表示今后决不再被人利用，也决不饶恕特务们的卑劣行径^①。

三月间，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秘密策划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董必武得知后，立即公开提出：“必须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目前应召开政协综合小组讨论，保证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②三月二十一日，董必武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我们预料本届参政会对政协之一切决议，一定会在各种掩饰下加以动摇，重复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各幕活剧，以谋不利于团结。因此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本届参政会”^③。随后，他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目的是“推翻政协决议，企图仍以‘五五宪草’的体系来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是今天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是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幕丑剧。”^④他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识破国民党的阴谋，为使中国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而奋斗。

①参见1946年2月《新华日报》及李金德的回忆材料。

②董必武：《在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载1946年3月19日《新华日报》。

③《董必武就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本届参政会事，答新华社记者问》，载1946年3月21日《新华日报》。

④董必武：《答〈七七日报〉记者问》，载1946年4月6日《七七日报》。

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公然违反停战协定，妄图用封锁、围困的办法，扼杀我中原解放区。从一月停战令发布至四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个地区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侵占大片土地，并在该区四周赶修碉堡工事，不许我方采购人员自由出入于中立区采购粮食，致使中原解放区广大军民处于无衣少食的严重困境。党中央派董必武前往慰问中原解放区广大军民，并帮助解决粮食问题。董必武接受这一任务后，于三月二十四日离开重庆到武汉。在武汉停留了数天，解决了粮食问题，当即赶赴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他不顾连日来的疲劳，立即深入到边区广大军民之中，详细了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困给边区军民造成的极大苦难，对边区军民进行亲切地慰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解放区犯下的种种罪行，激励并号召全体军民发扬八年抗战中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董必武的到来，我党中央的关怀，给中原军区军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董必武在和军区首长商谈、安排好各项重大问题之后，四月七日离开宣化店，取道汉口，十八日回到重庆，便立即向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不断蚕食进攻解放区的真相。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也随之来到南京。从此，董必武和周恩来又并肩战斗在南京和上海。

六月，蒋介石借口让黄河回归故道，部署在花园口堵口，企图水淹冀鲁豫解放区并切断各解放区的联系。董必武和周恩来及时向中外记者揭露了蒋帮这一毒计，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

不与我方就黄河堵口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先修复河道，将居民安全转移然后堵口放水的协议。但背信弃义的国民党政府，在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六月二十三日，悍然下令堵口放水。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交涉的同时，电告冀鲁豫党委对此项关系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必须时刻注意，不敢丝毫懈怠，要加紧进行复堤工程。从而使国民党堵口放水的阴谋未能得逞。

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下关惨案”，打伤了上海赴南京请愿的代表马叙伦等；七月中旬又连续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一起更为严重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七月二十八日，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争民主的牺牲》一文，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文章指出：反动派已不敢采用宪兵、警察、监狱、法院等公开的工具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甚至连希特勒式的审判的诡计也不敢采用，而是乞灵于美国秘密传授的无声手枪，偷偷摸摸地进行卑鄙的暗算。但是无论反动派怎样疯狂与残暴，决不能挽回它垂死的命运。一个坏政府想靠特务的恐怖手段来维持其黑暗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人民是不会容忍的。他号召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勇敢地举起民主主义的光荣旗帜胜利前进！

七月，蒋介石公然违反政协会议关于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擅自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催促各在野党于九月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九月六日，董必武以个人名义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指出，此举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我们坚决反对，并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接受这种未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单方面的决定。随即对来访记者揭露了

国民党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装出一副要民主的样子，但始终不肯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参政会不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装点“民主”门面的一个花瓶。五人小组的商谈，亦不过是以谈掩打的迷人烟幕。国共谈判总是谈不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

内战全面爆发的头几个月，蒋介石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疯狂进攻东北的同时，又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市及其附近地区。董必武对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谴责，并多次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交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进攻。九月三十日，他和周恩来、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联名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备忘录，指出：“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①。

国民党反动派敢于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疯狂地发动大规模内战，是由于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董必武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内战比赫尔利来华时，规模要大得多。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军队已动员，美制之飞机、坦克、大炮现正与人民作战，在中国人民身上起毁灭作用。如无美国的装备、运输，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

^①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就国民党军队若不停攻张家口，应负国共关系最后破裂的责任事，给蒋介石的备忘录》，载1946年10月6日《解放日报》。

义者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①美帝国主义除直接出兵出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外，还操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大量救济物资送给蒋介石作为发动内战的资本。董必武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多次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其远东分署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解放区受敌伪损害最大，难民最多，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这完全违反了联总规定的不得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之原则，致使救济物资不能分配到应该得到的解放区灾民身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不仅操纵了救济物资的分配与发放，利用救济物资武装军队，藉以扩大中国之内战，还派飞机故意轰炸运往解放区的救济物资，蓄意封锁解放区之救济口岸，使本已极少的救济物资无法运进解放区。他强烈要求联总采取适当措施，大公无私与合理地分配救济物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伪国大，最后关死了和谈的大门，国共谈判彻底决裂。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从此，董必武就担负起领导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的重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第二次下令在花园口堵口，二十七日挖开两条引河向解放区放水，妄图以此阻挡我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董必武立即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分别致函国民党水利委员会、行总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对国民党好战分子破坏历次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协议，破坏我方工程之进行，抢劫我方治理黄河之物资，不顾下游人民死活向故

^①董必武：《评马歇尔离华声明》，载1947年1月13日《新华日报》。

道放水等严重罪行，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一月五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黄河水患问题的讲话。随后，他于一月八日专程赴上海，与联总中国分署署长会谈有关黄河问题，并亲自向国民党政府及水利委员会提出质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不顾以往各项协议，急忙堵口放水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从而使国民党玩弄的黄河归故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

董必武十分注意争取、教育、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工作。当时中小工厂为了自救图存，成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董必武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告诉他们：“反动政府是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他们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任意摧毁民族工业，无恶不作。你们建立中小工厂的联合组织，就是要维护民族工业的生存。”^①他帮助他们分析了中小工业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庇护下，养肥了官僚资本，摧残了民族工业”^②。同时，他还针对中小工联部分会员只着眼于经济方面的思想，进一步指出：“各自为政，不过问政治是不行的。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繁荣就没有可能。”^③使他们认识到要争取经济民主，必须首先争取政治民主。逐步引导他们参加到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洪流中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反动派最后撕掉了和谈的假面具，强迫中共代表团于五天内撤离南京、上海，并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代表团驻地。董必武立即向国民党政府

①②③徐崇林：《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

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褫夺中共人员自由，系非法活动。包围办事处的军警必须撤走。”^①他同时教育办事处全体人员，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屈，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

董必武接到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宁、沪办事处全体人员于三月七日撤离南京。行前，他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国民党这一举动，显然企图配合政府之改组，俾求得美国政府公开的大量援助，借以鼓励前方颓落之士气，镇定后方动摇之人心，并残酷迫害日见猛烈之民主爱国运动”^②。“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民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好战分子行将自食其恶果。”^③“目前虽战祸蔓延，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④。临上飞机时，董必武向送别的各界人士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⑤历史的发展正如董必武所料，在两年零一个半月之后，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这个被国民党盘踞二十二年的城市，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①董必武：《向上海市市长、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局长提出的书面抗议》（本组存有复制件）。

②③④董必武：《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载1947年3月7日《解放日报》。

⑤刘昂：《董老领导我们战斗在虎狼窝里》，载《红旗飘飘》第17集。

党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中共中央机构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分别负责指挥战争和领导解放区各项工作，任命刘少奇为工委书记，朱德、董必武为工委常委。刚刚从蒋管区归来的董必武，根据党中央决定，立即离开延安，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投入了为统一华北各解放区，准备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紧张工作。

为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展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四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接受了这一任务后，立即赶赴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议，就统一财经问题和各解放区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必须积极促进财经工作的统一，但不可操之过急，要真正做到把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统一起来，还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此后，董必武向所属各级干部反复强调统一财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各战区内部联成一片，各战区间也联接起来了。要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范围的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财经工作必须统一。今后财经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并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要求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这一工作^①。与此同时，他又和华北财办的干部一起研究了华北各解放区原有的财经工作的决定、法令、工作计划、进出口贸易、币价比值等等，并于八月二十五日亲自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明确提出华北财办的任务是：“制定华北各解放区国民

^①参见董必武：《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

经济建设的方针，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调剂与管理；掌握各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等等。为完成上述任务，董必武领导华北财办，先后召开了军工生产、金融贸易等一系列工作会议，研究制定统一财经工作的办法、措施和切实可行的步骤；撤销了各区间关税壁垒，规定了各区货币兑换比较合理的办法；增进了各区民间贸易的往来；协同各战略区负责人调剂了贫富区的财政；确定了战时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基本路线；批判了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等等，调整了各解放区间的相互关系，解决了各区财经工作间的矛盾，逐步完成了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任务并为筹建中央财政准备了条件。为保证支援规模空前的人民解放战争和发展华北解放区的生产，迫切需要统一交通运输。华北财办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军工生产及交通会议。董必武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统一交通运输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交通运输的方针必须是：“一切为着争取战争胜利，一切服从战争需要。”^①从而推动了华北、西北和华东各解放区公路、铁路、河运、邮电工作的统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董必武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土地改革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前已提出来了，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彻底解决。这次土地会议就是要解决二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强

^①董必武：《适应形势发展，做好交通工作》。

调：“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会议期间，董必武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对农民分得土地后，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进一步调动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八月十七日向大会作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合理地解决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假使新翻身的农民只获得了土地，而依然缺乏生产资具，假使农民感到负担太重，那就必然减少农民对于利用土地来从事生产的兴趣。所以生产和负担问题，必须和土地与民主问题同时解决，才符合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接着，他又针对农村经过土改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三项补救办法，着重论述了“在自愿原则下，把农村的全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组织起来互相变工的好处，和在自愿原则下，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的优越性。”他在谈到土改后如何公平合理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时，指出：“整理村财政、节约民力、减轻战勤负担，以及用改良制度、调整人事、民主讨论等办法，来达到负担的公平合理，这是今天解决负担问题最实际的办法，也就是公私兼顾、军民两利的办法。”他还说：“不顾战争需要，单纯要求减轻负担，这种‘仁政’观点，对革命是有害的，也是损害群众整体的久远利益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指挥之下，实现华北的全面统一。五月成立了华北中央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

经过一系列准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在石家庄开幕，董必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他在开幕词中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因此，它是一次划时代的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正式合并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并于八月十八日选举董必武、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等二十七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九月二十六日，董必武率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并在就职大会上讲话，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明确提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从各方面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华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各界，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响应华北人民政府的号召，立即掀起了空前的生产和支前的热潮。董必武在总结支前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时，十分满意地指出：由于党政军民上下团结一致的努力，只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就动员、组织了四千七百余万人力、一千七百余万畜力支援前线，供应了各种军需物资八亿七千多万斤，有力地保证了平津、徐州、晋中、察绥、淮海以及大军南下、西进等重大战役的军需供应，保证了各路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增加支援前线的力量，必须在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迅速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等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以减少军队在行进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不便。为此，党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

经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任命董必武为部长。他遵照中央的指示，为统一华北、西北与华东三区的货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他还带领中财部的干部审查了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研究了各解放区执行财经政策的情况，调剂了各区之间的财政收支及财经关系，提出了统一各区财经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为尽快实现三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党中央决定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作为三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由董必武兼任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立即主持华北财经委员会，研究统一三区货币的具体办法和步骤，决定先将晋冀鲁豫边区之冀南银行与原晋察冀边区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固定比价，互相通用，成立华北银行；接着又于十二月决定，将华北币与山东、西北各区原有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在各区货币统一流通的基础上，又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同时，又进一步调剂了各地区的财政，统筹了各地区的贸易，审查并建立了各种经济法规，收集整理了有关财经工作的大量资料，初步实现了华北、东北、华东三区财政、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的统一。

董必武十分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他在就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所建议的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首先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十月六日，他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权。他认为以往我们在解放区建立的革命政权，一般还是军政府性质的，还没有取

得建设完备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经验，这就需要通过实践加以摸索，逐渐完备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此。他提出在整顿基层政权的同时，要积极为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作好准备，并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地区，进行了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重点试验。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和试验，董必武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对村县政权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具体的步骤。他说：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村级，小村可用村人民大会，大村可用村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村人民政府；县级要用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县人民政府。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搞好政权建设工作，必须注意发动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①。在以董必武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华北地区普遍进行了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选举工作，为人民政权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董必武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他曾明确指出：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就要创建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来维护新的社会秩序^②。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他提出了建立人民的法典与健全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北人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颁发了《废除国民党法统及其〈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董必武亲自领导司法部门举办司法干部训练班，帮助司法干部确立革命的法律观点，批判旧法思想，总结人民革命多年来的政法工作经验。为了促进中国的法学研究，董必武还发起建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并当选

^①参见董必武：《关于农村建政问题的谈话》（本组存有复制件）。

^②参见董必武：《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为领导人。

为了培养足够的干部适应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迎接全国解放，董必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并首先从整顿和发展中、小学教育入手，切实搞好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华北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游击作风和无纪律无制度现象，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以提高文化为主，把教育工作提高一步^①。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董必武当选为主任委员。他多次主持召开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研究讨论高等学校的招生原则、毕业生的训练与分配、文物与图书的管理以及大学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问题。

在抓大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董必武还大力提倡开办冬学和民兵夜校以及在新解放的城市举办干部学校，把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市政管理和建设干部，为作好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我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为准备建立全国的人民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起下，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开幕。董必武参与筹备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参加制定共同纲领的同时，还担任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的组长，首先起草了《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对国家名称、政权性质、

^①参见董必武：《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载19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最高政权机关及其组织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随后在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董必武还领导、动员华北人民政府的干部努力工作，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他对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作了《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和职权，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代表中国人民做政治协商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各界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必须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接着，他又论述了团结民主人士，发展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我们联系得愈广泛愈紧密，我们的敌人就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顺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①。“为了孤立反革命势力，必须争取可能争取的一切人士归向革命”^②。

在我党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政府的号召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及海外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陆续来到华北解放区。董必武以高度热情和诚挚态度进行了接待，并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解放战争中，曾得到各方民主人士的支持，现在残敌就歼为期不远，全国解放已经在望，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繁重任务，急需群策群力扶助，希望更加困

①②董必武：《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结起来，共同奋斗^①。

为了动员广大知识分子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大力推动并促成组织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董必武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并于七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必须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此外，董必武还在全国自然科学、全国社会科学以及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胜利开幕。董必武在会议进行的第二天，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这次会议，依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全国政权。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①参见董必武：《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的讲话》，载1949年3月2日《人民日报》。

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当时，国民党政府逃跑后遗留下来的党政机关人员和档案、图书、财产以及各种物资急待接管。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政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一切接收事宜。董必武受中央指派参加了该委员会工作，并参与制订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条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率华东区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进行接收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接收、训练、安置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各系统的旧人员二千多名，接收了各种档案、图书等六千多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察哈尔北部发现鼠疫。董必武奉命于十月二十七日召开紧急防疫会议，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讨论并制订了各项紧急防疫措施。随即成立了防疫总队，组织四千多名医务人员开往疫区，进行了防疫灭灾的大量工作。在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防疫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迅速制止了鼠疫的蔓延。这期间，董必武还多次主持召开各种救灾工作会议，对因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破坏较严重的河北、山东、苏北、皖北、陕北等地四千万灾民，进行了救助。在他的建议下，十二月下旬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他立即主持制定了中央救灾委员会组织通则，并在一次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受的“灾”，正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祸”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是中国人民贫穷和灾难的总根源。他明确提出：救灾工作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互助自救，政府给灾民以必要的和可能的救助，有计划地采取救灾与生产结合及以工代赈的办法，把救灾工作与兴修水利、治河、植树和增进农村副业结合起来。随即派出工作组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慰问，同时发起组织城市节约劝募运动，为灾区募集了大量的寒衣和救济物资，调拨了灾区所需的口粮和种子。由于措施得力，工作扎实，使大批灾民得到救济，并为灾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政府还拨出一部分经费并号召各地工会、工厂、机关、学校、部队捐助，进行了城市的失业救济。一九五〇年夏初，中央防汛指挥部成立，董必武兼任指挥部主任，因指挥及时，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洪水灾害，并督促了各地的堵口、排水和种麦工作。

为了迅速战胜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董必武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领导政法部门主持并积极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开展，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人民法庭组织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多种法规和条例，保障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董必武一贯十分重视政权工作，不止一次地论述了政权和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革命者所以重视政权，因为他们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摧毁旧政权机关，依照革命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新政权并加以巩固，

这些都是建设新社会的先决条件。”^①而且只有建立新政权机关，才能实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才能保障我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将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机构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并领导制定了《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组织条例》、《惩戒违法失职人员暂行条例》及《任免国家机关人员条例》，建立了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公程序，加强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接着，他便担负起领导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地方政权的繁重工作。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取了由解放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再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作法。董必武对这一新生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十分重视，他说：“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力量的源泉。”“这个制度是最便于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形式，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最好办法。”^②他还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目前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最合时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为了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参与领导制定了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农村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后，董必武派政法委员会干部

^{①②}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到北京、山西、察哈尔、河北等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政权建设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一九五〇年七月，董必武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搞好建政工作，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提出了目前建政工作的重点在县，应首先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以示范区、乡，并带动区乡。

为了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董必武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向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县长会议，以便先从华北地区开始，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大行政区。经过一系列准备，华北县长会议于九月二十三日召开，董必武在会上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重要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我们国家政权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因为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开得好，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起来管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务，就能使广大人民积极地和我们一道去完成当前诸般工作任务，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能监督我们的工作，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以便及时加以纠正。”^①当前，“在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以开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关键。”^②他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加强国家政权，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党领导国家政权，决不是说党可以代替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直接向国家机关发号施令。党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把它强化起

①②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来，使它能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

华北县长会议后，董必武又根据县、乡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三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毛泽东写信，提出“各地建政工作除必须党来领导外，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较好些；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①毛泽东对这些意见极为重视，第二天就给董必武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认为你给华东局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②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在当年召开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六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重要讲话，论述了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而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必然发展。这样人民权利的充分发挥，将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更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使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建设

①董必武，《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华东局的信》，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毛泽东给董必武的复信，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更加完备，更加巩固，使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的实现，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会后不久，董必武就从政法委员会抽调干部，到济南市进行普选工作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试点，总结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

一九五三年九月，党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投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为了使政权建设促进并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董必武于十月三十一日在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作了《认真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好民政工作》的报告，着重论述了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愈强化，就愈能有力地领导和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是保证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董必武在大会上作了《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加强守法思想问题》的发言。他说：“从一九五三年起，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普选运动，使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更充实更完备的新阶段。五年来政权建设的经验证明，凡是认真发扬了民主，把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提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或小组会议上展开讨论，并且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那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发挥。政府工作就有朝气，就可以少犯或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发挥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在大力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又致全力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他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作过多次极其精辟的论述，指出：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响，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家手中对付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工具。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的新法制这一紧张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政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完善的法律。接着，他参与或领导制订了《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全国犯人劳动改造条例》，以及民法、刑法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和法令。

董必武对中央与地方政法机关的建立给予高度的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就协助周恩来，迅速地建立了政治法律委员会以及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等政法部门。不久，各地司法局以及公证机关、律师制度等也先后建立。一九五一年五月，董必武领导政法委员会讨论决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负责指导与联系民

政、公安、司法、检察署、法院、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并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随后，董必武又以很大的精力领导了司法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央政法部门按照董必武的指示，组织了四个联合视察组，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进行有重点地调查研究，发现司法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他立即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改造全国的司法机关和干部队伍。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支持下，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董必武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在运动中，他多次作了重要讲话，论述了建立与健全司法机关的重要意义，指出司法工作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的直接工具，是组织与教育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他还论述了彻底改造与整顿各级司法机关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将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中清除出去。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底，全国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这次运动使全国司法干部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

在改造旧司法人员的同时，董必武非常重视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政法工作干部。他多次指出：加强培养政法干部，是我们党领导政治法律工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他针对全国解放以后政法干部极为缺乏的状况指出，过去对政法干部的培养问题注意不够是可以理解的，若今天再注意不够，政法建设就很困难了。又说：对于干部培养，如果现在不考虑到将来工作发展的需要，等到事到临头再筹办，是会赶不及的。因此，董必武一开始就积极抓紧政法干部的培养和政法院校的筹建工

作。一九五〇年五月，董必武主持召开的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第一次会议，就研究了对大学政法院系的课程改革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设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建议，并亲自领导筹办和调配干部、教师等工作。一九五二年十月，他又全面具体地提出了训练政法干部的意见：（一）各大学的政法院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训练；（二）政法干部学校：对政法干部进行轮训；（三）各省市开办政法干部轮训班。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撤销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董必武得知后，立即指示必须恢复与重建。他亲自给北大法律系调配了领导干部，对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意见。在他的关怀与推动下，北京、上海、重庆陆续成立了政法学院。他还提出办中级政法学校，在普通中学设立宪法课，配备宪法课教师等一系列积极的主张。

为了促进法学研究，加强同各国法律团体的交往，扩大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影响，经他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四月成立了政治法律学会，他被选为会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我国法律建设的成就，广泛交流了经验。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法学杂志《政法研究》于一九五四年创刊，法学研究所和法律出版社也相继建立。

为了总结司法工作的经验，研究司法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董必武于一九五三年四月领导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并作了《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报告，明确提出了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指出：“目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司法工作更加繁重，今后

应加强司法工作，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一九五五年三月，董必武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他说：司法工作的锋芒是“通过审判活动，配合公安和检察工作，镇压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特务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分子，同时通过工矿企业中的责任事故案件的处理，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守法教育。”他还要求各级法院把审理有关经济建设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漏洞，向有关方面提出改进工作和预防犯罪的建议。

为了保证法院能正确、合法、及时地处理有关经济建设的刑、民事案件，遵照有关法律规定，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各省市法院设立了经济建设保护庭（组），并加强了对这些专门审判庭（组）工作的监督和检查，使其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公证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了。这些机构的建立和公证工作的开展，对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及提高审判质量和政策观点，都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搞好审判工作，提高审判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董必武十分重视实事求是地总结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在他亲自主持和直接领导下，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法院派出工作组与下级法院结合，对十四个大城市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总结。在此基础上，他亲自拟定了起草刑事诉讼法指导思想的提纲。与此同时，他领导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各地调阅刑事案卷一万九千二百多卷，并邀请立法、司法部门和政法院校的专

家进行座谈和研究，对有关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还利用外出开会的机会，了解各地法院的工作情况，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或重大案件作出原则指示，及时发现并纠正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由新疆返京途中抵达兰州时，听取了甘肃省法院和检察院负责人的汇报后，纠正了两起重大错案。他针对乡干部由于强行制止农民为求雨唱戏拜神遭群众殴打，有关领导部门认定群众殴打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的活动，将四个农民判了死刑、一个判无期徒刑、两个判长期徒刑的重大错误，指出：农民有封建迷信思想，只能靠细致的思想工作去消除，而不能靠政府下令制止。干部强行干涉是不对的，怎么能把这些农民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和徒刑呢？他还进一步指出：法院办案要注意两个界限，一个是要弄清有罪还是无罪，不能把无罪当有罪；一个是要弄清该杀还是不该杀，不该杀的杀了，错误就难以挽回了。董必武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精神，使广大政法干部深受教育。

为了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董必武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法制宣传。一九五四年五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再次提出必须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认识“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照规定的程序制定出的，是全国人民的意志经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又经过一定的手续讨论通过的。”“它的意义是庄严的，通过它的手续是慎重的。”因此必须注意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他进一步论述了要教育人民守法，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守法执法模范的重要意义，指出：“目前应该很严肃地提起国家工作人员的注意，大

家应该守法，并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这对贯彻我们党的总路线有重大意义。”

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作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再次论述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实现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党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只有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在论述怎样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时，董必武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要做到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他还说：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党的监察委员会要关心法制工作，认真的监督党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董必武的这些论述，对加强我国法制

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十四岁高龄的董必武，早在一九五六年即开始向党中央提出申请：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及身体状况，不要再安排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主要职务，以便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创造接班条件。

经再三申请，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批示同意改换他的工作，并希望他勉为其难，为党担负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严肃认真地挑起了一个高龄老人难以承担的重担。首先，作为国家副主席，他肩负起接待国宾和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大量的外事活动；还以中国政法学会会长的身份接待许多外国法律工作者的访问；同时作为党政领导人之一出席党和政府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参加一些部门的工作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认真地贯彻党中央有关重大问题的决议精神。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先后出席了政法部门召开的全国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残废军人、烈军属、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两个会上分别作了《正确总结经验，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和《做出更优异的成绩》的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政法部门取得的成绩，要求把政

法工作提到更高水平。针对某些人过分强调我国立法工作不完备的说法，他指出：“……我们不追求形式。只要合乎马列主义原则，合乎实际需要，……草创伊始，不会那么完善。……只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不断地修改，就一定能够一步步完善起来的。”

董必武在一九六五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时他已年届八十高龄。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先后到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北起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南至南海之滨的海南岛，东到烟台，西至新疆，都留下了他的辛勤足迹。他视察了各地的工矿企业，水利工程，边疆民族自治区，以及各地人民公社。每到一地，都深入到车间、工地、食堂、大队，调查了解了这些单位的生产、科研、群众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赞扬了一些单位高速度生产、施工和改变生产面貌的成绩，并对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抓好生产、搞好生活提出了积极建议，有时还身体力行，促其改进和实施。他在每次视察之后，都及时地与有关同志一起把了解到的情况系统地加以整理向中央汇报，供中央指导工作时参考。一九五九年视察东北地区时，他了解到传统的黄金产区生产下降的情况后，便和同去视察的朱德、林枫等联名向中央报告。此后，又多次向冶金部的主管人员了解我国解放后黄金生产的情况，指出在国际市场上黄金是最自由的外汇，增加黄金生产是最大的积累，是扩大进口技术设备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建议凡是有条件生产黄金的都应积极安排生产；还建议规定超产提成制度，允许地方在提成范围内从国外进口一些地方上需要的设备，藉以鼓励发展生

产，促进国计民生。他非常关注这项工作，直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出有关发展黄金、白银生产的意见。他在视察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对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文化教育，进一步建设民族区域自治，都作了赞扬和鼓励。在内蒙古视察时，还对昭君墓作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的题词。他在视察中，了解到许多地区农村烧柴很困难，便积极设法解决。当他在报纸上读到沼气可用于做饭、照明和发电的报道后，便向湖北沼气利用研究小组和农业部主管沼气工作的同志了解沼气情况，并亲自到利用沼气较好的县、市实地调查，还查找有关沼气的技术资料。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他得出结论：在农村推广沼气，经济上合算，技术上可行，既能解决烧柴困难，还可照明发电，能节省大批柴草、稻麦秸、煤炭、煤油和植物油，同时有利于积肥和环境卫生，是一举多得，其利无穷的大好事。于是他建议先在湖北省的几个县试办，取得经验有了把握，尔后逐步扩大范围。从而推动了沼气的广泛利用和推广。

董必武对植树造林工作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他在各地视察中，特别是一九六三年视察了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后，对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前的工农业生产，而且关系到子孙万代。一九六三年底，在二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植树造林的专题发言。此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工作。他要求把植树造林工作由过去多从国家、人民现时需要着眼，提到进而为农业保持水土、改良土壤、防旱防涝、防风固沙、促进农业丰收，更进而为改善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福子孙万代着想的高度。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植树造林工作的设想，建议把广大农村充分利用四旁植树和铁路、公路利用两侧隙地植树作为重点，号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农户大办林业；铁路、公路要把植树作为本身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设想，如果按五千余万农户，每户年植十株树计算，每年可植树五亿余株；又据铁路、公路章程规定，路两侧应留隙地十五米宽，除去不能植树的地段，按十七八万公里计算，每公里可植八百到一千株树，三十年成材可得六百五十万到八百五十万立方米木材。他还设想各省区利用驻屯军队有计划地在荒山荒地植树，再动员学生作为植树造林的一股巨大集体力量。他在同年六月份给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的信——《植树造林工作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就如何解决植树造林中的思想问题，如何建立各种制度、做出规划、确定林权、收益分配，甚至连育苗、经费、技术指导等等细节，都提出了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各级领导。他亲自到广东、广西、湖北、山东等许多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部队、学校以及林业部、交通部，做各级领导的思想工作，抓各种植树造林的先进典型，并把他们的经验进行交流推广。在董必武的推动下，植树造林在很多社、队，在铁路、公路两侧和后方驻军中开展起来，并取得显著效果。湖北、广西、烟台驻军和河溶中学等，都纷纷向他报告植树造林成绩。林业部、交通部召开全国公路绿化经验交流大会时，他亲自写了贺词。为了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的宣传工作，董必武还把关于植树造林的设想写成通俗易懂的长诗，并且为林学院写了《为林学院补壁》七言绝句两首：

“秃岭荒山须覆盖，河滨河坝要经营。环村尽有空闲地，树木

栽培志士争。”“利在将来常被忽，效生左右会当寻。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年动乱开始的前夕，他还在抓植树造林经验的总结、推广。

董必武从改变农村面貌，提高社员生活水平着想，非常重视多种经营。他曾为推广蓖麻蚕亲自做试验，取得成功后又由小及大逐步推广到红安、湖北河溶中学等三个不同条件的地方进行试养，并在选蛹、选蛾、选种、保暖过冬等一些关键问题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一再嘱咐试养的地方，待取得实际效果以后再建议当地党政领导部门向农村推开，以保证农村能获得实际利益。

如今，植树造林、沼气利用、饲养蓖麻蚕、黄金生产等等事业，都已在董必武辛勤耕耘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这些既有利于当前国计民生又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比起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它却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董必武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洞，党要用我去补，我就把它补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作固然需要人去做，但补洞洞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俗话说：‘小洞不补，大了二尺五。’补洞洞的工作搞得好不好，有时也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董必武在八旬高龄的晚年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人民奔波劳碌，却自谦为负重的老牛。他以“驽骀荷重难胜任，唯望鞭策使凛竞”的诗句，鞭策自己除了“吃点草料”之外，不应再向主人索取什么了。他处处为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着想，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勤俭节约，对一粒米、一张纸、一点汽油、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常珍惜。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再教

育人们说：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人浪费一点，就要给国家增加很大的负担。

董必武对青年一代寄予极大的期望。他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接见《中国青年》杂志记者访问时指出：青年是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应在祖国建设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要搞建设没有学问，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青年时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和锻炼身体，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理论水平，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增强自己的体质，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青年要立大志，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它和运用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改造客观世界。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又红又专。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自觉性，要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不怕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要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革命动力^①。

董必武虽然离开了领导实际工作的主要岗位，但他并没有卸下自己的担子，而是以更高的热情为党分挑重担。他说“要演好一场戏光有主角、配角，没有跑龙套的，戏就演不成，主角要认真演，配角和跑龙套的也要认真演才行。”他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把一些人们不大注意，甚至被人们轻视的工作承担起来，并且认真负责地把它干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必武虽然在党的“九大”、“十大”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十大”后又

^①参见董必武：《立大志》和《怎样培养和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分别载于1960年第1期和1963年第3—4期《中国青年》。

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甚至对外以国家代主席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很多重要会议、重要决定根本不通知他。就连“亲切长征伴”、“堪为我辈师”的徐特立逝世的消息，也是在五天后从《南方日报》上读到讣文才知道的。非但如此，他自己也屡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他同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被诬为“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准备搞武装叛乱”，“要搞政变”，遭“勒令检查交代”。一九六九年林彪、江青一伙又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强迫他离开北京到了广州。一九七〇年除夕，他喜遇叶剑英，当即赋诗：“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发出了无限感慨。一九七二年，他对“立功丰不伐，求艺广多成”，“忆昔比邻住，曾为倒屣迎，阊阖谈国事，了了述边情”的陈毅被折磨病死，发出了“栋折我忧压，伊谁继直声”的忧虑。董必武对党和国家的不幸心急如焚，为战友被逼相继去世无限悲愤。但他既未向林、江一伙屈服，也未对中国革命丧失信心。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以多种形式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老牛负重耕荒地，斑豹韬文隐雾坳”，示以注意警惕坏人的阴谋诡计；并以“风来有迹叶微动，潮退无声滩渐明”的诗句，教育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当他看到造反派小报上诬蔑许多老同志是“叛徒”、“特务”、“投机分子”时，便对身边的同志说：“经过党多年反复地审查和考验，绝大多数叛徒、特务、投机分子在党内存不住身，早被历史淘汰了。”就在很多老干部遭受林、江一伙的围攻时，他在自己所属的党支部会上，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根据自己在党内五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向全体党员追忆党的历史，赞颂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当九届二中全会揭穿林彪、陈伯达等人的

阴谋时，他赋诗“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在林彪及其死党叛逃坠机死亡时，他写了《观坠机中尸影》诗，无情痛斥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董必武对林、江一帮的独裁统治无比气愤，他在给一些老同志和某些单位题字时，多次写“群言堂”三个字的大字横幅，示意人们要同林、江一帮人的独裁统治斗争，疾呼不要窒息民主，不要堵塞言路。

董必武没有被林、江一伙的嚣张气焰压倒。他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参加一些对党、对国家有益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六六年八月，他遵照“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命他编写党史的指示，提出组织党史编辑委员会及其人选，准备编写党史，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实现。他积极参加对外的国事活动，增进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谊，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为了搞好这些活动，他总是在事前认真查阅有关国家各方面的资料，充分进行准备。会见时常常一、两个小时，必要时以更长的时间进行交谈。有时甚至忍着病痛，用药维持也从不延误预定的接待活动。一九七五年初，他已经九十高龄，且身染沉疴，但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后，他置身体病痛于不顾，仍参加了对外的国事活动。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董必武写了《九十初度》自寿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阐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对祖国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无所畏惧的乐观胸怀。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因肝癌不治，与世长辞。

编辑组附记：

一、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一) 董必武的有关著述

1. 为蔡济民洗雪公电。
2.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报告。
3. 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
4. 在武汉三镇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5.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惩治、审判土豪劣绅等二个条例的说明。
6. 给何叔衡的信。
7.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
8. 怎样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9. 关于参政会五要案向中央的报告。
10. 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发言。
11. 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驳斥何应钦的发言。
12. 接见中小工业界代表时的讲话。
13. 就宣化店之行的任务及国民党围困、进攻中原军区的罪行等问题答记者问。
14. 为呼吁立即停战实现和平等问题给国民党代表的信。
15.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黄河水患问题的讲话。
16. 在晋察冀边区干部会上作关于蒋管区一般情况及民主运动的报告。
17. 在华北人民政府草拟施政纲领和计划专门委员会上的讲话。
18. 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 就察北鼠疫停止蔓延、开放京绥路交通事给铁道部的信。
20. 政务院第六次会议上所作关于华东区工作团的报告。
21. 在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机关会议上所作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
22. 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几项重要工作。

23. 关于成立政法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24. 关于建议建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给刘少奇并毛主席的信。
25. 关于东北地区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2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黄金、白银生产问题的发言。
27. 关于植树造林、养蓖麻蚕等问题与湖北林业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

(二) 董氏族谱。

(三) 内阁官报。

(四) 董必武同志少年时代在麻城宋埠张杰湾的读书活动及宋埠教案的调查报告

(五) 黄安县志

(六) 李维汉、王震、杨尚昆、熊瑾玎、吴德峰、郭述申、茅盾、何长工、夏之栩、刘昂、袁浦之、侯政、潘琪、许涤新、曹靖华、董献之、周梦萍等的回忆录或访问材料。

二、本传略由吴大羽主持，刘廷晓（分担第一、二、三章）、张永远（分担第四、六章）、曹为（分担第五、十章）、马鸿儒（分担第七、八、九章）参加，集体编写修订完成。牛立志参加了第一稿的第十章、谭玉轩参加了初稿的第九章的工作。董良羽参加了全稿的讨论修订，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并承中央档案馆，重庆、湖北、南京和上海等省市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任作民

陈志凌 任楚

任作民，一九二〇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一月转党，先后在上海、河南、山东、湖南等地，担负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因叛徒告密，两次被捕，长期被关在敌人的监牢里，受尽各种酷刑，几次昏死过去，遍体是敌人烧烙的伤疤，但他从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倔强气概^①。一九三七年十月，任作民被营救出狱^②。后调党中央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去世。任作民为党为中国革命事业兢兢业业，诚诚恳恳，贡献了毕生精力。

任作民乳名任菊，又名任培度，在苏联改名蒋鼎，一九二八年在开封叫张德富，一九三三年在济南被捕时又改名王敬

①林伯渠：《悼任作民》（1942年2月24日）。

②中央组织部1980年4月21日印23号文件称：“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功；在白区工作时，还叫过老李、老周等代名。他于一八九九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熟塘乡上桑冲村（现改为汨罗县弼时公社毛塘大队）的一个中农家庭。幼时，父辈兄弟未分家，全家有二十多口人。其父任绍霖（字裕昆）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派任绍霖去山东，担任山东省民军司令部秘书长及参谋官等职，领导了烟台的武装起义，并在烟台成立了军政府。后奉命回湖南做谭延闿的工作，并担任湖南省立政法学校教授及律师等职，一九一四年病逝。母亲周春桃，在家抚养子女，操持家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去世。

作民七岁时，入本乡族立序贤初级学校读书。一九一〇年进入高等小学。一九一四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第二年又进入长沙私立开物乙种农业学校。一九一六年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在长沙期间，作民有一年多和父亲住在一起，受到他父亲民主思想的熏陶，开始担忧国事。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清朝腐败无能，外交失败，割地赔款，贻害人民，我长大成人，一定要随千军万马，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以及一切害人虫”^①。一九一九年四月农校未毕业回到家乡，原想以学得的农业科学知识试验种田，因叔父反对，此举作罢。回家不久，和农村姑娘范友莲结婚。同年五月，作民去上海，住在其兄任新典处将近一年。在那里他努力补习数学，原想继续升学，但无钱交纳学费；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又无处筹集路费。正在这个时候，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

^①转引自丁祝华：《回忆任作民》（1982年8月），未刊稿。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更加激起了作民的爱国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中国劳苦大众的贫困和受人压迫，他忧心如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他感到革命无路，救国无门。不久得病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养病。

一九二〇年冬，任新典给作民来信：“陈独秀、杨明斋在上海举办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并有希望去苏留学”。作民随即找几个同窗好友，报告这一好消息，商量去上海事宜；稍作准备后，便辞别母亲和妻子，和任弼时、肖劲光等四人，搭乘轮船离开家乡，第二次到了上海。到上海后，作民住进了陈独秀、杨明斋办的俄文补习学校。当年冬天，经刘少奇介绍，任作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四月，任作民和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几名青年离开上海去苏联，途经海兰泡时，组织上临时决定作民留下，分配他到苏联红军中国支队作政治工作。八月，作民到达莫斯科，随即入东方大学。

一九二二年一月，作民经罗亦农、刘少奇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作民、刘少奇、罗亦农等中国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学生参加了大会，听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报告以及日共领袖片山潜的讲话，对革命道路的认识更清楚，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更坚定了。二月，共产国际因工作需要将作民从东方大学抽出来分配到远东，参与领导苏联境内的中国工人运动，负责主编工人报《工人之路》，并任该报社党支部书记。五月，由赤塔到海参崴，继续编报，后改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六月由海参崴到伯力，参加全俄工联远东局，在赤塔任省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

一九二五年四月，作民奉中央电召，由赤塔动身回国，五月到达上海，分配在党中央担任秘书兼管会计。九月，作民回湘探亲，接妻范友莲到上海。一九二六年七月，范友莲生次子任湘，产后四个月范氏去世。此时，作民奉命到武汉党中央接受新的任务，遂委托毛泽民将他妻子遗体和婴儿代为送回家乡。

一九二七年三月，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党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作民调到陈独秀办公室工作。同时调到办公室的有黄玠然、作民的妹妹任淑兰。陈独秀指定作民负责办公室领导工作（相当于办公室主任），黄玠然担任秘书，淑兰分管机关事务与生活。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任务繁重，活动频繁。党中央机关在武昌，党的会议和日常工作在武昌进行；鲍罗廷公馆在汉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办公机关也在汉口，许多重要问题又需去汉口商量。陈独秀一时在武昌，一时在汉口。陈独秀从事的主要活动又要作民参加。作民为了适应工作要求，早上去武昌中央机关，下午渡江到汉口，晚上从汉口回武昌，每日两地奔忙。五大召开期间，作民是大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五大以后到七月初，武汉政府内部反动派阴谋叛党，党内也开展了剧烈的斗争。此时，作民已不是早出晚归，而是时出时归，没有常规，千头万绪，显得十分繁忙和紧张^①。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作，“七·一五”国民党公开叛变，我党转入地下。八月，作民被派往开封，担任中共河南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周以栗。省委机关设在开封市游梁祠街。作民更名为任菊，周以栗更名为易云，作民原籍湖南改为

^①黄玠然1982年11月8日的回忆。

陕西，说是在湖北汉口作生意的。据李馥清回忆：“一九二七年秋，距开封市龙亭不远的一条窄小的东西街道，面向南的一个院子的小屋内，住了有意组织的一家人。房主姓雷名云樵，中学教师，其妻名为李学菊，家庭妇女……^①，一天下午，又搬来了在汉口作生意的两表兄弟……。表兄易云住上房，任菊表弟住南屋，北边一间作为灶房，还有一间是请来帮忙的王姓嫂子住。看起来，这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早晚，雷云樵都要出门去办他的事，不大出门的是这两位表兄弟，因为他们刚到开封情况不熟悉。王嫂羡慕说：‘你们四个人真过的好，表兄表弟，比亲兄弟还亲热。’这里也经常有人来打牌，谁赢了总得给这位王嫂分几个头钱！警察来查户口时，王嫂首先说：‘唉，这一家人真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家，难得兄弟们连句高声话都不说。’警察也认为这家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相称，后来每次来查户口时，多是盖个公章就匆匆走了。”^②

一九二八年春，河南军阀也加紧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和屠杀。国民党特务到处捕人杀人。郑州、许昌党的地下组织首先遭到破坏，有两个叛徒被敌人带到开封来破坏省委机关，拘捕省委领导人。春节过后，雷云樵在一家旅馆与地下交通人员接头时，碰上特务，遂被捕。不久，地下交通员安子文又被捕。周以栗和作民等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立即将省委机关转移，省委秘书处文件和材料也同时分散保管。这样，那个作为掩护省委机关的临时家庭也随之分开了。周以栗分散到开

^①雷云樵即雷晋笙，任省委秘书长。李学菊即李馥清，任省委委员。

^②李馥清 1960 年 11 月 6 日的回忆。

封第五小学教师马菊如家住，后来敌人从马的来往信件中查出她有共产党嫌疑，将她拘捕。在查抄她家时，发现了周以栗的住址。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一大早，特务包围了周以栗的住宅。周以栗、赵天明（郑杰）等人和赵的夫人及两个小孩同时被捕。早饭后，作民去找周以栗，一进门就被捕了。十时许，作民被送到冯玉祥总司令部军法处，关进一间大房子里，命令两个荷枪士兵看守着。敌人把作民当成省委主要领导人，开饭时，送来了白馍、米粥和小菜，态度相当客气，妄图诱作民投降。

下午三时，敌人派来一个凶暴的法官审讯任作民。作民根据已准备好的口供回复：“我姓张，名德富，湖北广水人，因有朋友在北平，想到那里托他谋事。我是银号店员，由汉口动身的时候，一个朋友要我替别人带封信到开封，昨天才到。今早上街找人，问错了门，遭错捕。”敌人逼问他的住处，他始终不承认。敌人开始下毒手，命令五条大汉，将作民揪上老虎凳，用麻绳捆住双手，脱掉衣服，再用毛巾堵塞嘴巴，拼命用力压杠子，作民昏过去了；松开后，作民苏醒过来，再问，无结果；又动刑，仍无结果。最后，敌人提审赵天明出来对质，赵拒绝承认认识任作民。敌人用皮鞭抽打赵的背脊，坐老虎凳，从鼻孔灌水，将铁制通条烧红，烙赵背上和腰的皮肤，用香火烧赵的肋窝，烧得赵死去活来好几次，但赵天明什么也未讲出来。赵天明被架走了，又来审问任作民，要他交出省委机关和领导人，作民回答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又将对赵施用的那一套刑具，用在作民身上。作民比赵天明身体虚弱，一动刑，就晕死过去，一连施刑四次。最后，作民从老虎凳下来时，皮开肉裂，全身血肉模糊，两腿已伸不直了。但他坚持了共产党

员的立场，没有透露任何党的机密。敌人命令两个法警将任作民架回牢房。这两个法警在送任作民到牢房时，伸出大拇指赞扬任作民是硬骨头好汉，悔恨他们不该吃这碗丧尽天良的饭。由于用刑太重，任作民生命垂危。第二天一早，敌人请来了西医，以内服外敷兼用的措施，抢救任作民的生命。任作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昏迷不醒，日夜呻吟，吃不进东西，光要喝水，数日后，大便只拉出几粒黑紫色血块。大约过了十天，才勉强可以坐起来，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半个月后，任作民被押到开封第一监狱。监狱长凶暴残忍，不问政治犯刑伤严重程度，一律钉上一副大铁镣。任作民也被钉上镣铐。在监狱，任作民开始和邮务员张宜昌同住在一个号，由于张宜昌和某看守有特殊私人关系，通过他，任作民和外边党组织很快联系上了。任作民住的监房，七尺多长宽，住五个人，屎尿桶放在屋子中间地洞里，吃喝睡觉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子里，经常是臭气熏天。由于任作民等被视为政治要犯，不准看报、放风、接见，不准和别的犯人说话，监视也特别严，稍有不顺从，就遭到斥责和打骂。任作民伤情重，行动不便，还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特别是每次换药揭纱布，皮肤就象被剥掉一样，疼痛难忍。幸有一些早先被捕来监的难友，听说任作民等受了重刑，通过帮助狱卒送水送饭来传信问候，使任作民等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任作民等初到开封第一监狱时，政治犯人数六七十人。到六、七月间，中共河南省军委又遭破坏，郑州以及各县被捕同志陆续解到开封，政治犯数量达到三百人以上。为了团结革命同志，保持革命气节，打击叛徒特务的破坏活动，任作民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监狱难友的斗争。为了保护周以栗，避免

原来不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任作民主动承担支部领导工作。他是狱中我党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对外与党组织发生联系，对内联络各监号，根据监狱中的特殊斗争形式，安排工作。作民等在狱中领导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进行内部教育工作，以各小号为学习小组，讨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有争论的问题，还可请懂行的人解答；传递政治消息，指定坚定的同志，用写暗码、敲墙壁等形式，将狱中重要消息传送各号的革命同志，免遭叛徒特务的破坏；要求党员以身作则，保持革命气节，在监狱对敌斗争中起党员的模范作用；开展斗争，监狱里未组织大规模的绝食斗争，但和平方式的斗争还是不少的，如要求放风，要求准许通信、接见、看书，反对侮辱，改善伙食等；介绍出狱同志在狱中的表现，凡是出狱的人，都将详细情况介绍给党的组织（坏分子不接头）^①。由于作民等在狱中的积极工作，教育和鼓励了很多青年同志，争取和团结一大批青年学生，提高了他们的斗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南汉宸（秘密共产党员）任省政府秘书长兼代理民政厅长。南汉宸得悉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人周以栗、任作民等被捕，便奉党的指示了解关押地点。他注意省政府来往公文信件，果然发现警察局给韩复榘有一呈文，报告捕获了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开封监狱，但呈文中开列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却没有周以栗、任作民的名字。他又亲自到开封监狱查看，见到了周、任等人，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未暴露^②。当时，我党乘

①任作民：《自述》。

②南新宙：《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载198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韩复榘倒戈的机会，由国际济难会出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和营救。蒋、冯战争后不久，省政府指定宋则久等到开封监狱审理政治犯案件，一批被关押的青年学生经谈话后很快被释放。一九二九年六月，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任作民等案件。事先，任作民等得到消息说：由于蒋、冯战争，他们案件的档案材料大多丢失。于是作民等商量好，决定推翻此案，否认反动派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罪名。半个月后，高等法院开庭审判，他们口供一致，最后法院只得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任作民等离开监狱，刘道生代表党组织派人在法院门口接周以栗、任作民等，为他们租旅馆，安排地方洗澡、更衣、理发、吃东西。党中央寄来二十元路费，南汉宸又帮助了五十元。任作民和周以栗取道海州乘船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任作民到上海后，先在党中央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副部长（李维汉任部长），后改任省委秘书、沪东区委书记，较长时间任江苏省委巡视员，专门巡视上海沪东区、闸北区，还到沪宁铁路沿线各县巡视并指导工作。

一九三一年冬，任作民住在闸北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闸北，作民在炮火声中进入沪西区。他先找到了丁祝华的兄嫂处，请他们帮助找房子住下来，不久和战友丁祝华结婚。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叛徒特务到处寻找拘捕共产党员。作民在上海工作近三年多，叛徒中认识作民的不少，他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丁祝华已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上海租界被捕判刑，缓刑交保释放，也不宜继续留在上海。为了躲避特务眼睛，他们是一日三游，实在无藏身

之地，就这样又艰难地工作了半年多。

一九三二年十月，作民被派往山东济南成立山东省委，担任省委书记，省委其他成员是：组织部长王仲和、宣传部长张子建、军委书记祝刚、秘书长张恩堂、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省委成立不久，陈衡舟去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会议，在旅馆被国民党由徐特务逮捕。叛变。由叛徒王于忠陪同返鲁。破坏山

掉，强迫他跪在地上，压起杠子来，开始站上两个人，接着再站上两个人，作民晕过去了。在上刑时，作民怒斥他们“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拯救热河”，“是荼毒同胞的罪人”。几个特务气极了，又要用刑。作民说：“就请直接枪毙我，我没有任何可说的了。”又上刑，作民晕过去了，松下来，作民一言不发；再次上刑，晕过去，还是一言不发。作民痛苦地咬紧牙关忍受着，决心以死和他们硬拚。

第四天晚上，叛徒王天生把作民找去，向作民提出了各种问题要他回答，妄图从精神上疲乏作民，搞得头晕脑胀时乱说。作民却保持镇静，只讲原来拟好的口供，不多说话。王天生胡缠乱磨，直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敌人看到作民气息奄奄，只好作罢！但又威胁说：“我们准备好了极新奇极厉害的刑具，会叫你张开嘴的，你等着吧！”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上午，敌人将作民等押送到省公安局拘留所，第二天又押送到济南市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送去的犯人都关在看守所最后面五重铁门内的革、面、洗、心四个大号子里，政治犯关在革、洗两个号，面、心两号关的是土匪和杀人犯。犯人吃的是仓底粮、烂菜汤。所方规定，犯人早起整队散步，早饭后按号开门大小便，不准接见、写信、看报纸杂志和新书籍，只准读经书、看佛经、诵《太上感应篇》，冬天不洗澡。当时，已是四月份了，天气开始热起来，还不给洗澡。作民等提议，用全体政治犯名义，向所方呈文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一、改良伙食；二、准看书报；三、准通信接见；四、半个月洗澡一次。条件呈上去后，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所方同意改善伙食，书报经所方检查过的可以看，写信、接见可以个别请求批准，一个月准洗澡一次。但对领导发动难友提出这一要求的作

民和负责抄写呈文的宋从则，却罚带脚镣一月和手铐一周。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作民经过较长期的观察，争取了一名同情政治犯人的看守。这个看守姓李，湖南华容人，原是农民协会会员，后因国民党进攻苏区，被迫逃出来当了国民党兵。作民多次与他交谈，他对作民表示友好，愿为政治犯作些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作民与外面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告诉了作民等人的案情，叛徒的姓名和破坏活动，为他们购买了进步书刊报纸。以后还为作民收转了组织送来的二十五元救济费，救济了一些贫穷患病的难友。有时他还剪下报纸上一些重要新闻，交给作民看。这个人为政治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九月，作民等十余人，被解押到济南看守分所。这个所的所长患脚病，不大管事，犯人可以随意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各小号犯人可以互相来往，可以购买《大公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中学生》等报刊秘密阅读，亦可在院子里踢球（用布包棉花作的球）。但这里的政治犯相当复杂，有第三党、托派分子、改组派分子，还有一些非党群众、青年革命知识分子。有的人政治上颓废，吸烟、喝酒、下围棋等，看进步报刊的人不多。根据这种情况，任作民和刘少陵（即华岗）等商量，决定在政治犯中开展思想工作，改变这种混乱状况。他们首先提出监狱政治犯主要目标是“保健和学习”，为此，明确规定读书、休息、游戏的时间，禁止抽烟、喝酒。为了培养骨干，开办了短期性训练班，采用小型座谈的方式讲课，上课时摆着围棋，有人进来就装着下棋，人走了接着讲课。这种形式的训练班，共办了两期，培训了一批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训练班由任作民和刘少陵担任教员，主要讲

授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参加训练的人是活跃分子，他们的认识提高以后，行动很积极，对其他人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还成立了俄语学习小组和文化教育小组。作民和刘少陵亲自教俄语，没有纸就用火柴棍在地上划，从字母教到简单的会话，还指定一些人给工农分子教识字。为了给经济上特别困难的难友以支援，还动员有存款的人拿出百分之三十，集中使用，以便为有病的难友买药和补养品。经过这些工作，许多人的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提高了，监狱的政治空气改变了，实现了“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的目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给以后山东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看守所，任作民等很重视掌握斗争的时机，正确地引导难友们的反抗斗争。

这个所虽然给了政治犯一些自由，但脚镣不去掉，不准公开看报、写家信；面馍放硷太多，伙食太差。这些问题，多次与所方交涉，所方一再推诿。有些青年人，凭着一时冲动，与所方冲突起来，就要开展绝食斗争。作民等分析了当时政治犯的情况，认为多数政治犯还没有绝食的决心，发动绝食斗争条件尚不够成熟，加上政治犯中情况很复杂，对看守所的认识并不一致，如果绝食斗争失败，政治犯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一次作民耐心说服了青年难友，未发动绝食斗争。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看守所某一主任与政治犯发生冲突，引起个别犯人的谩骂。当晚封号后，开来武装保安队二十余人，拿着麻绳鞭子，按事先开好的名单，先后拖出十一名犯人，到院子里痛打一顿，打的犯人周身红肿，痛哭喊叫。作民站到号门前，大声质问敌人：为什么打人？为什么这样凶残不讲理？我们抗议你们的犯法行为！各号政治犯都随着呼喊起

来。作民看到群众情绪很激愤，发动绝食的机会到了。他告诉刘庆珊，给其它号“打电话”，即用敲墙来传话，或用B. P. M等英文字母与其它政治犯联系；第二天，开始了绝食斗争。各小号提出了口头要求：惩治打人凶手，恤伤并保留刑事诉讼权；全部开镣；准许自由看书报；准许接见、通信；改善伙食等。绝食第三天，敌人派人来劝食，有个别人有些动摇。作民对刘庆珊说，告诉大家：“绝食斗争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刘庆珊把作民的意见“打电话”转达给其他号难友，难友们表现得很坚决。看守人员送饭、送水来了，大家原封不动地推一边，不管敌人怎样引诱，大家滴水不进，粒米不吃。绝食是一种韧性战斗，到了第三、第四天的时候，就感到全身无力、头昏眼花，作民等少数有绝食斗争经验的同志，天天给大家做工作，要求难友们躺下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培养锻炼自己的坚强毅力，坚持就是胜利^①。绝食斗争头几天，所方态度很强硬，扬言以送军法处、省党部相威胁，到了第五天，所方表示所提条件除开镣要请示上级外，其余全部接受。复食后三天，还给送来稀饭、面条、鸡蛋，体弱者给牛奶。被打的十一人提出刑事诉讼，检查官验了伤，保安队长受了处分。一个月后，所长也撤了职。为时五天半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一天晚餐，馍放硷太多，黄臭不能入口。难友们要求换馍，不换馍就不进号吃饭。一直等到八点钟，新调来的所长从临时公馆回来，派人送来面条吃后才进号。所长认为犯人的行为有损他的威严，决定惩罚犯人。次日

^①刘庆珊 1983 年 4 月的回忆。

早晨，所长不让开号门，难友们质问所长，所长命令武装保安队员，抓出带头提出质问的难友毒打，这次被打的有九人。作民等又决定发动政治犯人开展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开始后，一些看守主任和看守，都知道犯人必然胜利，他们不主动参与破坏活动，有的还为犯人传递消息，暗中讨好犯人。所长很孤立。犯人提出：绝对不许打人；凶手是所长，必须撤职依法处罪；开脚镣；改善伙食等等。绝食第五天，检查官前来正式答复条件：立即开镣，保证今后不打人，改善伙食。这次斗争，又以胜利而结束。新任所长在难友要求下，不久又被撤职了。

经过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政治犯的斗争意志。看守所的看守们，都知道政治犯是不好惹的，再不敢训斥和侮辱政治犯了。他们对任作民和刘少陵等尤为客气。同时，这个看守所闹事的声誉，传遍山东各个监狱，推动和鼓舞了其他监狱政治犯的斗争。

任作民在山东看守分所一年多，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据当时在一起坐牢的难友回忆：作民当时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面颊红润，头中秃顶，额头略有几道皱纹，显出刚毅、倔强的神色，遇事沉着稳重，平易近人，少言语。在敌人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义正辞严。对同志态度和蔼，体贴入微。有时还为难友裁剪、缝补衣服。对新入狱的难友，先从生活上关照他们，主动向他们介绍情况，对青年学生多从正面启发诱导他们。作民对难友的案情尤为关心，在看守所的政治犯，有的时间拖得很久未判决，有的人判决了，但在押的人不服，要向法院申诉。任作民和刘少陵成了难友们的“义务律师”。他们帮助难友分析案情，提出申诉理由，帮助整理辩护词，找旁证，以至为他们写呈文。

难友们把作民当作共产党的化身，十分敬仰和爱慕他。

一九三四年六月底，任作民等人案件正式宣判：“王敬功（即任作民），以组织和宣传不容于三民主义团体，依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判后，任作民等提出上诉。十一月初，高等法院重判，维持原判，并停止再次上诉权。十一月底，作民等被押至山东济南第一监狱。

济南第一监狱典狱长凶暴恶狠，下面的看守长，亦多是惯于欺压打骂政治犯的凶手。新入狱的犯人都要带脚镣，一直要带到入劳改工厂后半个月才开镣，否则用钱贿赂，一挂镣五六十元。对政治犯人随使用体罚，每日点名强迫犯人给看守敬礼，侮辱政治犯人格。有一次政治犯人因糊盒劳动太重不愿做，请假又不准许，狱方还威胁政治犯要重新带上脚镣，并不准放留声机唱片，收走政治犯人的书籍等，这就引起了政治犯一致的愤怒。正在这时，狱里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犯人，因一件小事与狱方发生争论，被处罚带了双镣，移住单独号间。犯人要求更换，狱方不但不换，还突然把犯人拉到管理科打掌心四十板。当晚，这个政治犯人自己进行了绝食斗争。

作民认为绝食斗争时机到了，他让刘宝珊、邵德厚把这个政治犯绝食斗争消息通过打墙告诉其它号难友。狱方无理打人的消息，很快在各号房传开了，第二天上午就有三十多人参加支援这一难友的绝食斗争；晚上，作民又让他俩将这一情况转告给各号房难友，动员大家都参加绝食斗争。第三天有七十多人参加，第四天有一百四十多人参加。随后，除托派外政治犯人全部参加，普通犯人也有同情政治犯人纷纷加入斗争的。全监四百多人，大部分参加到斗争中来。监方惊慌了，请反省院教诲师、医官来劝食。难友们斗志高昂，互相鼓励，坚持

拒绝监方要求。第六天上午，监方正式答复：一、以后绝对不打骂政治犯人；二、立即全体开镣；三、打开小号门，延长放风时间；四、改善伙食；五、自由借阅教诲室图书。第一监狱政治犯人的绝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使这个黑暗地狱第一次发生了变革。复食后四天内，监狱方面供应了大米饭、面条、鸡蛋。此后，狱卒们对政治犯人的态度也有些改变。

监狱方面确认任作民、王仲和、岳掘园领导了这次绝食斗争，向作民提出了警告，并送去东监住独号房间，将王仲和解送到济宁监狱，岳掘园亦被调出去住独居号间。作民在住独居号期间，自己努力学习日文，每日去教诲室借图书，读书总数在五十部以上，主要是中国历史、地理、哲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书籍，其它如世界史纲，战后世界，法国大革命史，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顾颉刚写的历史书籍，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等等。这对作民来说，真象进了一次大学。

一九三四年五月，丁祝华因病危离开苏州反省院。年底，来到济南监狱看望作民。二人见面后，各自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相互进行了勉励和安慰。丁祝华当时经济十分困难，她想办法为作民解决了一条棉裤，买了些他需要的旧书。一九三五年春，丁祝华又从日本书店为作民订了日文月刊。由于反动派的迫害，找不到职业，生活无着，她被迫离开了济南。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黎明，寒风刺骨。作民、刘少陵等十九人带上了脚镣、两人共戴一个手铐，被用汽车押送到火车站，上了一辆闷罐车，第二天上午到达郑州，十九日下午抵武昌大智门车站，当晚进武昌反省院。作民在监牢里，注意搜集报纸，研究国内外形势，对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了

解得较清楚，一有机会就给难友们讲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当时一些同志对释放蒋介石的主张不理解，认为放了蒋介石等于纵虎归山。作民耐心讲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放了蒋介石有利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势变了，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也应相应的改变等道理。他讲得深入浅出，听众都感到很新鲜，又很受教育^①。

作民等人反省院后，每人发给“反省人调查表”一份。这张表，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入过何种党派，担任过何种工作，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等。作民和刘少陵等商量决定：“不求出院。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这个立场坚定不变。”由于山东省常委蔡泽民已变节，作民的身份已暴露，为了减少院方的纠缠，并经刘少陵、王仲和的同意，作民填写“加入过共产党（民国十七年）”，“曾担任区委工作”，“对三民主义缺乏研究”，“在中国目前环境下，不反对实行三民主义”，对狱里看法是“黑暗重重”。院方还发给每个人十几张格子纸，要政治犯写“自述”，动员政治犯人诚实交待自己的历史，实际是诱骗革命者，改变他们的立场和信仰，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作民在自述中写了他的幼年生活，入学校，当教员，北伐时期参加革命运动，到乡下办农协，被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因国共分裂，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才转入共产党。后脱离了组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职员，自愧无知，并没有对党对社会有过多大功劳，到山东找事被捕，现在来反省院^②。这个自述写好后，交给刘少陵、王仲和看，他们的自述

①宋辛夷：《怀念任作民》（1982年2月），未刊稿。

②任作民：《自述》。

也交给作民，经过斟酌认为可以，再交给院方。院方看后很不满意，退回来，要他们重写，作民等坚决予以拒绝。

反省院还规定：政治犯星期一是纪念周会，星期六是周末会，还开别的什么讲演会，写作文、日记，为《诚化月刊》投稿，写反省心得等。对这些活动应采取什么态度，许多难友都来问作民。作民主张不写反省心得，不给《诚化月刊》写稿，日记只写成“流水帐”，不写真实思想，不吹捧院方人员，对于什么周会、讲演会等可借故装病尽量不参加。总之，采取逃避、拖延等对抗办法，使它收不到什么效果^①。

反省院内的政治犯人的活动，表面上似很随便，实际上，院内特务很多，对反省人员的言行监视很严。作民是济南看守所和第一监狱几次绝食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院方对任作民的行动很注意，活动比较困难。因而一般问题，他事先同刘少陵、向明商量好，再通过骨干分子去开展斗争，有必要时，他才挺身而出，同院方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反省院从北方转来的政治犯人，不习惯吃大米饭，吃下去肠胃不舒服，作民鼓励他们要求吃面食，并让山东人向明出来带头，不答应要求，北方人就天天请病假去医务室看病、不上课，不参加任何活动。最后，院方只好答应另安炉灶，办起面食伙，作民和刘少陵也参加进来。院方对吃面食的北方人很不放心，派了一名姓杨的人，到北方伙团吃饭。这个人一来就鬼头鬼脑，探听消息。作民让难友们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叫他不敢继续捣乱。有一天，难友们正在操场上打篮球，那个姓杨的在球场横冲直撞，有意捣乱，王立然、宋辛夷等狠狠揍了

^①宋辛夷 1982 年2月的回忆。

他一顿。姓杨的向院方告状，院方要处分王立然和宋辛夷，王、宋不承认有此事。这时，作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训练科主任游石青说：杨在球场乱冲乱闯，不守规则，有意干扰别人玩球，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处分王立然和宋辛夷^①。游石青怕事态扩大，不敢追究，对姓杨的“挨打”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有一次，一个姓罗的训育员，在教三民主义课时，鼓吹“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作民马上站起来质问他：“罗先生，你说共产主义不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现在救的怎么样了，真正做到民族独立没有？”“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于敌手，现在日寇又得寸进尺，进兵华北，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什么原因？”^②姓罗的无言可对，引起众人哄堂大笑。

反省院规定六个月为一期。任作民、刘少陵这一期应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结束。在结束这一期前，管理主任找作民谈话，问他为什么不说出他的组织关系，不讲明他们所认识的人，不说出他在省委时的工作情况？训育主任问他“为什么不肯作文章，为什么不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态度？”姓罗的教员给作民谈话，指出他待人接物，品行都是好的，但不骂共产党，表示对共产党还是恋恋不舍，日记写的不充分，又不肯做文章。总之，指责作民未按院方要求办事，要求他能表示悔改。作民回答说：“我看不到共产党有可骂之处，我不能违背事实讲假话，文章我根本不会做。”^③把他们顶了回去。作民和刘少

①②宋辛夷 1982 年 2 月的回忆。

③任作民：《自述》。

陵被留期再住六个月。

九月四日，丁祝华从山东赶到武昌反省院，见到任作民，得悉他们几人继续留反省院，心里很难过。作民安慰她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形势好转，我不会长期关在这里的。他要丁祝华回湖南老家，照顾两个孩子。丁祝华回湖南后，作民又同反省院开展新的斗争。他和刘少陵去找反省院长，质问他：现在已是全国抗战的局面，共产党已经实行政苏维埃为边区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什么要强制我们反共，我们出去难道不是和国民党一道去抗日吗？”院长没有别的道理可讲，只是说：“我也愿意你们出去，不过这是中央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①作民等要求请长假休息，经过多次争执交涉，最后被迫同意作民等请假一个月。实际上从此以后，作民从未上过课，参加过会，也不写日记，除吃饭睡觉看书以外，一切活动都拒绝参加。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董必武到汉口，正在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交涉，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在作民等政治犯^②。十月六日大早，院管理、训育两主任，突然找任作民和刘少陵谈话，通知他们今天可以走了。并说：“你们又有机会为国家出力，看你们出院多么简单，连保人都不要，什么手续也不举行。你们去收拾行李吧！”任作民等收拾好了东西，结算了帐，离开了反省院，结束了半年多的反省院生活。他们中午过江，到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等领导同志。

作民回到办事处，就象多年漂流在外的孤儿回到母亲身边

^①任作民：《自述》。

^②董必武办公室给丁祝华的信（1967年6月6日），存丁处。

一样，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他向党的领导同志表示，他多年过着敌人铁窗生活，没有为党做什么事，要求很快给他安排工作。党组织考虑作民长期在敌人监狱里受的折磨和摧残，在他离开反省院前一月，还患过一场严重的痢疾，身体十分虚弱，决定给他二十天假，回老家休息一下。十月下旬，作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望和接待了亲戚和朋友，也趁这个机会，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并把他从武汉带来的宣传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分送给来访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还在毛塘祠召集了任氏族人的会，在序贤学校召开全体师生会，在鄞家庵召开中学全体师生会，宣传抗战，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他还利用集会的机会教唱救亡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回老家去，”……激励人们为抗日而团结斗争。作民三弟任铭鼎担心他累倒，劝他注意休息，同时提醒他暴露了身份有危险。作民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深入我们国土，国难当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坐视等待国家灭亡，而怕暴露自己，在白区工作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屠杀，我就顾不得这些了。”^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作民被分配到中共湖南省特委，改姓周，担任特委书记。当时特委机构不健全，特委常委除作民外，还有两人，一个未到职，另一个到后又调走，实际特委主要领导人只有作民一人。作民来到特委后，首先抓了党的组织工作：长沙市党组织，由特委直接领导，经过整顿，建立

^①任铭鼎 1980 年 9 月的回忆。

了十个党支部，有党员五十九人，其中知识分子四十一人，干部十七人，工人一人。通过党支部又建立了战时工作团，妇女会，文抗会，职业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其中以战时工作团人数最多，工作也活跃；成立之初，已签名加入的有一百七十多人，随后还有许多人要求参加，实际人数在三百以上。这一团体受我党抗战方针的影响，工作很出色，在城市里，组织轮训班训练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组织农民；成立了宣传队、歌咏队、演唱队等慰劳伤兵和进行街头宣传。其次是文抗会的工作，开展得也很好，有会员四百多人，主要是知识界。他们请知名人士讲演，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成立了各种研究会、读书会等十多个群众学术研究团体；还开展唱歌、演剧、慰劳伤兵、欢送壮士出征，以及出版墙报等活动，对发动群众抗日，起了积极促进作用。铜官有窑工三千人，特委成立了铜官区委，在区委领导下，又成立了六个支部，组织了窑业工会。樟树港有党员十人，成立了党支部，归铜官区委领导；益阳有党员六十多人，成立了区委，建立了六个支部。特委还派出巡视员，到衡山、衡阳、浏阳、湘潭、常德等地开展党的组织工作。经过作民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湖南特委领导下，健全和建立了二个区委、二十四支部，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有二百零一人。还有一些县市党组织正在筹建中^①。在整顿恢复党的组织的同时，作民强调武装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特委对于农民工作，特别在发动长江游击队……更加重要与急迫”。在农民工作决议案上，特别着重于农民武装问题，认为各支部可以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去积极进行各界农民武装的发动工

^①任作民：《湖南特委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作。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爱国热忱，经济上防止豪绅贪污，免除苛捐杂税，改善群众生活，才能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①。作民调查了湖南国民党活动情况。湖南国民党有甲、乙两派，甲派就是中央派，以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彭国钧为首，乙派是何键派，以凌章、刘岳厚为首。何键调出湖南，张治中就任湘省主席职务时，极力想调和两派矛盾，实际两派摩擦不但未减少，还有发展的趋势。作民在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甲、乙两派都在整编土匪、编训民团、游击队”等，他们主要的目的是“镇压民众，保障私人利益”，“收征军队，去补充各自的实力”。这种作法，“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前途，是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的。”^②作民还深入民众，调查了解民众的情绪和想法。他指出：“一般的民众虽然知道中国在和日本作战，但想不到和他们自身有什么关系，他们对亡国的恐怖还轻，对于抽壮丁、纳税、还粮的恐怖要重的多”。国民政府抽壮丁一次比一次多，不出壮丁的可以用钱买，一个壮丁一百多块银元，捐税名目很多，有“爱国公债”，“防空捐”，“伤兵慰劳捐”，捐鞋、捐袜、捐棉背心，还有“积谷捐”等，保甲长成天在乡下抽丁催款，“闹个不休”，“人民是苦于无款可取”。作民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湖南省存在的实际问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向中央提出了湖南特委的工作计划，列举了十一条工作纲要，概括起来，这个计划有三个大的方面：健全党的组织，训练党的领导骨干，发展党员，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派遣干部，深入农村发动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武装的问题；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大众报》的发行

①②任作民，《湖南特委工作报告》。

量和销售进步书刊问题^①。二月十五日，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李富春等传阅了作民的工作报告。这是抗战初期，湖南我党工作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起点。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②，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当时在长沙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有《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半月刊》、《火线下三日刊》和《大众报》等，作民以省委负责人的身份，找《火线下三日刊》负责人黎树蓉（黎澍）、杨隆誉（杨赉）商量，指出将长沙各报的力量适当的集中起来，出版一张省报的计划，并托黎澍、杨赉筹备《观察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观察日报》创刊。这张报纸实际上成为当时湖南省委的机关报，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夜里和十三日早晨，长沙发生大火，作民和湖南工委其他同志，紧促地收拾了文件和行李，随后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乘一辆无棚卡车离开长沙去衡阳。在车上他们回首长沙，只见长沙上空，一片烟海，不知有多少伤兵和难民死于大火中。这就是蒋介石焦土政策造成的浩劫。到衡阳停留了两三天，即步行去邵阳。八路军办事处在主任王凌波领导下，开始在邵阳办公，作民也住在办事处，继续领导湖南工委的工作。他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邵阳开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并亲自给训练班讲课。

在邵阳期间，作民抓紧时机深入农村，到邵阳附近各县调查研究，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农民，宣传抗日主张。工作非常

①任作民：《湖南特委工作报告》。

②《湖南省志》第1册《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

忙累，有时几天不回家，即使回家，也是看一下就走了。在这期间，他爱人丁祝华生了一个女儿。一天，这个刚出生的女儿突然病了，发高烧，闹得全家一夜未睡。天一亮，作民要出差到外县，丁祝华要求作民晚去一天，观察一下孩子病情。作民恳切地说：不能因为自己孩子有病，留在家里而影响党的工作，只得请你多劳累一点。一大早，他就照常出差到外县去了^①。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式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委，高文华任省委书记，郭光洲任组织部长，任作民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统战部长、组织部长、长沙市委书记等职。春夏之交，作民代表徐特立出席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第一次公开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派遣特务到处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六月，制造了平江惨案。这时，作民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已有相当大的困难。一九三九年十月，党中央给作民电令：“携眷赴延”。十二月，作民、丁祝华带领自己的和其他烈属的子女多人，离开长沙转四川奔赴延安。当时，湖南交通秩序混乱，国民党地方政府又在交通线上重重设卡。他们在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三个月，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才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作民一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个窑洞里。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期间，作民前后给中央写了两个几万字的报告：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报告主要是汇报湖南党的工作；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写的是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专题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湖南党的工作和

^①丁祝华：《回忆任作民》（1982年2月）。

统一战线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不久，作民奉命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十月，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秘书长，分管西北局机关党务工作，还兼顾西北局所属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底，西北局书记高岗带领工作队去米脂、绥德检查工作，中央派肖劲光到西北局主持日常工作。肖劲光和任作民互相配合得很好，各自主动地承担工作任务，关系十分融洽。作民精力充沛，日夜忙碌不停，身体日渐消瘦。丁祝华要他注意身体，有劳有逸，他说：“我多少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忙一点有什么要紧。”^①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早晨，作民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经边区医院、中央医院医生抢救无效，于二月二十日午夜零时三十分去世，享年四十三岁。作民在病危时喃喃地说：“革命二十年，为党只工作了十三年，七年系身监狱，我相信能活到六十岁，再为党工作二十年。”^②作民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的后代，为着实现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英勇献身。

作民去世后，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和多年共事的战友，都万分悲恸，纷纷给他献挽诗、挽联，表示哀悼。现选录莫文骅挽诗一首

除夕举酒论生平，融融谈笑慰知音。

①丁祝华：《任作民的一生》。

②任作民：《自述》。

临别赠言君自重， 瞬息竟成隔世人。
十年我战南而北， 君则暗淡苦经营。
铁窗风味催人老， 魂断长空杜宇声。
遍体烙痕斑斑赤， 苛刑加害死复醒。

血肉受残心尤铁， 愧煞乞怜摇尾人。
品概如斯吾党杰， 英风千古鬼神惊。
国步维艰伤骏马， 遗志待遂有后昆。
月满寒窗君何在， 悠悠延水呜呜咽。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写成后，曾送请陈云、彭真、邓颖超、杨尚昆、宋仁穷、王震、李维汉、肖劲光、王首道、何长工、帅孟奇、白治民、莫文骅、于刚、丁祝华、黄玠然、涂国林、李林等同志审阅。他们中有的写信，有的打电话，一共提出了百余处修改和补充意见，使传稿得以最后完成，谨致谢意。

曾中生

盛仁学 高玉临

曾中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卓越的红军指挥员，曾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独立一师师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对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捍卫党的原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卓克基被张国焘秘密害死。

（一）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乳名光斋。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东乡犀牛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七岁进本镇上私塾，熟读了《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并练得一手好字，很受老师喜爱。不久，曾中生考入湖南省郴州第七联合中学。在中学阶段，他认真攻读各门功课，特别爱好历史和地理，课余常与同学谈古论今，探究学理，是全校知名的高材生，深受同学的尊敬。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思潮影响中国，在郴州第七联合中学迅速传播，使曾中生的思想和视野大为开阔。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在湖南，毛泽东等领导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曾中生满腔热情地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罢课游行。他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检查日货。在宣传演讲时，他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讲解反帝爱国的道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曾中生中学毕业，返回资兴县城。他目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景况，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时候，他认为武力可以救中国，便决定投笔从戎，到军队里找出路，参加了沈鸿英的部队。由于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不久，就提任了参谋职务。

一次，沈鸿英部向广西进发，受到唐生智部阻击。沈鸿英问曾中生，敢不敢当他的代表，去和唐生智谈判。曾中生慨然答应，随即带着沈鸿英的书信，到唐生智部进行活动。经他同各方面接触谈判，最后达成和解协议，避免了一场军事冲突。曾中生与唐生智的谈判，显示了他处理事务的才能，很得沈鸿英的赏识。但是，曾中生逐渐发现这支部队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纪律败坏。他觉得，象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在这里任职，不是自己要走的道路。于是，他毅然在一九二三年离开沈部，去寻求新的救国之道。

一九二四年春，曾中生来到湖南衡阳中学。在这里，他找到了正在衡阳三中读书的弟弟曾希圣和在衡阳三师读书的资兴同乡黄义藻、黄不若等好友。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已如火如荼。早在一九二一年冬天，毛泽东就派张秋人到衡阳，以第三

师范为据点，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到衡阳，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团和党的活动，在三中、三师积极开展起来。曾中生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他从《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中，学习了崭新的革命道理，思想大为开朗，好象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

这年秋，曾中生跋山涉水，步行来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他感到这里处处生机盎然，充满了革命气氛，心情尤为高兴。

一九二五年，曾中生考入了黄埔军校。经过半年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从第四期开始，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设政治科，聘请政治教官极多，其中多数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肖楚女、高语罕、安体城、张秋人、韩麟符、陈启修等^①。曾中生在这里受到革命熏陶，深入钻研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农民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每当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彭湃等作报告或讲课时，他都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又提出一些问题与同学热烈讨论。他还常到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等作“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的报告，逐渐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在黄埔军校，曾中生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当时，这个进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有李之龙、蒋先

^①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云、周逸群等。曾中生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中，负责青年军人俱乐部的一部分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把许多进步青年军人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利用青年军人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军人》会刊和《青年军人》旬刊，宣传马列主义，提高革命军人的政治觉悟，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敬佩。

国民党右派谢持、王柏龄等“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所以一经发动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①

有一次，政治部的李汉藩（共产党员）到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管理处长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意挑起争执。二人由相骂到打架，最后林振雄竟拿出手枪对李汉藩开了一枪（未打中）。这实际上是孙文主义学会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挑衅，引起了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周恩来同志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廖仲恺先生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②但蒋介石又指使戴季陶、沈定一等右派分子，继续进行阴谋活动。根据我党指示，由青年军人联合会派出代表向蒋介石请愿，曾中生是请愿代表之一。他和代表们一起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当蒋介石无理训斥请愿代表时，曾中生明确表示：“我们是来革命的，不论反革命怎样破坏和捣乱，我们坚

①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载《黄埔军校史料》。

②王逸常：《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载《黄埔军校史料》。

决革命到底！”^①他还和同学们一起高呼革命口号，使蒋介石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经过这些斗争，曾中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更加主动积极地靠拢党组织，努力完成党分配的各项工。作。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经过对曾中生的考察，于一九二五年底，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使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二）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党派曾中生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部工作。何应钦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是左派积极分子，拒绝接受。后来，党又改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唐生智原为湖南军阀，后来投靠国民政府，他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负责攻打吴佩孚。曾中生到职后，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当时有利的客观条件，推动唐生智率师北伐。他参加建立和整顿政治机关，积极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对部队士兵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工作。第八军由于有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使部队军心为之一振，军行所至都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组织群众支援和配合作战。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唐生智一时名噪大江南北。当时，唐也深感得力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对于曾中生更是倍加赞赏。

^①见《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曾中生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他遵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利用这个阵地，大力支持和推动唐生智继续北伐；宣传党的主张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消息；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指导湖北和周围地区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的《汉口民国日报》，实际上成了革命高潮时期我党的喉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中生积极参加了讨蒋委员会的工作。在群众大会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曾中生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后奉党中央指示去上海。同年九月，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期间，曾中生认真研究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参加了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和号召更加激发了曾中生的斗争热情，他主动提出回国工作。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九二八年冬，他回国到上海，在党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中生有机会看到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文件、报告。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〇年四月，党中央派曾中生到南京市委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再三嘱咐他，到敌人统治的心脏去斗争，首先要建立坚强的党组织，依靠群众，作艰苦细致的工作。曾中生到南京后，负责市委组织部工作。他积极整顿党的组织，制定了在敌人心脏地区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还依

靠党组织，积极地开展兵运活动，秘密控制了敌人的一个学兵营。不久，李立三错误地提出在全国实行总起义的冒险计划，要南京市委领导学兵营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南京，并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曾中生明确表示，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心，以仅有的一个学兵营的力量夺取南京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央没有考虑这种正确的意见，仍坚持要举行起义。曾中生又提出，即使举行起义，也应该将部队拉上山去打游击，而不是夺取南京。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曾中生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准备执行起义计划。就这样，南京党组织在“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下，举行“飞行集会”，组织武装暴动，致使党员公开暴露，党组织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损失。

“从六月至十月，市委机关曾两度被搜查，全市被捕党员一百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此外，宪兵连、军官团、学兵营等国民党士兵支部的党员因搞‘兵变’而暴露，遭秘密杀害的至少有四十人，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①

为了恢复党的组织，挽救革命的危机，“九月六日，江苏省委决定由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委员有杨子庄（军委）和顾志鹤。”^②这时，敌人派特务四处搜捕曾中生。一次，曾中生在公园里与黄埔军校相识的几个反动军官狭路相遇。他们一边纠缠住曾中生到茶亭喝茶，一边暗中通知宪兵前来捉人。在这紧张时刻，曾中生沉着机智地应付对方说：“各位仁兄，兄弟抱歉，我有个约会，稍去即回，请你们等候片刻。”^③他骗

^{①②}见南京市委档案馆有关资料。

^③《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过了反动军官脱离险境，不久，即被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

(三)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湖北孝感樊家村鄂豫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与原特委书记郭述申会面。在这之前，红一军因未查明敌人的“围剿”意图，仍依照中央指示，由河南罗山南下威逼武汉，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和打通与红十军的联系。

十一月十一日、十三日，红一军因攻黄陂之姚家集和黄安失利，向麻城方向转移，准备另寻战机歼灭敌人。曾中生了解这种情况后，及时指出，在目前为巩固苏区与冲破敌人之“包剿”，红军是第一等主力。因此，应马上追回红一军。但这时红一军已远去数百里。他选派了七名精干的战士，化装去紧急通知。之后，他来到特委和苏维埃的所在地七里坪，准备召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正在这时，各路敌军向我发动进攻。形势危急，扩大会议无法举行。曾中生立即决定召集原鄂豫皖特委和临近各县委的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①。在曾中生的主持下，会议着重解决鄂豫皖边区最迫切的组织领导和反“围剿”斗争方针问题。会上撤销了“左”倾盲动主义一度合并党、团组织成立的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临时特委，加强了党对反“围剿”的领导。会议制定了“围点打援”、“袭扰

^① 《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牵制”和“诱敌出阵以消灭”等反“围剿”方针。同时，还决定将原有的补充军集中起来，分三路配合教导队，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袭、夜袭敌人，以迫使敌人不敢冒进与分散“围剿”^①。

会后，曾中生再次派专人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临时特委的决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红一军奉命回师，到商南地区会合独立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兵力，向根据地纷纷推进，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曾中生认为，首先进犯的敌军，不是蒋介石的主力，我们可以采取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临时特委和曾中生的领导下，十二月，红军连克金家寨、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三个团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敌陈调元一个师另一个旅分成三路，向皖西六霍进犯。曾中生指挥红一军，集中主力歼灭其中路一个团，然后，在运动中又击溃南、北两路敌军。敌军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出皖西，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到一万八千多人，取得了皖西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不久，敌人又向我鄂豫边中心的黄安等地发动新的进攻。临时特委和曾中生决定，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对付优势敌人。按照这个部署，曾中生一方面指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在敌侧后袭击，使敌人不敢冒进和分散进行“清剿”；另一方面，他又指示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由蔡申熙率领的红十五军

^① 《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突袭敌人弱点。由于地方武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在“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取得了不少胜利，割断敌人电线，截得敌人的电话机与马匹及辎重，每天都获得敌人的枪枝弹药，敌人的交通队及民团一次一次被我截击，而且我们各地有独立作战的机能，敌人更无法应付，不能随便分散，怕我们所乘。红军晚上常出去打岗打到敌人后方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①这就使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虚实，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西返福田河与红十五军会师。根据中央指示，两军合编为红四军。此时，曾中生鉴于敌人已取守势，决定转入进攻作战，以红军主力寻找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以一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清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红四军主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包围麻城北面磨家楼守敌一个营，调动敌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庆带着四个团从麻城急来援救。援敌走在半路遭我红十一师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弃阵而逃。我军经过三天苦战，亦攻克了磨家楼。此役共歼敌一个营，击溃四个团，缴枪千余支。

接着，红四军十师主力开始攻打新集。新集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是鄂豫皖根据地中间的一颗钉子。这里围寨坚固，易守难攻，我军两次强攻均未拿下。曾中生、邝继勋和担任主攻任务的三十团团团长王树声商量，并召集干部和战士开“诸葛亮会”，进一步分析地形和敌人设防特点，决定采取“坑道作

^① 《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业爆破攻城”的新方案。王树声根据曾中生的指示，带领战士从北墙脚五六十公尺的一个山沟旁挖进去一条坑道，直通围寨墙脚下，将三百多斤黑色炸药和手榴弹一块放在一口棺材里，埋进坑道引火爆破，寨墙上炸开了两丈宽的一道缺口。曾中生命令我军发起总攻。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冲进围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短短三个小时，就将围寨内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随后，红军又相继拔除了二十余个反动据点，使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二月中旬，曾中生主持召开师以上军事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敌人防守不备，向敌人统治的京汉铁路发动新的攻势。三月上旬，曾中生指挥红军以“飘忽战略”，袭占李家寨、柳林河车站，切断敌人交通，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以为红军将截断京汉路，进攻信阳。于是，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忙令赵观涛的第六师迅速集结，固守信阳；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亦同时令李定五的新编第二旅由广水向武胜关、信阳推进；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出动，沿京汉路东侧向北推进，进占双桥镇。敌妄图以南北对进，侧后迂回，消灭红军于京汉路东侧。但由于北路敌徘徊于信阳与罗山之间，不敢向我根据地冒然推进，使敌三十四师成为孤军深入。曾中生根据这一情况，决定集中主力消灭三十四师于双桥镇。他指挥我军采取突袭猛进、迂回包围、大胆插入敌人指挥中心的作战方法，从三月九日拂晓至中午十二时，经过七小时战斗，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这是曾中生等指挥鄂豫皖广大军民反“围剿”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

敌三十四师被歼后，曾中生代表鄂豫皖临时特委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说：“敌人的‘包剿’是革命力量发展所必然的事，党大声答复：敌人‘包剿’因内外矛盾是不能完全很顺利的实现的，如果党的策略正确，而且能坚决执行其正确的策略，党更能大声回答这一切敌人的‘包剿’。……如何来冲破敌人的‘包剿’，党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相当伟大的作用，在组织上进行了不少严重的斗争；而且动员一切力量来参加革命战争。广大的群众在饥饿中、在雪地上、在枪林弹雨中唱着革命的战歌与敌人肉搏，使敌人的压迫与欺骗（除孝感、黄陂少数外）无所施其伎俩。”当时群众高兴地唱道：“白匪来了，粮食柴草都抢光；红军来了，帮我收割送进仓。”这就表明，由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广大军民为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团结战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双桥战役胜利后，鄂豫皖临时特委、军委等领导机关迁入新集。曾中生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曾中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党政建设的经验，制定出今后的斗争方针；进一步清算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为党的“第一任务”，“在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应有阵地的向敌人进攻，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革命根据地。”在他的主持下，特委扩大会议对根据地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规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收支、粮食管理等一整套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扭转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某些混乱状态。

会后，曾中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建设和发展时

期，干部实在缺乏，由于战争的频繁，干部缺乏正规的训练，要对付敌人新的更大的“围剿”是不行的。为了培养群众武装干部和红军干部，特委决定创办四个教导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由曾中生兼任校长，郑行瑞为副校长，刘杞为政委，李昂为教育长。该校“共办四队、二学兵连、一特种技术连（机炮连）、一政治连。学生由每连选四人送来。各工会、农会、青年团与党部都按规定选送。学习八个星期毕业。”^①在开学那天，曾中生向学员讲解了学校的性质和办学的任务，鼓励大家刻苦钻研军事和政治。

在曾中生等的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加强了团结，把各项建设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红四军军长邝继勋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中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在根据地军民中，曾中生受到同志们的信任和拥护，不愧为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卓越领导者。

（四）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纠集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特委和曾中生决定，红军主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向皖西地区进发。

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派张国焘等到鄂豫皖根据地来“改造”党和红军。

^①见《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当时，曾中生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四月十一日，通讯员送来消息，说中央代表张国焘等到了黄安檀树岗以北的打虎山。

“第二天傍晚，几个农民抬着一乘轿子，在独立团和地方武装的护送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新集。”^①曾中生接到通讯员的报告后，立即启程，步行赶到新集，与张国焘会面。曾中生向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及面临的艰巨斗争。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他无视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指责“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的组织，并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他叫嚷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要求以积极拥护王明的“斗争干部”来“改造领导”。五月十一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张国焘便诬蔑曾中生“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所指示的进攻方针”，“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对四中全会怀疑”等等，并决定调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把曾中生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之外。

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和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实行错误领导的开始。张国焘下车伊始，对苏区党和红军大加非难，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并命令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和执行各项“左”的政策。

以曾中生为首的一大批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指责，反对其推行的“左”倾政策。徐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人主张应当允许富农享有土地，并反对张国焘在春耕时期反复平分土地，影响生产的作法；陈定侯反对在根据地内工人过分提高工资以影响工农联盟；曹大骏、王培吾等则对张国焘的领导表示不满。但是，这些同志都被张国焘先后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领导”、“一贯右倾”等罪名，予以批判、斗争和撤职。

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无耻地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局在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确在实际中开始了转变。”他提出：“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①后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赤区，……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实际上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发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即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②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便利用职权，发动对曾中生

^①见《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②张国焘就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问题给中央的书面报告(1931年11月25日)，载《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进行了整整两天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帽子，要他检查、交待。张国焘还给徐朋人加上“不可救药的右倾小组织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给陈定侯戴上了“破坏工农联盟”等大帽子。张国焘公然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意见为准；知识分子干部犯了错误，应“罪加三分。”

正当张国焘在党内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六月初，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敌对鄂豫皖暂取守势。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根据这一形势，认为正是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他们向分局建议：在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张国焘却借口“巩固苏区”而不予采纳。他在“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下，无理指责曾中生等的建议“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按照张国焘的决定，红军从五月底就集中在根据地内剿匪，未能立即利用有利时机向外发展。这期间，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同志继续申述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获得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七月初，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兵力使用及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却一变而为冒险主义，提出了一个限令红四军在一月之内打下黄山、然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

庆，震动南京，直接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的行动计划。曾中生则认为，红军应有巩固阵地的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但是，张国焘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仍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

七月中旬，红四军接受任务后，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领导同志，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南下发展根据地的深入动员，广大指战员士气顿时高涨，表示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在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下，红四军主力挥戈南下，于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县城，“将陈调元部一个团的兵力全部消灭，自团长以下官兵，以及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无一逃脱，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机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军用品不计其数。”攻克英山后，部队在此休整两天，徐向前和曾中生对潜山、太湖、安庆等地区 and 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分析后指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要我们下英山后出安庆的，我们分析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出蕲（春）、（黄梅）、广（济）直捣武穴为好。”^①曾中生还认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也易见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四百里的白区，沿途驻有两个旅以上的敌军，突出冒进，毫无胜利把握。曾中生和徐向前一面将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

^①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

在曾中生、徐向前等领导下，红四军仅一个月內，以五个团的兵力，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座县城，歼敌七个多团，俘敌五千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当地革命群众的斗志，初步恢复了这一带的地方工作，并组织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色区域。

但是，张国焘竟不顾红四军南下作战胜利的事实，指责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徐向前，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①并严令曾中生率“部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停留。”^②

曾中生、徐向前接到张国焘的训令后，当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申述了与张国焘的争论，明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

① 《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信》（1931年8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星火燎原》丛刊之二，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

九月一日，曾中生、徐向前接到张国焘八月十七日的来信，只得依照分局的命令，被迫放弃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带领部队北返回到根据地。九月四日，部队移住鸡鸣河后，曾中生代表红四军，总结了南下以来的工作，接着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党的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大家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了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

会后，曾中生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复信张国焘，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作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他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对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再次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①

曾中生等同志的正确主张，象一把利剑刺中了张国焘肺腑。他收信后，恼羞成怒，但又不敢公开明辨是非，蓄意用阴谋手段对付曾中生。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敌特案件。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同学关系，派人送信给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

^① 《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0月21日）

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诡称许继慎已与蒋介石勾结，他表示欢迎许率部投降蒋介石。反动派企图以这种反间计对红军进行破坏。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送往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经过审查了解，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对此事的明确态度，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许继慎“不会有什么问题”，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

张国焘则认为这是打击反对他的那些同志的好机会。他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在新集下令非法逮捕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严刑逼供出所谓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芳、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等九人，是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主席是许继慎。诬陷他们“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的反革命计划”，诬蔑红四军南下，是曾中生等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将此事在后方部队中大肆煽动，欺骗广大指战员。

九月十三日，红四军继续北返到达麻埠后，张国焘为了贯彻他对红四军的“改造”，派陈昌浩前往红四军，宣布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陈昌浩亲自“带着红四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和许继慎回到白雀园。”^①遵照张国焘和陈昌浩的“指示”，“各师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②

九月底，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白雀园地区时，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

①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作。在张国焘的打击迫害下，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魏孟贤、吴精赤、王培吾、黄刚等红四军中的优秀指挥员，均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杀害。后来，张国焘也供认：当时，“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师各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的方式多系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①

十月上旬，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围攻”、“斗争”。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张国焘便使用其狡猾伎俩，抓住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进行攻击。指责他“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的，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他给曾中生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宣布调离部队考察，并按他个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他诬蔑曾中生“竟走到了领导四军干部向中央分局对抗的地步”；“做非常煽动性的演讲，引起大家不满意于中央分局和他的路线。由于四军许多干部签名答复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的一封反抗政治路线的信，措词异常蔑视党的领导，这信也是中生同志起草的。”^②

张国焘对曾中生同志采取的“审查”决定，得到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党中央的支持。中央给鄂豫皖中央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1931年10月）。

分局的信中着重指出：“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①

正当曾中生被张国焘撤职、蒙受陷害时，黄安独立团于十二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请求和强烈要求下，曾中生被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致力于部队建设。他看到这支部队是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缺少武器，便深入连队，全力抓部队的训练。在他的领导下，黄安独立师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曾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如一九三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汉口北上的敌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我黄安高桥河地区。曾中生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初成立的黄安独立师大显身手，打出了主力红军的威风。

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张国焘错误地认为敌人再若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当主力军，因而他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所谓“偏师”之说。九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接连转战豫南、皖西，因敌人采取固守待援的战术，未获战果。十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曾中生亲自率领两个团，在永家河与敌人展开搏斗，打垮了数倍敌人的进攻。

^① 《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但不幸，他臂部中弹负伤。同志们把他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总部医院治疗。他一直关心着战局的发展，不等伤愈，就返回了战斗岗位。这次转战，由于张国焘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皖西根据地损失了六分之五，敌人乘机大举进攻。

此时，张国焘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左”倾轻敌，变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无计划、无目的的向西转移。部队从湖北经河南去陕西，日夜兼程。一路上，广大指战员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浴血奋战，伤亡很大。

在关系到整个红四方面军安危的紧要关头，曾中生痛心疾首，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当部队到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同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张琴秋、刘杞等商议，拟派人去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转移和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挽回危局。后来，因为派人去中央有困难，遂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曾中生无私无畏，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便于次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表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曾中生用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惊慌失措的错误，和他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张国焘为了缓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表面上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其实，他对这些批评一直耿耿于怀，并伺机对曾中生等进行打击报复。

（五）

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西乡县钟家沟地区时，前敌委员会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曾中生在鄂豫皖时期就身负重伤，腿部肩部残废，行动很不方便，走起路来一颠一跛。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同广大指战员一道西进陕南，接着又越过“蜀道天险”，胜利到达了川北。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委，袁克服任省委书记，曾中生、傅钟等为省委委员。二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曾中生参加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他积极致力于政权建设，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了解川北人民在军阀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同时，他带领工作队，大力开展扩大红军，动员翻身的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苏区而斗争。

六月二十三日，在通江县新场坝，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对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并为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任务。

省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议在总结建立川陕根据地以来粉碎敌人“围剿”作战的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将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即：红四军、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共四万余人。十月下旬，川东游击军在宣汉的南坝场、普光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改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共五个军，很快发展到八万余人；建立了巴中市和二十二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五百万人口。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由于部队发展很快，新战士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都提升为干部。这不仅迫切需要加强对广大战士进行军事、政治教育，而且也急需提高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在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军事科学，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上。他号召红军干部、战士都要学习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术；努力克服以往在作战中存在的缺点，不断提高指挥能力，反对只知打仗冲锋，而不注意研究军事理论和战术的倾向。

七月初，曾中生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对四川军阀的情况，红军的作战要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这篇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每一节的开头，都是四字一句的口号，便于记忆掌握。例如，叙述川军情况一节的开头写道：“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关于红军的作战要点，则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

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①曾中生运用敌我对比的分析，既揭露了四川军阀的致命弱点，又概括了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根本要素。笔墨虽然不多，但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战术和指挥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八月初，曾中生又为红四方面军起草了《游击战争要诀》一文，这是指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文件。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总结。指出游击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具体条件，叙述了“游击战争网”的布置和政治工作。

第二，游击战争通则。明确指出了不攻坚、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具体配合、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十六条规定。

第三，在游击战术中，还特别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阐述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及其具体运用方法。

在曾中生等同志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以高度的热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他深入连队、班排，组织官兵互教，对指战员进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定期对战士进行考核和测验，对于干部，还要增加一项对指挥艺术的测验。通过攀登悬崖、侦察、联络、射击、投弹、跑步、爬山、跳越障碍、紧急集合、实战演习等训练，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军事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对战胜敌人新的“围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站稳了脚跟之时，张国焘却下

^①红四方面军1933年7月7日出版的《干部必读》第22期。

决心要“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为此，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蔑为“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秘密杀害，宣布开除了刘杞的党籍。同时，还长期关押和软禁了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为进一步迫害曾中生扫清了“障碍”。

八月初，陈昌浩在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大肆攻击曾中生。他说：“在中生指使之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并提出其政纲，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接着，张国焘又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陈昌浩的《托陈派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无中生有的给曾中生罗织种种罪名，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他狂妄的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必须执行纪律。”^①并宣布撤销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正在为红四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文的曾中生非法逮捕关押，施以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待在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不屈服于张国焘的淫威，遂被长期监禁关押。

在战场上负过重伤的曾中生，现在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在被关押的极端艰苦条件下，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他回顾和

^①1933年8月出版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必读》第36、44期。

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的历次作战经验，在一盏小小的桐油灯下，夜以继日地坚持撰文著书。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完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①一文，约三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注意之原则，行军、驻军、战斗搜索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及战术，以及特种战斗（山地）、河川、森林与居民地、夜间战斗等十个部分。他以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所采取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和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互相配合的经验，系统总结出了十种反“围剿”战法：

1. 内线作战，各个击破；
2. 专击敌人联络点；
3. 前进包围、后进包围；
4. 专于抄袭迂回；
5.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
6. 围攻一点，消灭援兵；
7. 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
8. 布置大的游击战网；
9. 尽力发挥夜间的作战；
10. 突出外线的攻击。

这些作战方法，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一些

^①《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系单行油印小册子，曾印刷过三次（即三种版本）。第一次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印（1933年10月2日）；第二次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1934年3月24日）；第三次为红九军政治部翻印（1934年5月8日）。

战略原则。同时，他又根据历来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十种“围剿”战法，为我军制定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中生在该文中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几个主要军事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他在说明阶级战争的目的、任务等问题后指出：反“围剿”已成为一时代的特种战术。中国被压迫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应“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迅速进到根本消灭‘围剿’的胜利阶段。”他特别强调，这种反“围剿”的作战，“必须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精密的训练，严肃的军纪，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攻击精神，始能驾凌物质的威力，而收到战胜的效果。”

关于人民战争。他指出：“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解放的军队，是为群众利益奋斗服务的，故能处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拥护。”他强调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和经常布置很活跃的游击战争网。”“以地方武装和红军小部队密切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这样就能使敌人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从而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指出：我军作战必须“彻底集中我军必胜的兵力于敌人一面之要点，而发挥其战斗力。……对于其他方面，只能使用适合目的之最少限度的兵力。”对敌人“分进合击”的战法，“必须集中最大兵力，迅速、果断、坚决、先机、彻底消灭一路。”

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他指出：“用内线作战法给敌

各个击破”，“是我们历来消灭敌人收获最多的办法。”但“当敌逼近而我军又受客观牵制兵力未能集中，以致不能达到先机消灭敌人时，则可缩小阵地，诱敌深入于预定之点，集中必胜兵力而消灭之。”特别是“当敌人四面包围、封锁，我以内线作战，集中攻击一点，没有不消灭敌人的道理。”

关于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他指出：“就一般意义上说，我与敌是作长期的、艰苦的、到底不懈的战争，这自然是一种持久的性质，而且必须有这种持久的坚决准备，才能最后战胜一切敌人。”但在每一次战斗或战役中，则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击敌人要害，迅速歼灭之。而运动战，是依托苏区转，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陷入军事孤立。”

曾中生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中所阐述的这些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因为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指导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

当曾中生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经篡夺了党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革命遭到了严重挫折。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使红四方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也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曾中生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啊！他以实际行动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毅

力，忍苦耐劳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①

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欢迎曾中生这本小册子，他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而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书中观点的正确。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指挥战斗的必用教材和依据。这本军事著作，随着广大指战员的艰苦转战带到了延安，为毛泽东后来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但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他和负责“监管”他的人员交朋友，常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他们谈心。由于听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张国焘就下令制止，并要求严加管制。但指战员是了解曾中生的。据当时在保卫局工作的陈明义回忆说：曾中生“经常给我们讲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讲他听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听周恩来同志讲课的情况，讲北伐战争中叶挺同志领导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战斗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得着了迷。我就是在曾中生同志的教育下，开始知道了我们党早期的一些革命历史，懂得了红军发展到了今天，多么来之不易！”^②很多干部、战士听了曾中生的谈话，都被感动得流下热泪。曾中生也从干部战士们那里听到不少关于张国焘的罪行，使他更加认清

①曾中生：《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②陈明义：《疾风知劲草，大雪傲青松》，《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

了张国焘的反革命面目。

同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知道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的胜利大有希望，并决心等见到党中央，好好呈述过去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当党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后，就指名要见曾中生。这时，张国焘正依仗人多、兵多、枪多，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伪“中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害怕曾中生向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也不许他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这就更加激起了曾中生对张国焘的愤怒与憎恨。他不畏张国焘的打击与陷害，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原则，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采取杀人灭口的毒辣手段。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中的一条河沟里，曾中生被害死。接着，又让人在卓克基南面故意大声喊叫：“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呀！”^①还故意让武装人员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便造谣说：“曾中生通敌，被掉进河里淹死了。”^②后来又将看守人员抓起来审讯、关押，以掩盖事实真相。

由于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当时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已被

^{①②}徐以新：《忆中生同志》（1959年9月15日），原件存曾中生侄儿曾阳生处。

害死，对他的生命安全，仍十分关心。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地方组织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林育英还特别提出，要对廖承志、曾中生“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囑。”^①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曾中生的亲密战友刘伯承赞扬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②徐向前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③是我党早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活动家。

曾中生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他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①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长征部分”。

^{②③}盛仁学：《曾中生与他的军事著作》，载《革命回忆录》第2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 祥 谦

王大同 陈孝华

郑祖溪 林少玉

(一)

林祥谦，名元德，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农历八月二十九）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林发舒，辛劳一辈子，只给子孙留下一间木构房屋和五分四厘薄田。父亲林其庄，是马尾造船厂锅炉工。母亲翁氏，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操持一家人的生活。

林祥谦从六岁起开始随母亲下地干活，到十一二岁就学会了各种农活。他渴望读书识字，但终年不得温饱的家境使他无法进学堂。每当他从村塾门前经过时，听到那琅琅的读书声，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门外静听片刻，还默默地跟着朗读。父母看到他这样好学，便想方设法凑足交学费的谷子，把他送进了学堂。林祥谦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学习用功，读了一年多，就认得不少常用字。但终因家境日贫，只得停学务农。

林祥谦的家族是尚干镇林氏世系中一支赤贫的弱房，每当祭神拜佛或逢年过节，常因捐不起钱典，送不足财礼，而被宗族头子们欺压凌辱。有一年的正月十四晚上，轮到林祥谦这一

家族为祖宗“伴夜”，按规定要摆香炉、点蜡烛，请戏班子来唱戏。由于他们穷，请不起好的戏班子，宗族的族长就辱骂他们给祖宗丢脸。童年的林祥谦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不平。他的母亲也经常向他诉说地主老财残酷压榨农民的事。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封建地主阶级的种子。

尚干镇地处闽江下游。林祥谦童年时，这一带不仅深受腐朽的清王朝的残酷统治，而且屡遭外国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这里的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反抗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每当夜晚，林祥谦总喜欢跑到村边的大榕树下，倾听大人们讲述乡民中涌现的爱国反帝故事。其中对林祥谦影响最深的，是中法马江战役中家乡人民的抗法斗争。那时，尚干人民自动赶往马尾参战，据传还击伤了法国侵略军头目孤拔乘坐的旗舰。先辈们的这些英勇事迹，给林祥谦以深刻的教育。

林祥谦小时候就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孩子。一九〇四年端午节，家乡淘江两岸挤满了观看比赛龙舟的人群。突然一个小女孩掉下江去。年仅十二岁的林祥谦，毫不犹豫地跳进江里。当他把那个眼看就要被江水吞没的小女孩托出水面，并在别人帮助下救上江岸时，人们齐声称赞他是勇敢的小英雄。

严峻的生活现实，炼就了林祥谦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品格。一九〇五年夏粮歉收，全家人盼着那仅有的一棵龙眼树果实成熟，好换点钱粮度日。可是，还没等他们采收，一家林姓地主的儿子又纠集了另外两个地主儿子，却偷偷地爬上树去肆意糟塌。林祥谦看见，上前喝令他们下来。这三个小坏蛋非但不听，还将林祥谦殴打了一顿。林祥谦极为愤慨地说：“难道穷人就该受欺侮吗？”妈妈深怕孩子惹祸，连忙劝慰说：“德儿啊！人家有钱有势，惹不得。”倔强的小祥谦实在咽不

下这口恶气。当天晚上，他找了几个穷伙伴，乘夜用砖石猛砸那家林姓地主的屋顶和门窗，并用木炭在墙上写下“打倒财主仔”五个大字^①。事后，林祥谦到马尾他父亲那里。饱经风霜的林其庄，怕孩子回去再惹麻烦，就让林祥谦在马尾住下来，并送他到附近一所学堂去念书。

一九〇六年，林祥谦一家生活更加难以维持，他再次被迫停学。他的父亲变卖家当，四出借款，筹集了一百元的保证金，又托人找了两家“铺保”，具写“甘结”，把他送进船厂当钳工学徒。当时，林祥谦只有十四岁。他的身子比钳床工作台高不了多少，只好站在废料箱上艰难地操作。工厂的劳动条件很差，更谈不上有什么劳动防护设施。林祥谦和工友们早上五点多进厂，下午六点钟下班，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收入却十分低微，寒冬腊月到了，还穿着单衣，光着脚板干活。

林祥谦和工人们都住在“考工所”里。这是全厂最潮湿、最肮脏的低洼区，一排排泥墙屋紧挨在一起，每间狭小的房子里要塞二十个铺位，工人们挤着睡，连翻个身子都很困难。当时一个参观过“考工所”的外国人评论说：“它是最悲惨的寓所”^②。而这个“最悲惨的寓所”附近，却是供洋人享受的西式漂亮楼房和供船厂官僚住的“官厅”。工厂里的监督、监工、领班都由洋人充任。清政府在厂里驻扎军队，象对待囚犯一样监视着工人，随意打骂和关押工人。一天，林祥谦和另一个徒工被派去抬运钢板。十几块钢板摞在一起，压得这两个未成年的学徒工气喘不得。他俩刚坐下来歇息，就被监工狠狠揍

^①陈桂贞谈话记录（1971年1月17日）。

^②《田凫号航行记》，见《洋务运动》第8册。

了一顿鞭子。打这以后，林祥谦和工人们经常用怠工的方法进行斗争，以示反抗。只要工头不在场，他们就歇手不干。

林祥谦聪明好学，进厂二、三年就掌握了钳工技术，达到技工水平。但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凡事主持公道，爱打抱不平，得罪了工头，以致干了五年还转不了正式工，使他十分气愤。加上那时物价上涨，工厂面临破产，大批解雇工人，林祥谦和他的父亲已无法在马尾立足，不得不另谋生路。

(二)

一九一二年初，林祥谦只身离开马尾来到汉口江岸。在妹夫周连城和几位福建老乡的帮助下，他借了一笔钱买成礼物送给工头，并找到“铺保”，经技术工种考试，被江岸铁路工厂录用。

一九一二年冬，林祥谦返回家乡尚干，和邻近的大义乡贫农女儿陈桂贞结了婚。这时，他的父亲林其庄也被马尾造船厂解雇了。他便带着父亲、妻子和二弟元成一起到江岸谋生。在亲友和同乡的帮助下，林其庄进了江岸机厂当锅炉工，林元成到信阳火车站做升火工，林祥谦仍在江岸工务修理厂当钳工。他们全家住在福建街一间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的茅草房里。

当时，铁路工人的工资也是非常微薄的。林其庄父子三人的劳动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加以林祥谦经常把工薪拿去资助其他更穷困的工人，家里经常瓜菜当饭，一天两餐。

林祥谦所在的江岸机厂，是法国人于一九〇一年开办的。工人们一踏进工厂大门就好象进了监牢，完全丧失了人身自

由，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伤病假不发工资，每月初一、十五两个休息日也不发工资，稍不注意或丧失劳动力，就被洋人资本家踢出工厂。厂方的大小头目，还对工人敲榨勒索，强迫工人送礼，甚至巧立名目扣发工人的工资，至于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有斗争精神的林祥谦，哪能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劳动收入，他和工友们曾多次开展小规模罢工斗争，并用怠工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压迫。但是，这些仍无法改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成年累月做牛马，吃喝如猪穿如柳。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①这就是林祥谦和广大京汉铁路工人发出的呼喊声。

一九一七年秋，林祥谦的母亲因劳累过度，贫病交迫，含恨离开了人世。林祥谦忍着巨大的悲痛，回家料理丧事后又重返江岸。这时，他努力探索着改变工人处境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新曙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林祥谦和工友们看到了解放的希望，斗志更为昂扬。武汉地区党组织也很快地发现并及时地培养了富有反抗精神、在江岸铁路工人中有威信的林祥谦。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陈潭秋等，热情地找林祥谦、曾玉良等六人了解京汉路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

^①转引自《“二七”罢工斗争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扼要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针任务，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长辛店和郑州铁路工人组织俱乐部开展斗争的情况。这次会见和谈话，使林祥谦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几天后，林祥谦又约江岸机厂曾玉良等人，到中共武汉区委所在地，找到了陈潭秋、黄负生等，向他们诉说了江岸铁路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谋求解放的热切愿望，还汇报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狭隘地方观念的各个帮口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及其对工人团结对敌的不利影响。

陈潭秋和黄负生深入浅出地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殷切地期望林祥谦、曾玉良等带头克服帮口观念，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江岸工人俱乐部。林祥谦和曾玉良等人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作为团结工人，向敌人作斗争的指挥部。这次会见，陈潭秋送给林祥谦《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刊，勉励他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从此，林祥谦找到了领路人，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林祥谦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工人周刊》等书刊，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谋求工人阶级解放的自觉性。为了粉碎敌人破坏工人团结的阴谋，林祥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道理，揭露敌人通过小恩小惠和封建帮口来分裂工人队伍的罪恶阴谋，使大家认识到工人大众都是一家人，不要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林祥谦根据“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尽可能协助工友们解决困难，并发动工人互助。有一次，林祥谦的长女汉玉发烧生病，没钱治疗。但是，当他发现一位湖北籍工人因无钱为

患了“绞肠痧”的孩子医治而焦急时，二话没话就急忙跑回家里，抱起一床棉被到当铺当了三元钱，立即给那位工人送去。那位湖北籍工人接到这救命钱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林祥谦发现另一位湖北籍工人，已经几餐揭不开锅，小孩饿得直哭，便悄悄去取自己家里仅存的十几斤米。父亲皱起眉头问：“祥谦，我们家已连三顿稀饭都喝不上，你还把这些米拿去做什么？”^①林祥谦把那位工人家里的困难情况告诉父亲，说：“爹啊！穷人有难要相帮，我们一天有三顿稀饭，人家已经两三顿没有米下锅了。”^②父亲被儿子的话感动了，高兴地让他赶快把米给那位工人送去。

经过林祥谦艰苦细致的工作，江岸铁路工人逐渐消除了帮口隔阂，增强了团结。这样，组织工人俱乐部，进一步团结、教育工人，谋求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在党的领导下，林祥谦日夜奔走呼号，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工人们说：资本家不劳动，“赚钱多，住高洋房子，整天欺侮我们”，工人没有结成团体就要受压迫，“我们要先成立工人俱乐部，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工人们认识到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无不热烈响应。

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项德隆（即项英）以江岸工人俱乐部文书的身份来江岸协助组织工人俱乐部，陈潭秋、黄负生等也常来具体指导。他们经常在林祥谦家里开会，拟定俱乐部章程，讨论批准俱乐部会员名单。每逢这时候，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总是在门外为他们放哨。

^{①②}陈桂贞：《忆祥谦》，转引自《纪念“二七”四十周年专集》，中国铁路工会福州委员会宣传部1963年2月7日编印。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就绪。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老君殿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那天，林祥谦和近千名工人，清早就欢天喜地地来到会场，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负责同志亲临指导，京汉铁路各站和武汉各工团组织都派代表参加，江岸各工厂厂长亦应邀出席。大会在一片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谁是工人之友》为题，在会上讲了话。林祥谦在会上作了会费收支情况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选出项德隆、林祥谦、曾玉良等五人为江岸工人俱乐部干事，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

在工人俱乐部，林祥谦负责会计工作。他千方百计增加收入，节约开支，按时向工友们报告收支情况。工人们在厂里毫无民主权利，到了俱乐部，气氛迥然不同，大家同样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象是生活在另一天地。

林祥谦和工人俱乐部的其他同志，耐心劝说一些工人改正过去沾染的赌博、酗酒和吸鸦片等不良习气。为此，在俱乐部里设置了象棋、围棋、二胡、京胡等文娱器材，供工人们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多数是小工，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之后，能平等地和工匠、工务员一道进行各项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林祥谦从小就喜爱下象棋，他参加俱乐部活动，经常有意识地多找小工下棋，进一步增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

经过林祥谦等人的积极工作，工人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吸引着江岸广大工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业余夜校的教育下，许多工人的家庭关系得到改善，家属们高兴地称赞：“俱乐部好，赌钱鬼没有了，吃酒人少了！”广

大工人异口同声地说：“俱乐部是工人的家，祥谦是这个家的好兄弟。”工人俱乐部还举办工人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林祥谦每天晚饭后就来到俱乐部，参加夜校的政治和文化学习，以及各种娱乐活动，及时了解工人们的情绪和要求。通过夜校的学习，工人阶级的觉悟日益提高，纷纷自觉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林祥谦和全体俱乐部委员，代表广大工人的利益，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原来病假不发工资，后来十四天以内仍发全薪；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原来工人出厂要搜身，后来废除了；遇到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工人俱乐部就派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厂方不得不取消一些罚款。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下午，江岸机厂工人黄宝成带着妻子，由汉口玉带门搭乘铁路工人上下班专用的交通车回江岸。车刚出站，总查票程炎和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就以查票为借口无理取闹，喝令巡警把他捆绑起来，送到大智门车站警务段关押，一路上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同时，还将他的妻子扣押在江岸铁路巡警所。

江岸工人获悉黄宝成夫妇被扣押后，即向俱乐部报告。当晚，林祥谦在俱乐部召开工人大会，报告敌人挑衅行凶的经过，组织工人商讨对策。工人们怒不可遏，一致向路局提出七项要求，即把凶手程、姜撤职查办；取消京汉路南段押车的巡长、巡警；赔偿损失；责令程炎、姜道生由大智门一路放鞭炮到江岸，向黄宝成夫妇公开赔礼道歉；优待工人家属搭乘短程空车免费等，否则就实行罢工。经过俱乐部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斗争，路局只好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并在第三天下午，由京汉路南段车务处长汪奎龙，带着程、姜二人，垂头丧气地从

大智门出发，一路放鞭炮到江岸工人俱乐部。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八月一日，又指使江岸工务修理厂的监工，借故把在该厂当工人的三名俱乐部会员解雇。林祥谦和俱乐部领导闻讯后，又召开工人大会，强烈要求将三名工友复职，把肇事的监工和厂长邵步云革职，并增加工人的工资。大会一致决定：上述要求在三日内如得不到满足，全厂三百多名工人即行罢工。终于迫使当局全部答应工人的要求。

这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使江岸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敌人企图进行破坏，但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周围，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林祥谦由于斗争性强，办事公道，善于团结群众，一心一意为广大工人谋利益，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敬佩，被推选为江岸分工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又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三)

一九二二年，全国出现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在这一年里也先后成立了十六个分工会。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京汉铁路广大工人迫切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为了适应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实现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愿望，总工会筹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筹备，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隆重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

会。一月三十日晚，林祥谦以江岸分工会代表的身份，同武汉三十多个工会团体的代表，在工人们的热烈欢送下，从汉口乘车奔赴郑州，准备参加这个大会。

本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事先已把开会的有关事宜，向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写了书面报告。赵满口答应，还把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与二月一日对调，以便工人赴会，并答应“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证明，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①；但他在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大肆攻击京汉路工“未经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虑，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飭预为防范，切实监视”。吴佩孚眼看各地工运蓬勃发展，已经严重威胁他的反动统治，如让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将使他的重要军事交通工具和主要军饷来源受到更大威胁，于是，他撕下了所谓“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开指使反动军警进行破坏。

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曾一再狂叫：“我黄殿辰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他带着武装警察，闯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办事处，气势汹汹地宣布：“吴大帅禁止你们开会！”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制止集会，切实监视工人。为了对工会领导进行欺骗和威胁，以瓦解工人的斗志，阻止总工会的成立，吴佩孚又于三十日电邀筹委会派五名代表到洛阳进行谈判。筹委会当即派出杨德甫、史文彬等五人，于当天到达洛阳。吴佩孚对代表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受到代表们的驳斥，会谈不欢而散。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92页。

代表们于三十一日赶回郑州，在当晚召集的全路各站代表会议上，汇报了同吴佩孚交涉的经过。会议决定不顾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坚决按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城紧急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如临大敌。街上商店闭门，行人绝迹，一片恐怖气氛。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工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毫不畏惧。上午八时，林祥谦和各分工会向大会报告总工会的筹备经过。

这时，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气急败坏地闯进会场，爬上主席台，声嘶力竭地叫嚷：“不准开会！”“如有反抗，军法从事！”与会者根本不予理睬，一个劲地高呼口号，高奏乐曲。响亮的口号声和乐曲声，淹没了黄殿辰的叫喊声。

林祥谦和京汉铁路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无视吴佩孚的禁令，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果敢地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吴佩孚等人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无比恐慌与仇恨。二月一日下午，他们命令反动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作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文件材料，捣毁各单位赠送的匾额和对联，代表和来宾住处也受到反动军警的包围和监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勒令立即离开郑州。郑州分工会也遭查封，全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军阀的武力威逼，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当晚，他们秘密召开各分会和各路代表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撤革赵继贤、黄殿辰，赔偿工会损失等五项要求，限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总工会将“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铁路全体同盟大罢工。同时总工会决定移到江岸办公。

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并表示：“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后退”^①。会议还成立了总罢工委员会，推选林祥谦、曾玉良等人，领导江岸方面的罢工斗争，并用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和成立经过，愤怒控诉反动当局的暴行，号召工友和同胞们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压迫。宣言郑重声明：不达到总工会提出的五项条件，决不上工。

会后，代表和来宾陆续离开郑州。林祥谦、施洋、项德隆等武汉的代表，于第二天上午返回江岸，受到数百名工人的热烈欢迎。当天，召开了会员大会，林祥谦当众怒斥军阀吴佩孚破坏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罪行，传达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用最大的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争取自由，争取人权！“江岸工人闻之，切齿顿足，愤恨万分。”^②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总工会作出的罢工决定。

总工会秘密迁至江岸刘家庙办公后，一切公开活动都由江岸分工会出面。林祥谦深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争取工人自由和人权的斗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自己肩负的使命更加重要了。他决心战斗到底，不辜负阶级弟兄的重托。

二月二日和三日，林祥谦紧张而又沉着地做好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周密地制定罢工的计划 and 行动步骤。在林祥谦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人组织了宣传队，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的罪行；成立了调查队，了解敌情，及时掌握敌人动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95页。

②林育南：《施伯高传》。

态；同时把工人纠察队扩大为工人纠察团，负责放哨巡逻，维持罢工秩序，保卫工会，对付敌人的破坏活动。工人们每十人编为一组，随时待命行动，工人纠察团员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卫。林祥谦为此日夜奔忙，连回家吃饭也顾不上。

三日晚，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大伙规定四日上工后，以江岸机厂锅炉房的汽笛声为全面罢工的号令。四日上午九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立即下达了罢工令。工人黄正兴于九时零四分拉响了汽笛，随着这划破江岸沉闷空气的第一声汽笛，江岸机厂的所有汽笛也都跟着吼叫起来，迅速连成一片，响彻武汉三镇，震撼四面八方。工人们听到这对黑暗社会宣战的高昂汽笛声，无不精神振奋。大伙在林祥谦的指挥下，立即关了电闸，灭了炉火，离开工厂。他们边走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并迅速按照行动计划展开活动。宣传队员跑上街头，张贴红绿标语和《罢工宣言》，散发《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员司》等传单，纠察团员戴上袖章，手持铁棍、木棒，很快地控制铁路和工厂的各个要害部门。不久，江岸机厂股道上，便停满熄了火、放掉气的机车。厂里烟囱不再冒烟了，车间里顿时变得寂静无声，繁忙的运输线瘫痪了。不到三小时，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两万多工人停止了工作。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

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发动武汉工人、学生、妇女、新闻等各界群众，采用各种形式声援江岸工人的罢工斗争。四日下午，武汉各报都为江岸铁路工人罢工发了号外。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罢工的

事。各群众团体每天都派出慰问队，川流不息地来到江岸慰问工人，鼓舞斗志。武汉十八个工团联名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工会，痛斥军阀政府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表示：“我等代表全体湖北各工团，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拚一死命，亦所不惜！”^①四日晚上，寒风白雪，铺天盖地，林祥谦和江岸分工会秘书黄子章在分会所研究罢工日刊的创刊号问题。

敌人妄图扑灭罢工烈火。二月五日，吴佩孚命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从速消灭罢工的领导力量。肖耀南指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军警到江岸，企图以与工会谈判诱捕林祥谦等领导人。工会识破其奸计，答称：“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张厚生见诱捕不成，便调来大批军队，占领工厂，强迫工人上工，并抓走了两名司机，逼他们升火开车。林祥谦得知后，立即组织一千多名工人和纠察团员，赶到江岸机厂，不顾军警阻拦，冒着生命危险将那两位司机抢救出来。当天下午，敌人又绑架了万能山、廖于廷等三位纠察团员。林祥谦派代表交涉无效，便召集二千多名工人，手持铁棍、木棒和斧头，高举“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的旗帜，涌入车站，不断高呼“还我工友”等口号，迫使敌人将被捕工人无条件全部释放。

二月六日上午，在党的领导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武汉

① <二七工仇>。

②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载<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出版。

各界，派出两千多名代表来到江岸，亲切慰问同敌人英勇搏斗的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壮大声势，鼓舞士气，总工会领导和林祥谦特地在江岸分工会所门前，召开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大会，林育南、林祥谦和武汉工人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林祥谦在讲话中感谢武汉各界群众对江岸铁路工人的有力支援，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工人们要团结，罢工要坚持！不要怕军阀，不要怕帝国主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分成四路纵队，前后长达数里。工人们情绪高昂地从江岸向汉口出发，林祥谦、施洋等走在队伍的前头，曾玉良指挥纠察团员行进在游行队伍的两侧，保护游行群众，沿途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的群众多达三千余人。在林祥谦等带领下，队伍穿过汉口的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租界，向帝国主义示威，他们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自由、争人权！”街道两旁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商店的店员还燃放鞭炮表示支持。帝国主义分子被觉醒了的愤怒群众吓得躲在租界楼上，路旁凶狠残暴的租界巡捕，也夹着尾巴不敢吭声。

罢工斗争在继续，罢工工人的生活日益困难。林祥谦勉励大家说：“苦是暂时的，眼前苦一点，为的是争自由，争地位，斗争要英勇。”他把工会不多的经费和各界支援的款项，按工人的困难情况，适当发给一点钱买米度日。他的夫人陈桂贞也大力协助做好妇女家属工作。工友们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四)

二月七日，罢工进入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这天上午，武

汉各界群众继续派出代表，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由于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林祥谦等人的努力工作，江岸铁路工人在连续的对敌斗争中，团结得象一个人似的。工人纠察团和广大工人，警惕地保卫着分工会会所。他们下定决心：不实现京汉铁路总工会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决不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敌人也加紧进行镇压罢工的反革命行动。帝国主义在北京的公使团，以“财产遭受损失”为借口，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唆使吴佩孚使用武力镇压罢工。二月六日下午，汉口的美、英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和肖耀南的代表，在英国总领事署内密谋策划后，吴佩孚就丧心病狂地决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大屠杀。

七日上午，肖耀南秉承帝国主义和吴佩孚的旨意，任命张厚生为刘家庙铁路警备司令，并在扶轮小学设立指挥所，完成了屠杀江岸铁路工人的反革命部署。

当天中午，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来临，他接受工友的劝说，回家吃午饭，做父亲和妻子的工作，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父亲林其庄望着儿子熬红的眼睛和消瘦的脸，痛惜地劝说儿子在家休息一会儿；妻子陈桂贞忙给丈夫盛饭，问道：“听说路局要下毒手，真的吗？”祥谦说：“咱工人结团体、立工会、争自由、争人权，是光明正大的事。但敌人是不甘心的，是会下毒手的，咱要有准备。”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炭火盆里，饭后急忙返回工会。

下午二时，张厚生派警官到江岸分工会，佯称：“奉肖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惟请先将全

权代表名单开示”^①。工会干部知道这又是敌人耍弄的诱捕林祥谦等领导人的鬼花招，就开了一个假名单给他。敌人见阴谋落空，迫不及待地要总工会的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企图把工会领导人一网打尽。

五时二十分，张厚生带着两营敌兵，从江岸车站分三路包围江岸分工会会所。一路由头道街包抄会所右侧，一路由福建街控制会所左侧，还有一路由火车站直扑会所。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则紧急宣布临时戒严，同时派兵登岸配合。

林祥谦接到纠察团员关于敌人分路包抄工会的报告后，命令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众迎敌，并亲自销毁工会的秘密文件。守卫在江岸分工会会所的数百名工人纠察团员和敢死队员，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他们拿起铁棍、木棒，拣来石子、瓦片，做好同敌人搏斗的准备。

不久，张厚生亲自指挥敌兵朝江岸分工会会所疯狂射击，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二七”大屠杀。

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江岸铁路工人怀着对军阀匪徒的仇恨，在“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的口号声中，挥动铁棍、木棒同敌人勇猛搏斗。林祥谦的亲密战友曾玉良象怒吼的雄狮，带领纠察团员冲向敌群，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工人们同敌兵激战了三十分钟，直到京汉铁路总工会下令撤退才离开战场。

兽性大发的敌兵，到处枪杀、搜捕工人，他们还闯进工人家里抢劫财产，奸淫妇女。工会附近的商店也被洗劫一空。福建街一夜之间连遭三次洗劫，老人、小孩、妇女的哭喊声惊天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00页。

动地，工会门前及周围，弹痕累累，尸横遍地，鲜血淌流，惨不忍睹。在敌人的野蛮屠杀中，江岸三十多名工人英勇牺牲，二百多名工人受伤，林祥谦的二弟林元成也被敌人杀害。林祥谦在同围捕他的敌人英勇搏斗中，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名工人。

七日晚上，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敌人把几十名被捕工人捆绑在江岸车站站台上。林祥谦被绑在站台东侧的木柱上。江岸广大工人听到林祥谦和许多工友被捕的消息后，冒着被敌人捕杀的危险，纷纷奔向车站，想夺回大伙爱戴的领导人和其他阶级弟兄。但是大队敌兵端着刺刀组成一道道封锁线，阻拦工人群众靠近站台。林祥谦透过层层刀枪，看到和他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战友们，顿时力量倍增，他威武不屈地挺立在站台上，怒视着敌军官兵，有力地鼓舞着工友们的战斗情绪。

这时，敌湖北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纠集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运、江岸机厂厂长杜拉克一伙，带着身佩大刀的剑子手，杀气腾腾地来到江岸车站站台。开始，张厚生妄想用死的威胁来迫使林祥谦下令复工。他亲自提着马灯，走到林祥谦跟前，故意问段长：“此人是不是林祥谦？”段长连忙回答说：

“就是他。”张假惺惺地说：“林会长，受委屈了！你现在的唯一出路是下令工人赶快上工，这样做，我保有你的好处，不然，你就性命难保”^①。

林祥谦怒目以对，不予理睬。

威胁利诱不成，张厚生立即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命令剑子

^①转引自《“二七”罢工斗争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页。

手举刀朝林祥谦左肩砍去，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对襟蓝上衣，不断滴落在飘洒着雪花的站台上，他忍着巨痛，巍然屹立。

陈桂贞接到林祥谦被捕的消息，迅即赶到车站。工友们护送桂贞到站台前，她看到林祥谦后急忙喊到：“祥谦，你有什么交代？”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林祥谦，突然听到已有身孕的妻子的呼唤声，着急地说：“你不要管我，赶快回去吧！”

张厚生又对林祥谦嚎叫：“上不上工？”

林祥谦瞪圆双眼，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

张厚生又气又恼，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右肩又砍一刀，歇斯底里地狂叫：“到底下不下复工令？”

林祥谦毫不动摇，他无比坚定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张厚生气得脸色铁青，疯狂地命令刽子手再往林祥谦身上砍去。林祥谦血流如注，顷刻间晕厥过去。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骄横的敌人洋洋得意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他又使尽全身力气，咬牙切齿地痛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了！”

张厚生恼羞成怒，浑身发抖，没等林祥谦说完，就慌忙命令刽子手把他杀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林祥谦，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林祥谦烈士虽然牺牲了，但是他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敢坚定，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崇高品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附：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 武汉江岸“二七”纪念馆、“二七”机车车辆厂、福建祥谦公社、祥谦陵园管理处、郑州“二七”纪念馆提供的历史资料和“二七”老人回忆录。
2. 烈士夫人陈桂贞的有关回忆录。
3. 福建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走访林祥麟记录。
4. 1923年2月27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的《“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均刊载于《向导》周刊第20期。
5. 北京工人周刊社1923年3月印行的《京汉工人流血记》。
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7. 棲梧老人：《“二七”罢工回忆》，载《新观察》1957年第234期。
8. 《向导》、《晨报》、《顺天时报》等报刊的有关报道。
9.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1月版。

曾延生

曾昭试

曾延生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领导了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著名斗争。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曾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领导了赣南各县的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同他的爱人蒋竞英，英勇就义。

曾延生，学名宪瑞，字麟书。一八九七年三月十日，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白沙曾家村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父亲曾采芹^①是清朝秀才，依靠经营祖传薄地四十余亩和一家名叫“合顺店”的酒肉槽坊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并不宽裕。

曾延生从八岁起，先后在本村族祠“三省堂”和邻近的永乐寺、均路村以及吉安县城读书。后来，又考入南京体育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秋肄业，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担任体育教员，并在吉安县立高小兼一个班的国文课。

当时，吉安学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时有发生。曾延生等人在白鹭洲中学、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和县立高小，组织师生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驱逐七师校长尹士珍、高小代校

^①曾采芹，1878年生，1925年参加进步团体“觉群社”，后担负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三次被捕，1931年7月牺牲在吉安狱中。

长谢邦宪和阻止亲日派政客邹古愚接任高小校长，以及反对县教育局局长肖斯贪污大学生津贴费等斗争的胜利。

反动当局加紧了对进步师生的控制与迫害。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的一天，曾延生在县立高小办公室阅读《新青年》，被军阀部队常德胜师的一个副官看见。暑假过后，白鹭洲中学和县立高小便同时以“行为越轨”为由，将曾延生解聘。

曾延生返回家里，向父亲陈述了想继续求学的愿望。父亲将几亩田地抵押，借了一笔钱，让延生到外地深造。

一九二三年秋天，曾延生踏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设立的上海大学的校门，选读了社会学系。他在这里探求革命真理，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经刘九峰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延生入党后，先后和在南昌、吉安的同学、亲友建立了通信联系，给他们寄去《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资本论入门》等多种社会科学书刊，热心传播革命真理。

一九二四年暑假，曾延生和罗石冰从上海回到吉安，在第七师范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陈正人、梁一清、梁明哲、曾迎祥等。八月，又秘密建立了中共吉安第七师范小组。

为了推动和发展上海各区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开始，“党选择了沪西小沙渡和沪东杨树浦作为工作重点。”^①曾延生被派到沪东杨树浦区，以创办“平民夜校”作掩护，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为了贯彻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曾延生不分昼夜奔波于杨树浦一带的纱厂，组织工人建立

^①《五卅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版。

和发展工会。他发动沪东工人积极参加沪西工人发起的“二月罢工”。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向工人请求谈判。这一斗争锻炼了工人队伍，扩大了工会组织。“几天之内，杨树浦地区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①同时，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蒋竞英等工会活动分子，经曾延生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曾延生带领一支工人宣传队，由杨树浦向南京路进发，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演讲宣传。持续至下午，又与武装巡捕冲突搏斗，直到奉命撤离。

六月十四日，曾延生以上海工、商、学界宣传代表身份，奉命来到南昌，向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象和继续在上海、汉口、青岛等地屠杀工人的罪行。当他回到吉安时，“吉地学联已组织驻会沪案干事部”^②，“于是乃由学联聘为特别干事。”^③

曾延生进吉安学联工作后，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宣传。“除他个人在各机关各店铺及少数乡村宣传外，并在学联驻会干事部组织宣传队，每日午后到吉地及其附近各处宣传。”^④几天之后，吉安四千多工人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接着，全城罢工、罢课、罢市，成立“募捐委员会”和“仇货检查队”，掀起了一场爱国反帝风暴。

与此同时，曾延生还注意做好工人组织的发展和骨干培养

① 《五卅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版。

②③④吉安团地委书记给团中央局书记的《吉安团工作总报告》（1925年11月5日），见1960年编印的《吉安地区革命史资料》第1卷，存江西省档案馆。

工作。在一次地方团员大会上，他“提议组织同志分组到码头工人、染布工人、裁缝工人、米业工人”^①中去，进行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会后，他亲自规划在省立七师、阳明中学、吉安中学，通过学生会开办平民夜校，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他还在驻会沪案干事部中，经常组织谈话会，对于党、团员的工作，“常加以痛切之批评与指导”^②。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吉安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除省立七师党支部外，又建立了工人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

七月间，曾延生回到故乡工作。他首先在白沙附近的钟家村，吸收二十八名青年学生，以办国音补习班为名，秘密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后来，又吸收他的二弟曾如柏（曾山）等贫苦工农参加。到八月中旬，社员增加到九十多人。觉群社在白沙明心寺公开成立时，曾延生被推选为社长。党在觉群社社员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曾延生任支部书记。他号召社员们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动员农民起来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提出打倒劣绅土豪之口号”^③，“大得农民之信仰”^④。

不久，曾延生奉命返回上海。时值党的十月扩大会议之后，他被派往中共引翔港部委会任宣传委员，十二月以后，又兼管组织工作^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城。曾延生和妻子蒋竞英被党派往九江工作。根据省委决定，中共九江特支改

①②③④吉安团地委书记给团中央局书记的《吉安团工作总报告》（1925年11月5日）。

⑤1925年12月26日引翔港部委会第九次部委会会议记录，影印件存上海档案馆。

组为中共九江地委，曾延生任地委书记。

在地委领导下，南浔铁路、久兴纱厂、轮船码头、九江第六师范和郊区的黄老门、马回岭、港口等农村，党、团组织迅速得到健全和发展；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并且举办了政治训练班、工农武装训练班，培养政治工作和武装斗争的骨干。为了反对奉系军阀“南伐”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还成立了反奉运动大同盟和反文化侵略大同盟。九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九江的英商太古、怡和和日清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宣布罢工”^①。一月六日，英舰水兵上岸镇压，当场打死码头工人吴宜山，并“致重伤工人数名”^②。“一·六惨案”发生后，中共九江地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坚决收回租界。通过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召开的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会议，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当天，愤怒的人群，手执大刀、梭标等武器，高呼口号，冲进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数十年的“租界”。接着，中共九江地委又采取紧急措施，成立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发表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宣言》^③。这个宣言，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英国政府被迫正式承认九江英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管理。

①② 《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宣言》，见1927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见1927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这时，蒋介石的爪牙段锡朋指派喽罗李鸿翥纠集一批右派政客建立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并组织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运动。在农村，他们欺骗农民夺取农会领导权，还挑拨市党部和农民的关系。二月间，九江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市党部开幕。李鸿翥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会议。他抢先发言，散布愚弄农民的谬论。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的曾延生，当即以“谨防扒手”为题，痛斥了李鸿翥的无耻谰言，使大会得以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蒋介石加快了反共政变的步伐。十七日，九江的豪绅地痞流氓，捣毁国民党市党部，杀害了工人纠察队队员曹炳元。曾延生和九江地委的同志们，迅速组织反击，包围全城，捕捉暴徒。

三月二十九日，郭沫若逃脱蒋介石的魔掌，从安庆潜回九江，准备转赴南昌，曾延生指派陈冰等三人专程护送。就在这次从九江到南昌后，郭沫若在朱德家里，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四月四日，这篇讨蒋檄文最早经中共九江地委送交九江《民国日报》全文发表。同日，九江地委领导全市工农群众，一举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处决了反动头目王若渊等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曾延生从九江调回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和代理委员长。

六月五日，朱培德在南昌演出了“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闹剧，曾延生也在被“礼送”之列。但他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监视，继续战斗在江西。不久，曾延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洪流，被分配在粮秣管理委员会担任委员。起义军挥师南进，于九月二十三日占领潮州，曾延生随大

军入城。次日清晨，他往城外筹粮，傍晚返回驻地时，部队已进军汕头。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折回江西找党。

十月间，中共江西省委派曾延生、汪群到万安，和曾天宇一道，筹划万安暴动。在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之后，曾延生深入到窑头、百家、罗塘等地，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此期间，他们获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李思愬往赣州收编十四军，乘“美洲号”轮溯江而上。曾延生和罗塘党的负责人，组织农军拦江截击，缴了敌人四条枪。

十一月下旬，曾延生又奉命去泰和、吉安一带开辟新区，在泰和万合田墩朱家村建立了吉、万、泰中心联络站。十二月间，他又调任赣南特委书记。

曾延生偕蒋竞英一路风尘来到赣州。城里早就贴有朱培德发出捉拿他的“通缉令”。曾延生看了嗤之以鼻，从容地到真君阁去找地下党的同志。几天后，以曾延生为首的中共赣南特委正式组成，旋即分头到各县去发动群众，准备农民暴动。他自己不畏艰险，四处奔忙。在城西门外，他参加了“瞭棚”会议，筹划如何牵制白军力量为农民暴动创造有利条件。在峰山上的天主堂内，他参加了赣县第三区区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部署了大埠地区的武装暴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一九二八年二月间，赣县的大埠，南康的潭口，于都的里仁、桥头和信丰等地，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同时，特委还秘密创办了《红旗日报》，指导运动深入开展。

赣南各县的农民暴动，使国民党反动派“疲于应付”^①。

^①见1928年4月14日敌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给国民政府的呈文，复印件存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他们除了抽调兵力疯狂镇压暴动，还在赣州城内增派特务加紧搜查，旨在“破获发号施令之机关与其发号施令之首领”^①。在这笼罩着白色恐怖、范围不大的赣州城内，曾延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的行迹终于被敌人发觉。三月二十三日，敌人突然包围了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古城巷二号，曾延生和蒋竞英不幸被捕。

曾延生被捕后，被解送到赣州警备司令部。面对敌人残暴的审讯，他毫不屈服；在敌人变换花样，采用肉麻的腐蚀时，他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又把蒋竞英带到曾延生的牢房，企图软化他们的革命意志。

夫妻二人，牢房相见，互相慰问，互相鼓励。他们回答敌人“关怀”的是雄壮有力的歌声。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敌人下了毒手。在刑场上，曾延生和蒋竞英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诱敌深入实行战略转移撤离吉安途中，特意访问了曾延生的家乡，亲切慰问了曾延生的母亲^②，热情赞扬了曾延生的革命精神。

①见1928年4月14日敌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给国民政府的呈文，复印件存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②曾母康春玉，1878年生，1967年病故。土地革命时五次被捕，从不屈服。解放后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勤俭的榜样”。见1960年1月7日《井冈山报》。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曾山：《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曾延生烈士》，载1959年5月15日《南昌日报》。
2. 《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载《碧血丹心》，江西省民政厅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3. 《吉安地区革命史资料》第1卷，存江西省档案馆；《吉安市、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存吉安县档案馆；《九江人民革命斗争史》，存九江市档案馆；《万安人民革命斗争史》，存万安县文化馆；《赣州市革命斗争史》，存赣州市档案馆。
4. 查阅刘九峰、桂家鸿、丘偶、李松风、郭慎东、周春崖、梁铎、曾汝玫、肖安民等人的回忆录；访问肖淑贤、刘桂香、张翼鹤、刘春华、汪安国、刘九峰、丘偶、龚寅候、王绍昆、陈光柳、曾广伸、曾广迎、曾广界、曾昭淑、曾福喜等的谈话记录。
5. 参阅敌伪档案：江西吉安县公民刘立纲等给国民政府的呈文（编号1813）和敌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给国民政府的呈文（编号336）。

郭 隆 真

罗占元 许庆昌

冲破封建樊笼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一八九四年四月，诞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户回民家庭里。郭家在金滩镇上是个颇有名望的乡绅之家，隆真的父亲郭荣桂是个较开明的读书人。他对科举考试十分冷淡，不追求功名，赞成康梁变法，崇尚维新，在金滩镇他第一个剪掉辫子，被镇上士绅讥为“异端”^①。

父亲是郭隆真的启蒙教师。她七、八岁时，父亲就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开始只让她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书籍。郭隆真受父亲性格影响较深，她曾向父亲问道：《女儿经》上让我们女儿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尽要女儿干这干那，为什么没有一部男儿经，也写上要男儿干这干那呢？

父亲说：我国历代相传的规矩是以男为主，男儿要念四书五经，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可惜淑善是个女儿，要是男儿就好了。

^①据郭隆真的叔伯兄弟郭全三和郭荣桂的学生马宇民的回忆。

隆真争辩说：女儿又怎么样，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中国古代就有木兰替父从军、缙萦上书救父的事情^①，她们都能和男儿一样，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哥哥一样去读书？

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有一种男儿般的气概，终于允许她和哥哥一起读书。

郭隆真的母亲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她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经常用《女儿经》中“烧菜汤，敬双亲”，“学针线，莫懒身”等条文教训和督促女儿们学习女工针黹和烹饪之事，并对女儿管教极严，要求她们深居简出，行动稳当，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隆真对这些旧礼教的束缚非常反感，经常跑出去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母亲按传统习惯让隆真裹小脚，她不肯。母亲说服无效，便强把她的脚裹起来。她大哭大闹，撕掉裹脚布，不吃不喝，以示反抗，最后迫使母亲妥协。

辛亥革命前夕，许多地方兴办新学。金滩镇是卫河沿岸上的一个热闹的集镇，水陆交通方便，外埠的各种消息很容易传到这里。郭隆真的父亲对各地兴办新学的消息很感兴趣。他感到光办新学还不够，还必须创办女学，让女孩子也有上学的机会。一九〇九年，郭隆真十五岁时，在父亲的主持下，以郭淑善的名义在金滩镇破天荒地办起了一所女学，定名为元城县^②第一女子小学堂。讲堂、自习室都设在郭家院里，一切设备和经费均由郭家自己负担。郭隆真自任义务教员，免费招收了二十

^①缙萦，西汉著名医学家淳于意的女儿。淳于意在汉文帝时被人控告下狱，缙萦自己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罪。

^②当时金滩镇属元城县治，1914年后并于大名县。

多名女孩子来读书。学生除了学习新课本外，还学唱反对封建礼教的歌谣。

当时，办女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其中有个社会舆论问题。许多人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甚至对女学进行讥笑讽刺。但郭隆真对办好这所女学很认真，主动到一些人家去拜访，说服家长允许女孩上学。

有一次，她勇敢地跑到大街路口张贴广告，上面写道：“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入学一律欢迎。”^①由于郭隆真的不断努力，到校学生越来越多，人们看法也逐渐改变，这所女学日益得到人们的称赞。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位较开明的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教育，发现了金滩镇办起的这所女子新学堂。他嘉奖郭家父女，并在县里立案，不久又把这所小学搬到元城县城里，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由于办女子学堂有成绩，一九一三年，郭隆真十九岁时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女师上学。

然而生活为她安排了坎坷的道路。原来在郭隆真十三岁的时候，父母便给她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婆家是一个田产房屋很多的地主，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急于给儿子完婚，好让媳妇过门料理家务，因而一再催促结婚。郭隆真当时强烈反对中途辍学，更不同意结婚。为了躲婚，她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这时她父亲已经去世，婆家一再扬言，如果不结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一九一七年暑假，郭隆真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急信，匆匆回家，见母亲无病方知被骗。经母亲苦

^①大名县金滩镇公社金北大队罗洪章的回忆。

苦哀求，最后只好“同意”结婚了。

结婚那天，郭隆真没有梳妆打扮，仍然穿起那套月白色上衣和黑裙子的学生装。那时新娘坐花轿必须把轿帘放下，不能露面，她却不管那一套，自己硬把轿帘掀开，让新鲜空气透进来。

刚过门不久，她就提出仍去天津读书，如不同意就离婚。开始，婆家不同意，但郭隆真毫不让步，经过几次冲突，婆家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樊笼，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拓了一条新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婆家。

战斗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郭隆真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入简易师范班，再入预科，以后才考入师范本科第八级，于一九一九年暑期毕业。

在校期间，她衣着朴素，态度爽朗大方，对人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她反抗封建礼教和黑暗社会的斗争精神，深受同学们的钦佩。

五四前夕，直隶女师实行封建统治，不让学生与外界来往。几次爱国浪潮几乎都没有冲进女师的围墙，这里的女学生仍然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郭隆真对此厌恶而且忿忿不平。她曾对妹妹郭淑文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生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①郭隆真喜欢阅读《新青

^① 《红旗飘飘》第23集第133页。

年》等进步报刊，从中寻求救国真理。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她同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闯将。五月五日晚上，经郭隆真和邓颖超等研究后，于六日下午由郭隆真主持召开了直隶女师各班代表会议。会上，她慷慨激昂地陈述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受的耻辱，揭露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并大声疾呼：“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① 她的话激励着每个同学，使历来平静的女师校园沸腾起来了。

五月十四日，天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进行。但这个学生联合会最初不包括各女校学生。为了把天津各女校学生组织起来，参加爱国运动，郭隆真和刘清扬、邓颖超等，积极到各女校联络，筹备建立妇女组织。经过她们紧张的活动，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天津义仓街江苏会馆举行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天津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等女校学生六百多人。会议公推女师毕业生刘清扬和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为评议委员，并组成爱国宣传讲演队，以邓颖超、郭隆真为演讲队队长^②。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郭隆真率领讲演队日夜奔波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讲演的内容除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外，还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

^① 《不屈的共产党人》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② 参见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9页。

姻、保护妇女儿童等。

在爱国学生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斗争下，北京政府于六月上旬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六月中旬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各地学联纷纷通电响应，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了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为代表，与北京学联等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这是郭隆真第一次进京参加请愿活动。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的坚决斗争下，终于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一九一九年八月，山东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枪杀山东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和其他两位领导人，宣布山东戒严，野蛮镇压爱国运动。马良的暴行引起了全国公愤。这时天津反动当局正在回民中散布“天下教友是一家”的谬论，企图挑拨离间回汉青年的团结。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召集天津一部分回族群众开会，向大家指出：既然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下毒手杀害了回民马云亭？这分明是骗人的迷魂药，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大家认识提高了，由郭隆真与刘清扬等带领，走到清真寺，砸掉了由马良题字的匾额。

接着，郭隆真又一次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天津学联推出她和刘清扬、张若名以及男学生代表共十人，于八月二十三日进京。到北京后，他（她）们联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十五人，组织了二十五人的请愿团到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要求爱国自由。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郭隆真在总统府门前对过路的各界群众讲演，痛斥卖国贼枪杀爱国领袖的罪行，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反动政府如临大敌，惊恐万状，急忙派军

警逮捕了学生代表，将代表们拘押在北京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一方面声言要把全体代表枪毙，以威胁爱国群众；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软化学生代表。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是回族人，他知道郭隆真也是回族，企图利用所谓民族感情拉拢她。常朗斋命令从他的小厨房里给郭隆真开饭，但郭隆真不买他的帐，坚持和几位被捕的女代表在一起开饭。在被拘押期间，郭隆真斗志坚强，她面对面地斥责敌人说：“爱国无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能有人救国吗？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照样进行爱国活动。”

请愿代表被捕后，全国各地强烈抗议。在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八月末释放了郭隆真等请愿代表。

九月初，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郭隆真等男女学生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请愿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由于并肩战斗的友谊和高昂的爱国热情，使她们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之间的界限。郭隆真首先提议：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男女同学要更好地联合起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有的女生还提议，天津各女校学生可以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些主张立即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与大家的赞同。周恩来还主张由这两个团体各推举若干人，办一个刊物，以推动天津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两个组织各派十个人参加。其中男代表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等，女代表中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会上决定出版的刊物叫《觉悟》，主办刊物的团体就叫觉悟社。觉悟社成立时，社员们不用本名，特制定五十个号码，以抓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

再按号码谐音取一化名。如邓颖超是一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是五号，化名伍豪；郭隆真是十三号，化名石衫或石珊。觉悟社一诞生，就请李大钊来指导。李大钊特别称赞他们男女同学合组团体，勇敢打破封建隔阂的精神，鼓励他们团结奋进，努力研究各种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郭隆真第三次进北京请愿。这是由于八月份请愿目的没有达到，九月间山东形势愈见紧张，应山东爱国团体的要求，天津、上海、南京、河南等省十八个爱国团体的三十一名代表陆续到京。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八人，其中有郭隆真、王同华、武绍芬三名女生。九月三十日，郭隆真等全体代表在北京武绍芬家里开会研究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全体代表齐集新华门前，要求徐世昌总统接见。在请愿书中，除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外，还要求不得补签对德和约，不得与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条，解散安福俱乐部等。徐世昌仍然避而不见，郭隆真义愤填膺，一口气爬到总统府门前石狮子上，面向新华门，大骂总统徐世昌。至当晚九时，京师警察厅派出五、六百军警，将郭隆真等三十一名代表和一个新闻记者强行押到警察厅。当警厅派人审讯她们时，郭隆真鄙夷地回答说：我到警察厅来，是你们吴总监把我请来的，别人不能问我！当时京师警察厅上报的公函中记载：“女生郭隆真并向承审员声言，汝非吴姓，无权问我，其势汹汹，出言蛮横，似此当场侮辱，殊属目无法纪。”^①由于郭隆真等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反动政府于十一月十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

^①中华民国8年10月京师警察厅公函，存北京档案馆。

郭隆真被释放后，回到天津又投入新的战斗。这时天津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仍然如火如荼。直隶省长曹锐命令天津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回家，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骨干成员，提出“反对提前放假”的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持抵制日货的斗争。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从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庄查获了日货灯罩十七篓，“魁发成”奸商勾来日本浪人殴打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和奸商，但省公署逮捕了请愿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觉悟社的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等直接领导下，天津一千余学生于一月二十九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他们来到省公署，大门紧闭，省长不见。周恩来、郭隆真等奋不顾身，从省公署大门门槛空档挤了进去，要找省长算帐。警察逮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多名学生代表，镇压了请愿示威群众。

在警察厅拘押期间，司法科长高登甲曾传讯郭隆真，但郭隆真每次大义凛然地回答，都使他无法再问下去。而郭隆真却反过来质问高登甲拘捕的理由，更使他狼狈不堪。有一次高登甲路过郭隆真和张若名的牢房门前，郭隆真从窗户里大喊：“请司法科长站住！我们有句话说。”高登甲表示不屑于与女学生讲话，郭隆真怒斥他蔑视女子人格。

警察厅对被捕的学生代表严加隔离，不准互相往来，又不准备公开审理。周恩来、郭隆真等秘密串联了全体被捕代表，进行绝食斗争，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要求公开审判。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他们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四月七日全体被捕代表二十一人被移送到检查厅。他们在检查厅里得到了可

以看书学习、互相往来和开展娱乐活动的权利。郭隆真这期间虽然曾经患病，但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她积极地学习，热情地联络和照顾大家，受到了大家的敬重。四月十一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代表大家特赠送镶有国旗的一面镜子，表示祝贺。郭隆真很受感动，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饶有趣味的短信，信上说：“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激！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①周恩来后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篇历史文献中，详细记载了郭隆真等被捕代表的斗争情况。由于全体被捕代表和天津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七月七日开庭审讯被押半年之久的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一名代表，并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所谓“期满释放”。周恩来、郭隆真等在法庭门前被欢呼的人群包围起来，给他们每个人胸前戴上了镌有“为国捐躯”四个金字的纪念章和大红绸花。

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广泛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新浪潮。这时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寻求马列主义真理而积极倡导和发动的，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隆真和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为这股巨大浪潮所吸引，决心赴法勤工俭学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寻求救国

^①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第52页。

救民的真理。觉悟社和天津学联的同学们热情支持郭真隆，并为她筹措了出国的旅费，帮助她实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十五届赴法学生团组成。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都是这届赴法学生团的成员。十一月七日，郭隆真等一百九十七人乘坐法轮保尔到斯号放洋赴法^①，于一九二一年初到达法国。

当时法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出现不景气的时期，许多工厂资本家裁减工人，大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遇到了极大困难。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履行代找工作、安排就学的职责，反而把国内的一点捐款也贪污中饱，使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求学不能，做工不得，生活无着。为改变这种困难处境，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勤工俭学学生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读书权”的斗争口号；二十八日组织了四百多勤工俭学学生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郭隆真、张若名等参加了这次运动。

此后，郭隆真与张若名进入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厂当工人，工作非常艰苦，每天为云母片打眼，完工后周身酸痛。郭隆真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这时期她直接接触了法国工人和华工，与他们一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也进一步了解了法国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努力学习法语，如饥似渴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工资微薄，经常吃的只是炒洋白菜和粗面包，但她仍然节省一些工资用来帮助张若名入校学习。她的这种舍己为人精神，得到广大勤工俭学生的

^①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146页。

称赞。

留法勤工俭学的男女学生，虽然多次斗争，但经济困难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有许多人无法维持生活，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冻饿交迫，困苦颠连，甚至有自杀者，而女生之苦尤甚。郭隆真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但她和许多女学生一样，生活异常凄苦。为此，她写了血书及泪书寄回国内，刊登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她在以《人道》为题的血书中呼喊：

“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声里！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饿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①。

在另一封泪书里，郭隆真揭露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员脑筋腐败，排斥女生，挥霍巨款，动用留法俭学生之存款，“致使饥寒迫亡的女生告急无门”。

郭隆真的血泪书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同情。

《时事新报》在发表血泪书同时，还加了编者前言：“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不能维持生活，已有被遣送回国者。而留法者仍属困苦颠连，莫可告语，其中举目无亲之女生，更有行将冻饿以死之慨。昨有郭隆真女士，寄来血书明信片一张，系断指所书者；另有乞援书一封，并饥寒状况之报告。字字沉痛，不忍卒读。想巴黎沦落人，必不至一郭女士，郭女士悲声，或即留法工学生之悲声也。”^②前言中还呼吁北京政府当局在“政事百

^{①②}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688页。

忙之中，亦应分出一、二分精力，注意及此”；警告当局“倘不力筹救济方法，恐将陷许多青年于绝地”^①。

一九二三年夏，山东临城匪徒劫车案^②发生后，英、美、法、意、日、比、荷等帝国主义外交使团多次开会，以“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为由，议决在中国设国际警察，共管全中国铁路，并已讨论具体实施办法。在法华人闻此消息，愤慨万分，于七月八日集会巴黎，商量对策。郭隆真代表旅法女子勤工俭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以反对列强共营中国铁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的书记股，以何鲁之、徐特立为主的经济股，以郭隆真为主的交际股，以许德珩为主的新闻股，以袁子贞为主的庶务股，领导这一斗争。嗣于十五日召开了旅法华人救国大会，发表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两份重要文件，表示：“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害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要内以民族自决，外以团结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起来反抗”。这两份重要文件还指出：“为要贯彻我们的主张，最后我们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了。”^③郭隆真参予领导的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也鼓舞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斗志。各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斗争的

①③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688、799页。

②山东临城匪案，是指以孙美瑶（张敬尧旧部）为首的大股土匪于1923年5月5日深夜，掘毁了山东临城境内一段铁路，使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出轨，然后抢劫火车上的行李财物，并劫走中外旅客二百多人，以勒索金的事件。

威力，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未能得逞。

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一九二一年，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得到上海中共中央通知，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①。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许多进步的勤工俭学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郭隆真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了锻炼，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一九二三年加入团组织，同年转为中共党员^②。

郭隆真入党后，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目标和方向，并且学会了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从而发出了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谋求解放的呼声。当时在法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王亚森的中国少女，被拐骗到法国给资本家当仆人，资本

①胡华：《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载《周恩来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郭隆真自传中说：“在1923年春遇少年杂志社记者于里昂，遂对共产主义讨论两次，说我具备革命者的条件，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结果周恩来、尹宽等遂介绍我加入S（C）Y。”另据蔡畅1939年4月15日回忆她在法国勤工俭学中的活动时说：“1923年头，党刚成立不久，我即刻加入了共产党”，“我是负责党的组织部的工作的，当时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女党员，有两个是湖南来的，其余三人就是郭隆真、张若名、熊季光”（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第406页）。

家不但不给工资，还常常施以残酷虐待，最后驱逐出门。郭隆真就此事发表了《法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女子》一文，尖锐地指出：“这就是资本制度的罪恶！法国资本家不知奴隶了多少法国女子，现在且奴隶中国女子。王亚森这件事不过是法国资本家黑暗势力下的一个发现，我们应该为已发现的王亚森谋解放，同时亦应该为未发现的女奴隶谋解放！”^①

一九二四年秋，郭隆真结束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和李富春、蔡畅等一起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情景，增强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一九二五年春，在国内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她满怀革命激情回到北京。

从事北京地下党的活动

郭隆真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负总责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

这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隆真被李大钊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妇女部工作，化名林一（林逸）。妇女部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妇女之友》，分别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派一位代表负责主办，郭隆真代表共产党方面负责，张挹兰^②代表国民党方面负责。《妇女之友》创刊后很受群众欢迎，郭隆真为这个刊物付出了艰巨劳动。她经常亲自把稿件送到天津，

^①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第58页。

^②张挹兰系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

印刷好以后，用一个大网篮装起来加以伪装，当作行李乘火车带回北京。为避免前门车站的检查，她在东便门小站下车，雇人力车转道入城。由于她工作沉着大胆，总是能来去自如，顺利完成任务。

郭隆真在参加妇女部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是北京缙云女校的主持人。这个学校和《妇女之友》社都在西城报子衙四十九号一处两层的四合院里，前院是女校，后院是《妇女之友》社。郭隆真利用这里作为我党的一个活动机关，党团组织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郭隆真还经常到香山慈幼院及北京女高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处活动，进行发展党团组织等工作。她在香山慈幼院发展了张百川、李玉枢等第一批团员，并建立了团的组织。她还亲自介绍了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陈碧如和香山慈幼院的教师张秀岩等人入党。

郭隆真在北京时住在井儿胡同四号的一间小门房里，屋子很小，摆设简单，生活俭朴，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在警探密布的险恶环境中，她毫不退缩，克服各种困难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受到了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

一九二六年六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占京津，年底称安国军总司令，加紧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环境异常险恶。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反动军阀袭击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了寓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的李大钊，张挹兰同时被捕。接着，郭隆真也被捕。事前郭隆真早有戒备，已把党内文件转移别处，敌人在郭隆真那里什么证据都没捞到。郭隆真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敌人审讯了几次，没有得到口供。她在狱中毫不屈服，还鼓舞同狱难友坚持斗争，并向监狱看守宣传爱国反帝的思想。一名女狱卒受到教

育，后来为郭隆真往外传递消息。当韩幽桐去探监时，见隆真身穿囚衣，面容憔悴，不禁失声哭起来。郭隆真安慰她说：

“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①。

由于没有证据，郭隆真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后经亲友和同学们多方营救，于一九二八年末被释放出狱。

由于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同志调离北京，有的同志被捕殉难。郭隆真出狱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住张秀岩家里将近一个月。一九二九年初，她离北京去上海。这时的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处于非常秘密状态，郭隆真到上海两个月，没有和组织接上头。但是郭隆真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并不气馁，天天到街头四处留意观察，寻找接头机会。又经过一段时间，终于在上海静安寺路拐角处遇见了邓颖超，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暂住党中央直属机关，等待分配工作。

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

一九二九年春，郭隆真被派到东北，在满洲省委搞职工运动。她谦虚朴实，待人热情，和蔼可亲，满洲省委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

为了加强东北党的工作，党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达满洲省委的所在地沈阳，时值哈尔滨爆发了中东路事件，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工作中心在哈尔滨。刘少奇亲自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并把郭隆真等一些满洲省委重要干部

^① 《红旗飘飘》第23集第144页。

先后派到哈尔滨，加强中东路工人斗争的领导力量。

一九二九年七月，东北当局在国际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下，武装占领中东路，公然破坏了一九二四年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定。八月，东北军与苏联远东军在边境地区发生战争。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当七月份东北当局武装占领中东路之后，把苏联职工全部驱逐，并对中东路的中国工人开始有计划地迫害。中国工人在中苏共管期间所享有的一切待遇被取消，工资减少，工时延长，生活条件恶化。当局还派出大批稽查侦探监视工人，整个中东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中东路工人与中国反动当局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迫切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党把领导中东路斗争的重点放在中国工人最集中、工作又较有基础的中东路三十六棚总工厂，派郭隆真、李梅五、孙秀峰等到这里工作。

三十六棚铁路总厂当时有中国工人一千五六百人，没有女工，郭隆真在这里兼党支部书记^①，这是很不容易的。她以李梅五家属的身份随同李梅五一起，住到三十六棚附近偏脸子八道街工人宿舍二十九号院里，不久与李梅五结婚。李梅五在机械分厂当旋盘工，便于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斗争。郭隆真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工人们也都亲切地称她大姐，常到她家里去。有人头发长了，她就说：“小伙子，该剪了。”于是就给工人剪头；有人衣服破了，她就说：“脱下来，补一补。”于是就给工人补衣服。有些独身工人有钱，不会安排生活，就把钱交给她保存，或托她买些可用的东西。她每次都办得很周到。她通过这些方法接触工人，向他们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革命道理，很快在她周围团结

^①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她特别注意分寸，避免暴露目标。

郭隆真根据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有关指示，亲自编写和刻印传单，揭露东北当局在蒋介石政府和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引导工人群众认识中东路事件的真相，不受国民党冒充“爱国主义”的欺骗。

当时中央指导中东路斗争有些“左”的东西，如一开始就要求组织以拥护苏联为中心的政治示威游行等。郭隆真和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认为，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斗争方式应该有所转变，不宜马上搞政治示威游行，而是应该以怠工的形式进行反抗斗争。他们计划提出工人最关心的几项要求，广泛联络各厂工人，争取共同行动，在适当时机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口号。但这些意见遭到哈尔滨市委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单纯搞经济斗争。刘少奇到哈尔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坚决支持了郭隆真的意见。哈尔滨市委经过讨论也改变了过去的主张，决定支持郭隆真的提议，努力扩大怠工斗争，除三十六棚外，还要发动地包（机车修配厂所在地）、上号（香房）等处铁路工人怠工斗争，同时也要发动其它行业工人斗争，以与中东路工人斗争相呼应。于是中东路特别是三十六棚总厂工人怠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党团组织的工作也渐有起色。十一月初，以三十六棚工人为主的七百余名铁路工人包围了铁路管理处长，提出“反对减少工资”、“反对木棍改发土煤”^①等要求，迫使管理处长不得不两次收回减

^①东北当局强占中东路之后，为了减少支出，把原发给工人取暖的木拌劈柴改发价格低的土煤。

少工人工资的成命；甚至工人的一些日常要求，也都得到了相当的满足。这期间党组织和郭隆真也引导工人把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东北军阀强占中东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一九二九年八月到十月，由于中东路事件引起东北军和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年底东北军大败，中苏边境战争停止，签订《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中苏共管的原状，此后工人斗争的发展出现了更加有利的新形势。中东路工人的斗争与工会组织的建立均可公开进行，工人的文件与斗争消息均可在报上发表，并且有相当的印刷出版自由^①。党的组织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在这种形势下，正如刘少奇所说：“在客观上，此时一点钟的工作，比环境恶劣时一年的工作所收获的成效还要大”^②。

这时期，党领导了东铁失业工人的复工运动。《伯力协定》规定，七月事变被驱逐的苏联员工全部回厂工作，七月事变以后招用的新员工全部裁减。对这个协定，中东路工人是拥护的，因为七月以后雇用的只有少数中国工人，多数是白俄分子，有些就是一九二四年中苏合办东铁后被开除的帝俄时期的工头或监工。但是东北当局阴谋在裁人问题上挑起工人的反苏情绪，他们不按《伯力协定》办，大裁中国工人，不裁白俄分子。如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一次裁掉一百八十余人，全是中国人，其中还有许多是七月事变前多年的老工人。当工人起来质问时，铁路督办公署把这种裁工的责任完全推到苏方局长与厂长身上（其实苏方是反对他们这样裁人的）。郭隆真根据

①②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刘少奇的指示，立即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掀起反裁工斗争。她首先编写了揭露中国官厅裁工阴谋的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同时找积极分子开会，研究斗争方案。接着成立了群众斗争组织，一个是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主要由郭隆真领导；另一个是东铁工人失业团。当时李梅五也被裁，党派他为失业团总代表，又派全总特派员孙秀峰任失业团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派唐宏经指导在业工人斗争；郭隆真等五、六名党团干部担任失业团的讲演队、体育队、外站巡视等工作。失业团与后援会的斗争迅速展开。刘少奇当时指出：失业团活动是目前北满发动群众斗争的中心，它不只限于争得失业工人复工，主要作用是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和组织全路以至各行各业的工人斗争。失业团发表《告全路工人书》和声明，提出：立即恢复一切被裁工人工作、开除一切白党、补上中国工人等七项要求。在业工人的后援会也发表声明，要求东铁督办公署收回成命，使被裁华工一律复工，将东铁白俄一律裁掉，以华工添补；并宣布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资格，一切复工交涉委托东铁工人失业团办理。郭隆真深入地作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亲自到失业团和中东路沿线巡视与讲演，编写传单，甚至拿着粉笔把工人的要求写到火车上、大街上、工厂附近的墙壁上。她还经常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的要求与想法。刘少奇曾说：派到失业团里的许多同志，只有大姐作了很多工作。在郭隆真等领导下，失业团的同志们斗志昂扬，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活动。如派代表到东铁督办公署请愿，找路局副局长郭崇熙谈判，多次冲进总厂与中方副厂长李祖藩评理，三次包围机务处副处长高端办公室。这些活动闹得官厅和路局不得安宁，同时极大地扩大了失业团的影响。三十六棚的在业工人，除组织后援会外，又有四五

百人捐款援助，外站工人也纷纷捐款。中东路各站工人议论说：

“失业团干得真漂亮。”失业团的斗争，使反动当局大为恐慌，为防止事态扩大，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先给七月以前在籍而被裁的百余工人复了工，经过一段周折又给部分新工人复了工。余下一部分失业小工，工会捐款救济。这一次在刘少奇指导下，由郭隆真参加领导的失业团的复工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

东铁失业团斗争的一个中心目标，是打倒工业维持会，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当时的工业维持会是个黄色工会，一直由官厅包办，它的历任会长、副会长全是官厅指派的帐房先生、监工、工头和流氓无赖。他们只顾勾结官厅，多多“捞钱”，不管工人死活。三十六棚“工维会”会长肖世平，外号“肖扒皮”，是历任会长中“捞钱”最凶的。东铁工人对这个御用的“工维会”早就深恶痛绝。本来在失业团斗争过程中结合打倒“工维会”是绝好时机，但失业团总代表李梅五等人不执行党的指示，反而与“工维会”暗中妥协与勾结，破坏党反对“工维会”的斗争。只是由于郭隆真带领三十六棚工人积极分子坚决斗争，才使“工维会”的罪行得以揭露。工人们强烈提出，“推翻工业维持会，打倒会长肖扒皮”^①的要求。对于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李梅五又百般阻挠，并强迫郭隆真跟他走。郭隆真非常气愤，批评了他的反党行为，并向刘少奇作了报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郭隆真亲自领导三十六棚工人筹建自己的工会。她紧紧依靠工人积极分子，向他们介绍国内各地成立工会的情况，派他们到各厂广泛宣传。一九三〇年春

^① 《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节，到郭隆真家拜年的工人很多。她利用这个机会，和工人商量筹建工会的问题。接着她又召集各分厂筹建工会的代表十余人到失业团开会，不顾李梅五的破坏，同工人一起研究了工会的组织方法。她还亲自帮助工人把它写成布告，分别贴在各分厂大门口。布告一贴出，工人纷纷围上来看，这时发起人立即向工人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签字报名，参加工会。结果三日内报名的达八九百人。在郭隆真指导下，工人们立即召开全体大会，成立了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九个分厂共选出十五名委员，机总分厂青年工人张明德当选为总工厂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后，郭隆真为工人起草了工厂委员会成立声明，声明说：“总工厂全体中国工人一致决议，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资格，并经全体工人一致选举委员十五人组成总工厂（工人）委员会，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关工人事宜^①。声明一式数份，分别贴于各分厂并送铁路局、督办公署、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等机关。郭隆真与张明德等工厂委员会的骨干分子继续发动工人斗争。他们曾召集千余工人大会，高呼打倒工贼的口号，会场群情激昂，把工贼与警察都吓跑了。有一次，工贼肖世平勾结警察管理处到三十六棚抓人，把有些反对肖世平的工人以“共产党”罪名逮捕。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和广大工人行动起来，包围了警察管理处，愤怒要求放人，打倒工贼。在群众斗争强大压力下，警察当局只得放了工人，撤掉了“工维会”会长肖世平的职务。沿路各站工人听说三十六棚成立了工人工厂委员会，都欢欣鼓舞，翘首相望，等待加入。当时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召开全路工人代表大会，砸掉“工维会”牌子，成立中东路华工

^①据黑龙江省档案局有关档案。

总会。但就在这时，李梅五、孙秀峰等反对派分子，背着郭隆真，违反党与刘少奇的指示，拉出一部分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跑到南岗“工维会”去参加选举，使工厂委员会功败垂成。

郭隆真在对待李梅五的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宝贵的政治品质。李梅五是从法国回来的华工，一九二八年冬到满洲省委搞职工运动，一九二九年七月到哈尔滨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他是隐藏在党内的反对派分子，其真面目是逐步暴露的。开始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时，他还比较积极，后来主要在对待工维会的态度以及建立工厂委员会等问题上，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这期间郭隆真多次严肃批评他，但他一意孤行，与郭发生激烈冲突。政治观点的分歧，使李梅五露出了可憎的真面目。他对郭隆真说：“我是反对派，是反对派的工人部长。我爱你是要你服从我这个反对派，你现在怎样？即表示态度，要服从就服从，不服从立即滚出去。”^①李梅五利用夫妻关系要挟郭隆真，足见其自私无耻。郭隆真青年时代饱尝包办婚姻的痛苦，经过多年斗争，才摆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她为了革命工作，无暇过问自己的私生活，到东北和李梅五结婚已是三十多岁。她渴望有个理想的爱人，但她更珍惜党的利益，在维护党的事业面前，她态度明朗，立场坚定，丝毫不徇私情，拒绝了李梅五的要挟。李梅五又进一步威胁、恫吓说：“你是中央派来的侦探，你马上滚，将来反对派得势，我要枪毙你。”^②在与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中，郭隆真不动摇，不

^{①②}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存中央档案馆。

气馁，始终和广大工人站在一起，执行省委的斗争策略，为维护党的利益英勇奋斗。一九三〇年三月李梅五被清除出党，三十六棚工人称快。郭隆真得到党与三十六棚工人的极大尊敬和信赖。为了郭隆真的安全，党决定把她调走。临行那天，三十六棚工人积极分子为大姐送行，表现了难舍难离的阶级感情。郭隆真在领导中东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刘少奇在全面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时，对郭隆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①

坚贞不屈

一九三〇年三月，郭隆真由哈尔滨调回沈阳，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郭隆真到沈阳后不久，刘少奇奉中央之命调离满洲省委。四月，中央派李子芬担任省委书记，郭隆真负责辽宁的工运工作。四月十九日，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机关党团同志三十余人被捕。四月末组织了以林仲丹、杨一辰为首的临时省委。林仲丹为了迅速恢复满洲省委党团工作，将王鹤寿从哈尔滨调回沈阳恢复团省委，郭隆真也参加党团省委的恢复工作。因为党团机关均被破坏，无法在城里活动，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他们到沈阳大南边门外文家坟的野地里开会。会上，郭隆真讲了话。散会后，刚要往城里走，警察就来了。警察是看见空旷的坟地里有男有女引起了怀疑。因为这一带头天晚上发生

^①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了盗案，警察正在搜查可疑的行人。郭隆真等几个刚到城门口，警察就上前盘查，并将他们捆绑起来。郭隆真为了蒙混敌人，编了一套逃婚情节，说她不堪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从家里跑出来，愿意嫁与某人。这几个人中有做媒的，有写婚书的，有的是送钱来给他们结婚的。警察本是无目的的拘捕，又没有其它证据，只好将其他几个人放了。对郭隆真则以“背夫窃逃，有伤风化”的罪名，拘留在看守所十多天。组织上通过一位党员的亲属花了几百元钱，贿赂警察署释放了郭隆真，使她又一次逃出了敌人的魔爪。郭隆真被释放后，组织上考虑到她已不便留在东北，中央即把她调离满洲省委，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郭隆真在上海稍事休整，于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被中央派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逸。

当时，山东正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之下。从一九二九年十月到一九三〇年二月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警察和便衣侦探在青岛、济南等城市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在青岛恢复了山东临时省委。同年六月临时省委改组，成立了山东省委，加强了山东党的工作。郭隆真到山东后，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①，和陈少敏、董汝勤等一起，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〇年八月间，青岛市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和集会，遭到敌人的镇压，党组织也暴露

^①1961年9月董汝勤回忆青岛市党的活动情况时说：1930年青岛市委书记是杨汝贤，韩良慧是组织部长，郭隆真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了，一部分同志被捕。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地下党的活动十分困难。但是，郭隆真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年十月中旬，青岛内外纱厂工人朱光清被厂方日本人折磨致死，但厂方却伪称朱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不许工人声张。郭隆真得知消息，就在工人中活动，找一些工人谈话，指出朱光清是被厂方日本人害死，要工人团结起来同厂方进行斗争，要为朱光清开追悼会，要抬着棺材向厂方提出要求。她还乘机教育工人要组织自己的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罪恶的小报。由于郭隆真经常在工人中活动，引起敌探的注意。一次，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杨氏在河边洗衣，郭隆真与她谈话，不慎被青岛市公安局第五分局局员陈寄尘侦知，对郭隆真进行跟踪监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活动，陈寄尘尾随其后，她刚进林家即遭逮捕。

被捕后，青岛市公安局对郭隆真进行审讯。郭隆真开始自称张马氏，继而又说张李氏，说她从天津来，后又改口说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来没有抓到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假，弄不清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但青岛市公安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乃于十一月十七日将郭隆真解送济南高等法院。

郭隆真被关押在济南监狱。敌人对她施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她始终坚不吐实，表现出毫不动摇的硬骨头精神，连狱中的狱吏也说这样的人实在少见。一直到牺牲前，敌人也没

有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山东的反动军阀韩复榘，把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春先后被捕的二十二名共产党员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杀害。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宁死不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进行战斗，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浩然正气。其中有前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人，郭隆真亦同时遇难。郭隆真等遇难后，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不仅慷慨就义，而且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斗争，这种光荣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郭隆真一生为革命战斗，无私无畏，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对党、对同志犹如一团烈火，忠于组织、团结同志。她一生曾经六次被捕入狱，面对野蛮、凶恶的敌人，大义凛然，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毫不畏惧。革命锻造了她铮铮铁骨。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妇女界的一面光辉旗帜。

^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茅 丽 瑛

王正玲 毛和利

(一)

一九一〇年八月四日，茅丽瑛出生于杭州一个正在走向贫困潦倒的小官吏家庭。父亲茅仲复，性情暴戾，嗜吸大烟，又处处摆阔，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母亲朱氏，勤俭、善良，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生有一男二女。茅丽瑛五岁那年的隆冬，债主连连临门逼债，除夕夜晚，父亲投西湖自尽。不久，她那七岁的哥哥也因患肺炎无钱医治而夭亡。

茅丽瑛的父亲死后，她的母亲为生活终日奔波，在借贷无着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幼女离开杭州，到上海投奔亲戚陈招悦，寻找生活出路。在上海启秀女校担任教务主任的陈招悦，将这母女三人安排在校内教工宿舍居住，并让朱氏当校工。这所女校位于闸北的东宝兴路，分中学、小学和幼稚园三部分，朱氏的工作是管理幼稚园。一家人虽说有了一个安身之所，但朱氏那微薄的收入，仍难以抚养两个幼女成人，只得含泪将小女儿丽华，送给一个广东人当养女。

一九一八年秋，年满八岁的茅丽瑛，得到陈招悦的应允，就读于启秀女校。丽瑛资质颖慧又勤奋好学，不久便以优异成绩博得教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尊敬。她的英语成绩始终为全班

之冠，大量的单词、词组都背得烂熟，且能与英语教师对答如流。她性格活跃，爱好文体活动，课余常与同学一起跳绳、踢毽子、溜冰和骑车；在陈招悦的指教下，还能弹一手好钢琴。清贫的家境，使好学上进的茅丽瑛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为以后继续升学的经费而焦虑。当她得知学校幼稚园需要音乐教师时，便主动向陈招悦自荐。学校同意了她的要求。从此，她一面继续读书，一面给幼稚园当“小先生”。

一九二五年五月，继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后，租界的帝国主义巡捕又在南京路上枪杀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十余人，全上海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一向主张“学校要超政治”的启秀女校校长徐婉珊，这一次又没有让学生上街游行。可是，这场伟大的反帝风暴还是震撼了校园，初步唤醒了茅丽瑛、蒋学杰等过去极少过问政治的女学生。打这以后，茅丽瑛经常向蒋学杰借阅《学生杂志》、《妇女周报》等刊物，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并注意观察社会的状况，常与同学一起对社会的种种不平开展讨论，然而都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天下午，正在上课的启秀女校师生，被突然从远处传来的激烈枪声惊得紧张不安。徐婉珊下令关闭校门，以保安全。茅丽瑛难以坐定，一心想弄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走上学校楼房最高层向外眺望，但却什么也没有看见。翌日下午枪声停息不久，消息传来了：工人大暴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校门已经打开，茅丽瑛、蒋学杰等几个女同学跑上街头，去探询暴动的始末。

街头巷尾，到处聚集着人群，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讲述着

自己看见的有关大暴动的一些片断。一个目睹者滔滔不绝地把工人纠察队在天通庵怎样袭击军阀部队军用火车，怎样迫使数路全副武装的军阀士兵缴械投降的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到天通庵去看看！”在茅丽瑛的提议下，一群女学生到了天通庵车站，又随着人流，涌向北火车站。北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怀着胜利喜悦的各界民众，举着红旗，打着标语，不断地欢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啦！”“骑在上海人民头上的反动军阀被打倒了！”这振奋人心的革命场面，使茅丽瑛受到极深的感染。她激动地提出，要把这耳闻目睹的实况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在校内散发。女友们都赞同她的倡议。于是，她们立即赶回学校，分头写稿、裁纸，忙碌起来。茅丽瑛搬来了平时印歌曲用的腊纸、钢板和油印机。一叠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传单很快印了出来。^①

第二天，这份传单在全校传开了。师生们争相阅读，惊喜不已；校当局却大为恼火。一贯谨小慎微的陈招悦听说传单是茅丽瑛发起搞的，勃然大怒，立即把茅丽瑛找去训诫道：现在世事变幻莫测，你们这些女学生能管得了？有这点精力，不用于读书，却去搞什么传单！拯救社会靠你们这几张纸就能奏效？以后不许再作类似的事情！年轻的茅丽瑛当时对许多社会问题还不理解，面对着这位有恩于己的亲戚和严师的训斥，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

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阶级用鲜血解放了的上海，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血腥统治的世界。茅丽瑛原以为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劳苦大众便可以

^①据蒋学杰、章聚宝的回忆。

永远扬眉吐气，但事实却完全出乎她的想象。“社会真复杂啊！”这时，她又觉得陈招悦的说教似乎有理。

一九三〇年夏，茅丽瑛高中毕业，她立志要保障人权，拯救无辜，改变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遂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东吴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一样，学费高得惊人，茅丽瑛仅仅念完第一学期，就因无法筹措学费而被迫辍学了^①。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江海关招收秘书课英文打字员，^②有数千人报名投考。茅丽瑛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母亲高兴得把她搂在怀里，不少人为她找到这只“金饭碗”而表示羡慕。但茅丽瑛却说：“这种呆板的工作不是我愿意做的，为了安慰含辛茹苦的母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志愿。”^③

座落在外滩的江海关，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最大的海关。英国人担任这里的一切要职，他们对华籍职员采取奴化、分化的手段：给予超出一般机关的薪金待遇，灌输所谓“海关国际性”、“超政治性”、“不受国内政治风潮影响”的思想，并规定不准参加政治运动、不准女职员结婚等等。茅丽瑛这个酷爱祖国、初入社会的纯真女学生，处处感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屈辱，但又欲言而不能。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掌握国家的主权？中国的经济命脉为何被洋人操纵？她常常徘徊于黄浦

^①1949年12月11日《新闻日报》“茅丽瑛烈士牺牲十周年纪念特辑。”

^②《江海关人事记录卡》（1931年），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③《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江边，心潮逐浪，百思不解。

茅丽瑛在海关工作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人民遭受空前涂炭的时期。黄浦江上，挂着太阳旗帜的武装走私船接踵而至，海关的缉私人员屡遭殴辱，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茅丽瑛忧心如焚，经常夜不能寐。一九三五年，她参加了各界职业妇女自发组织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常与新结识的郑玉颜、董琼南等有志青年一起谈论时政。她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不可推卸的救国责任，但又为不知怎样才能尽到这一责任而焦急、羞愧和烦恼。

一九三六年夏，在上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胡实声、冯华全、彭瑞复等，从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江海关后，运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各种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十一月二日，党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乐文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益里海关华员俱乐部宣告成立^①。乐文社《宣言》反对个人主义人生观，号召“合群”。它“以文会友”，通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激发海关职工的抗日情绪。茅丽瑛是最早参加乐文社的成员之一^②，并成为时事讨论组、一般社会问题研究组和歌咏团的积极分子。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后，茅丽瑛愤慨不已，对“七君子”中的史良尤为敬慕。她说：“史良真是中国女性的骄傲。”她走上街头，参加了要求抗日，反动内战，呼吁释放“七君子”的示威大游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乐文社连续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

① 《上海海关职工运动史》（初稿）。

② 乐文社会务记录簿，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钱俊瑞、钱亦石、胡愈之、范长江等作形势报告。茅丽瑛为祖国出现明朗的抗日局面而欣喜万分。不久，她又参加了海关地下党支部领导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宣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书籍，从中寻求真理，并认真思考自己应走的道路。不久，她在上海职业妇女会发起组织读书会^①，邀请孙冶芳、吴承禧、林淡秋等进步人士演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各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海关地下党支部也立即领导职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八月十六日中午，乐文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下设秘书、救护、劝募、慰劳等组，茅丽瑛被推为慰劳组负责人之一^②。翌日上午，二百多名职工聚集在俱乐部参加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成立大会。会议发起捐献“一元钱运动”。到会职工踊跃捐献，茅丽瑛也超数捐了款^③。

战时服务团成立后，茅丽瑛为募捐、宣传、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员，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为募得更多的款物，她跑遍了海关每一个部门；为慰问伤员，她带领一支慰劳队，顶着烈日，步行到红十字、太和医院和一些战地临时医院。这些活动，当时的海关刊物《关声》曾多次作了报道，其中有一则消息说：“慰劳队十一人赴小沙渡路培成女校，慰劳

① 《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史》（初稿）。

② 海关战时服务团会议记录簿，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③ “捐款数额一览表”见《关声》（1937年）。

伤兵，由茅丽瑛女士代表向受伤战士致辞。伤兵共六十余，都盼望早愈再前往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①

沪战爆发后，租界外围地区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茅丽瑛也告别了启秀女校，随同母亲和陈招悦等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楼房（现淮海中路的第十二中学）里暂时栖身。轰炸后的一天，她外出路过启秀女校，眼前竟是一片断垣残壁、瓦砾灰烬。她心如刀割，怒火中烧，禁不住喊道：“我们无论如何要报这个仇！”

（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九日，蒋介石下令全军撤退，放弃上海。至此，上海除市区租界这块“孤岛”外，均沦落敌手。

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告别亲人，走向内地，奔赴延安。十一月中旬，殷之铎、余毅等十多名海关进步青年，酝酿辞职，组织救亡长征团到华南去宣传抗日。茅丽瑛想到自己义不容辞的爱国责任，也准备辞职、别母，到华南去。但是，年迈的母亲不同意她去，她犹豫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茅丽瑛出席了欢送海关抗日救亡长征团的茶话会。长征团员们激昂的言词，使她又一次受到激励。她坚定了决心，说服了母亲，连夜整理好行装，第二天赶到码头，要随长征团一起出发。

同事们惊愕地问她：“你这一走，你的母亲怎么办呢？”

^① 《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一周工作报告》，见《关声》（1937年）。

茅丽瑛说：“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轻人的热血呢！我母亲老了，她身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我到底还是决定选择前一条路。当我把这决定告诉她时，她悲伤地哭了。我流着眼泪跟她解释，你们看我眼睛都哭红了。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和屠杀，我又坚定了下來。”^①说着，她用手帕抹掉脸上的泪水，登上轮船，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

长征团到达粤海关后，团员们的足迹遍及白云山下，珠江两岸。每当晨曦微露，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紧张生活，操练、学习和宣传，一直持续到夕阳西沉。虽然每天只有七分钱的菜金，但是一个个却精神抖擞。他们向民众控诉日寇侵华暴行，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等话剧，呼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在这些活动中，茅丽瑛表现得很出色，无论排演节目，张贴标语和印发传单，她都积极参加，每天忙个不停，有时累得口干唇焦、体乏力竭，仍然激情奋发地工作。

一个多月后，长征团带来的活动经费已差不多耗尽，一部分人打算到延安去。延安，也是茅丽瑛心中景仰的地方。可就在这时，启秀女中向她连续发来急电，告诉她母亲病重，催促她火速返沪。她顿时陷于矛盾之中。一天清晨，长征团负责人

^①西濠：《几段回忆》，载《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殷之铎，把征得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同意他们去延安的情况告诉了茅丽瑛，并且动员她一起奔赴延安。茅丽瑛沉思良久，仍然想不出两全之策，问道：“是否只有去延安，才能加入共产党？”她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殷之铎又惊又喜，说：“我认为并非唯去延安才能加入共产党。你既提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我从现实中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真正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她的语气十分坚决，两眼闪现着坚定的目光。殷之铎高兴得连声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这时，茅丽瑛终于道出了想去延安，但又因老母病重无人照顾而产生了欲走不能的矛盾心理。殷之铎鼓励她：“沦陷区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回沪后仍可想办法找到共产党。”茅丽瑛默默地点了点头^①。

一九三八年初春，茅丽瑛回到了上海。

（四）

沦陷后的上海，一面是英勇的斗争，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茅丽瑛便是英勇斗争行列中的坚强一员。一九三八年春，江苏省职业界救亡协会党组织决定将职业妇女会改组为职业妇女俱乐部，使之成为团结广大妇女，继续开展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伟大斗争的组织。茅丽瑛从广东一回到上海，不少原海关的同事和校友都热心地为她寻找职业，一些机关也愿以优厚的待遇聘用她。但茅丽瑛却不为所动，决然选择了启秀女中英语教师这个职业。工资虽然低微，却可以抽出时间从事社会活

^①据殷之铎的回忆。

动。她和郑玉颜、董琼南、蒋学杰一起，共同担负起“职妇”的筹建工作。

筹建“职妇”并非易事。她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茅丽瑛首先带头捐献了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作为筹建“职妇”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职妇”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在南京路一百二十号福利公司三楼正式诞生^①，茅丽瑛、蒋学杰等被推选为负责人。从此，俱乐部内热气腾腾，通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话剧、歌咏、粤曲、平剧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博得大家的欢迎。会员们幽默地说：我们的螺丝壳里大有道场可做！

党时刻关怀着茅丽瑛的成长。中共“职协”党组织鉴于茅丽瑛的表现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由胡实声负责做发展茅丽瑛入党的工作^②。五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胡实声来到启秀女中，在底楼的一间教室里，同茅丽瑛就形势、任务和各自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交谈。谈话中，胡实声问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应该由谁来领导呢？”茅丽瑛毫不迟疑地回答：“靠中国共产党！”此时，她想到了一个久已积压心头的问题，低声问：“请告诉我，你是共产党员吗？”胡实声用微笑代替了回答。茅丽瑛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郑重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党很快批准了茅丽瑛的申请。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她庄严地宣誓：“我一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言行一致，对党忠诚，为共产主

① 《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② 据陆志仁的回忆。

③ 据胡实声的回忆。

义奋斗终身！”^①

不久，“职妇”又有一批会员入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中共“职妇”党支部，董琼南任书记，茅丽瑛、郑玉颜等任委员，茅丽瑛负责党团工作。从此，“职妇”各项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茅丽瑛十分重视“职妇”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由原来的一百多人猛增到五百多人。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党支部决定举行民主选举，健全“职妇”的组织机构。七月三日晚，“职妇”假逸园（现文化广场）餐厅召开选举大会，虽然大雨滂沱，但会员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大会在听取了茅丽瑛所作的“职妇”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总结和下一步的活动计划的报告之后，选举茅丽瑛为“职妇”主席^②。

新的工作重担压到茅丽瑛的肩上。她对于“职妇”的每项工作，都事必躬亲，还经常撰写指导性文章，署名“励茵”发表在《职妇》刊物上。夜以继日的工作，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使她得了严重的胃病。姐妹们劝她注意身体，她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早已献给了大家，所以我的行动，也须取决于大家，只要是于大家有好处的，我都高兴干！我要抓住每一分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③茅丽瑛以她的模范行动影响着姐妹们，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尊敬，都亲昵地称她是“我们的茅姐”。

^①据王纪华、陆志仁的回忆。

^②《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③《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编印。

“职妇”的研究股每周活动一次，用漫谈的方式，讨论妇女解放问题。茅丽瑛经常出席漫谈会，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她说：“职业不是解决恋爱的手段，结婚也决不是职业妇女的最后归宿”，“别让家庭琐事，消耗尽我们可贵的精力，磨折尽我们坚强的志气”。她强调指出：“妇女解放要在民族解放中取得。”^①她还介绍大家阅读《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行漫记》等书籍，并邀请戴平万等前来辅导。一些认识模糊、处在徬徨中的妇女，通过这些活动，思想逐渐进步，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职妇”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失学、失业和家庭妇女也纷纷加入进来。茅丽瑛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她们，发动劝募基金、互助互济，成立缝纫组，举办消费合作社，接洽特约商店和医院，以减轻大家生活上的负担。在一次理事会上，茅丽瑛又提出：我们都是职业妇女，应该想到无业的姐妹，为她们举办一些文化、技术训练班。理事们赞同她的建议。于是，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中文速记班、文化补习班相继创办。茅丽瑛亲授英语课。参加训练班的妇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文化普遍有了提高，有的还学会了技能，找到了职业。

“到社会上服务，谋取经济上的独立，这是我们唯一获得独立、自由、平等的道路。”^②在茅丽瑛的倡议下，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职妇剧团”排演的四幕话剧《女子公寓》，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举行首次公演。开演之前，茅丽瑛和应邀前来观摩演出的《女子公寓》编剧于伶正坐在观众席上

^{①②}《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编印。

交谈。不一会，两个流氓突然窜到她们跟前，借“职妇剧团”的演出未办过合法手续为由，企图敲诈钱财，并扬言要报告租界当局，禁止演出。茅丽瑛蓦地站起，痛斥这两个人的诡诈，当场把他们赶出剧院^①。这次公演获得了圆满成功。接着，话剧《阿Q正传》又参加了全市职业界团体义演，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会员们分成小队，分别带着大量食品和日用品，前往妇孺难民收容所、难童收容所进行慰问和宣传。

“职妇”在茅丽瑛等人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使她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从个人和家庭的圈子里摆脱出来，关心并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奠定了基础。茅丽瑛也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和成熟了，她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挥毫写下：“我们要有热的血，冷的头脑，积极的精神，战斗的意志。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反省，不断地努力克服弱点。那么在未来的新中国里，才配得上称做新的女性。”^②

（五）

一九三九年春，赴前线慰问新四军的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返回上海后，向各救亡协会代表报告了新四军英勇抗战、痛歼日寇的情况，茅丽瑛听后无比激奋。她提出要到新四军去，上火线痛击日寇。但当组织上没有批准这一请求时，她表

^①据于伶的回忆。

^②茅丽瑛遗墨影印件，载《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

示服从党的需要，立足“孤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以实际行动支援新四军^①。当时，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剋扣抗日部队军饷，致使新四军财力、物力严重不足。同时，在上海“租界”里，有近二十万难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些情况说明，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留在上海的同志们去做。江苏省委职委妇委会的罗晓红，向“职妇”党支部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利用“孤岛”这个特殊环境，为新四军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救济难民筹集一笔款子^②。党支部当即研究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再把募捐来的物品进行义卖，并把义卖的名义定为“物品慈善义卖会”。

茅丽瑛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义卖筹备组，邀请了十五位社会闻人作为义卖的赞助人，以扩大社会影响。为使义卖“合法化”，还向工部局登记，取得了执照。

正在这个时候，茅丽瑛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她将母亲送进医院，拜托一位女校工代为照料，自己又返回战斗岗位，几乎每天都通宵达旦地为筹备义卖而奔忙，直到母亲临终，都未能顾上再去看望一眼^③。

“职妇”开展的抗日爱国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恐慌，对即将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义卖，敌人更是虎视眈眈。极司斐尔路（现万航渡路）日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不择手段地进行威吓、破坏，还派遣特务打入“职妇”，又收买了“职妇”一个理事，刺探内部情况。

① <血洒孤岛>，载 <中华女英烈>。

②据陆志仁、罗晓红、董琼南的回忆。

③ <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六月七日下午，“职妇”首次借大陆广播电台^①，邀请名伶播音，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助义卖物品。傍晚，电台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亲启”，却未注明投寄人地址和姓名。一位会员摸着装有一小块硬物的信封，以为是谁捐来了金戒子，便高兴地拆开来看。“咣当”一声，落在桌上的竟是一粒子弹！信笺上只写有一句话：“立即停止，否则将与你们不利！！！”这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在场的人一时不知所措，即打电话报告茅丽瑛。与此同时，茅丽瑛在会所也收到一封同样的恐吓信。日伪特务的卑劣行径，使茅丽瑛怒不可遏，但她决意不变原定计划。她对着电话筒，斩钉截铁地告诉姐妹们：“继续播音！”^②茅丽瑛镇定、沉着的话语，鼓舞了“职妇”的姐妹们。那天，电台的募捐播音一直持续到午夜十二点才结束。六月九日和十八日，象这样的广播宣传，又连续进行了两次。

通过电台连续广播宣传，中国国货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五十六家公司的职工、厂商捐献了大量的食品、药品、儿童玩具和日用品。“职妇”还组织募捐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义务募捐宣传。募捐队所到之处，市民们无不慷慨解囊。一位老太太把结婚时珍藏下来的价值三百元的玉如意也捐了出来。茅丽瑛又把劝募工作做到了启秀女中，全校掀起一个捐献热潮。

“义卖”原定七月十四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幕。可是，由于特务恐吓，宁波同乡会管理人员在义卖日期即将临近之时，通知“职妇”另觅地方。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敌特的破坏，茅丽瑛镇

①② <职妇> 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静地对大家说：救济难民乃属正义的事业，威胁恫吓阻挡不了正义的事业。目前最紧要的是各位姐妹齐心协力，义卖一定会成功；她要求大家分头出去另找义卖场所。经过会员们四出奔走，先后联系了新新公司四楼、美国妇女总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等几处地方，但都因收到恐吓信而婉言拒绝。

时间已经是七月十二日夜晚，离预定的开幕日期只有一天一晚了，义卖的场地仍无着落。有些人担心义卖搞不成了。茅丽瑛在“职妇”会所召集筹备人员会议，她说：“不举行义卖，正中敌人阴谋；不举行义卖，群众的抗日热情会受到挫伤。所以，环境越为艰险，我们越动摇不得！我已下定决心，为义卖牺牲一切！义卖的商场就在此地！”^①

在茅丽瑛的领导和带动下，姐妹们立即行动，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筹备，小小的“职妇”会所陈列得琳琅满目，俨然象个百货商场。十四日上午九时，义卖如期正式开幕。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顾客，看着商场正中那幅画着饥寒交迫的受难同胞的彩色画，那些写着“多购一分货，多救一条命”的醒目标语，以及摆满两个商场的各种物品，无不感赞“职妇”姐妹的爱国义举，争相购买义卖物品，许多人还多付钱，少拿货。商场里充满亲切、热烈的气氛。

下午二时许，两个穿西装的人突然冲进商场，蛮横地将货柜推翻，然后乘秩序混乱之际，又匆匆溜走。“职妇”会员们当即冲下楼去追捕暴徒。茅丽瑛站在商场中央大声喊道：“请大家不要慌，我们赶快收拾物品，继续营业。暴徒的捣乱是不得人心的，是徒劳！”约过十分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此时，人

^① 《血洒孤岛》，载《中华女英烈》，许德良、蒋学杰等的回忆。

们纷纷怒斥：“这是什么世界？连救难都不能！”“民族败类！”一个中年男子拉住一位记者的手说：“你们要报道事实真相，讲公道话。中国人甘做奴才的只有一小撮！”说罢，他脱下长衫，高喊“义卖！”

两个暴徒很快就被会员扭获，押送到工部局。傍晚，工部局通知“职妇”，派负责人出庭。茅丽瑛决定亲自前往。在场的会员都为她的安全担心，她说：“工部局洋人多，我的英语还可对付，不必为我担心。”在法庭上，茅丽瑛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经过，暴徒被斥得理屈词穷，只得招认他们是奉“七十六号”之命前去捣乱破坏的。当时的《申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职妇俱乐部义卖，突遭暴徒捣乱，两犯各处徒刑七月。一名蒋堂清，家住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一名朱木金，年均十九。供认系奉某某之嘱托，前往捣乱。”^①

义卖按计划举行了两天，圆满结束。《申报》和《大晚报》分别于十五、十六日刊登了“义卖”特写。义卖所得的大量款子，除二千三百元交难民救济协会外，其余秘密转送给新四军，作为购买前方将士棉衣的经费。

(六)

通过义卖斗争，“职妇”姐妹们在党的领导下，又一次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茅丽瑛在发表于《职妇》特刊上的工作总结中写道：“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有努力工作的热忱，凭着主观上坚定不移的意志，我们自信，能克服我们的弱点。”“我

^①1939年7月16日《申报》。

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而且目前正处于险恶的中途。风飘与浪涛，都极容易把我们覆没。我们要坚定，要沉着……姐妹们，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阳光与自由在我们的前面，但正因为要达到这自由光明的境地，我们这时要加倍努力。我们还没有到达欢笑的时候。”^①上级党组织指示“职妇”，在日益险恶的环境中，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茅丽瑛要注意隐蔽。茅丽瑛表示：“我不怕，不屈服，艰险的环境，正是我们最好的磨炼！”^②她对“职妇”活动在形式上作了一些变动，仍然从容不迫地继续工作。

不久，发生了邮政局下令在邮政系统限制录用女职员的四条规定。这四条规定遭到邮政局女职员的激烈反对。茅丽瑛闻讯十分愤慨。她联络十几个妇女社会团体大造社会舆论，联合通电全国妇女界，声援邮政女职员的斗争。还奔走邮政总局，要求收回成命；招待报社记者，请求舆论主持正义^③。

茅丽瑛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十一月十七日的日伪汉奸报纸《新申报》^④，以《上海共党企图再举，在文化界积极活跃，日方已加严密监视中》为题发表消息，对茅丽瑛公开进行恫吓。消息说：“上海中国共产党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以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为新编第四军文化工作班担任重大任务。此事既经判明，深遭重视。”

①《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②1949年12月11日《新闻日报》“纪念茅丽瑛牺牲十周年特刊”。

③《职业生活》第2卷第5期（1939年11月）；《妇女生活》第8卷（1940年2月20日）。

④《新申报》是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日本侵华陆军的机关报。

“职妇”姐妹们看了报纸，都为茅丽瑛担心，而茅丽瑛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说：“若真称得上‘第二史良’，那倒是我的骄傲。”“除了工作，生命中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①党组织十分关怀茅丽瑛的安全，再次指示她注意隐蔽，并准备让她撤离上海到新四军去。

茅丽瑛遵党所嘱，一连二十多天，基本上在家里呆着，极少外出。但她仍时刻关心“职妇”的工作，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工作情况。十二月十二日，“职妇”理事们要开会研究工作，一种高度的责任心驱使着茅丽瑛顶着呼啸的寒风向“职妇”会所走去。下午四时整，她来到姐妹们中间，同志们见到她，真好似久别重逢，特别高兴，会议立即热烈地开始了。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小轿车从沪西“七十六号”开出，行驶至南京路四川路口嘎然刹车，车中钻出了四男一女。女的名叫黄鸥，绰号“双枪皇后”，是“七十六号”侦行组组长。她窥探了一阵周围的情况，布置特务陈剑飞、劳永生预伏在“职妇”楼梯口，另两个特务放哨监视，特务们要对茅丽瑛下毒手了！^②

下午七时半，“职妇”理事会结束。茅丽瑛与两个会员一起下楼，还未走出楼梯口，陈剑飞对准茅丽瑛连发三枪。茅丽瑛望着逃跑的特务，怒斥道：“刽子手，你打死我一个茅丽瑛有啥用？后面还有多多少人！”话毕，鲜血从她黑丝绒旗袍溢出，她倒在血泊之中^③。

^①《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出版。

^②据黄鸥、陈剑飞、劳永生等犯案卷，原件存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③《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多多少少的人”是上海话，意即“有很多的人”。

茅丽瑛被送进仁济医院。医院完全屈服于敌伪的压力，将茅丽瑛列为“政治病人”，禁止任何人进院探望。

茅丽瑛躺在病床上，脸白如纸。两位“职妇”会员趁人不备，进了病房。茅丽瑛忍着剧痛，紧紧地握住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而无悔。我是独个儿，所以我死是毫无关系的，只是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的死而有所怕。希望你们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①茅丽瑛住的病房，夜班的当班护士正巧是“职妇”会员阿真。她接班后，拆开绑在茅丽瑛伤口上那已被鲜血渗透的纱布，仔细地察看伤口。只见一弹从右骨盆进，左小腹出；一弹穿过右膝盖；一弹穿过左小腿，伤势十分严重。阿真细数茅丽瑛的脉搏，一分钟是“104”。“茅姐的生命在危险中！”阿真禁不住泪水滚落下来。茅丽瑛看着她，声音极其低弱地说：“别悲伤，也吩咐一切人别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只要你们仍旧继续不断地工作下去！”^②阿真给医生挂电话，详细报告了茅丽瑛的病情，希望医生能立即决定动手术。但是医生却迟迟不来。次日凌晨二时半，茅丽瑛的脉搏增至“118”。阿真又会同其他病房的护士向医生再三请求，医生这才为茅丽瑛施行了手术。

十三日，《申报》、《新闻报》、《大美报》、《中华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茅丽瑛突遭枪击的消息，各界人士尤其是广大妇女都无比愤慨。人们捧着鲜花和各种慰问品前往医院，然而都被院方拒之门外。医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久久不散。许多护士主动要求护理茅丽瑛，院方也一概禁止。

^① 《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手术后，茅丽瑛的精神比前略好，脉搏也跳得有力些了。这时党组织正在想方设法为她联系转院治疗。十五日上午，蒋学杰以“家属”的身份，几经周折进入病房，将这一消息告诉她，茅丽瑛的嘴角露出了微笑：“谢谢大家，不必为我操劳，要好好应付环境。”^①

午后，阿真提前上班，看到茅丽瑛的呼吸道上却安上了氧气管，已经不能说话，瞳孔正在扩散。她悲痛地疾呼：“茅姐！茅姐！”茅丽瑛微微点了点头，随后闭上了双眼。这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十二分。茅丽瑛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党决定为茅丽瑛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组织上海各群众团体成立茅丽瑛治丧委员会。十二月十六日，各界人士冒着风险，成群结队地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烈士遗容。十七日下午二时，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代表，以及八百多名群众参加了入殓仪式，何香凝等爱国人士亦派员专程来沪致祭。十八日《申报》报道公祭情况说：“前往致祭者达二千人，仪式壮严、肃穆，备极哀荣，”其规模和情绪“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未有”。

^①据蒋学杰的回忆。

鲁佛民

郑 则

鲁佛民，名琛，字献卿，佛民为其别号，寓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示自己为真理而奋斗，不怕牺牲。山东济南市人，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生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清光绪七年九月初九）。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三时，病逝于延安中央医院，终年六十四岁。

鲁佛民从一个旧民主主义的贫苦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历尽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佛民出生时，正是极端腐败的清帝国的末叶，那时已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伺机瓜分中国，眼看山河破碎，国脉垂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弄得民生凋敝。他的家道也日渐衰落。佛民的幼年，家有祖母，双目失明，终年卧病不起；父亲鲁颂平在外地作一名文牍，以微薄的收入糊口，母亲一人操持家务；佛民的姐姐均幼年早死。

一八八六年，佛民六岁时，父亲在长清县被贪赃枉法的县官逼迫自杀。

父亲死后，亲朋欺他孤儿寡母，屡遭讹诈，不久祖母也去世。家庭屡遭不幸，景况相当凄凉。

佛民七岁入蒙馆，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受封建教育；八岁开始念《论语》，九岁读书于华

林寺，念《大学》、《中庸》，十岁读《孟子》。一八九三年，佛民十三岁时，亲朋因其母多病，单丁独户，劝其早婚为宜。是年冬，与北园菜市农家女孙氏结婚。

十四岁时，佛民从学于张振堂先生，读完了《诗经》、《易经》、《尚书》、《礼记》。这时他内心有读书成名，光大门庭的念头。十五岁习作试帖诗，临摹书法颜真卿字体，有学习书法成名之意。是年九月，生长子广德，后名伯峻。

一八九六年，佛民十六岁，居城内生计不易维持，迁居于西关，租赁两间半草屋。家境贫苦，但他学习之志弥坚，随李章光先生学《礼记》、《左传》，兼学八股文、试帖七家诗。是年十二月，佛民母亲因病去世。一个十六岁的青年从此只有孤身自主，所以，他丧母之年，是他青年时代最感孤苦的一年。

一八九七年秋，佛民邀约学友二三人，在西关东流水一带，合租半间房子，摆脱家庭琐事，从秋到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日夜苦读。第二年，又从秦兆骏先生学作八股文、试帖诗，试作八韵，常彻夜达旦，追求科举心很殷切，“邻人均以书呆目之”。就在这一年，发生了戊戌政变。佛民开始听说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及变法内容，开始知道维新的道路，对科举、以八股文试帖诗为进身之阶，发生怀疑。

十九岁以后，佛民涉猎的书籍范围渐广，尤爱读清初方望溪、戴名世等人的文章。二十岁的时候，佛民已经认识到八股文是“愚民政策”。他说：“聪敏富有拾科第如草芥，迟纯穷寒者终身困于场屋。”因此，立志不作八股文，还写了一篇《罢艺论》，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当时慨然有反抗心，有薄古之思，这是我生命史上第一次思想转变。”

佛民二十一岁时，为了家庭生计，开始充当塾师，教蒙

馆。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这几年间，佛民在授课之余，攻读和浏览了大量的书籍，开始读了《李二曲集》、《四书反省录》，为他的“读书明理，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观念和思想”打下基础。以后又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回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巨著，获益非小。到后来，束脩稍丰，他更进一步购置和博览群书，如典制一类的《大清会典》，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理学著作，清初黄梨洲、戴名世的著作。同时又读康有为的全部文章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章太炎的著作以及《孙逸仙传》等等时文。佛民在这期间，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新旧兼读。他的知识领域更为开阔，思想奔放，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但对革命的认识仍不甚清楚。

一九一一年，佛民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这时山东也宣告独立。佛民被革命热潮所激，立志参加革命。同年十二月，他奋然而起，抱一腔热血，冒然自身离济南去上海。到上海住在一家小客店中，以万言书上章太炎。因久仰其名，对他非常钦佩，以上书结识的办法，一展素志。章太炎接书后，立派其门人王绍鏊接待。屡次与章太炎晤面，洽谈甚欢。但因章太炎周围的人有地方排外观念，佛民的志愿未能得酬。时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玩弄南北议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乃成泡影。佛民颓然返回济南。

这时他深深体会到自己缺乏专门学识，力图向新学发展。

是年五月，生次子广益（后名鲁方明即余修）。

一九一二年，佛民回济南后，经同学介绍，到北园小学担任教师。同时，在课余积极准备投考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那时，省立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也废除了官班必须是候辅县道一类，绅班必须是孝廉以上资格的规定。冬季，他报考该校，名列第一，被录取。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窃国擅权，先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相继解散国会，积极筹备复辟称帝。佛民闻讯之下，激于政治上的义愤，自发地联合同学，组织学生会。他在学校公开讲演，当众揭露袁世凯窃国罪恶，提出反对袁氏称帝，大讲民主政治。佛民这种活动，被充当军阀当局侦探的学生，报告了山东省督府。军阀当局立即传讯校长，追查此事。幸亏校长识大体，坚决否认学校有学生登台演说反对袁氏之事。一场风波，乃得平息。不过，济南许多报纸竟纷纷以“孙文黄兴余毒，传染省法政学校”等报道，进行攻击。

当时山东政治极为黑暗，城内密布警探，爱国志士稍有议论时政者，即遭逮捕，被枪杀者时有所闻。佛民身处危境，遭此打击，心怀不平，但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埋头博览政治、法律书籍，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待机而动。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学校曾举行过特别试验，全校千余名学生，以政治、法律、经济分科命题，并规定论文以五千字为限。佛民所作政治论文，在九十四名优等生中，名列前茅。他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在校学习期间，他每日在家吃早餐，下午四时下课以后，才回家吃午餐，三年如一日。由此可见他学习生活是多么艰苦。

一九一四年，佛民从山东法政学校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奖状。这一年，北洋政府有文官考试，可是佛民对名利宦途，淡薄视之，不去应试。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预料国家政治可能有好的转机。佛民在济南联合几个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发起组织报纸，想投身舆论界，发挥专长，以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报社命名《公言报》，一九一六年秋出版。

在办报的同时，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佛民经友人介绍，到山东高等检查厅任学习书记，一个月工资只有十元。一九一七年春，佛民取得律师证书，开始挂牌营律师业务。

这时，报社的一些编辑人员都以报社为进身之阶，庄某出任督署秘书长，童某出任某地交涉员，因而编辑无人。这时，佛民乃入报社充编辑，主持笔政。每日撰写社论，鼓吹民主政治。对时政得失，则痛切言之，间或指责笑骂。

佛民指责当政的言论，触怒了军阀当局。当时，警察厅检查新闻稿，经审查后报纸方准付印。对此，佛民联合报社同仁，一致抗议。盖以人权岂可轻犯，力争言论自由。报社此举更加激怒当局。因此，警察厅派警察把报社经理张思纬、编辑王金榜传去，进行审讯，并加以刑具。报社职工被捕多人，佛民因事不在，幸免于难。

至此，《公言报》乃被封闭。

这次事件，使佛民认识到在封建军阀统治下，无民主自由可言。他立志要进一步寻求革新政治之新途径。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新旧兼蓄为宗旨，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主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时，佛民在省立高小任教，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接触了新

思潮。他认为“陈独秀著文新颖、立论精辟，较胡适胜一筹，颇受其影响，思想上为之一变。”那时，佛民时常在律师公会的机关报《山东法报》撰写社论，颇为社会人士所注目。他开始走向左翼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的火焰，如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五四”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济南学生相继而起。罢课罢市风起云涌。佛民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基于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了学生运动。

当时，山东学生联合会为山东“五四”运动之领导团体。运动初起，山东省议会曾有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半岛及青岛问题。后来，学潮渐次扩大与深入，形成真正的群众反帝反封建运动时，这部分代表豪绅官僚的省议员，相继退出或藏匿不见，惟有佛民仍一本爱国初衷，始终和爱国青年站在一起，参加并领导、筹划济南市的整个运动。当时学联重要宣言、标语口号，都由佛民草拟。他奔走呼号，亲临街头讲演，散发传单，每次游行，都是走在群众的前列。有时他还深夜潜赴各校讲演。有一天夜晚，在第一师范举行各校代表会议，请他前去讲演指导，那时校门已被军警封闭，他被学生从学校后墙接入。他在讲演中，历陈自辛丑以来，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国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会场上一阵阵口号声，震动了门外的军警，他们破门而入，声言捉拿佛民。佛民却在学生掩护下，越墙离校。军阀下令不准学生会开会。当学生们研究如何对待这一严重形势时，佛民又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对学生们说：“学生爱国讲演，自有法律保障！至于军警干涉学生宣传，强制商店开市，出自上级军官意旨，下级士

兵多系山东老乡，未必尽听上级的话。只要我们坚持正义斗争，一定能得到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佛民的一席话，解除了学生思想上的很多顾虑。由于佛民和学生紧密团结，忘我地参加运动，深受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但佛民也因此而被反动军阀和亲日分子视为眼中钉和危险人物。当时济南镇守使、亲日派安福系军阀马良，就曾多次密令缉拿。济南报界的亲日分子，也用尽挑拨离间的伎俩，说他利用青年学生，别有企图；省商校校长叶春墀更是到处散布谣言，公然说佛民煽动学生暴动；省教育厅厅长、安福系国会议员袁荣叟下令各校，说“有不逞之徒，籍端煽惑，查究法办”；军事机关也颁布告示，说：“间有过激党之徒，煽惑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提倡无政府主义，破坏军队、监狱”等。佛民处此险境，意志愈坚，热心为国，不畏强暴，仍秘密与山东学生联合会发生密切的联系，指导该会工作，从不稍懈，到处受到学生的欢迎。

六月，由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团体，组织八十三人的山东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团，佛民被推为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关于在京请愿的情况，佛民曾记述如下：

山东请愿团抵京时，驻足山东会馆。翌日，整队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卫兵阻止，代表则蜂拥呼号闯进。卫士坚拒，大门紧闭。彼时徐东海^①当国，因惧山东民众，故不愿见。当时代表同人，以不远千里来京向总统请愿，竟被拒于门外，乃痛哭呼号。最后，北京军警督查马龙标（曾任山东五师师长，于地方较有威望），乃由户开半门后出

^①徐东海即徐世昌。

现，向大家拱揖慰问，并佯言总统不在。代表坚请进谒徐总统。马氏则称总统为一国元首，晋见是可以的，但必须商定时间地点。代表不听，坚请见。谓今日如不蒙允许，即露宿新华门外。马氏往返数次磋商，双方始约定时间地点。于是代表团始整队而返，时已夜半。此即所谓鲁省代表哭闹总统府事件也^①。

六月二十一日，徐世昌在居仁堂接见山东代表团。接见时，从代表团中又选出十余人，事前推定发言者。代表们进入居仁堂后，陈词时激昂慷慨，继之以痛哭流涕，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速电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坚决收回青岛。徐世昌当面不得不口头表示允许。

佛民趁参加赴京请愿团之便，到北大访山东籍学生及李大钊等。经他们的晤谈指导，佛民对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政治生活更感兴趣。他决心回山东传播新书报和新思想。

经过亲身参加这次运动，佛民深切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新思潮的接受，使我对政治的认识亦渐渐清楚，革命思想之萌芽即在此时。我由于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大浪潮，提高了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坚定了我奋斗的信心。”^②

佛民回到济南以后，仍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斗争。“五四”运动在山东，到一九二〇年初，由于军阀的镇压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陷入停顿状态。这时学生会和各界重新成立了评议会，

^{①②}见佛民自传。

佛民等二十三人又当选为理事，继续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正当佛民废寝忘食参加爱国运动时，他的原配夫人孙氏病故。

一九二〇年秋，佛民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充任《大民主报》及《山东法报》编辑，并经营律师业务。这时佛民的长子伯峻已毕业于山东师范讲习所，任乡村教师。父子均有收入，家庭生活渐宽裕。

一九二〇年夏，佛民续弦孙兰贞。

一九二一年春，日本新闻界举办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济南等地各大报社均有记者出席。佛民以山东报界联合会理事，被邀赴日参加大会。

因五四运动后中国反日空气相当高涨，所以日本方面极力拉拢收买中国舆论界，对中国代表殷勤接待，由能操华语的社会名流如大畏、重信等任招待。每次宴会，还馈赠珍贵礼品。有些人辄争相贪取，而佛民则拒不受纳。

在日本时，每至一处参观，日本方面都要邀请中国记者讲演。佛民利用这些机会，大讲平民政治的宗旨，博得不少掌声。在东京时，北洋军阀驻日本大使胡惟德，曾在使馆设宴招待中国记者。佛民即席演说，促胡致电华盛顿会议，要求收回青岛。胡讷讷不敢应诺，状极狼狈。

佛民在日本旅游期间，细心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工农业、教育事业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景象，“深感此邻邦为一欣欣向荣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感到我国政治腐败，若不大加革新，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①

①见佛民自传。

此次东游，在思想上给佛民一大刺激，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之情，使他了解到“救中国的办法，只有改革中国的政治。”但对如何改革，他却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归国后，佛民曾写《东游略志》，发表于《大民主报》，以期唤醒国人图强之志。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期间，佛民除营律师业务外，主要是过着繁忙的新闻编辑生活。佛民每天在编辑室内，遍阅国内外新闻，这对他了解情况，接触新事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北京有中俄通讯社稿，着重宣传欧战后各国澎湃兴起的工人运动情况，引起他极为浓厚的兴趣。他特别留心阅读，并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此类消息。这时期，他也接触过马列主义早期翻译读物，读过一本关于阶级斗争的书，但只了解到贫苦者应起来斗争，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阶级斗争。

一九二一年秋，佛民的同学尹克立邀他办报。他认为要宣传一种政治主张，必先制造舆论，非有报刊为喉舌不可。因此，他同意参加创办，并且担任报社的经理。报纸命名为《平民日报》，宣传平民政治。报纸冬季创刊，日出两大张。他联络一部分北大毕业生，充任编辑。报纸传播新文化、新思潮，颇有朝气，一时成为济南权威报纸。

后来，报社规模较大，以致入不敷出，亏累到不能维持的程度。那时佛民的律师业务，收入尚可，他把律师的收入也补贴到报社。

随着生活的实践，佛民又逐渐感到当律师并不能真正保障人权，操此业的多以营利为目的；而报社的记者生活，也多依仗于资本家和官僚们，受其支配，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因

此，他内心对这两种职业，感到厌恶，而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参加的会议，内容表面上是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解决远东、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美、日争霸远东，特别是争霸中国的斗争。华府会议上决定将青岛由日本交还中国，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任鲁案督办，在北京和济南设督办公署，办理接收青岛事宜。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民国日报》曾有这样的报导：“山东各界联合会，假商埠国货研究会开全体大会，共到十余团体，公推李郁庭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兹将议决事项列下：（一）……；（二）据上次议案选派代表，加入中日协定委员会，赴京监督，传达消息，当即票选鲁佛民、王际唐、王文瑞、李郁庭、李冠九、董星五、于养源、姜练五等八人，不日即行赴京，加入会议，兹录各界联合会为选代表加入委员会之电文如下：北京国务院转王正廷先生鉴，兹查中日协定委员会，讨论鲁案细目协定，开会在即，鲁省各界于本月二十六号开会，票选民意代表鲁佛民、王际唐、王文瑞、李郁庭、李冠九、董星五、于养源、姜练五等八人，即日赴京，加入会议，以资监视，而便参议！山东各界联合会寝。”

山东各界联合会代表抵京后为中日协定细目，公推代表八人，参与会议，以资监视。当时斗争十分激烈。报载：“本月五号下午，八代表赴督办公署，与王正廷会面，首有王君文瑞报告来意，大致谓此次代表等来京，衔负本省各界两项要求，一为协定细目，必须有精确调查，方能获公平结果，鲁人对于督办署一切调查，毫无闻知，且袁良调查尤属荒谬，请即公开宣布，以明真象；一为请求参与会议，相同办理，藉以洞澈原

案，而资臂助。王谓宣布一层，恐事实理论均难办到，譬如各种调查，案卷累累，若皆行宣布，实不胜繁，且有诸多不便，而将来以何者为依据，现尚未定，至袁良之调查，亦不过为参考之一，并非专注于此……。鲁君佛民谓宣布一说，督办在济南对于各界，曾经表示，候调查完竣，立即宣布，亦且谓随时调查，随时宣布，亦无不可，乃今日竟自食其言，何前后矛盾乃尔，先生办外交有年，言语岂可随便……。鲁君佛民又谓，若实必不能参加，则须将每次会议之记事录，交给查阅。王一并允许，各代表随即辞出。”^①

鲁案会议，我方代表是王正廷，理事为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佛民至七月间被公推为首席民意代表，列席会议，长时间与这些外交人物过从。会议从六月开始，直至一九二三年一月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内，在鲁案交涉过程中，遇有损及国权之处，或有瑕疵可指者，佛民即代表民意“抗言责喝，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王正廷非常惧怕佛民，有的委员也被佛民指责得不敢和他见面。孔祥熙那时是王属下的一个处长，表面上装作谦虚有礼，在一些事情上还要征求山东代表的意见。其实佛民对这般滑头官僚，买办官僚，极为厌恶。

佛民参予鲁案交涉工作时，曾和旅京的山东国会议员丁佛言、刘冠三、于沐尘，省议会议长王鸿一及山东旅京学生暗中联络，发动他们到鲁案督办公署向王正廷示威，施加压力。王正廷看他们来势汹汹，惶恐万状，害怕被打，调动了全署杂务人员来保卫他。在此以前，佛民曾在济南和他斗争过。有一

^①1922年7月9日《民国日报》第3版。

次，王正廷回山东公干，佛民邀他去济南商会向各界报告鲁案接收情况。佛民事先布置了许多社会开明人士、省议会议员、学生代表等，在会上激昂陈词，对王正廷严词责问。王正廷回答了不到十五分钟，就词穷言尽。当时群情激愤，几乎动武，王正廷乘混乱鼠窜。从那以后，王正廷知山东群众力量不可侮。所以，后来在谈判归还青岛过程中，他对日本无理要求不敢让步。鲁案结束后，小幡公使在日本国内遭到一部分人的抨击。鲁案办理结束时，王正廷说：“真佩服山东代表（指鲁佛民），真正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

王正廷是一个洋奴式的买办政客。他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企图接收青岛后，与日本人专利经营商业，偷偷派其心腹袁良去青岛活动。这事被山东代表们发觉了，佛民就在《益世报》上写文章揭露了王正廷的阴谋活动。不久，袁良被驱逐，王正廷也蹙迹。到了七、八月间，斗争更加尖锐，可以从以下报导中看出：

“二十八日鲁案第一部分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方面主席委员为杨荫抗氏，初次讨论凡协议重要事件时用何种语言，日人主张用日语，因决定用日语。次又讨论凡协定之内容，是否公布，日人方面多赞成不公布，亦即决定不公布，嗣又讨论是否用议事录，日人方面又多不赞成用议事录，因亦即决定不用。二十八日通体会议情形，不致夙如日人之愿以偿，当时鲁代表鲁佛民等，于会议散后，即质问杨氏对于本日讨论各项，事前已否加以考虑，分委员会于各种细目，关系至切，既无议事录又不能宣布会议内容，一有疏虞便无法挽救，是否尚可推翻此案，委员干事凡决定一种细目，必依照分委员会之一种书面，今无议

事录，将依据分委员会各委员口头话而为决定某种细目之根据乎，杨氏对鲁代表此种质问，又无明瞭之解答……。”^①

“中日鲁案委员会联合会，因仓库码头等争执颇力，二十八日鲁省各界代表李郁庭、鲁佛民、董星五、王际唐、姜练五等赴督办公署，见王正廷氏，为相当之督促，向王氏提议，关于公产项内，日人提出保留之房产土地等数甚浮滥，已越出华会条约之规定范围，我国应严行审查拒绝，而码头仓库本为德国政府所建筑，自与私产性质不同，按华会条约第二节第六条之解释，应归第一部作为公产讨论，我国应坚持前议到底，无须变更。且青岛船坞，前为日人攫去，既说到码头，何以船坞一字不提，我国对此应有何种主张，亦当请求一适当之应付。再者盐田矿山，日人延宕不提，委员等不应任其迁延时日，致生滞缓外之嫌，应即从速催促日人提出，以供我国审查。以上各节，王氏当即口头容纳，闻对于督办公署制定青岛市自治暂行条例一项，各该代表以根本上即不承认其据有此种权限，日内即将另具意见书有所声述云。”^②

“北京函云，山东外交代表朱紫垣、李冠九、王际唐、王文瑞等因鲁案交涉吃紧之际，特于五日假中央公园水榭，约集国民外交联合会代表，讨论善后办法。经众决定，本月九日上午九时在西城根山东中学开代表会议，届时提议下列事项：

（一）中日委员会提案，日本要求违反条约，决不承认案；（二）澳兵惨杀一华工案；（三）废督裁兵案；（四）筹款赎路案。及由山东代表李冠九等报告鲁案会议，日本种种无理要求，极

①1922年7月31日《民国日报》第6版。

②1922年8月1日《民国日报》第6版。

堪令人愤慨，结果以王正廷，确无外交常识，恳请撤换以挽危机。”^①

“鲁议员曹瀛及各界代表鲁佛民等，致吴佩孚电云：洛阳吴巡阅使钧鉴，王正廷督办鲁案将及三月，措施乖方，毫无效果，擅定市制条例，画青岛为特别区域，不惟越权乱法，抑亦断送主权，此其误国之罪一。对于日本所提铁路附属财产案，认我国土地为彼所有，而公然估价；青岛市公私财产案，认日人所经营之农业为正当；公产保留案，除日本领事署外，尚提出七十余处之多。王正廷不加驳拒，漫然接受，致令交涉前途，陷于危境，此其溺职之罪二。亲日素著之辈，如袁良、周宝山、崔士杰等，王正廷托为心腹，参与机要，苟非别具肺肠，暗藏黑幕，何至颠倒如是，此其用人失当之罪三。况国会议员，依法不得兼任官吏，王正廷以督办而兼任参议院副议长，宪法审议会议长，明系贪位苟禄，破坏国法，若不速令去职，必致贻误将来，迩来全国舆论，已一致攻击，众议院湖南议员郭人漳等，且已提出查办案，我鲁人桑梓攸关，尤不能不据实揭发；兹有山东来京代表暨鲁籍两院议员旅京同乡共同开会议决，电请我公急电政府，迅予撤换，以拯危局，而维桑梓，不胜屏营待命之至，山东参众两院议员曹瀛、丁佛言、赵正印、张鲁泉、史泽咸、于元芳、王广瑞、王宗元等二十余人；山东各界代表鲁佛民、李郁庭、朱紫垣、朱心芳、王际唐、王文瑞等十余人；旅京同乡代表王讷、邵宝亮、张筱轩、赵志缪、张致远等三十余人叩养。”^②

^①1922年8月9日《国民日报》第3版。

^②1922年8月29日《民国日报》第6版。

王正廷旋被撤职以后，北洋政府改派山东省长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前省议会议长王鸿一向熊介绍了一批代表，佛民也被推荐到青岛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佛民到青岛，在督办公署政务课任职。数年来，佛民由于律师和报社的业务，以及参加群众运动，处于极为忙碌的状态。在青岛期间，他的公务不很繁忙，而且经济收入也较宽裕，因此他有能力购买各种新书籍，也有时间可以阅读大量新书籍。这时他读书虽然仍是“新旧兼读”，但却较前更多地接触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深受影响。从保存下来的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七日佛民的日记中，可以充分反映出来，如：

六月十九日……又晋城（济南）买《社会主义讨论集》。

六月二十三日，……看《向导》周报……。

六月二十四日，……午看《向导》周报……。

六月二十七日，……看《向导》周刊，颇令人鼓舞

……

八月二日，……看陈独秀《向导》，确有特别见地

……。

八月九日，……七点一刻乘车回济，……沿途看《社会主义讨论集》……九点半看至七十四页……。

八月十四日，……十点赴车站（回青），……尽日在车看《社会主义讨论集》，至一百五十六页……。

八月十六日，……十一点睡眠。《讨论集》看至二百一十二页。

八月十七日……今日看《讨论集》二百三十二页，晚十一点睡眠。

八月十八日，……看《向导》周报……。

八月二十九日，……看《社会主义讨论集》……。

九月一日，……上午看《向导》周刊，……下午……仍看《向导》周报。

从以上日记当中，有六天记载了他阅读《向导》周报的情况，有五天记载他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的情况。佛民非常喜欢阅读《向导》周报，读了之后，“颇令人鼓舞”，他认为“陈独秀《向导》周刊，确有特别见地。”那时，佛民还购买了列宁小传、剩余价值、马列主义之浅说等等书籍，悉心阅读，“欲继续进步，不愿作一安分之公务人员。”

一九二三年，山东党组织派邓恩铭去青岛开辟工作。邓恩铭经佛民的长子鲁伯峻介绍认识了佛民。那时青岛地下党的同志除邓恩铭外，还有延伯真、陈文其等人。他们积极在政治思想上帮助佛民，同时也在佛民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工作。这时，佛民才真正和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而且和青岛地下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一九二五年关向应去青岛工作时，他们也经常来往，他的次子余修即经关向应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这时是鲁佛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转折，是决定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竭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做出贡献。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国民党实行改组，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四年，邓恩铭等组织建立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介绍鲁佛民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佛民在市党部任

领导工作，并建立了下层组织，主要是在店员职工、电话生、司机、报社排字工人、贫苦知识分子、小学教师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青岛久处德、日帝国主义统治下，因此开辟工作比较顺利，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以及下级党部都逐渐建立起来。

佛民在进行工作时，还利用自己在督办公署的合法身份，和当时青岛最大的书店中华书局建立代销处关系。他集资从党主办的上海书店、民智书局等处购买了大批革命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周报、《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以及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公开陈列出售，播下了青岛最早的革命火种。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二十一日北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绕道日本到达北京。

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王尽美由孙中山委派为特派员到青岛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王到青岛后，连日召集各界进行讨论。一月十七日，在青岛五州大药房召开筹备会。佛民被推为主席，积极参加了青岛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佛民被推为青岛代表，赴京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北方共产党员江渚源（江浩）、于树德（于永滋），以及赵世炎、安体诚等，他们朝夕相聚，政治见解颇为一致。

孙中山因舟车劳累，肝癌病发作。抵京后，戴季陶、吴稚晖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全体代表，由戴季陶报告中山病

情，后推代表数人去东城铁狮子胡同行辕慰问中山先生病情，佛民也被推为代表。

三月十二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在开会，中山逝世噩耗传来，与会代表发起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追悼会。追悼会轰动全城，形成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推动国民革命的大会。国民会议由于段祺瑞的阻挠、反对，未能开成，各地代表离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旅居青岛的沂属日照、莒县、沂南等人士，假青岛齐燕会馆为上海“五卅”烈士尹景伊举行追悼会，佛民致挽词云：“为打倒帝国主义，洒满腔热血，唤醒被压迫者，愤表同情，知君捐生，无复遗恨。作民族解放运动，凭双手空掌，抵抗强盗恶魔，挺身拚命，嗟我后死，能不伤怀。”从这挽词中可以窥见佛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已十分成熟，投靠革命的意志弥坚。

与此同时，王尽美因奔走革命，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就医于青岛医院。病危中，佛民以深厚的革命感情，逐日到病院探视，并为其资助医药费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尽美病逝于青岛，佛民主持他的装殓，会同党组织派人把其棺木运回原籍安葬。

一九二五年夏，佛民担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在工作中，国民党右派进行各种干扰，佛民即与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佛民以自己在督办公署的合法身份，主动地积极开展工作。后来，他在市内办了一处育英小学，在四方办了一处三义小学。他在这两处小学里面安插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这两处小学也就是当时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内负责同

志先后有关向应、邓恩铭、李芸生、赵玉璋、项玉敏、于佩贞、朱秀蓉等在那里住过。四方三义小学晚上还办工人夜校，暗中进行工会工作。一九二五年秋，省委派鲁伯峻到青岛，也是得佛民的协助，成立阎家山工人子弟小学，开展党的工作，得以建立党在沧口、四方一带的工人支部。

佛民为了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团结左倾分子，组织了三民主义学会，自己出任学会的总领导人。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晚九时，四方党员正在小学开会，突遭戒严司令部破坏，当场被捕六人。由此而牵连育英小学。三日早四时，警察局又去育英小学逮捕了校长王介山。同时，在那里抄去了三民主义学会的名册。佛民涉重大嫌疑，乃出走青岛，绕道大连，潜赴北京。

一九二六年春初，佛民抵京。这时政局已有新的变化，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后，改称国民军，与国民党人合作，表示倾向革命。那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北京处于半公开活动。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就设在翠花胡同，共产党的机关也设在附近。于树德、丁惟汾、王乐平那时都住在党部内，佛民住在附近公寓里，每天出入党的机关。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时，佛民即参予筹备工作。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军阀段祺瑞以执政名义，对革命进行镇压，通缉大批名流学者。不久，冯玉祥率部退守南口，奉系军阀入城，革命同志相继离京。佛民也离京返济。

佛民回济后，稍事休息，即只身去江西秦文炳部做军事工作。

秦文炳系当时江西督军邓如琢的亲信师长，济南人，是佛民青年时期同学砚友，莫逆之交。秦文炳驻军九江，兼九江镇

守使，扼长江咽喉，地位甚重要。

佛民抵九江后，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商定行动计划。佛民即住进秦文炳师部，每日与秦晤谈。秦文炳早年毕业于陆军学堂，多年行伍，被恶势力包围已久，一脑子封建腐朽思想，跟革命思想相距甚远。佛民虽旁引曲喻，多方开导，但收效不大。佛民后经秦文炳向江西省长李定魁推荐为高级咨议，只领干薪。他羁留南昌月余，见计不得售，乃返九江。

返九江后，佛民继续做秦文炳的工作，秦表示对中山先生有信仰，但对国共合作不了解。佛民未能争取秦文炳参加北伐，乃于七月间返济。

一九二六年的山东大地，被反动军阀张宗昌所盘据。张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公开贪脏枉法，祸害人民。他反对“赤化”，革命者时遭杀害、政治上暗无天日。当时正处北伐战争前夕，久处军阀高压之下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对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群众运动日趋高潮，山东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工人集中的城镇如济南、青岛、淄博等地，农村如潍县、益都、寿光和鲁西诸地，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党中央相继派吴芳和关向应来担任领导，以加强山东的工作。

这时，鲁佛民回到济南，经过和两个早已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儿子商议，毅然决定在济南定居，即在济南西关制锦市街租赁了一所宽绰的院落，挂起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律师身份掩护党的工作。

事务所的周围环境十分恶劣，后邻为军阀褚玉璞的官邸，对门即为军署谍报科科长住宅，四邻多为军警工作人员的住宅，但他的事务所每日都有党的负责同志和各地来省委接头的同志出入，省委也时常在此通宵达旦地开会，党的文件、书

汉不久，各部亟待充实干练的干部，而河南军事工作组织已结束。因此，组织决定介绍佛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任秘书工作。佛民在商民部时，因部长不过问部政，佛民承担了全部工作。后来，佛民还在军事委员会经理处任秘书，协助筹建组织，颇多贡献。佛民这时正当壮年，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工作。

就在这时，传来了他的长子鲁伯峻在山东济南被军阀张宗昌杀害的噩耗。他虽如失一臂，但强忍悲痛，坚持工作，奋进如前。不久，佛民的妻子和次子余修在山东也不能立足，随山东省委负责同志来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汉口民国日报》有这样的报导：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商民部在中央党部举行第七次部务会议，讨论店员工会问题，出席者经亨颐、鲁佛民等。鲁佛民提出“中央近连二函，命调查武汉商业凋敝真相及染织厂停顿原因”。佛民正积极工作之际，不料汪精卫进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党的干部一部分撤赴苏联，一部分转到江西。组织上因佛民年龄较老，已经留有胡须，当时家眷在汉口，不被人所注意，决定他继续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探听消息。佛民忠诚执行党的决定，虽身在虎穴，仍佯作镇静，每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上班，每晚到党的机关汇报国民党政治动态。

不料山东籍国民党右翼分子，嫉恨佛民过去打击右派国民党的行动，乃唆使山东国民党员韩方正，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告佛民私吞巨款。在此情况下，组织上决定佛民离开武汉。佛民当即搭英国太古轮船公司长江轮离开武汉，经上海，又回到青岛。

一九二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鲁佛民的党籍。

籍、宣传品都存在事务所内，印刷机关也在这里。那时关向应也常骑脚踏车来往，事务所俨然成了共产党省委机关。关向应、延伯真、吴芳等也经常宿于事务所内，对佛民讲述政治形势。这使佛民有机会多和党内同志接触，对他的思想觉悟提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佛民的思想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他已经从一个旧民主主义的信仰者，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完成民主革命这一历史任务。他那种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他把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凡是对党对革命有利的事，他都坚决地执行，从不犹疑。

过去受佛民影响的两个儿子，现在反过来又对佛民的思想进步起了作用。

一九二六年十月，佛民四十六岁时，由省委书记吴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坎坷的政治道路上探索了几十年的鲁佛民，在近半百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归宿，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这时，党组织派佛民去武汉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节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佛民由济南出发经上海去武汉，他的两个儿子都到车站送行。在车站临别之际，佛民谆谆嘱咐告诫大儿子鲁伯峻：身处危境，一切行动要机敏，要有敌情观念；如果一旦不幸，落入敌手，应当忠诚于革命，誓死保卫党的利益，不负于党的信任。

佛民到上海后，见到党中央的秘书长、军委负责人王若飞。若飞很器重佛民的学识才能，介绍他去武汉，指示让他去河南做军事工作。佛民到武汉时，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

那时，佛民潜居青岛，但仍担任转递中央和省委秘密信件工作。

佛民过去长期在青岛工作，敌人对他的政治情况极为了解，因此难以长期隐蔽。后经组织安排他去平津，谋求公开职业，作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一九二八年春，佛民去北京。到京后，一直未能和组织接上关系，后来因党组织遭破坏，致使佛民与党失去了联系。他在北京“无职业，无旅费，困顿不堪”。但他说：“我心归皈共产主义，并不动摇，国难家仇（长子被封建军阀所杀）益坚定我卓绝不拔之政治节操”；“誓不入反动宦途”。那时，佛民只得改名鲁贤廷，以教家馆维持生活。一九二九年，他的次子余修也因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在山东无法立足，与其继母一同逃来北平。他们一家三口，过着亡命生活，时常得靠借贷度日，倍尝忧患艰苦，如此共三年。

一九三二年，佛民早年的学生张郁光因在曲阜二师任校长有“袒共嫌疑”而被国民党通缉，也来北平。那时，他看到佛民清贫赋闲，就介绍他去私立志成中学任国文教员。至此，佛民始有一正式职业。

一九三三年，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于永滋（于树德）、李锡九都回到北平，佛民和他们时有来往，相谈很投机。是年秋，经于永滋介绍，佛民又去艺文中学任课。艺文中学校长查良剑对学生组织反帝大同盟、“左联”等活动防范甚严，佛民则竭力卫护，因而在一九三四年秋又被解聘。那时，李大钊的女儿也在艺文中学读书，佛民经常接近她，希望找到党的关系，但未能如愿。以后，他又回到志成中学继续任教。他在教书时，对进步学生暗中予以指导，披沙澄金很费苦心。他的学

生日后很多都走上抗日战场，参加了共产党，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一九三五年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佛民也参加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团体。此时，他与吴承仕、齐燕铭、黄松龄、孙席珍、张郁光等进步人士时有来往。蕴藏多年的革命激情又开始爆发。一九三六年春，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曾大肆逮捕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他的次子余修也遭逮捕。他联络社会名流，奔走营救爱国青年。

佛民由于接近左翼教授，从他们那里不断阅到北方局出版的党刊《长城》、《人民之友》，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刊物。三月间又读到北平翻印的斯诺著的《西北印象记》（即后来出版的《西行漫记》）。因此，去西北苏区的决心，日渐迫切。

“七七”事变发生后，佛民决意到西北，投奔他半生依靠的中国共产党。七月中旬由北平动身，作西北之行。经张苏介绍，先到西安办事处晤叶剑英。与叶详谈后，乃乘八路军汽车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延安。

八月十五日，佛民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晨起颇早，饭后遇吴〔伍〕同志^①（外交部秘书），吴〔伍〕告以今日下午毛主席约谈话。……十一点勤务约赴毛主席处（城西北隅龙王巷六号）。中等民房，大门内养鸡一群。办公室〔在〕北房，卫士一，托刀佩手枪。先禀告，然后入。……进入北房之西间，毛同志靠南窗设一书桌，西向坐，余东向坐。泽东同志较武汉时代稍稍苍老，而沈毅锐敏之精神，

^①吴误，应为伍。伍同志，即伍修权。

溢于眉宇。拣一纸，令余书名。书名后，余遂申述过去经历。毛同志颇谛听，评我十年不变，尚有政治节操，并随笔记大略。即作一介绍便信，令赴土地部与王观澜同志接洽。对于北京左倾教授、抗日学生极关心。约谈一小时，辞出。送至办公门内。”^①

以后，他到徐特立主持的教育厅任秘书工作。此时，他“寄身革命工作，心愿大偿，精神至为快活。”

一九三八年春，佛民调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担任对外文件及法院重要案件之处理，并领导直属县的保管文卷等工作。后因他年事已高，组织上照顾他的健康情况，减轻他的工作，分配他专管法院及对外文件处理。

一九三八年十月，鲁佛民经组织批准重新入党。他的革命精神更为振奋。窑洞中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工作和学习均甚积极，并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自勉。

由于佛民年高体弱，终于积劳成疾，自一九三九年春抱病，咳血失眠，神经衰弱。经医生精心治疗，时愈时病。但他集中力量，每周仍到大礼堂听课一次，坚持学习党建党史不辍。组织生活参加小组会等，从未缺席。他自己常说：“个人须充满朝气，于工作中，力求提高自己，帮助他人。”

一九四〇年，佛民病体渐康复，仍分管教育厅和法院工作。除工作外，延安干部学习风气甚盛，佛民深知理论之重要，对学习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虽于烈日朔风中，未有间断。

佛民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虽年已

^①引自鲁佛民1944年8月15日日记。

六旬，从不以老迈自居，仍积极工作，以期永葆革命青春。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负责人林伯渠、谢觉哉等，倡议成立怀安诗社，佛民以诗翁积极参加，运用旧体诗披襟述怀。他不仅是革命者，还是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诗人。延安时代的生活，激荡着佛民的心灵，他经常用旧体诗热情地予以讴歌。

一九四二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开展整风学习。他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学习整风文件，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他从一九四二年患心脏病，仍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一九四三年出任边区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边区银行法律顾问。对于边区教育、立法等工作，均有建树。

一九四四年五月，佛民患病不起。病危时，边区政府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领导人亲往探视。他仍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当矢志以衰老之年，努力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分钟。”^①垂危时，问他有什么遗嘱，佛民说：“我一生言行，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临终时勉其次子余修继其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弥留之际，仍不断念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诗句，惋惜未能亲见日寇投降。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三时，佛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佛民逝世后，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鲁佛民革命的一生。佛民遗体安葬于延安烈士陵园。

^①引自吴玉章在鲁佛民追悼会上的讲话，见1944年5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林 锵 云

张招英 兰继埽

李忍子 林秀然

林锵云，又名锬池、昌文，一八九四年二月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六区沙岗乡大来里（现罗坑公社下沙大队）一个工人家庭，全家靠父亲在香港当洋务工人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

林锵云八岁进私塾读书，十一岁时，因父亲失业和生母去世停学，十三岁跟父亲到香港谋生，十四岁开始当学徒，以后当海员和洋务工人。后来，他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

林锵云在外国轮船上做工，饱尝了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帝国主义者的横行霸道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极为愤恨，因而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提出来的革命主张。一九一四年，经陈普铭（国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介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曾参加国民党发动的讨伐反动军阀的军事活动，并在“联义社海外交通部”（香港海员早期的革命组织）联络下参加了海员公益社，联系了不少海员工人参加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〇年前后，林锵云在香港的山顶当洋务工人时，与工友谭其科、褐荣等听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打倒了资本家，当家做了主人，非常羡慕和向往，想要组织工会联络洋务工人。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对中国海员工人的奴役，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大罢工，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下，林锵云参加了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给他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此后，他更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一九二四年，林锵云在积极参加工会活动的同时，阅读了《向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等，觉悟更加提高。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林锵云结识了苏兆征、邓中夏等，并在联义社干部戴卓文的领导下搞宣传工作，上街贴标语、散发传单、演讲等，积极组织洋务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他后来回到广州，被选为工人代表，出席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①。七月，林锵云被选到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宣传学校学习。九月结业后担任罢工委员会宣传部演讲队第一分队队长，奔赴东莞、台山、开平等地农村，宣传省港大罢工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发动农民支援罢工斗争。一九二六年夏天，林锵云被派到南海县任国民党县党部农民部干事^②。在此期间，他得到杨匏安（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部长）等党员的培养、教育。一九二六年九月，由邓发、龚昌荣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编入洋务工

①②访问林锵云记录（1964年）。

③林锵云《自传》。

会支部。同年冬天，他由杨匏安派往南海县开展农民运动，公开身份是南海县九江市国民党市党部筹备主任。他深入基层，发动农民，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农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林锵云在南海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无法继续开展活动，便返回广州，找到邓发，被派回洋务工会支部，在原省港罢工工人中活动，串联了一批人参加工人“十人团”和“赤卫队”等秘密组织，九、十月间参加了赤色工会（包括海员、洋务、印刷、泥水各业）发动的示威游行^①。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起义前，林锵云受党的指派，参加调查各区署的枪枝和警察人数。起义开始后，他被派到工人赤卫队搞政治工作。他所在的赤卫队担任攻击广州市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驻地，他和赤卫队员奋勇战斗，很快冲进去把几百名保安队缴了械。随后，林锵云负责将收缴的文件、物品送到起义军司令部，被留在司令部经理处工作^②。起义失败后，他和一位黄包车工人撤出司令部，由于与组织失去了联络，转退到农村，一九二八年二月，才经广州到香港，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担任洋务工会支部书记。

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林锵云被省委派回南海，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当时，许多党组织和农会遭到破坏，不少共产党员和农民赤卫队员牺牲了，加上当地地主武装民团势力猖獗，工作极其困难。五月，南海成立了临时县委，林锵云

① 《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9、10期合刊。

② 林锵云《自传》。

任书记^①。六月初，他主持临时县委常委，研究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的训练、恢复发展农会和赤卫队以及领导减租、抗捐、抗税等问题。他们还分头走村串户，与散居各地的党员和赤卫队员联系，分别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到六月上旬，恢复组织生活的农村党员有四十人，并在四区、九区恢复和重新建立了一批党支部。随后，林锵云主持召开了全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海县委，他任县委书记^②。这次会议决定继续抓紧恢复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六月二十七日，根据省委关于“南海县委取消，归并佛山合组市委指挥南海工作”的指示，召开了佛山市委和南海县委联席会议，成立新的佛山市委，林锵云任市委常委^③。八月，由于四区罗格乡省委巡视员暴露，被敌人追踪到九区陈溪乡，党的机关被包围、搜查，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林锵云难以继续坚持工作，中秋节前便离开佛山返回香港向省委汇报，后留在香港工作。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同港英当局串通一气，采用卑鄙的手段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同志。就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林锵云深入到各处帮助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对一些悲观消极的党员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使各级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他没有公开的社会职业，租了一间房子住，既当交通又管收发。那时，组织上发给的活动经费很少，他生活非常艰苦，经常到饭店买些残羹剩饭充饥，有时甚至吃

①③ <党史参考资料选编>，中共南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2年1月编印。

②访问林锵云记录（1964年）。

不上饭，但仍然朝气蓬勃地为党工作。

一九二九年初，党把林锵云调到广东省济难会（又名赤色救济会）工作，主要任务是慰问和救济被捕同志的家属，照顾入狱的同志，设法筹款请律师营救被捕同志。济难会设组织、宣传、救济三个部，林锵云任救济部部长^①。他住在香港跑马地济难会机关，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奔忙，工作十分紧张。在此期间，济难会曾先后营救同志多人出狱。五月，林锵云任香港工代会党团书记（仍兼济难会工作）。他经常和香港市委书记邓发等一起，深入到海员、洋务工人和机器工人等中去，了解情况，教育和组织工人参加斗争。经过他们的努力，香港工代会建立起了几个秘密活动地点，健全了组织，充实了领导机关，恢复并发展了党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林锵云根据党提出的以合法职业掩护革命工作的指示，到英国海军俱乐部当服务生，同时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兼洋务工会支部书记^②。由于他做了许多工作，英国海军俱乐部成为香港海员和洋务工人活动的基地之一。可是，不久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下，香港的党团组织和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发动工人罢工。英国海军俱乐部被指定为斗争的起点之一，结果罢工失败，参加罢工的工人全部被开除。接着，香港市委机关也遭破坏，林锵云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只好到油麻地官涌酒店做杂工，以此作掩护，继续在洋务工人中活动，寻找机会与组织联系。后来，因洋务工会支部出了叛徒，供出了林锵云和其他支委，香港警察前来围捕，幸亏

^①访问林锵云记录（1964年）。

^②林锵云：《自传》。

一位同店工友闻讯告诉了他，才得以跳墙脱险，在香港避居了两个月。因一时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英警又通缉、搜捕，处境十分艰险，洋务工会的同志便筹集旅费，让林锵云到上海找党。

一九三一年春，林锵云到了上海，找到在全国海员工会（简称海总）工作的冯燊，与海总取得了联系。三月，海总决定林锵云以海总特派员身份回香港工作。五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又任命林锵云为全总南方特派员兼海总香港特派员^①，负责发展港、澳一带的工人运动。林锵云回到香港后，工作非常困难，直到十月和十一月，才分别同省、市委接上关系。十二月的一天，他到海员工会布置筹备纪念广州起义的工作，刚要出门，正好碰上叛徒带领英国警探前来搜查，不幸被捕，被关押了五十多天。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后来由济难会工作人员谢颂雅和洋务工会的谭其科等人出面，筹集了一笔款子，请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结果，港英当局判处驱逐林锵云出境。他决定去上海，英籍探长约翰逊无理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去上海？林锵云理直气壮地回答：“上海是中国的地方，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去不得！”^②在香港地下党同志的安排下，林锵云化装成海员，登上了从香港直达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可是，林锵云在船上仍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在跟踪。因此，船到上海一靠岸，他当机立断，行李也没要，立即上岸往人群里一钻，转了几条大街小巷，看看确实摆脱了特务的跟踪，才到海总找冯燊接上关系。海总分配他负责太平洋航线海员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林锵云准备下船布置纪念红五月的活动和给海员送书报，在西华德路碰上叛徒刘铁生（曾任中华

①②访问林锵云记录（1964年）。

全国海员港务总工会长江委员会书记，与林锵云认识），被扭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虹口捕房。不久，被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公安局，关押了两个星期后，又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了两个多月。在上海公安局和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期间，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用电刑和坐水牢等残酷手段，企图使他屈服。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但敌人仍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无理判处他无期徒刑，交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监禁执行。十月，他被转到苏州国民党江苏陆军军人监狱^①。

苏州监狱关押的多是“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施以法西斯的非人待遇，每天两顿发霉发臭的米饭也不给吃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号子里，暗无天日，大小便都在里边，空气恶浊极了。原来牢房规定的半小时放风时间，后来也取消了。至于打骂更是经常之事。在这样的环境里，肺病、疟疾、痢疾、伤寒等传染病流行，不少革命者、爱国志士死在狱中。入狱不久，和林锵云一起从上海解来的十几个同志牺牲了一半。林锵云也染上了疟疾，常发高烧，几乎被夺去了生命。在狱中，林锵云积极参加了反迫害斗争。在一次绝食斗争中，敌人剥掉他们的棉衣，用藤条抽打，强迫他们吃饭，但他们坚决拒食，终于迫使敌人答应改善伙食和恢复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监狱里严禁看书报，只许读些圣经之类的东西。林锵云等经过巧妙的伪装，保存了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大家视为珍宝，偷偷地争相传阅。林锵云童年时因家境贫穷，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以后，又因环境和工作繁忙，难得有时

^①林锵云，《自传》。

间坐下来读书。于是他把监狱当成学校，请难友当老师，刻苦地学习。没有纸笔墨砚，他就用手指沾水在地板上练字，一连坚持几年，终于练就一手好指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退的局面。在丢失华北广大国土的同时，在华东方面，上海失陷，南京被围，国民党政府和中央机关纷纷逃奔武汉。十一月下旬，苏州监狱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将判处十五年以上和无期徒刑的所谓“要犯”，从苏州转移到宜兴。在转移途中，船到难走的地方，看守们就强迫“犯人”下船，拖着沉重的脚镣和病弱的身体拉缆。到宜兴后，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祠堂里，林锵云等人同看守展开了说理斗争，质问看守：国共两党已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出去参加抗日。后来，他们又被押解到安徽省高淳县的一个农村。这时，南京已经沦陷，日寇飞机在这一带狂轰滥炸，人民纷纷向内地逃难，国民党溃兵蜂涌后退，人心惶惶，看守们已自顾不暇，丢下“犯人”溜了。林锵云等人砸镣开锁，获得了自由。他们公推当地人孙乐宜带队，决定先到武汉找党。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他们或病或伤，身体非常虚弱，行动十分困难，大家互相背、扶，艰难地一步步前进，机智地通过了国民党军政当局的不断盘查，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辗转到了武汉。他们先住在难民救济所，不久，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回到了党的怀抱。接着，他们参加了长江局为出狱同志开办的学习班，组织上对他们被捕后的表现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①。一个多月后，长江

^①林锵云：《自传》。

局派林锵云回广东工作。

(二)

一九三八年二月，林锵云从武汉回到广州，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省委。省委分配他到职工部任副部长^①。他先到香港活动了一个多月，联络了以前参加过罢工斗争的一、二十名工人。后来接到组织通知回到广州。五月间，省委又派他到中共南顺工委负责职工部工作。他在贺丰、碧江、西海、龙眼一带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南海的大揽、顺德的西海、龙眼等地建立了党支部，为后来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仓惶退却。十月二十一日，华南重镇广州失陷，日寇继续将其侵略魔爪伸向广州外围。当时南顺工委有的同志认为，南海离广州这么近，又是平原，不易坚持斗争，提出要撤到山区或香港去。林锵云不同意，他说，一个党员，就要落地生根，坚持斗争，不能临阵逃跑^②。在未接到上级指示之前，他仍然坚持在顺德活动，联系了一些支部，坚持工作，稳定了三区和六区的组织。这期间，他也曾到佛山活动过。早在广州沦陷前夕，省委决定成立东南特委和西南特委（一九三九年春改为中区特委），撤出广州到其他地区领导抗日。当时，东南特

^①《工运史研究资料》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1981年第9、10期合刊。

^②访问林锵云记录（1964年）。

委分管东江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香港，但林锵云他们不知道南顺工委归东南特委领导。为了迅速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林锵云通过新会荷塘与顺德均安圩党员之间的历史关系，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来到西南特委所在地开平赤坎汇报和联系工作。西南特委同意南顺工委暂时由西南特委同他们联系，并决定南顺工委工作由林锵云负责^①。他根据特委提出的长期积蓄力量、埋头苦干的斗争口号，到顺德一直留在沦陷区坚持斗争。林锵云他们依靠当地组织，以群众基础较好的西海、路尾围、龙眼等地作为立足点，同农民一起劳动，并派人到各乡活动，联系了几个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和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筹集了一些枪枝，大约在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后，在顺德大良镇蓬莱小学组织起一支有十多人的游击队（即当时的特务中队）^②。这支队伍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只有三枝长枪（单响）、四枝短枪，都是一些破旧武器，有些战士只好用木枪来进行训练。在初步学会了一些基本军事常识后，有的战士便向林锵云要真枪。林锵云风趣地对他们说：“我又不是开军械厂的，那有这么多枪？”接着，他鼓励大家：“不要着急，有人就会有枪，枪可以向敌人要，不要愁没有枪。”^③。他还用一些革命故事来启发大家认识人和武器的关系，增强斗争的信心。当时，部队的生活极为艰苦，给养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利用群众的牛栏、猪舍做住地。由于林锵云注意加强思想工作，部队的政治、文化活动，民主

①访问罗范群记录。

②《顺德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顺德县政协文史资料组编印。

③《光荣的历程》（顺德革命回忆录），中共番禺县委编印。

生活和群众工作都很活跃和深入。加上林锵云从不特殊，与大家共甘苦，所以这支小部队虽然人少武器差，但情绪很高。他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坚持抗战爱民的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断壮大了力量和扩大了活动区域，成为以后开展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之一。

根据省委关于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的指示，林锵云召集游击队商量出击鬼子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林锵云在研究会上分析了形势，坚定地说：“目前敌我力量虽然悬殊，但我们不能长期等待下去。我们必须从战斗中来壮大自己，打击敌人的气焰，使全县人民知道抗日力量仍然存在，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站起来打击日本鬼子，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真正出路。”他还指出：“要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先得要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既打击敌人，又教育人民，我们要在敌人的心脏里投一颗炸弹，使日本鬼子知道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①从五月到七月，游击队先后三次袭击大良日寇，大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凶焰，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一九三九年冬，林锵云率领游击队转到番禺南部活动，进行杀奸、除害，寻找机会出击敌人。

一九四〇年夏，林锵云到三埠参加中共广东中区特委会议。这时中央先后派遣了一批干部深入广东敌后，协助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后，他偕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谢立全、谢斌两同志回到顺德。接着，广东省委为了加强与统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发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成立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

^① 《光荣的历程》（顺德革命回忆录）。

委，由罗范群任中心县委书记，林锵云、谢立全、谢斌、陈翔南、刘向东、严尚民等为中心县委的成员。一九四〇年夏秋间，中心县委举行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并进行了详细讨论，分析了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和特点，确定今后斗争的方针是：分散隐蔽发展，积蓄力量，掌握有利时机，坚决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①。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心县委从三角洲各县的党组织调集人员和武器，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为了建立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进一步团结改造在我党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使它成为真正的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中心县委在征得广游二支队司令员吴勤的同意后，决定将林锵云领导的部队，编入广游二支队，成为这个支队的独立第一中队，由林锵云任中队长^②，直属中心县委领导和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指挥。

独立第一中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练兵活动，并深入群众发动农民参加部队，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一天，敌伪共千余人分三路向番禺县沙湾发起进攻。林锵云、谢立全等带领三十多名战士驻守在涌边村的后山，有一路鬼子和伪军共四百余人，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向涌边的后山扑来。尽管敌我力量悬殊，战士又缺乏作战经验，但由于林锵云等沉着指挥和战士们勇猛战斗，从早上坚持到下午三时，击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把几百敌人打退了，还缴获了一批武器，给战士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但在战斗中也暴露出部队

①谢立全：《珠江怒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页。

②《华南抗日纵队战史》第62页。

不够沉着，缺乏军事技术等缺点。同时，有少数战士对残酷的战斗环境产生了害怕情绪。针对这些情况，林锵云等拟定了军事和政治的整训计划，率领部队撤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路尾围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整训。

整训首先是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并以沙湾战斗为例，进行战斗总结，表扬好人好事，吸收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能团结群众又在战斗中表现坚定勇敢的战士入党。经过政治整训，提高了战士的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接着又进行紧张的练兵。在整个整训过程中，林锵云对部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他亲自给战士上政治课，找人个别谈话，耐心进行教育。就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他也从不简单粗暴，而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使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乐于接受教育。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同干部、战士、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无间。战士、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林叔”，而不叫他的职称。在艰苦的环境中，他自己衣着朴素，却想着为战士缝纱衫。战士没钱买烟，他一到战士中间，就从口袋里掏出烟丝，叫大家来抽。烟丝给战士捲完了，他自己就找“代用品”，搓些干木瓜叶，摘几片桑叶代烟纸，抽得津津有味。他好象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一有空就给战士和群众讲革命斗争故事，讲革命的前途，讲新中国未来的远景，讲得十分亲切生动。年青小伙子为了多听一点，常常偷偷把时钟拨慢。夜深了，林锵云还要走到战士的住地巡视，看他们的被子盖好没有，发现还未入睡的战士，便亲切地问：“够暖吗？”他的关怀、鼓舞，温暖着每个战士。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部队的素质提高了，影响日益扩大，部队也有了发展，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信

心。在这样的形势下，林锵云等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打开局面，建立敌后根据地，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

顺德的西海，自然条件很好，蔗林、桑基、鱼塘、河涌纵横交错，是一个水网之乡，很适宜进行游击战争。抗战初期，广雅中学的学生曾在这里开展过抗日救亡工作。林锵云初到顺德时，也在这里活动过，群众基础好，又建立了党支部，西海正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好地方。当时，西海地方实力派分成几股势力，互有矛盾。一九四〇年十月，土匪集团“济群团”数百名武装匪徒，闯进西海，大肆抢掠。西海党支部发动群众，开展防匪保家的宣传活动，与地方实力派中的妥协势力进行斗争，并提出邀请独立第一中队进驻西海，保卫西海。妥协势力眼见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只好勉强表示同意。林锵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带领着装备有两挺崭新机枪和几十支长短枪的部队，乘着快艇浩浩荡荡地驶进了西海，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林锵云根据中心县委关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建立西海根据地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深入动员，使每个战士认识到保住西海，立足生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接着，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备战工作，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和构筑工事，一面分批派出工作组深入群众，边帮助群众生产，边进行防匪保家、抗日救国的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西海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了：农会从三十多人发展到七八十人，妇女会、识字班也开始建立起来了。部队还广泛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西海为中心，组织顺德三、四、五区联防。这时，党吸收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参军，党组织又从港澳动员了二十多名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到西海来参加部队，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部队迅速扩大到一百二十多人。西海成了珠江三角洲武

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惧，日寇加紧对珠江三角洲进行“扫荡”。一九四一年七月中旬，日寇指使汉奸李鵬鸡（李辅群）部两个团向西海外围推进，形成对西海的三面包围。敌人一面进行军事威胁，另一面玩弄政治诱降手腕，要挟西海的投降派和动摇分子，妄图迫使独立第一中队撤离西海。在敌伪压境的形势下，当初同意请独立第一中队进驻西海的地方实力派动摇了，一小撮地主乡绅在群众中制造谣言和散播失败论调，一股反动逆流在西海泛滥起来。为了保卫西海，林锵云带领部队紧张地进行备战。同时，对西海的上层人物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一天晚上，林锵云和部队其他负责同志正在研究敌情，警卫员报告说，有一些乡绅求见。林锵云心里明白，这些乡绅投降之心未死，肯定是来说服部队放弃保卫西海的。在接见乡绅时，林锵云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犯西海的目的明显不过的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妥协投降，这是完全违背西海人民意志的，人民绝不会答应，这条路行不通。另一条是坚决抵抗，保卫家乡，这是西海人民应该走也愿意走的道路，也只有坚决抵抗才能保卫西海的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是抗日的部队，一定要和人民一道，打倒敌人，收复失地，使人民安居乐业过好日子。”接着，他又用缓和的语气对他们说：“大家还是把眼光放远一点吧！不管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多么凶恶，也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希望诸位在抗战中都能贡献点力量，为人民作点好事，日后留个美名。”^①林锵云义正词严的陈说，使绅士们听罢面红耳赤，

^①谢立全：《珠江怒潮》第81—83页。

低头不语。

一九四一年中秋节前后，我军击退了李塋鸡伪军对西海进行的两次试探性的进攻。但林锵云等清醒地估计到，部队正面临着敌人更大规模进攻的危险。九月的一天晚上，部队彻夜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坚决保卫西海。接着，召开了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林锵云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并指出保卫西海的重要意义。他说，西海是顺德的门户，在军事上是敌我必争之地。同时，西海又是珠江三角洲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保住这块根据地，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要通过这场战斗来挫败敌伪的嚣张气焰，鼓舞起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的斗志，坚定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因此，我们只有打，坚决打，一定要保卫西海。他还详细分析了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指出，敌人这次调动集结的兵力，虽然十倍于我，但这只是数字上的差别。我们是人民的战士，一个能打垮敌人十个。我们完全有力量打败敌人，而且要打场大胜仗，消灭敌人，壮大自己^①。他号召大家坚决依靠群众，打好这一仗。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塋鸡派敌“前线总指挥”祁宝林率三千余人，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分路进犯西海。林锵云、谢立全等指挥部队，利用三角洲特有的桑基、鱼塘、蔗林、河涌等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截击。战斗从早晨继续到太阳偏西，敌人大部伤亡或被水淹死，残余的敌人被追击得走投无路。林锵云马上带领群众，手拿锄头、棍棒、艇橈，四出抓俘虏。当他穿过蔗林时，看见七个持枪的伪军蹲在大基上喘气，便机智地向

^① <光荣的历程>（顺德革命回忆录）。

后面的蔗林呼喊：“同志们快出来呀，这里有‘黄泡仔’，快干掉他们。”被打得魂不附体的伪军听到喊声，以为蔗林真有大队人马，慌忙跪地求饶。林锵云喝令他们放下武器，就这样单人匹马抓了七个俘虏，缴了七枝枪^①。这一仗，打垮了敌人一个师的进犯，打死了伪团长兼“前线总指挥”祁宝林，毙伤敌人五百多，俘三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

西海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同时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抗日的怒火在珠江三角洲燃烧得更旺了。林锵云率领的部队声威大振，大批青年踊跃参军，驻西海的部队迅速发展 to 五百余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又建立了许多新的隐蔽活动据点，巩固了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新的形势下，中心县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开展统战工作，扩大抗日力量。当时，距西海东南四十二里的番禺榄核镇，地方实力派内部发生分化，以自卫大队长杨忠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实力自卫，维持现状，反对另一派向敌人投降妥协。我们党早就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利用旧友关系，对杨忠进行争取教育工作，西海大捷后，在榄核镇广大群众的推动下，他进一步靠拢我们。中心县委决定派部队进驻榄核，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改造杨忠和他的部队。林锵云多次找杨忠谈话，晓以民族大义，激发他对敌人的憎恨，同时与杨忠协商部队进驻事宜，决定把挑选出来的七十多名干部和战士，分批秘密进驻榄核。经过进驻榄核的干部、战士的努力工作，使榄核镇成了“白皮红心”的隐蔽据点。有了这一片回旋地区，西海根据地与中山抗日游击

^①谢立全：《珠江怒潮》第96页。

区的联系畅通无阻，对于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坚持游击战争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杨忠和他的部队坚定地走上了抗日道路，一直转战在珠江三角洲，成了一支抗日的队伍。一九四五年，杨忠在随部队挺进粤北地区时，因长期行军劳累，一病不起，临终时，他说：“我这一世，到头来总算找对了路，虽死无憾了，只可惜不能再见到林叔一面……。”^①除改造杨忠部队外，林锵云等还争取教育和改造了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日、伪、顽互相勾结，企图分化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团结起来的抗日武装。五月，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林小亚暗杀了广游二支队司令员吴勤。六月，林锵云被中心县委任命为广游二支队代司令员^②。他根据中心县委和省委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坚持对敌斗争的指示，率领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反敌、伪、顽合流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反击。

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寇纠集了数千鬼子兵和伪军李塋鸡、彭济华两个师，以及以林小亚为首的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团队，合计万余人，分路向南海、顺德、番禺、中山、新会等地区，继续进行“大扫荡”。形势越来越严重。中心县委根据省委传达的党中央关于“敌进我退，分散坚持斗争，待机打击敌人”的斗争方针，结合珠江三角洲的具体情况，决定除留下小部分武工队在西海隐蔽坚持斗争外，部队主力由林锵云等率领，分散向禺南的南、顺边境和中山等地区转移。在这之前，中心县委还作出了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的决定。林锵云率队到禺南后，结合当地党发展起来的队伍，展开了更有利的斗

^①谢立全：《珠江怒潮》第110页。

^②访问罗范群记录。

争。一九四三年春，珠江抗日武装力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共广东临委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珠江地区指挥部，统一指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部队，林锵云为司令员^①。

一九四三年夏，日寇集中兵力“扫荡”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林锵云等从番、顺地区来到五桂山，指挥部转移到了五桂山根据地。一九四三年秋，敌人对五桂山根据地发动“十路围攻”。当时在五桂山游击区的主力部队只有五百余人，各村民兵也不过三百余人，要战胜十数倍于我的上万敌人，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指挥部经过反复研究制定出粉碎敌人“十路围攻”的作战部署，林锵云等率领部队采取灵活的战术，不到三天便粉碎了敌人准备用一个月时间彻底“扫荡”五桂山根据地的计划。

一九四四年五月，广东军政委员会在宝安土洋村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在华南全面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成立珠江纵队。九月，正式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林锵云为珠江纵队司令员^②。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大举进攻湘桂线。党中央为了坚持和扩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华南新的斗争局面，指令东江、珠江部队分别向粤赣和粤桂边区发展。十月，林锵云等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从中山五桂山根据地出发，由海洲、荷塘渡西江经新会到达皂幕山区，与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会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③。一九四四年底，为适应广东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省军政委员会又决定把珠江

① 《华南抗日纵队战史》。

②③ 访问罗范群记录。

三角洲与粤中地区划开，将林锵云调回珠江三角洲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公开宣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并公开宣布林锵云为司令员^①。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珠江纵队发表了宣言，指出：“从五年来艰苦抗日自卫斗争中，使我们全体同志一致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救星”，“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统一指挥作战，与我们的兄弟部队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共同坚持华南敌后战场，为解放华南同胞而奋斗。”^②“珠纵”成立后，在珠江三角洲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四月，林锵云由中山坐船通过伶仃洋经宝安到了东江纵队。七月，他代表“珠纵”参加了在罗浮山召开的广东各地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林锵云被选为区党委委员。会议期间接中央电示，要广东组织部队北上五岭，接应王震南下的部队。接着，组成粤北指挥部，由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负责，带领一千多人于八月从罗浮山出发北上。途中由于敌情不明，给养困难，处境十分艰难。在艰苦的行军途中，林锵云身先士卒，吃苦在前，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后来，通过电台与“东纵”联系，才知道王震部队到南雄后，接到中央命令已经北返了。粤北指挥部仍按计划北上，一九四五年九月，北进部队到达南雄帽子峰周围，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南雄和粤赣边的大庾岭一带活动，发动群众，

① 《华南抗日纵队战史》。

②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宣言》，存广东省档案馆。

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粤北根据地^①。

一九四六年春夏，党领导的广东游击队，在广东军调小组调处下，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并签订了中共广东武装的“北撤协定”。广东区党委指示粤北人民武装北撤九百人。当粤北指挥部林锵云等集结部队准备北撤时，美方和蒋方代表相互勾结，千方百计给北撤部队制造困难，限制部队在十里宽的路线上行军，途中又制造种种借口，拦阻我部队前进，同时派兵尾随我部队，步步进逼，还组织了不少特务、流氓借端寻衅，制造冲突。北撤部队沿途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胜利到达沙鱼涌与兄弟部队会合。

为了统一领导，北撤部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林锵云为委员。北撤部队还组织了一个干部大队，由林锵云任大队长^②。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北撤部队在宝安的沙鱼涌上船，分乘三艘美国登陆艇，七月初到达烟台，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不久，东纵主力调到临沂。林锵云因病留在烟台住院治疗。十月间，烟台紧张，林锵云带领一百多名病号，通过封锁线，到达华东军区所在地，后来，分别到党校和军政大学学习。林锵云在华东党校仅学完第一单元，即被调中央城工部工作。他到河北阜平找中央工委，见到了刘少奇等。当时，党中央正在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他留下来参加了会议。会后，林锵云被派到山东，担任两广纵队副政委^③。

①访问王作尧记录。

②访问杨康华记录。

③林锵云《自传》。

(三)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抽调军队干部加强地方的工作，以解决新解放区所需要的大量干部。林锵云由于过去长期从事工运工作，这时，党又派他搞工会工作。他以两广解放区职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大会还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林锵云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次年四月，他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世界工联在意大利召开的代表会议，到苏联、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参加了一些工会活动。回国后不久，林锵云又在北京出席了亚澳工会会议。一九四九年底，林锵云被调回广东工作。

林锵云回到广东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华南分局职工委员会第二书记。一九五〇年一月，林锵云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局长。这时，他抓了劳动就业与失业救济、工会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等问题。林锵云提出，劳动局的任务应以保护劳动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同年八月，成立广东省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林锵云兼任主任。他强调政府救济失业工人的政策，并不是单纯的慈善观点，而是要以“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转业学习”等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组织起来，实行生产自救。由于采取了

一系列积极措施，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在劳动就业与失业救济工作上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五〇年三月，广东省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后，林锵云任主任。他首先抓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作。针对一些市、县工会干部对工人入会条件要求过多，有的地方又存在滥收会员的偏向，林锵云提出，要放手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工会领导和干部必须注意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特别要把反对关门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同工会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结合起来，认真抓好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五三年四月，广东省总工会正式成立，林锵云被选为总工会主席。到一九五七年，全省建立了十四个产业工会，十个省属市和一百个县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全省会员达一百多万人。

林锵云在主持工会工作期间，多次在会议讲话和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复强调，要做好工会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接受党对工会的领导，反对工会干部的分散主义。他始终坚持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会工作。例如，在建国初期，他动员和组织职工，把支援前线和恢复、发展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提出工会要教育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起骨干作用，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清除“五毒”、“三害”的基础上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工会向企业行政部门输送了大批优秀工会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合营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广东省工会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表扬。

林锵云还认真贯彻了工会工作必须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教育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劳动，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国家

建设。在他主持工会工作期间，开办了工人夜校、技术学校，不断提高工人文化和生产技术水平。他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还办起了工人疗养院、工人医院、工人文化宫等等，使工会工作做到生产、福利、教育三位一体。针对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严重，不法资本家以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和我们争夺青年职工及某些青工堕落犯罪的情况，林锵云强调，加强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工会的重大政治任务。为此，他经常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活动的机会，对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林锵云在负责省总工会工作的同时，兼任中国海员工会华南区委员会主席。他非常关心海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提出一定要办好海员俱乐部。当时华南地区是全国建立海员俱乐部最多的地区，俱乐部成为海员学习时事政治、生产技术、休息和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林锵云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黄埔港装卸任务很繁重，他帮助解决及时把进出口物资运往各地的问题，使黄埔港年年超额完成装卸任务，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在国际上赢得了好的声誉。

林锵云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一九五八年九月，他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以后，主要负责民政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优抚政策，做好经常性的拥军优属工作。每逢节日，他都亲自率领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到驻军慰问坚守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安全的解放军指战员，把党和人民的关怀送到战士们的心里。对烈、军属和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他也关怀备

至。他还多次会见了彭湃同志的母亲和其他革命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

林锵云十分重视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七年十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林锵云先后任副主任、主任。他在负责老区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评划老根据地的标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评划老区的工作。对全省老根据地建设从交通、水电、生产、文教、卫生等方面都做了规划。他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曾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广东革命故事丛书”。林锵云还经常深入到老区，慰问烈、军属，关心各地烈士陵园的建设，为烈士纪念碑题字。一九六二年八月底至九月初，林锵云率领了一批曾在中山县五桂山区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访问了五桂山革命根据地。他虽然年纪较大，身体又不太好，还是和大家一起从中山的南塍步行到三乡，再到五桂山，直走到原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槟榔山。所到之处，他都勉励老根据地人民进一步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继续克服各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

顺德的西海是林锵云亲自参加建设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后，他曾多次到西海看望群众。一九五九年，有一次他和顺德民政局的同志到西海，找一些军、烈属开座谈会。他亲切地问大家：你们吃得饱吗？住房解决了没有？生产上有什么困难？军、烈属反映：现在生产可以，但建房很困难，没有材料。林锵云立即对县民政局同志说：“抗日的时候群众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打鬼子时他们住茅寮，现在还是住茅屋，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茅屋换成砖屋。”^①后来，干部们积极想办

^①访问梁镜清记录。

法找到水泥预制件厂协助解决材料，并发动大家烧砖瓦、挑沙子，首先帮助烈、军属盖房。群众高兴地说：林叔提出的茅房变砖屋的想法实现了。一次，林锵云听西海群众反映，现在劳动力不够，群众碾米要到番禺去，两个人去碾一担米要花一天时间。林锵云对县农机厂厂长说：“你听到没有？群众碾米那么困难，你是厂长，要想办法搞到碾米机，方便群众。”^①经过农机厂同志的努力，搞出了小型碾米机，西海群众再不用划艇去外地碾米了。

林锵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反对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做法。有一次，在里仁洞召开佛山地区老区工作会议，会上有的人提出亩产万斤的口号，顺德的一个干部问林锵云：你看行不行？林锵云问他，你们西海的实际产量有多少？回答说：只有五百七十斤。林锵云叫他在会上就说五百七十斤，不要吹牛，要讲老实话^②。林锵云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从不为自己谋私利。解放后有的亲戚想通过他从农村到广州找工作，他耐心说服他们，并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要他们安心建设农村。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不许孩子讲父亲的职务，在家里要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也不允许孩子顺便搭乘他坐的小汽车。林锵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他在院子里自己种了一些瓜菜，和家里人一起吃瓜菜饭，而把国家配给高干的一些食品送给战友的小孩吃。平时，他到公社去调查了解情况，公社的同志问他想吃什么，他总是说：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①②}访问梁镜清记录。

林锵云为党为人民奋斗了一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林锵云被“隔离审查”，他爱人张仕娥也在同一天被抓走，于三月六日被迫害致死。林锵云在被关押期间，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含冤逝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党为林锵云在广州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 在林锵云追悼会上尹林平致的悼词，载《南方日报》1979年12月13日。
2. 广东省党史委员会资料室、广东省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南方日报》资料室和顺德、南海、中山县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有关资料。
3. 谢立全：《挺进粤中》，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4. 公曼：《珠江三角洲人民子弟兵的抗战史》，载《正报》旬刊第12期（1946年）。
5. 刘向东：《珠江纵队革命斗争回忆》。
6. 《广东省内的中共部队》，载《华商报》1946年2月19日。
7. 《正义报》，见暨南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华南新闻事业史料》第1辑。
8. 访问冯燊、欧初、梁广、孙乐宜、何干诚、黄云耀、饶璜湘、廖似光、方群英、陈胜、陈九、梁棉、黎朝华、陈椒蕃、梁国僚、霍文、李朋生、周强、孙文德、林婉平、林悦欢等的纪录。

车 向 忱

施文魁 车树实

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车向忱，早年在东北从事平民教育和反日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往返关内外，联络东北义勇军，推动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持东北民众救亡会，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促进团结抗日。在陕西创办东北竞存学校，掩护我党地下组织，为党输送干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后，他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东北，历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哈尔滨大学校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含冤逝世。

唤起民众，挽救国家的危亡

车向忱原名庆和，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东顾家房身村。他的曾祖父从山东逃荒来到东北，落户务农。父亲车文笏是个读书人，一九〇九年在本村办起了一所时势小学堂，十二岁的车向忱高兴地进入了这所小学堂学习。校

长符子权提倡维新，倾向革命，常向学生们讲些英雄人物反抗异族侵略的故事，并指导学生们看些热爱祖国的书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以及林则徐、邓世昌等英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车向忱的心中，使他从小就产生了爱慕英雄，学习英雄，为振兴中华争当英雄的强烈愿望。

车向忱在一九一四年入法库县中学读书，一九一八年毕业后，又去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当时，北京正处在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收回领土主权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开始。各校学生救国会的组织建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学生们也正在走街串巷进行宣传。车向忱一面补习功课，一面积极参加讲演团的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的夜晚，北京大学的校园沸腾了。为了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同学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次日去天安门前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当时，一位同学对车向忱说：“咱们都是补习班的，别去参加游行示威了，免得耽误了功课。”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国都要亡了，还念什么书！”^①

五月四日，他加入了北京大学学生的队伍，冲破军警的阻挠，奔向天安门前。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直抵卖国贼曹汝霖的住所——赵家楼胡同。学生们在那里痛殴了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了赵家楼曹宅。这时候，车向忱和一些同学被军警包围逮捕。后来，由于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声援，才被释放。

^①车向忱：《我所走过的道路——躬身实践四十年》，载《人民中国》（日文版）1963年第9期。

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使车向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深深感到，“对于反动统治者，只有依靠群众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赢得胜利^①。”

高等补习班学习结束后，车向忱考入中国大学，进入法科一年级学习。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担任名誉校长的一所大学。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唤起民众”、“恢复中华”的伟大号召，给予他极为深刻的影响。于是，他放弃了法科学习，改入哲学系，立志学习哲学和教育，准备将来要为改造社会，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奋斗。

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车向忱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迷信是“社会上最深、最大、还最久的病源”，是“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②。因此，在学生时代，他就把打破迷信，唤醒民众，当作自己为改造社会应尽的职责。

从一九二一年初开始，他就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每日课余总要腾出一两小时，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写一二段对于封建迷信思想的批判。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初完成了一部三万七千多字的书稿——《打破迷信》。可是，在那腐败、愚昧、反动、黑暗的社会，又有谁肯为劳苦同胞出版这个不挣钱的书籍呢？他本着“不干则已，一干到底”的精神，自己拿出两年来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学费，将书稿交由北京第一监狱印刷厂印制一千册，并在劳苦大众中廉价出售。可是，

①车向忱：《我所走过的道路——躬身实践四十年》，载《人民中国》（日文版），1963年第9期。

②车向忱：《打破迷信》一书《自序》，1923年北京印制。

销路不畅。广大劳苦民众没有钱买书，而且，还有不识字没文化的实际困难。为了提高劳苦民众的文化，他在写书的同时，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中国大学平民夜校，并亲自担任夜校主任。平民夜校本着不要学费、杂费、书费和夜间上学的原则，广泛招收本校的工人、职员、家属和附近的居民，学习国文、算术、常识等。《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中记载：“查本校平民学校创设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观。此虽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唤起民众之一法也。”

一九二五年，车向忱从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当时，父亲主张寻找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与车家有点亲戚关系）谋个县长的职位。可是，他十分鄙视升官发财，对杨的为人也很反感，于是，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沈阳。他想，如今东北已在日寇侵略魔爪的威胁之下，要想救国先要救民，要想救民先要教民。他寻得一家小店住下，立即开始为实现平民教育的理想而奔走，准备为唤醒民众，挽救国家的危亡干一番事业。

他寻访友人援助，未能见面；各个教育机关、同善堂、道德会他都走遍了，也无济于事。当他听说大南门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宝航（又名阎玉衡）非常热心社会事业，便登门拜访。两人一谈，非常投合，当即决定以青年会为据点，着手开展平民教育活动。

经过紧张的筹划之后，首先在小南门内的第一监狱为犯罪儿童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冬季，他应聘为省立第三高中的教员，于是，又在该校创立平民夜校两个班。第二年夏季，他兼任东北大学附属中学和第一高中教员，又在两校各设立平民

夜校一个班。除此之外，他还联络大中學生，成立奉天學生平民服務團，利用節假日，帶領學生到城市貧民和鄉村農民中去，“真正地作平民的朋友”^①，大力興辦平民夜校。他白天在中學教書，晚上便騎着自行車到各個平民夜校去視察，有時還親自教課。

當時，辦平民學校的經費，除了青年會補助一小部分外，主要靠募捐和車向忱的薪水維持。他在三所中學兼課，每月薪水九十多塊現大洋，幾乎全部用來給學生購買課本、鉛筆、紙張，而自己和家屬却過着省吃儉用的生活。家中有時斷炊，孩子餓的哭泣，妻子前來要錢買米，他還得向別人借錢。

隨着平民教育事業的發展，車向忱又聯合各界熱心人士，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成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進會^②，並親自擔任了該會的總幹事。

不久，第一高中、第三中學以平民教育活動影響學生學習為理由，解聘了車向忱。這時，要繼續發展平民教育，困難就更多了。可是，他並不屈服，還對會員們說：“工作開展了，經濟上的困難會越來越多的。只要我們本着不怕窮、不怕苦、不怕死，實干、苦干、硬干的精神去做，困難一定能夠克服；只要我們不被凍死、餓死，我們絕不放棄工作”^③。

不久，當時的教育廳長又誣蔑車向忱說：“這是拉攏青

① <奉天學生平民服務團啟事和章程>，見 <遼寧國民簡易教育概況> 1929年出版。

② <遼寧五年來簡易教育的經過>，見 <遼寧國民簡易教育概況>。

③黃宇宙：<回憶“東北甘地”——車向忱同志>，載 <沈陽師院學報> 1979年第4期。

年，有左倾嫌疑。”这个人甚至跑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那里诬告说：“办平民教育就是反对贵族，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张学良。”车向忱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求还在中学读书的学生张学思帮忙，引见其兄张学良。他对张学良说：“办平民教育是为了唤醒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张学良一听，十分高兴，便说：“反对日本侵略，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①过后不久，张学良还捐助现大洋五千元，并应邀兼任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改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就这样，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辽宁全省共办起城市平民学校四十一所，学生一千七百余，农村平民学校二百多所，波及二十余县，使全省七千多名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开始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一些受教育的劳苦民众纷纷表示，“不做睁眼瞎，增强爱国心，不当亡国奴！”

一九二九年夏，日本政府在经济掠夺的同时，增兵东北，准备进行军事侵略。在此形势下，为进一步唤起民众，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侵略，他与阎宝航、张希尧等^②共同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③，他被大家公推为主任干事、会长，负责日常工作。

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是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的群众性爱国反日团体。沈阳各大中学校学生踊跃参加，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便三五成群的分赴街头、茶社、剧院、福音堂、监狱等地进行反日爱国讲演，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

①③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人民的反日斗争>，载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 1963年第2辑。

②张希尧，又名张德厚，东北大学学生。

们说：“买洋货，钱就叫外国人赚去了，就象人身上的血脉似的，老叫别人把血脉抽走，这个人就快该死了。一个国家叫外国人用洋货不断的把金钱赚走，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老百姓就会成为亡国奴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①

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同时，他还兼管着拒毒联合会^②的日常工作。他时常带领会员化装潜入日本站、十间房（西塔东）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等毒窑进行实地调查、拍照，然后据此编写逼真的宣传材料，演出生动的宣传剧目。他还邀请著名画家创作了许多宣传画，并带领会员上街张贴。在拒毒禁烟活动中，最突出的要算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和六月十六日，分别两次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焚烧鸦片的举动。在此以前，省邮政局扣留了日本人贩运的海洛因、鸦片三百八十六包、烟土四百箱。由于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省政府决定全部焚毁。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会负责人车向忱与阎宝航等为这次活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们动员了数百名学生前去讲演、宣传、维持秩序。焚烧毒品的当天，烟雾蔽天，人人称快，广大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纵毒祸华的阴谋！

这些反日爱国活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也引起了日寇的仇视。日本当局指使一些浪人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对车向忱及其家属进行威胁、恫吓。可是，他毫不惧怕，依然坚定地对会员们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象文天祥、史可法

①《“九·一八”事变前辽宁人民的反日斗争》。

②拒毒联合会是反对日本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的反日团体，1930年在辽宁成立，阎宝航为会长。

那样，洒鲜血、抛头颅，宁死不当亡国奴！”还说：“我一个人死去，如果能换来千万人的觉醒和幸福，那我马上可以去死！”^①当时，广大青年、平民和一般社会人士都很赞誉他的爱国精神。

一九三〇年末，日本帝国主义准备进行军事入侵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当听说日本关东军要在我辽河上游铁岭马莲沟要道上建筑兵营，妄图控制辽河包围沈阳的消息时，他立即派遣张希尧、黄宇宙^②等化装深入当地百姓之中进行调查，并动员群众拒绝为日本出工；并以当地群众的名义，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写信表示抗议。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这座日本关东军的兵营始终未能建成。

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当局蓄意制造了万宝山惨案。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车向忱同张希尧等化装前往长春万宝山进行调查。回到沈阳后，他们又发动国民常识促进会的会员为救济旅朝受难同胞进行募捐。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夕，日本军队频繁的进行军事演习，他和国民常识促进会的会员们加紧工作，加紧斗争。由他主持筹办的国货公司提前于十二日开始营业。国民常识促进会准备在国庆日举办的拒毒宣传、民众夜校的招生、国货陈列馆的展出等项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中。

就在日本驻军以演习的名义向我沈阳驻军第七旅的营房——北大营，不断制造挑衅事件的紧急关头，车向忱与张希尧来到北大营面见老朋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他说明来意，

①黄宇宙：《回忆“东北甘地”——车向忱同志》。

②黄宇宙，国民常识促进会工作人员。

希望王以哲尽快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王以哲立即拿出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发来的“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命令让他看。他看过，十分激愤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劝导王以哲说：“一旦日寇开了火，你如果敢抵抗，只要坚持三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在群众方面发动二、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①王以哲述说了自己的苦衷，并表示已作了“见机行事”的安排，还准备再向上级请示。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淫，同胞们在流血、牺牲。国民常识促进会、平民学校、国货公司等全被彻底捣毁，依靠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和鼓动东北军抵抗日寇的种种努力都已化为泡影。车向忱内心悲愤万分！九月十九日，他联合了东北大学的爱国同学张希尧、苗可秀、张金辉等四十余人，怀着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急切愿望，离别了已是一片火海的沈阳，分头秘密登上火车，奔赴北平，商讨对策。

抗日救国活动

到达北平后，车向忱立即同东北同乡高崇民^②、阎宝航等商量、研究，决定共同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这个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群众性反日救国团体，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

^①车向忱：《自传》。

^②高崇民，原为奉天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秘书，奉天农务会会长。

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正式成立。张学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流亡关内的同胞踊跃参加，入会者达四百多人。车向忱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委。

救国会成立后，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十月初，车向忱领导了一个宣传组，前往山海关、绥中、兴城等地，深入群众，控诉日寇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不当亡国奴。

回到北平后，为训练出关抗日的青年，车向忱又与张希尧、苗可秀等联合由沈阳逃出的东大同学一百多人，组成了东北学生军，编为一个连。他不仅参加学生军的领导工作，关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还请求张学良从东北军中派两名教官，前来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为了督促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同年十一月，救国会又决定派车向忱率领六名青年，赴南京直接求见蒋介石。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客厅里，他代表请愿团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供给东北军军火”、“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中苏复交”等七项要求。蒋介石虚伪傲慢，不负责任地答复说：“阿拉（我）对东北人民很关心的，但是阿拉很忙啊！没有时间答复，你们去找陈立夫好了。”谈话前后不到五分钟，便不了了之^①。通过这次请愿，他与参加请愿的同胞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决心出卖东北的真面目。大家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不能再有任何幻想了，蒋介石既然决心不要东北，那么，我们自己去干吧！

^①车向忱：《最大的教训》，见1948年9月18日《东北日报》。

十二月下旬，日寇集中兵力向我辽宁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锦州发起进攻，车向忱与苗可秀等率领救国会慰问团赴该地区田庄台前线慰劳抗敌将士。在此同时，已沦陷的东北三省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揭竿而起，组成了以部分原东北军为基础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巩固的后方，急需内地支援。他回北平后，与救国会商量，自告奋勇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抗日义勇军。救国会为此作出决定，张学良也亲自接见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初，车向忱改名杨秀东，化装成卖药先生，与扮作徒弟的宋黎、李述全^①一同由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塘沽港口乘日轮“天潮丸”，前往已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大连。

车向忱按照预定计划，经庄河、安东（今丹东）、凤城，寻见了义勇军将领邓铁梅，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并商定介绍苗可秀去那里工作^②。然后，又从凤城经安东、宽甸、桓仁、辑安、通化，到临江策划组织抗日武装，建立秘密抗日小组。在临江八道江寻见了义勇军将领唐聚五，进行慰问^③。然后，由临江经开原到达哈尔滨，至珠河一带见到李杜将军^④。在进行慰问的同时，车向忱还讲述了关内人民的希望，并把救国会与张学良将军的信件交给李杜，鼓励他再接再厉打击日寇。

次日，车向忱回哈尔滨转齐齐哈尔寻访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当听说马占山在“江桥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寇之后，现已退至大黑河一带。于是，他化装成农民，由讷河进入冰雪覆盖着的

^①宋黎、李述全当时均为东北大学的学生。

^{②③④}程之平，〈访问车向忱先生〉，载1946年6月10日。《东北日报》。车向忱，〈自传〉。

大兴安岭森林。不幸路上遇见土匪，将路费抢劫一空，他忍饥受冻，沿途讨饭，倍历艰辛，经过十日之久，终于到达大黑河。

在大黑河的官银号，即义勇军的司令部内，车向忱见到了马占山。他说明自己是代表救国会前来慰问的，接着又从棉袄中拆出委任状和张学良的亲笔信件。马占山见信后十分激动，热泪纵横，随即召开阅兵大会，宣誓反攻，并请他给全体将士讲话，鼓励大家抗日到底^①。

完成这一任务后，他继续前往海伦、拜泉、安达等地联络马的部下邓文、李海清等，使他们与马占山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市的日寇。不久，他返回北平汇报情况，然后又回到哈尔滨。

一九三二年七月，他根据救国会的决定，为掩护来往的抗日同志和为义勇军战士秘密治疗伤病，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开设了大同疗养院^②。年末，日寇宪兵破获了大同疗养院，并悬赏五千金票购买车向忱的头颅。他只好暂时离开，潜赴满州里、海拉尔，寻访苏炳文，推动其联合抗日，并往绥芬河一带策动伪军反正。不久，又返北平汇报工作。

通过一年来深入敌后，他亲眼看到广大的义勇军战士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孤军作战，非常勇敢顽强；但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部都被日寇各个击破。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在吉沈铁路中段崛起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磐石工农义勇军，即南满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

①车向忱：《我的一段抗日活动》，载《星火》革命回忆录第2辑。

②车向忱：《自传》。

身)，在极其困难恶劣的条件下，卓有成效的打击日寇，急待祖国内地广大人民的支援。他向救国会汇报了这一情况。按照当时救国会的观点，凡是抗日的，都应该积极支持。于是，救国会便把联络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秘密交给了车向忱。

一九三三年初，车向忱第三次潜回东北，来到了辽南地区。经过一段寻访，终于找到了杨靖宇^①所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当即表示慰问，并代表救国会商讨了援助步枪、子弹、手榴弹等事宜^②。他从南满游击队和这些坚强勇敢的战士们身上看到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希望。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回忆起当年我所参加的这段抗日活动，没能使广大的义勇军得到政治上的指导，以致没有能使他们和东北抗日联军更好的联合在一起，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这是很遗憾的事。”^③

离开辽南地区后，他又往黑龙江等地寻找马占山的部下宋喜和、允江，还联络了“压满州”、“挡一面”、“李波澜”等山林支队，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日寇，但当时义勇军的活动是大势已去。这时，他又得知救国会所领导的奉天组织已遭日寇警特破坏，哈尔滨、庄河、西丰等地的组织业已暴露，于是，决定撤回北平。不久，他便携同妻子翟重光 and 不满周岁的儿子作掩护，经由山海关回到北平。

三月初，热河失守，日寇飞机轮番轰炸长城各口，驻守该

①杨靖宇于1933年1月担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后来，南满游击队发展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担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②王春发：《回忆车向忱同志》（1982年4月27日谈话记录）。

③车向忱：《我的一段抗日活动》。

地的东北军将士自动奋起抵抗。他同张希尧率领东北大学同学五十余人，代表救国会、辽吉黑后援会、北平妇女协会，乘着满载大批慰劳品的汽车，前往抗日前线海阳镇、古北口南石匣镇慰劳抗日部队。慰劳团在他率先垂范的影响下，不顾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二千五百多名。此情此景使在前线参战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也十分感动，可是，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却采取了袖手旁观、与日寇勾结的“国策”，致使中国军队不得不放弃长城各口，失掉了冀东。

就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密谋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期间，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抗日将领冯玉祥、共产党员吉鸿昌等，以部分驻守长城的抗日军队、东北义勇军和平津流亡学生为基础，组成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在康保、宝昌、沽原一带抗击日寇，爆发了著名的“张北抗战”。为了鼓励抗日战士英勇杀敌，车向忱又偕同张希尧等赴张北前线慰问，并在那里结识了冯玉祥和吉鸿昌。他在张北前线又一次亲眼看到了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军队英勇顽强的打击敌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可是，为时不久，这样真正抗日的部队却遭到蒋介石调来的十六个师的“围剿”。

这一时期，救国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希尧、郑洪轩、董学礼等常与他接触，并经常谈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不断发表的关于怒斥日寇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号召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声明、宣言等。他联系到自己在南满游击队和张北前线的所见所闻，与《塘沽协定》前后蒋介石国民党破坏长城抗战，“围剿”察绥

抗日同盟军的现实，尤其是亲日派何应钦秉承其主子的旨意，提出了“抗日救国有罪”，明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逮捕了老朋友张希尧，还在各处通缉捉拿他自己等事实。两相对比，究竟谁真抗日？谁假抗日？谁救国？谁卖国？已十分清楚。他深深地感到，“国民党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大打内战，只有共产党才是坚持抗日的。”^①

竞 存 十 年

一九三五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北上，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撤销了鄂豫皖“剿总”，又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调来陕甘一带。车向忱目睹东北军调离抗日前线，辗转北上与抗日的红军作战，心中十分痛苦。他无力阻止，随即来到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养病。恰在这时，又接到自己的老朋友、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拍来的电报，邀他去西安。他很想为促进“团结抗日”尽自己的一点责任，便携带家属来到西安。

初到西安，他同王以哲朝夕相处，名为帮助老朋友学哲学，实则谈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当时，由于东北军云集陕甘一带，西安街头到处都能看到东北军的眷属和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有一些东北流浪儿童，背井离乡，失家又失学，甚至沿街乞讨。他见此凄凉景象，痛苦难忍。于是，便找到了已被释放的张希尧，说明自己想为流亡子弟办一所私立小

^①车向忱：《自传》。

学，以便培养打回老家去的新生力量。张希尧听后，非常赞成，当即商定：教师可以从东北同乡中邀请几位，尽义务；校舍得设法借一所闲房。为此，他请求王以哲支持，很快便在东关索罗巷四十三号借得一处已停业的火柴厂作为校址。他拿出自己身边仅有的两元钱，买了些粉笔、纸张、墨水等，又向附近邻居借了些桌凳，便于一九三五年夏天，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起名为东北竞存小学。“竞存”就是要以竞争求生存，要提倡同日寇、汉奸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学校成立后经费十分困难，主要靠校长募捐维持。这就是当时《西京民报》曾经报道过的，“长安市上唯一穷苦的竞存小学校”^①。

东北竞存小学办起之后，立即得到中共陕西地下党、东北军、西北军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杜重远、杨明轩、杜斌丞等，均积极捐款资助。竞存学校的学生很快便由三十多名发展为二百六十多名，并先后在西安民乐园、长安王曲镇和凤县银洞滩等地，各设分校一所。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这前后，执行蒋介石“围剿”命令的东北军进犯红军，红军在劳山歼灭了东北军一一〇师，在榆林桥歼灭了一〇七师一部，在直罗镇又一举全歼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部。这是东北军有史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因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对此，蒋介石还趁机扣发军饷，取消编制。驻防洛川的王以哲十分苦闷、懊悔，又邀请车向忱去洛川。当年冬季，车向忱乘东北军的飞机来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王以哲向他述说东北军受到的损失和自己苦闷、焦虑的心情。他直言不讳的劝说道：“我早就说

^①1936年10月7日《西京民报》。

过，我们东北军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谁帮助我们抗日，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谁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回顾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张北抗战、红军北上抗日，以及眼下的“剿共”内战，反复地说明中共是东北同胞的朋友，我们应该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打回老家去。

恰在这时，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后释放的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带着毛泽东写给张学良的函件来到洛川，求见王以哲，当时，王以哲不敢收留，怕张学良见怪。车向忱则摆明利害，多方劝说。王以哲听了老朋友的话，随将高福源留下，并电请张学良飞洛。很快，张学良飞到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看了毛泽东的函件，并即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示了东北军愿与红军商谈合作的愿望。车向忱在洛川又与王以哲及其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反复说明联共抗日的道理，经一月之久，然后飞返西安^①。

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启发帮助下，为培养坚决抗日的骨干力量，不仅在军内组织了抗日同志会、学兵队，还在西安城南王曲镇联合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车向忱是抗日同志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经常接受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王以哲的邀请，去那里给学员们讲课、作报告。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向学员们说明，“必须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真抗日，谁假抗日。”^②不但如此，他还组织竞存小学的学生们前去宣传演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定由竞存小学的师生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油印刊物——《东北通讯》。刊物每期印出，都送到学兵队和军官训练团，受到大家的欢迎。

^{①②}车向忱：《自传》。

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为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团结抗日来到西安。车向忱热情的向他们介绍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还主动把竟存学校的油印机拿了出来，赶制宣传品；组织师生积极支持、协助他们进行宣传活动。竟存小学成了宋黎等人从事地下活动的接头地点。八月二十九日晚七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宋黎。这天晚上，车向忱受张学良的委托去找宋黎，恰与特务挟持宋黎于饭店门前相遇。他见势不好，急忙化装去见张学良，报告宋黎等被国民党省党部捕去，并说：“这表明省党部根本看不起张副司令。”^①张大怒，当即传令卫队营长带领全副武装的战士，于次日拂晓包抄了国民党省党部，救出了被捕的马绍周、关副官等（宋黎已被西北军宪兵营的巡逻队救出），抢出了文件、材料。这一大快人心的“艳(二十九日)晚事件”，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西安军民反蒋抗日的情绪。

“九·一八”五周年时，东北流亡同胞与西安各界群众联合召开了纪念大会。车向忱带领东北竟存小学的师生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大会开过之后，广大民众团结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为了使东北流亡同胞团结起来，担负起“救亡图存，收复失地”的重任，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他与洪钊^②、金钊如^③等十余人经过紧张的筹备，于十月四日在竟存小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大会，有一百五十多人前来参加。他被大家推定为大会主席，并

①车向忱：《自传》。

②洪钊，西安东北大学校友会的负责人。

③金钊如，西安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

在会上被选为“东救”的执行委员、主任委员。他在开幕词中说道：“诸君均为流亡，各方皆非我们的故土，所以，收复失地工作，应由我们作先锋，死和牺牲，我们应站在前面。但是，仅这样还不够，我们更应发动全国民众，联合起来，继续不断的永久的为中华民族谋解放，图生存，争独立与自由。……”^①

“东救”成立后，立即发表了《援绥募捐启事》，掀起了援助绥东抗战的热潮。东北竞存小学救国会首先积极响应，师生们纷纷顶着严寒，走街串巷，为绥东抗敌将士募捐。就这样一文一文的积累，共募得一百九十一元七角，还为绥东抗敌将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西京民报》报道了这一情况，还在编者“按语”中写道：“竞存小学学生无多，且均幼小，而真诚热烈募捐，能达到如此珍贵成绩，是多么可敬可佩呀。本市中小学林立，任何学校的环境都优于竞存，我想能如竞存小学作一下，成绩当然能超过竞存。”

由于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捐款总数竟达两千元以上。十一月二十日，车向忱代表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各民众团体及张学良将军，率领慰问团前往绥远前线。慰问团抵达太原，受到各界民众热烈欢迎。他们继续前进，二十八日到达百灵庙前线，慰劳抗敌将士。夜晚，向当地驻军了解攻取百灵庙获胜的经过，慰问团成员都万分兴奋！十二天后，他们返回西安。车向忱在向《西京民报》记者谈感想时说：“如能对敌抗战，全国军民立刻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吾人认为，只有全力对外，才能完成真正统一。希望国人，有钱的出

^①1936年10月5日《西京民报》。

钱，有力的出力，援助绥远将士，拥护抗敌领袖。吾人相信，华北各将领苟能出兵援绥，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找出一条生路。”^①

在援绥抗战的高潮中，“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了。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以西安市学联的名义，邀请了“西救”、“东救”秘密商议，决定在十二月九日召开纪念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以便深入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清晨，东北竞存小学的二百多名同学，在车向忱和老师们的带领下，从东关索罗巷出发，前去参加纪念大会。当队伍走到民立中学的门口时，恰遇国民党警察将该校同学严密包围封锁。爱国热情高涨的竞存小同学们理直气壮的质问警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并在门前高呼口号：“欢迎民立的爱国同学！”“欢迎军警参加抗日请愿！”“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奸！”随着一声“冲啊！”民立中学的同学们不顾一切地向校门口冲去。就在这时，警察向竞存的小同学们开枪了。几名小同学负了伤^②。可是，同学们并没有被冲散。他们重新集合起队伍，在车向忱和老师们的带领下，高举着那面象征着白山黑水的校旗，又继续前进。

十点多钟，在西北“剿总”门前参加大会的各校同学，听说东北竞存小学的同学被反动军警开枪打伤，非常气愤，大家

^①1936年12月5日《西京民报》。

^②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枪杀幼童案”。《西京民报》1936年12月13日的报道说：“当‘一二九’那天早晨，各团体正集合准备出发的时候，竞存小学发生了中国（不，世界）空前未有的对小学生的屠杀。”

振臂高呼：“惩办杀人凶手！”“打倒汉奸卖国贼！”“誓死为负伤受难的小朋友报仇！”与会的同学们纷纷提出：到临潼找蒋介石去。

就在这时，车向忱亲赴张学良公馆，向张控诉了反动军警开枪杀害东北流亡孩子的法西斯暴行，两人声泪俱下。张学良悲愤交加，当即给国民党中央陈立夫挂电话，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命令东北军卫队营要保护学生队伍，跟着学生维持秩序。当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对请愿学生们“格杀勿论”的命令后，唯恐学生们吃亏，随后又乘车追赶请愿队伍，进行劝阻，并表示，一定要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两天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十四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共同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十二月十六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拥护张杨主张的市民大会上，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散发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出卖民族利益，进攻工农队伍，残害同胞，压迫救亡运动的历史，热情地赞颂了张杨为救国家、救民族而发动的兵谏。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应张杨的邀请，乘飞机来到西安。为了使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变成群众的行动，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同各方面人士紧张的商谈工作。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在长安县公署邀请了包括车向忱在内的二十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①。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

^①徐彬如：《回忆车向忱同志》（1981年1月10日谈话记录）。

主持。当杨明轩向周恩来介绍车向忱时，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东北流亡儿童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怀。

周恩来的这次会见和谈话，使车向忱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进一步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由于‘西安事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更辨别出哪党好，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①此后，他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也就更为自觉、更加坚定了。

在车向忱的主持下，“东救”于事变后立即开始了接待、安排已释放的男女政治犯。为了尽快地把城乡的宣传工作开展起来，十二月二十三日还专门召集了“东救”宣传部的部务会议，讨论了加强训练宣传员，立即进行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国内的政治形势、如何发动全面抗战，以及军民当前的任务等项宣传工作。此外，还决定聘请学者名人，设立讲演台，改《救亡周报》为《救亡周刊》，组织一百三十人的宣传队等。东北竞存小学的师生们也在他的带领下，同西安的各个学校一起，积极投入到拥护张杨八项抗日主张的宣传活动中。

车向忱在主持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活动。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不断搜集材料，于一九三六年底编著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这本书由他的学生、刚从东北抗联来到西安的苏安人写了序^②，付印出版。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立即

①车向忱：《自传》。

②苏安人在“序”中写道：“我师车先生向忱热心救亡席不暇暖，坚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真是十年如一日！其最近苦心搜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材料，献给武装同志们，以作参考。”

遭到扣押、软禁。背信弃义的蒋介石还调动了中央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车向忱和“东救”的执委们一方面起草了发给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电报，要求允许“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①”；另一方面，又接受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派遣，携款一万元，分赴赤水、渭南、临潼、兰田等地慰劳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战士们。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西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以头条的显著地位发表了新闻报道，题目是《车向忱慰劳归来谈话，我军前线士气倍极旺盛，商贾贸易毫无惊扰情形，中央军情绪颓丧、士兵不愿作战》。

新的政治形势给陕西的教育界带来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如何使教育为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服务，为实现抗日救国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因此，必须改变复古、反动的国民党教育，实施抗日救国的战时教育，即国难教育。为此，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车向忱是这一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教盟的执委，具体负责教盟的宣传工作。他执笔草拟了《陕西国难教育方案》中学部分的全文，还在《救国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专文：《东北奴化教育一斑》。文中在谈到对西北教育的希望时，明确地写道：“现在‘双十二’的警钟，已震动了整个的中国及全世界，西北的学生已从‘羔羊训练’式的教育制度下跑到光明的社会里来，而得到新的生命。将来的教育呢？一定会走到一个新的途径上去。”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核心人物王以哲为军内少

^①1937年1月1日《西京民报》。

壮派所杀害，车向忱感到极度悲痛。他目睹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由于汉奸、托派以及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煽动、挑拨、拉拢、收买而逐渐分崩瓦解^①，心中更是痛苦难忍！他东奔西走，竭尽全力，企图把东北军重新团结起来，继续与红军合作，抗日复土，打回老家去。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那种既成局面已是不可挽回了。

由于中共地下党和周恩来的帮助，他没有悲观失望，更没有丧失信心。在国民党中央军于二月八日开入西安，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着古城的时候，他仍旧坚持在那里办学，战斗！

车向忱经常去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即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以及联络处的主任伍云甫，反映东北军、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竞存学校的情况，聆听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意见，并从联络处秘密带回革命书刊、毛泽东著作等，供进步师生们学习。联络处也根据他的请求，不断地派出工作人员去竞存学校教歌、教舞、讲授游击战术等。林伯渠还根据东北竞存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亲自批准，由联络处每月为学校秘密补助三百元钱。

这时，不仅东北流亡儿童，其它战区和西北籍的儿童也都纷纷前来竞存小学报名入学。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校舍已无法容纳。一九三七年初，车向忱决定将学校由东关索罗巷迁到城内大南门里的韩湘子庙，即原东望小学的校址（东望小学因东北军南迁已停办）。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他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从北京聘请了聂长林（又名聂速藩，中共党员）来校

^①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版。

担任训育主任，从西安聘请了刘明（中共党员）担任班主任，聘请了张继五担任教导主任等。在学校教育方面，他提出，一切课程都要围绕着“团结抗日”，围绕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强调教学要紧密联系抗战形势和任务。教育学生分清敌友，辨明是非。他时常利用自己从东北带来的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照片，进行经济掠夺的伪币，施行奴化教育的课本等教育学生，不忘亡国失家的痛苦。由于他的积极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热心指导，在学生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竞存分队。“民先”分队以半公开的方式在校内进行活动，并带领同学们分赴街道、农村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当时，一些官办学校的民先队在校内无法开展活动，也都来到竞存开会、学习、刻印材料、练歌、排剧等。东北竞存小学成了当时西安民先队活动的大本营之一。

国民党当局在扣押了张学良，拆散了东北军、西北军之后，对于还在依靠共产党办学的车向忱早已恨之入骨了。一九三七年八月末的一天夜晚，一群国民党警察特务突然包围了学校，扬言要在校内搜查枪枝（办学初期，为了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曾向王以哲要了十五支步枪，搜查前，车向忱已责成刘明设法送往联络处）。经过一阵翻腾，特务们只发现了几粒生了锈的子弹和校长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的日寇照片、伪币、课本等。他们以此为借口，便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和聂长林、张继五、刘明及工友老王。

车向忱等被捕后，全校师生列队前往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校长、老师和工友。车向忱的夫人翟重光奔走南京、上海等地，拜访老友阎宝航、高崇民等，进行营救。东北同乡会联名出保，并托人告知中央军黄杰军长。黄杰给蒋鼎文写了亲

笔信，大意说：“车向忱是抗日爱国的东北人，在古北口抗战时期曾支援过中央军不少物资。如果说他是汉奸，那么，我黄杰也得是汉奸了。”^①由于多方声援、营救，经过一个多月的关押、刑讯，车向忱等才得取保释放。

出狱后，他依靠共产党办学的决心更大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除小学部外，又正式增设了中学部三个班。红军联络处、中共陕西省委应他的邀请，先后派地下党员钱一粟、陈放、郝克勇、张寒暉、滕净东等来校。车向忱安排他们分别担任学校的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校务主任、年级主任等领导工作。当年地下党的领导成员徐彬如后来回忆说：“这时，李克农同志领导的社会部（做情报工作的）正有一批从陕北来的人员需要安插，我们就把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做党的秘密工作。社会部的电台就设在竞存学校，肖克的夫人，吴德峰的夫人都在那里工作过。竞存，实际上是社会部的一个‘点’。”^②

“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后，广大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抗日革命的真理。为了广泛地培养革命青年，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生力量，中共代表博古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在西安创办一所抗大分校。可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却以没房子为理由，百般刁难、推托，不让成立。为此，党中央代表林伯渠提出要同国民党省党部谈判此事。车向忱听说要在西安办抗大，非常赞成，积极支持，并以陕西文化教

^①张政枋：《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

^②徐彬如：《怀念车向忱同志》，载《宝鸡教育——东北竞存中学校史资料专辑》1982年增刊。

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当时，他还是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的负责人），与中共陕西省委的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决定在西安城外寻找一处地方办学。他通过救亡总会的熟人，在三原县找到了安吴堡这个地方。不久，党中央派来冯文彬、胡乔木，在这里创办了我党所领导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安吴青训班。一九三八年初，他还去安吴青训班参观，对于学习抗大作风，办好竞存，受到很大的启示。后来，他还组织竞存学校的教师、学生，去安吴青训班参观学习。

东北竞存学校由于党员不断增多，秘密地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竞存特别支部（简称“竞存特支”），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地下党员的增多和竞存特支的建立，对车向忱的思想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后来，在回顾特支地下党员对自己的帮助时，他深有感触地写道，“由于张寒暄等同志介绍给我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毛主席著作，使我在理论上、政治思想上有了些依据和方向，逐渐地走入了革命的正轨。”^①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向陕西进逼，飞机频繁轰炸西安，国民党当局向各学校提出疏散的要求。他根据坚持持久抗战精神，主张迁校至靠近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军后方的陕西省凤翔县一带，以便必要时组织师生们上山打游击。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竞存特支和中共陕西省委的赞同与支持，并在师生中进行了动员。

十月初，竞存的七十多名师生在车向忱的率领下，来到凤翔东关外纸坊村两座四壁残缺、门窗俱无的破庙内。学校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在竞存特支的支持和当地

^①车向忱：《自传》。

群众的主动帮助下，他带领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佛殿为宿舍，用麦草当床铺，露天地里吃饭，大树下面上课。一九三九年十月，《老百姓报》上有一篇文章，生动的记载了当年竞存师生野外学习的情景：“大树遮太阳，河流交响曲；小凳排排坐，前后皆整齐；黑板挂树上，先生草中立；旷野任狂吼，句句皆清晰；……要想住洋房，打回老家去！”东北竞存学校在艰难困苦中继续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小学部、初中部以外，又增设了高中部，在校学生达到七百多名。为了把抗日救亡与学习延安作风结合起来，为了“把学生都变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斗士”，他提出了“团结、创造、耐苦、奋斗”的八字校训和“一切以抗战为前提”的《竞存校歌》，决心要把竞存办成一所新型的抗大式的学校。

在教学上，他主张一切课程都要紧紧围绕抗日救亡与革命斗争的需要，自编教材，自印讲义，自己开设新课。在文化课学习中，还一反过去“死读书”的做法，注重理论结合实际，注重教育结合劳动。师生们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附近的城镇、农村演剧、讲演、办夜校、组织儿童团；另一方面，自己开荒种地，自己养牛、养猪，自己拉石头、脱坯、打墙、建造房屋，自己创办造纸工场，并结合群众的经验，改良土纸，增加产量。在生产劳动中，同学们不仅运用了所学习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增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对竞存学校十分关怀、支持，车向忱也经常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他曾向竞存特支的负责同志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听共产党的。”^①他不仅经常同

^①吕剑人：《回忆车向忱同志》（1981年1月4日谈话记录）。

党员教师商量学校工作，同领导竞存特支的西府地委书记吕剑人也作过交谈，还曾先后两次去重庆拜访周恩来，听取他对于形势的分析和办学的意见。在竞存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亲自为学校捐款五千元，师生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后，中共陕西省委本着党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根据竞存学校社会活动过多，过份暴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学校”的意见。车向忱得知后，积极拥护，主动配合。凡是学校的各项重大决策，他总是首先征求特支和地下党员的意见。当日寇近逼潼关，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刻，他与特支负责同志研究，如何组织武装力量，运来枪枝、勘测地形，做好进山打游击的准备。国民党当局硬要往学校派遣特务充当训育主任，他与特支负责同志商量，要不要接纳，以及如何同特务斗争。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特务指挥全副武装的士兵，两次包围学校进行大搜捕。他不顾自己再次坐牢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坚持同国民党的破坏作斗争。事件发生后，又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师生。东北竞存学校几遭浩劫破坏，但在师生们的团结战斗下，没有被摧垮，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东北竞存”这所进步的革命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党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热情、革命思想、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优秀人才。在这十年中，从竞存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五千多名（其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当时，就有百余名师生先后偷越封锁线，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数十人参加了八路军。

来到革命的故乡——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来到了！车向忱和东北流亡的师生们都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与兴奋之中。大家急切的盼望和平、民主的实现，盼望着早日返回东北，重建家园。可是，无情的现实很快就使大家失望了。

就在蒋介石国民党调遣大量军队严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时候，车向忱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着的西安。他找到了老朋友杨明轩，谈了自己准备去延安的想法。杨明轩非常赞同，并通过中共陕西地下党的关系，亲自为车向忱去延安作了妥善周密的安排。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车向忱化名杨秀东，扮作商人，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与赶着牲口驮子的商人混在一起，经由耀县顺利地越过了封锁线，到达日夜想念的陕甘宁边区。一踏进边区这个新天地，就象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从外地回到了久别多年的故乡。他到马栏后，地委汪书记热情招待，还特意举办了欢迎会。在马栏休息了三天，汪书记又指派专人护送，又经过五天行程，终于看到了那巍巍的宝塔山。

“啊！延安！”他在心里亲切地呼唤着，激动地热泪横流。

车向忱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第二天，他就见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等。第三天清晨，交际处的负责同志对他说：“林老讲，今天请您去枣园，毛主席想见见您。”听到这一喜讯，他立刻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兴奋的热泪夺眶而出。他想，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受尽了欺凌、迫害和

艰难困苦的折磨，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如今来到这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得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还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在林老的陪同下，车向忱来到了枣园。刚刚迈进毛泽东住的窑院的大门，毛泽东便从窑洞里健步走了出来，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们一同走进窑洞，落座后，毛泽东微笑着说：“车先生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①接着，他非常亲切地问车向忱到延安后生活得怎样？对延安观感如何？东北竞存学校现在怎样了等等。毛泽东又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泽东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为桑梓服务！”^②

那一天，车向忱兴奋得彻夜未眠。他从交际处负责人那里借来了许多毛泽东的著作和《解放日报》，如饥似渴地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之后，在林老的安排下，他参加边区的各种教育会议，参观延安的大中小学，看到了陕甘宁边区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事求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看到了这种新教育在教育青少年，改造顽皮儿童和知识分子方面收到显著效果，更使他赞叹不已。他后来回忆说：“在延安一个多月的过程中，使我头脑中旧的教育观点和新的教育观点马上起了个斗争，使我三十年来旧的教育幻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我马上承认，这种新教育制度

①车向忱：《自传》。

②何礼：《回忆车向忱同志》（1982年2月28日谈话记录）。

是对的，是真理。”^①

在延安工作的原竞存师生听说老校长来了，每天都有人来交际处看望。车向忱和他们凤翔一别，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延安重逢，大家都有说不尽的感想。已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的原竞存教师张寒晖兴奋地告诉他说：“竞存的学生来到延安的能有一百二十多人。目前，大多数都去全国各地接收失地。不要多久，我们也快走了。”^②

原竞存的学生刘中坚就要离开延安去西安工作，请老校长写几句话以作留念。车向忱想了想，提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十年斗争为竞存，
魑魅魍魉不离门；
动辄到校捕先生，
转瞬学生又失群。

幸赖师生能团结，
艰难困苦仍前进；
造成桃李千九百，
革命种子到处伸^③。

这时候，他看到许多竞存的学生在革命阵营的各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觉得自己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贡献

①车向忱：《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忆——两个天下、两种教育》，载《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②③车向忱：《自传》。

一点力量，心中感到无尚的愉快和自豪。

新年到了，林老陪同车向忱又去枣园，给毛泽东、朱德、徐特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拜年。毛泽东同他亲切地握手，关切地问道：“车先生，您还没有回东北呢？”他回答说：“我以前得的关节炎病犯了，走路还比较吃力。”毛泽东想了想说：“有办法，三人小组的飞机快来了。”^①

当天，毛泽东就派医生到交际处给车向忱看病，并赠给他皮大衣一件，让他注意身体。时隔不久的一天早上，车向忱接到了送他回东北的通知。于是，他带着中共中央写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介绍信，赶往延安机场。刚到机场，他便发现毛泽东、林伯渠等都亲自来为他送行。见此情景，他立刻老泪滂沱。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嘱咐说：“团结同胞，争取和平，搞好东北工作。”^②

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激动心情登上飞机，频频的向毛泽东、林伯渠和其他前来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

飞机起飞了。毛泽东那亲切地嘱咐，还久久地回荡在他的心中。

建设人民的新东北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车向忱回到了离别十四年的家乡——辽宁沈阳。重返故土，分外亲切。可是，家乡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和平景象。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残破的伤痕，国民党接收

①车向忱：《自传》。

②何礼：《回忆车向忱同志》。

大员们的奢侈腐败，以及调兵遣将妄图夺取胜利果实的种种活动，使他那十分兴奋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在老朋友巩天民的帮助下，去抚顺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见到了林枫、张学思等同志，并以急切的心情要求组织给自己分配工作。

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走遍了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作了许多次报告、演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出卖东北，抛弃东北人民，如今又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的种种罪行；赞颂共产党、抗日联军、八路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坚持抗战，赢得了胜利的种种光辉业绩。他根据党组织的意见，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广泛地开展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的企图，宣传我党的和平主张。为了争取局部的和平停战，他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面对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轰炸、进攻，他又率领长春市慰问团一百二十余人赴四平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慰劳正在进行英勇保卫战的东北民主联军。

由于建设东北人民政权的需要，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车向忱担任了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各界群众的欢迎会上说：“今天大家推选我作副主席，为嫩江人民服务，我觉得非常惶惑不安。我为自己确立了三个方针：（一）不干则已，干则到底；（二）不屈不挠，鞠躬尽瘁；（三）为嫩江人民贡献出我所有的一切，把嫩江省建设成人民的乐土。”^①

^① 《老教育家车向忱就职嫩江副主席，表示愿贡献一切为人民服务》，见1946年6月13日《东北日报》。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车向忱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通知：“经行政委员会决定，公推先生为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①。于是，他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主持全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当时，东北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他利用各种场合报告、演说，揭露国民党在教育上一党包办，残害进步势力，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罪状；热情宣扬陕甘宁解放区成功的教育实践，明确提出，“东北应当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②他还根据东北解放区建立不久，学校没有设备，没有课本等实际困难，一方面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积极编写新教材或选用旧教材；另一方面吸取陕甘宁解放区和东北竞存学校的教育经验，提出“从实际出发，学习与生产配合，生产与劳动配合，学校与工厂配合，教学与大自然配合”的一整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主张^③。

他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同时，还根据组织的决定，兼任了哈尔滨大学的校长。多少年来，他要办大学的理想，终于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解放区实现了。哈尔滨大学是一所由民主政府刚刚接收、秩序非常混乱的私立大学。为了改造这所旧大学，党组织向学校选派了优秀的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支部。车向忱非常尊重党员同志们的意见，主动接受党的领导。他书写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并根据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把参加战争和土改确定为

①林枫给车向忱的信（1946年9月）。

②《老教育家车向忱先生痛述反动派歧视东北人，主张东北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见《东北日报》1946年5月29日。

③车向忱：《试试不用课本的教法》，载1947年3月27日《东北日报》。

“学习的中心目标”^①，积极号召、鼓励学生去前方参加战勤工作。东北民主联军的伤员列车路过哈尔滨时，他带领学生去车站慰问，亲自给伤员送水、送饭，还和同学们一起为伤员们扭秧歌庆胜利。在哈尔滨市六百多名大中學生下乡参加土改的欢送会上，他号召大家“要象六百门小钢炮一样，都要瞄准那些封建势力，开火！”^②他还亲自下乡视察学生们参加土改的情况，注意总结学生参加实际斗争所取得的收获。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写道：“这不但使学生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了一步，就是我这个校长，在思想上也随着进了一步。”^③

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党组织根据对车向忱的长期了解，以及本人的一贯表现和要求，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车向忱履行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手续，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入党后，按照党组织指示，他没有公开党员的身份，与阎宝航、陈先舟编为一个小组，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栗又文代表党组织负责联系^④。

不久，由于组织上的关照，车向忱一家迁入哈尔滨大学后院一座二层小楼居住，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又尽可能给他配备了小汽车和一些必要的家俱。这使得在破庙里渡过了前半生的车向忱十分不安起来。住楼的当天夜晚，竟激动得不能成眠。他翻身起来，打开电灯，翻开了自己的《日记》本写道：

“我自己要时时的检讨，对得起革命不，对得起人民不？自明天起将汽车退回，用腿走路，或许对我的腿病还能好些

①②车向忱：《日记》。

③车向忱：《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忆——两个天下，两种教育》。

④《车向忱是共产党员》，载辽宁《共产党员》1982年第5期。

（运动有益）。这样，还可以节省汽油以便支援前线，不脱离群众……。”天亮之后，他为送车事给行政委员会秘书处写了信，然后又将老伴、孩子、警卫员和工友召集一起，向他们说道：“咱们在小楼住一夜了。组织上想的很周到，安排了许多器具物品，我们不要随便动用，该退回的退回，不要存享受的观念，要有革命的牺牲精神才好。……要处处节俭，节约水电，节省生活费用。”

东北全境解放后，他又回到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成立时，他被选为政府委员，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东北大区撤销后，他担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从事繁忙的行政与党派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直接参加教育工作实践，先后曾兼任了东北实验学校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他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探讨着新中国教育所应走的道路。

为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党提出了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改革旧有学校教育事业的任任务。车向忱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撰写了《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忆——两个天下，两种教育》一文。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深刻地对比了新旧两种政权下，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热情地赞颂了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他把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反帝反封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政治思想教

育；强调培养学生劳动观点等十大特点。这对学习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改革旧的学校教育，起了推动的作用。

建国后党的第一个生日来到时，车向忱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东北日报》和《东北教育》上发表了同一文章，题目是：《共产党为中国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深刻地指出，我国教育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根本教训，就在于“缺乏明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因而，总是解决不了教育上的问题。东北解放五年来教育工作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教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南针’。”他不仅这样写了，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始终坚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从未动摇。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开始，车向忱提出了“教育要配合建设”的主张^①。他在一九五〇年新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东北已经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将来全国都要卷入经济建设的高潮，这便需要着大量有革命思想和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人才。因此，就要求广大的青年学生加强学习。”显然，我们“教育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培植大量的经济建设的干部。”^②

为了切实的、从儿童时期抓好新一代人的基础教育，车向忱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调查了一些家庭、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他一边搜集材料写作，一

^① 《教育要配合建设——车向忱访问记》，见1949年8月26日《东北日报》。

^② 车向忱：《青年学生们，迎接一九五〇年》，载《生活知识》1950年1月1日。

边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反复修改了十余次，终于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写成了一本八万多字的书——《怎样教育新一代》。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刻地阐明了新一代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批判了一些家长对孩子前途、幸福的一些错误认识，以及教育上的错误做法。并根据我国教育的性质、特点，总结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以身作则、耐心说服启发、正面教育引导，以及讲故事、学榜样、召开家庭会等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和方法。这本书问世后，立即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保育员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因而先后六次印刷，在全国发行十万册以上，还被译成朝鲜文出版。

对于教育战线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他总是热心关怀，积极扶持。中等学校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出现后，他发表文章，热情支持、赞扬；农业中学出现了，他又以《农业中学前程远大》为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肯定。一九五九年初，他发现辽宁省黑山北关小学运用集中识字的方法进行语文教学改革的宝贵经验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八次去黑山北关小学视察，亲自听课、看作业，找学生和任课教师谈话，帮助他们继续总结提高，要求他们“一定把德、智、体几方面都抓起来，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搞好。”黑山北关小学的教学改革，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团结广大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车向忱还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下，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教育部党组织的支持下，于一九五二年筹建了民进辽宁省委员会，并先后在沈阳、旅大、丹东、抚顺等十多个城市筹建了民进分会的组织。后来，又受民进中央的委托，于一九五三年去长

春，一九五六年去哈尔滨，分别筹建了吉、黑两省的民进组织。当时，一些人对民主党派缺乏全面认识。他便多次召开座谈会，介绍民进的性质、任务，以及它一贯与党密切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民进成员在教育战线上发挥积极作用。为了推动各地的会务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亲自了解情况，参加组织生活，找人个别谈话，并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在工作中，他一贯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治病救人，对犯错误的同志也总是耐心帮助，热情鼓励他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一九五四年末，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五年初，他又在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支持下，担负了政协辽宁省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省政协建立后，他被推选为副主席，负责省政协常委会的工作。他十分重视党交给的团结全省人民的这一工作，经常主持召开一些座谈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对于一些合理建议，总是千方百计的给以支持。

一九六二年，我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车向忱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去陕西省的西安、宝鸡、凤翔、延安等地视察。返回辽宁后，他分别在省政协和沈阳师院作了《学习延安作风》的报告，并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文章。这对于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发扬革命传统，战胜自然灾害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六三年初，他在省政协召开的六旬以上老人联欢会上，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朗诵了即席所作的诗歌：

年高寿长志不衰，
老者安之党关怀；

花甲群仙逢盛世，
愿将余生献当代^①。

这是他对老人们的祝福，也是自己的心愿：“老当益壮，革命到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鞠躬尽瘁

一九六四年底，党的好干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在报上公布后，全国广大人民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车向忱听了关于焦裕禄事迹的报告后，内心十分激动，挥笔在《日记》上写下了七律一首：

不畏风沙为兰考，
裕禄群众心一条；
献出生命为人民，
哪有困难哪有焦。

裕禄革命意志坚，
庸碌终生我不甘；
立志狠学前途广，
鞭策自己永向前。

为了学习焦裕禄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发扬党的艰苦奋

^①1963年2月1日《辽宁日报》。

斗的作风，他主动提出第一次自减工资四十六元，请求收回国库，作为自己对人民的点滴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车向忱和许多党政干部一样，先是“靠边站”，接受“传讯”和“批判”；后来又以“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残余和代表人物”的罪名，被绑架、“专政”，送往盘锦“干校”劳动，受尽了威吓、侮辱、殴打、刑讯逼供等折磨。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一边一次又一次地给周恩来写信报告情况，一边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要学习焦裕禄同志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党的知遇之恩”^①。就是在他被非法拘禁、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仍然在《日记》中写下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膑足而写《兵法》，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的话语，借以激励自己处逆境而不忘党的事业，“准备再干上二十年，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为共产主义献终身”。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突然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革委会，在沈阳为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车向忱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②，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辽宁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公开了车向忱的党籍^③，并于同年十二月，在车向忱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员党旗。

①车向忱：《日记》。

②1977年12月20日《辽宁日报》。

③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给沈阳师院党委的信（1979年6月20日）。

曹 荻 秋

司虎春 刘 诚

(一)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〇九年（农历六月十六），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南津驿镇。父亲曹品江和母亲杨慈祥在镇上开设一个小酱品店，维持全家生活。曹荻秋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六。

曹荻秋五岁时，父亲病逝，六岁开始上私塾，十岁进入本镇公立小学读书。他刻苦好学，喜书法，春节时常为邻居们写对联。

南津驿镇小学，为镇上于、李两家地主官僚所控制。他们的子弟，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曹荻秋兄弟仗义执言，常与于、李两家的公子哥儿发生冲突。一天，于家的孩子无端的辱骂曹荻秋，曹荻秋与之争吵后，前去责问于的父亲。第二天，曹荻秋竟为此事被学校开除，只得转到离家九十里的资中县球溪镇小学继续攻读。一年半以后，他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即资州中学。中学初期的曹荻秋，是个“勤勉奋发的学生，成绩优良，不问外事。”^①

^①曹荻秋《自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曹荻秋也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开始投入社会的实际活动，进而组织与联合学生的工作。”^①

一九二六年夏，年仅十七岁的曹荻秋，借用曹培金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取了成都师范大学（原名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故名曹培金。

在成都，他先后参加了洪沛然^②、余国桢等人组织的三民主义学会（国民党左派组织）和成都师范大学党的外围组织“导社”。“导社”的主要活动是和国家主义派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共产党员苟永芳是“导社”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帮助下，曹荻秋积极参加“导社”的活动，“并阅读了许多流行的革命书藉，打下了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基石。”^③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④。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二八年春，成都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二·一六”惨案^⑤，使整个成都地区处于白色恐怖

①③ 曹荻秋《自传》。

②洪沛然当时是共青团员，1927年上半年参加共产党，在成都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

④“三·三一”惨案：为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并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和声援北伐战争，中共四川地委指导莲花池省党部联合各进步团体，于1927年3月31日，在重庆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蒋介石指使反动军阀血洗会场，残杀民众数百人。

⑤“二·二六”惨案：1928年寒假期间，成都省立一中的学生，在党的外围组织“石犀社”的领导下，开展了择师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分子杨廷铨当校长，斗争十分激烈。以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为首的刽子手，制造了“二·一六”大惨案，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14人。

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曹荻秋没有被吓倒，而更激起他对敌人的仇恨。他“沉入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及各种社会思想、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自动要求参加组织，并重新踏入革命的实践。”^①一九二八年秋，在地下党员贺竞华等的领导下，曹荻秋恢复和扩大了“导社”的组织，领导学生开展斗争，成为师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曹荻秋等领导了师大的择师运动，拒绝新任校长到职。军警团联合办事处^②发出密令要逮捕他。他暂时隐蔽到新都县图书馆洪沛然处躲避。

一九二九年九月，曹荻秋由成华县委组织部长、少城区委书记贺竞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成华县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川西特委宣传部干事等职。一九三〇年大学毕业后，曹荻秋在温江县中学任训育主任，同时担任党的温江工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四川省委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下，把全川划为东南西北四大军区，布置全川的总暴动，在川西策动驻广汉、新都部队起义。曹荻秋被派往广汉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驻军的策反工作。

曹荻秋到广汉后，化名曹雪樵，以广汉男中训育主任的职务为掩护，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广汉起义前敌委员会，由廖恩波、刘连波、曹荻秋、徐孟超、廖宗泽五人组成。前委

①曹荻秋《自传》。

②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成都由刘文辉24军、邓锡侯26军、田頌尧29军联合统治，设立了三军联合办事处。

书记廖恩波未到，由刘连波代理。前委制定了广汉起义的实施方案，起义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以夜间熄灯为信号（广汉县城每晚十一点熄灯），到时若电灯不熄，就以打响广汉男中大钟为信号，这项工作由曹荻秋负责。

预定的时间到了。广汉男中大钟急鸣，灯熄而复明，枪声四起。广汉起义爆发了。原邓锡侯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的两个团和一个随营军官学校二千多人，参加了起义。二十六日晨，起义军控制了全城。总指挥部负责人曹荻秋，组织各校师生成立了一个起义军宣传队，在城内各街口搭起宣传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下午四点钟，起义军总部在广汉公园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曹荻秋代表前委宣布广汉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暂由曹荻秋代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下设两个纵队，曹荻秋兼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广汉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反动军阀，他们立即调兵遣将包围广汉。前委决定立即撤离广汉，按原计划攻打绵竹县城。由于起义部队没有经过严格整编，士兵思想不稳便匆忙投入战斗，又因一个大队长的叛变，引起全线仓促撤退。正在生病发高烧的曹荻秋，在混乱中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曹荻秋掉队以后，依靠农民的帮助回到成都。这时，成都报纸已登了附有曹荻秋照片的通缉令。他在成都无法立足，便经泸州到重庆，被分配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又奉调到江北县委工作，公开职业是一个兵工厂的学徒。两个月后，县委被敌人破坏，曹荻秋的身份已暴露，只好离开江北县委。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曹荻秋从重庆经武汉到达上海。党组织分配他在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任秘书。不久，又任中国社会科学硏究总会（简称“社研”）党团书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群众热血沸腾，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我党因势利导，组织了上海民众救国会。曹荻秋参加了救国会党团的工作，还组织了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曹荻秋任总指挥。

在“社研”工作期间，曹荻秋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凯丰经常有工作联系。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凯丰通知曹荻秋，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要到他的住处武定路联系工作。过了一天，凯丰又来通知，说此人失踪，要曹荻秋立刻搬家。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便搬到沪西昌平路（英租界）“社研”一位姓季的住所。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夜，曹荻秋和弟弟曹心哲在住所突然被捕。巡捕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些革命书籍和传单，并有图章、毕业文凭、像片等证据。

曹荻秋从租界巡捕房的审讯中，了解自己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的，但这个叛徒只知道他叫“大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真正身份。于是曹荻秋就机智地编了一套假口供欺骗敌人，说自己名叫张云卿，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生，住在海格路现代中学，和曹培金（大学毕业文凭上的名字）是双胞胎，后来自己过继给姓张的当养子，这次从四川来上海是找曹培金帮忙考学校的等等。巡捕房审不出什么新口供，只好让他签

字，移送到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敌法院刑事法庭先后对他进行三次审讯。尽管叛徒一口咬定他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的负责人，二房东也说他是住在昌平路的，但曹荻秋继续利用编造的口供欺骗敌人，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内同志。敌法院根据叛徒的告密和二房东的证词，妄加曹荻秋以组织文化总同盟“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

在西牢的前楼五层楼上，共有四十六个房间，全是关押的政治犯。曹荻秋和他弟弟同关在三号房间。每个房间只有十一只脚板长，五只脚板宽，同住三人，就在这样特殊环境里，曹荻秋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狱中政治犯开展了新的斗争。

在西牢的政治犯中有个同难互济会的组织，代号“阿大”。“阿大”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政治犯的觉悟，团结互助，坚持狱中斗争。曹荻秋入狱不久，就被难友们推选为同难互济会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西牢有个规定，政治犯不准读书看报。曹荻秋等领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开展要求读书的斗争。经过多次交锋，他们终于争取到在上海有亲友的可以送书进来，在监狱有存钱的可以由狱方代购书籍的自由。他们还想方设法应付狱方检查，得到一些革命书籍。曹荻秋在大学里就曾研究过哲学，在狱中他学习了英文版的哲学史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还帮助难友们学习英文。

曹荻秋和其他同志一起，还领导政治犯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斗争。西牢的物质生活十分差，加之囚房里见不到阳光，个个面色苍白，体质不断下降。曹荻秋以“阿大”领导政治犯，向狱方提出改善生活、允许锻炼身体和参加劳动等要求。经过

斗争，物质生活略有改善，晴天的早晨，大家可以到六层楼平台上去跑步，还可以到监狱工厂做工。

一九三五年六月，曹荻秋等领导政治犯开展反对进反省院的斗争。原来西牢的政治犯刑满以后，即可释放，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规定这些人刑满以后，都要引渡给国民党转反省院，但凡要求提前进反省院的可以提前出狱。这时，一些托派分子就乘机煽动，散布投降主义论调，说什么反省院“总是要去的，迟去不如早去。”少数幼稚的青年学生受到影响，要求提前进反省院。曹荻秋等“阿大”负责人，领导政治犯就这个问题开展了大辩论，揭穿了托派分子的谎言，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同牢难友高唱国际歌以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使敌人的阴谋破产。

五年后，曹荻秋刑期届满。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他被移送到浙江路伪法院看守所。国民党市党部派了一个特务和他谈话，曹荻秋仍按原被捕时的口供作了回答。在敌人的“谈话察看”记录中说，曹荻秋“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喻，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决不予闻政治云云。”^①因此，刑期虽满，仍不予释放，又把他送到苏州反省院。

在苏州反省院，曹荻秋被编在中学组，进行所谓“感化教育”，并要写“反省”日记。他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使敌人一无所获。不到两个月，反省院当局又把他升到大学组。这时，他发现反省院院方御用工具自治会的主席，过去是“社研”大夏大学分会的一个会员。曹荻秋分析自己很可能被这个

^① 上海市委文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出卖了。因此，准备在反省院长期蹲下去^①。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寇飞机接连轰炸苏州。政治犯推派廖体仁、彭康、曹荻秋等为代表，向院方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参加抗日，院方声称要请示，又说为了安全先转移到太湖东山刘家祠堂。到东山后，政治犯推选代表组成“非常委员会”，继续与狱方交涉释放问题。曹荻秋被选为“非常委员会”的成员。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营救下，八月下旬，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全部被无条件释放。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曹荻秋率五十余名政治犯从苏州来到上海，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曹荻秋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审查出狱同志的狱中表现。这项工作完成后，党组织决定他参加中共江苏省文委工作，并负责领导上海所有文化团体的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党组织批准他回四川工作的要求，路经武汉时被长江局留下，分配到沈钧儒所领导的武汉救国会工作，任联络部长，参加党团。不久，党又派他到军委会宣传厅工作。后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七军团所办的干训团，任主任政治教官。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湖北省委决定曹荻秋参加鄂西北特委工作。中原局成立后，鄂西北特委改为省委，他即参加省委工作，同时在第五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原局又调曹荻秋到河南竹沟，参加豫鄂边省委工作。同年十月左右，刘少奇从延安来到竹沟，他又随少奇赴豫皖苏边区，参加区党委兼任皖北特委书记。

^① 《铁窗五载》，上海《青年一代》1979年第2期。

(三)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刘少奇（化名胡服）率领一批干部从淮南半塔集东进盐城。不久，曹获秋得到刘少奇的电令，从豫皖苏边区来到盐城，参加领导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刘少奇到达盐城不久，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八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建立。同年二月，盐阜淮涟区党委（又称盐阜区党委）^①成立，区党委书记刘彬，组织部长杨纯（不久即由喻屏担任），曹获秋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民运部长、敌工部长等职。

为了及时总结盐城县的群众工作，曹获秋写了题为《盐城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一文，文中指出：“在建立和巩固盐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各种工作中，群众工作是工作的中心。”

“我们应该知道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的抗日武装，若果没有深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群众运动开展了，广大群众觉悟起来了，建党、建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才不成问题。”一九四二年八月，这篇文章在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第九期上重新发表，编者按指出：“此文介绍去年七月大扫荡前，盐城大量开辟工作时群众运动的一些经验，虽已过去但仍有参考价值。”

^①盐阜区：盐阜地处江苏北部，介于苏中区和淮海区之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盛产粮棉盐等。新四军军部、中原局等重要机关曾设在这里。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当时的盐城商会，曹荻秋主持了盐城县第一届参议会，刘少奇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盐城的文教界人士暨地方耆绅，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大家反映：胡服很象大教授，曹荻秋似有学者的风度，共产党人才济济啊！后来，他又多次主持过民主人士座谈会，了解各界人士对我党的态度及其思想动态，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和开明绅士交朋友，做过细工作，引导他们走上抗日道路。如阜宁县的著名绅士王冀英出来参加抗日了，还被选为县参议会的副参议长；画家杨幼樵参加了盐城县参议会、盐阜区参议会，为抗日做了有益的工作；计雨亭也出来抗日了，他靠拢我党，积极工作，后被选为盐阜行署副主任。

一九四二年秋，曹荻秋到建阳去检查工作，了解到有少数绅士，由于对我党的政策不甚了解，情绪波动，想离开根据地。如古虹乡的著名绅士乔炳，就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一个儿子乔铎在我军工作。曹荻秋亲自登门拜访乔炳，向他详细地讲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减租减息法令，一席话，使他深受感动，决意遵守法令，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事后，乔炳亲笔书写了“行署主任曹荻秋于×月×日来我家晤谈”几个大字，放在客厅中间，影响较大，稳定了一些绅士留在解放区。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日伪一万七千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同时出动，扫荡盐阜区。二十五日，盐城被敌占领。区党委转移到阜宁农村，曹荻秋带领一个连在树家桥与树海组建荡东大队，坚持反“扫荡”斗争。他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里，和大家一起吃霉山芋干喝野菜汤，与群众同甘苦。

一九四二年盐阜地区夏收减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减租田亩三十六万多亩，受惠佃户为二万二千多户，粮食约有四百万斤，并在减租中发动与组织了数十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奠定了根据地的社会基础。为了搞好秋收减租，曹荻秋为《盐阜报》写了一篇社论^①，指出，夏季减租仅仅把盐阜根据地的建设推进一步，而并未能彻底完成根据地的发展任务。因此，必须搞好秋收减租。社论提出秋收减租的基本要求是：在地区上更求普遍，在执行任务上更求彻底，达到我区没有不减租的地主，也没有不获减租利益的佃户。社论还强调指出，应把减租与组织人民大多数的任务、动员人民参军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抗日的政治斗争，这是我们今天减租的根本要求。

为切实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曹荻秋深入区乡，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政策和调查的丰富材料，为基层干部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减租减息的小册子。

一九四二年九月，曹荻秋担任盐阜行署主任。他十分重视政权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指示。

政权建设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为了改造乡政权，培养基层干部，盐阜行署创办了行政学院。这年秋，盐阜地委委托曹荻秋等筹办盐阜青年干部学校，并由他担任校务委员。不久，青年干部学校与行政学院合并改名为盐阜区干部学院。曹荻秋亲自给学员讲课。

^① 《对秋收减租的几点意见》（1942年8月16日）。

曹荻秋热情帮助各级干部提高领导艺术。他发现有的县区干部包办代替现象比较严重，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题为《反对领导上包办代替》的小册子，阐明提高领导艺术对做好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用通俗的比方说明，一个具有划船艺术的人能顺利的极其容易的将船撑抵彼岸，一个无划船艺术的人就困难万分，甚至完全不可能到达彼岸。他用这个例子启发干部只有努力学习，掌握领导艺术，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并深刻指出，我们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本小册子还提出了纠正工作中包办代替现象的具体办法。

他非常注意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一九四三年，盐阜区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地委和行署号召各机关节约粮食，支援灾区人民。当时有一位干部，没有把行署节约的粮食全部送到灾区去，而留了一部分为机关改善生活。曹荻秋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并要他第二天把粮食送到灾区。

曹荻秋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他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警卫员、秘书编在一个党小组，按时向小组长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遇有重要工作不能参加组织生活时，他都亲自向党小组长请假。他对盐城县委负责同志说，我们不要以领导自居，而应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大家要遵守。

根据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月，盐阜行署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五十。为了更好的贯彻精兵简政的方针，十月十一日，《盐阜报》发表了行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贺希明的《为改变作风，确定新工作制度，贯彻精兵简政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把精兵简政和改进工作作

风，建立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克服过去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不民主、官僚架子等腐朽作风，创造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府要求的一套工作方式、方法、制度、作风。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盐阜区参议会在阜宁县郭庄（现郭墅公社）隆重召开，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三师师长黄克诚都到会并作了报告。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曹荻秋代表行署作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四日曹荻秋答复参议员对政府工作的质疑，逐条详细解释，诚恳接受提案内容。当时《盐阜报》报导：

“曹主任答复时态度诚恳坦白，凡关于参议员提案有误处，根据政府法令及所举例证之当时情况，详加解答；凡政府不甚了解之例证则已派人调查；对关于政府工作之正确意见，则诚恳接受，并深表谢意。各参议员对曹主任答复各点均极表满意。”

最后，会议按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选举，黄克诚当选为参议长，曹荻秋当选为行委会主任。

一九四三年，日寇为了确保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扫荡”。这年元旦，中共盐阜地委发布《告党员书》，要求全体党员团结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盐阜行署发布《告人民书》，号召全区军民准备反击日伪大“扫荡”。曹荻秋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于二月写了《游击区工作报告提要》，指出：在日伪集中兵力“扫荡”下，我部分根据地将转变为游击区，部分游击区将转变为敌占区。因此，坚持游击区的斗争，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论述了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分析了游击区的基本特点，提出在游击区应采取的具体策略方针。

一九四三年春，敌伪二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对盐阜区进

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扑灭我军，摧毁盐阜根据地。盐阜军民开展了反“扫荡”的英勇斗争。

曹荻秋打起背包到群众中去，和人民一起坚持反“扫荡”的艰苦斗争。有时连续行军，脚上起了泡，他仍常常把马让给警卫员驮东西或身体不好的同志骑。到了宿营地，他顾不上休息，忙着找地方干部谈话，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

曹荻秋在反“扫荡”斗争的艰苦岁月中，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十分关心党外人士的安全。盐阜区文教处督学车载是追随党多年的老知识分子，有名的文化人，已年近六旬，胡须过腹，和曹荻秋一起在建阳县七区沙村乡大纵湖边打游击。为保障他的安全，曹荻秋亲自托七区区长把他安排到可靠的地方打埋伏，反“扫荡”胜利后再送回后方。

一次，夜间行军，曹荻秋带一部分队伍准备过敌人封锁线时，突然他的刚三岁的儿子哭声不停。为了部队安全的过封锁线，曹荻秋命令警卫员把孩子丢下，带领大家顺利冲过封锁线。后来，他的儿子被后面上来的部队抱起来过了封锁线。

由于新四军第三师全体指战员和盐阜军民的共同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曹荻秋任行署主任时，注意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紧紧抓住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财经工作的战时性、环境的多变性、农村的分散性、地区的不平衡性、一定物资上对敌的依赖性、新民主主义财经工作等特点^①，灵活多样地开展工作。他还非常重视正确贯彻发展工商业的各项政策和法令。

^① 《两年来财经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1943年11月30日在盐阜区财经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一月，曹获秋为《盐阜区财经法令汇编》亲自撰写了序言。序言中指出：“我深感我们同志对法令的研究精神太差，以致在工作中不能正确掌握政策，法令是我们政策的表现，只要精通法令是可以相对减少错误的，我希望这一法令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同志们对法令的研究，并能给以充实和改进。”

由于曹获秋和广大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的积极工作，盐阜区的财经工作搞得很有成效。人民负担合理，培植了民力，发展了生产，切实保证了军需供给，从财经方面完成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政治任务。

曹获秋注意调查研究，不断改进政府工作，加强政权建设。他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统一领导与部门工作、突击工作与部门工作、部门分工与地区分工、上下级关系等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影响了政府工作的和谐和统一。一九四四年七月，在行署召开的行政扩大会议上，曹获秋就如何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这些矛盾作了报告^①，提出了具体办法：第一，确立整体与部门工作的正确关系。县区长是整体的代表，自身必须有整体观念，建立全面领导。同时，各县区政府必须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改变个人突出的领导。县区长对部门的领导应着重政策原则的掌握、方针的决定。第二，把突击工作与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第三，健全部门工作，把地区分工变为个别结合。第四，确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这个报告，对改进政府领导、加强政权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二年九月，根据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盐阜区整风

^① 《盐阜整风》1945年2月7日第4期。

学习总委员会成立，刘彬、曹荻秋担任正副主任，王阨西任学习总指导员。地委和部分县委负责同志首先开始整风。在整风学习的小组会上，曹荻秋严于解剖自己。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时说：过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未能很好地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象参加领导的广汉暴动，是属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因此很快遭到失败，这是很深刻的教训。他还坦率地谈到了自己思想上潜在着的个人英雄主义，说这个问题在白区工作时未暴露，到了解放区以后，当遇着比自己职务高而能力不如自己的同志时，个人英雄主义就会露头。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

一九四三年十月，盐阜区的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了。盐阜党校先后举办过四期干部整风学习。曹荻秋非常关心党校的工作，曾经为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作过《学风反省总结》，他指出：“学风反省不是别种反省，它是思想方法的反省，是认识客观事物，与理解客观事物的反省”。“反省与检查问题是将文件与自己的实际结合的问题，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反省与检查我们过去的实际工作的问题。”《先锋》^①杂志曾发表了这篇报告，并在编后记中指出：“这份党校学风反省总结，可为领导整风及个人进行反省时的借镜。”

在整风期间，同志们对什么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为此，《盐阜整风》编辑部，特请曹荻秋把他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第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政府人员的立场问题》^②，抽暇整理出来发表。他在这篇报告中指

^①1944年4月20日，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出版3—4月号合刊。

^②1944年10月10日《盐阜整风》第10期。

出：“抗日民主政府的立场除了中华民族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外，没有别的立场”，“在处理较大的或原则性问题时，应把问题提到战略与策略的水准去认识”，“还有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政策”，“政策、战略、策略都考虑到了，仅仅是完备了我们处理问题不丧失立场的条件，还必须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正面反面及各个侧面作精细的研究和了解，再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站稳立场，这是一个长期的锻炼过程。”这篇报告对大家启发很大。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对敌斗争，巩固解放区，准备大反攻，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底，盐阜行署召开全区财经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曹荻秋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第一条是“培植民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因此要“把农业生产作为生产建设的中心。”^①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盐阜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盐阜行署，曹荻秋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傍晚，同志们经常看到他在分管的田里给蔬菜松土、施肥、浇水。警卫员见他工作太忙，要代他管理，他总是说：“我要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啊。”他还挤出时间学习纺纱，一个多月后他就熟练地掌握了纺纱技术，与大家一样上交规定的纺纱数量。一天，曹荻秋到党校去，正碰上第二大队第一小组的学员正在学纺纱。这个小组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学了两个月还没有学会。曹荻秋笑着对大家说，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说着便拿起纺纱车熟练地摇动起来，均匀的白纱从他手中缓缓而出。

^① 《两年来财经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1943年11月30日）。

身教重于言教，半个月后，这个小组的学员都学会了纺纱。

在领导机关的带动下，全区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在农村，随着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贯彻，盐阜地委按照党中央组织起来的指示，在全区由点到面组织起换工队等形式的互助合作运动，把农民群众逐步引上集体劳动的道路。为了组织好换工队，曹荻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了阜宁五区晏陈、孔庄两乡组织换工队的经验，写了题为《论换工的组织与领导》^①。他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组织换工的目的、意义，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换工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时的指导。在地委领导下，盐阜区换工小组发展很快，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全区已组织起六千八百三十个换工小组，组织起来的农民有十八万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盐阜区行署召开全区第一次生产代表大会，各地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较好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大会。曹荻秋勉励代表们争做生产模范和劳动模范，领导大家组织起来参加生产，使明年的生活过得更好。

（四）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盐阜地委书记刘彬及一批干部也随去东北。曹荻秋留在盐阜，任地委书记。

这时候，盐阜解放区又扩大了，地委机关驻在新区淮安城内。曹荻秋发现淮安解放几个月了，但县委领导没有把放手发

^①1944年5月1日《盐阜报》。

动群众当作基本方针，因而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曹荻秋于一九四五年底，在淮安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该县领导前一时期在群众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并代表地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应把群众的反汉奸叛国罪犯的斗争，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并渗透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逐步推进到下一阶段的大规模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生产运动，群众的武装自卫运动，这是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最适宜的道路，也是淮安市工作应当遵循的道路。”^①在新的方针指导下，淮安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半数以上的群众都卷入到反奸运动中来，形成了广大群众的反奸运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有些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情绪极高”^②。在此情况下，“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③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曹荻秋对县委领导同志说：“根据目前形势，华中已成为反动派争夺的主要战场，而我党对华中采取的是坚决自卫的方针，决心予来犯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今后华中形势将转变为紧张的战争环境，大规模的自卫战争将连续展开，不消灭敌人一定数量的有生力量，这种形势是不会转变的”；“为了应付目前形势，必须把土地改革搞好，土改搞不好，我们将无深厚的社会基础以支持战争。”^④

① 《淮安新解放区工作的几个问题》，《华中通讯》第一期。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7、378页。

④ 《曹荻秋同志给盐城、盐东、建阳县委书记的信》，《盐阜党刊》第5期。

为了切实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盐阜地委决定选取各种不同类型地区，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区。曹荻秋带头下乡，到淮安的砖桥乡陈羊村、临城区，阜宁的童营，阜东的坎北区，淮宝的小韦庄、张韦庄等地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在土地改革中的拉平问题与对中富农政策的研究》^①这篇文章和地委于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发出的有关土改的三次指示，及时指导了盐阜区的土改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地委发出关于土改的补充指示，明确指出：在农村我们应该争取大多数人口与党一道，才能在任何坏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树敌过多，困难就将增加百倍。

但是，土改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各地还是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因此，在曹荻秋主持下，地委又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与改造领导成份的补充指示》，慎重指出，绝对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对已侵犯中农利益，应该说服雇贫农向中农让步。我们在农村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内战全面爆发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十万兵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八百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曹荻秋兼任盐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并组织了数万民工随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粟裕领导的我华中人民解放军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伟大战斗。十二月中旬，华中人民解放军于盐城、宿北两次大捷后，主动北撤，进入山东。

^① 《盐阜党刊》第5期。

为了统一领导苏北敌后斗争，一九四七年初成立了苏北区党委，书记刘培善不久被调往山东，由曹荻秋继任。三月二十日又成立了苏北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

苏北区党委和苏北军区，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了敌人军事政治活动方针与活动特点，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制定了正确地反“清剿”斗争原则。曹荻秋写了一篇题为《“清剿”与反“清剿”》的指导性文章，从当时苏北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先发制人、敌进我进、大部撤退、小股活动、暂时撤出相机反击、邻区策应等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文章还着重指出，对这几种对策，应按“清剿”到来时的情况及其变化，灵活运用，但必须遵守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这三个原则。文章同时强调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几种偏向：一是机械执行坚持原地斗争，死守阵地，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因而丧失有生力量，这是拚命主义；二是单纯强调保存有生力量，怕牺牲，轻易放弃阵地，这是逃跑主义；三是单纯的军事活动，不要群众，其结果是会失败的。上述这些原则在苏北^①得到了贯彻，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以曹荻秋为首的区党委领导下，苏北军民作战六千余次，歼敌近二万，牵制了敌人八万以上的兵力，给华东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援。

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曹荻秋主持召开了苏北区党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今后全区党政军民斗争的总方针为继续顽强坚持苏北斗争，准备大反攻，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对今后

^①当时苏北包括盐阜、淮海两个区。

的工作任务，强调指出要深入普遍开展民主团结反蒋运动，继续贯彻土地复查，强化边区武装及群众性的反蒋自卫斗争，以达巩固中心区、缩小顽化区之目的。会后，在继续进行土地复查，贯彻“中间不动，两头拉平”的方针时，从山东等地刮来了“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翻身大棍”等“左”的口号和做法。十一地委个别领导人受其影响，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采取了一些“左”的做法，问题比较严重。曹荻秋耐心细致地向他们阐明党的正确政策，并以很大魄力纠正“左”的错误。

曹荻秋在领导苏北人民坚持敌后斗争的同时，又为恢复另一块解放区——江淮区^①做出了贡献。

在苏北和江淮之间有一块跳板——淮宝县^②。一九四六年秋，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淮宝县委率大批干部，撤到当时五地委所在地。曹荻秋亲自找他们谈话，深入了解情况。在不久召开的淮宝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报告，指出淮宝县今后的方针仍然是坚持原地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好的共产党员要到艰苦斗争环境中去考验”的口号下，新的淮宝县委率领大批干部，艰苦奋斗，前仆后继，打回淮宝。

一九四六年底，根据上级指示，陈庆先、曹荻秋所部十二纵队一部分，由饶子健、杨效椿率领，先后挺进淮北、淮南地区。经半年苦战，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围剿”、“追

①江淮区：江淮区所辖，包括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大别山以东，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余万。

②抗战胜利后，淮宝属五地委（即盐阜地委）管辖，1948年划归江淮区。

剿”等阴谋，饶子健部在顽强坚持斗争的洪泽湖游击队配合下，打开了淮北路东地区；一九四七年春，杨效椿部与淮宝县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经过三进三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开了淮宝局面，坚持了淮宝，使淮北有了依托的基地，为开辟淮南提供了跳板。

一九四八年春，陈庆先、曹荻秋亲率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江淮，曹荻秋任江淮区党委书记；五月成立江淮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受命全面恢复江淮。从此，江淮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当时，整个江淮斗争的基本形势是拉锯式的敌我反复争夺，大块地区是游击区，尚有不少地方没有收复，我们只有较小的一块基地。为了全面恢复江淮根据地，曹荻秋分析了江淮区的斗争形势，指出应如何正确对待当前斗争的困难，并提出为实现从敌人手中夺回我们的阵地这样一个总目标。他规划了收复失地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蒋占区变为我之游击区；第二步是敌我的反复拉锯争夺；第三步是经过反复拉锯争夺后，最后将争夺区变为我之基本区。在这三个步骤中，最艰苦困难的是第二个步骤，斗争的关键也在第二步。他说，我们在敌我拉锯中能坚持，能生存，胜利就是我们的^①。

随着江淮区的逐步收复，土地改革问题被提到了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根据华中土地工作会议的精神，区党委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曹荻秋对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具体路线具体政策，作了详细阐述。为了使

^① <坚定决心为收复江淮一切失地而斗争>，1948年7月12日<江淮日报>。

到会同志更好的理解和领会土改的政策方针，会议组织大家深入讨论如何划分阶级及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政策等问题。最后，曹荻秋代表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根据新老收复区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土改方针和具体任务。

在以曹荻秋为首的区党委的领导下，江淮土改工作稳妥地开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积极发展生产，踊跃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十一月十二日，区党委发出《支援前线紧急动员令》，号召江淮“全体党政军民立刻紧急动员起来，热烈支援前线，为争取歼灭徐州蒋军的伟大胜利和解放全江淮而努力。”

为统一江淮、苏北大規模支前工作，全力支援前线，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贺希明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规模空前的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紧傍徐州东南的江淮三分区，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平均有一万九千人磨面，有五百辆大车、四千五百辆小车向前线运送，加上出发前线服务的担架二千四百副，全分区共动员民力计七十八万二千个工，畜力五十六万个工。

为支援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一九四九年二月成立了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曹荻秋任正副司令员，宋任穷、陈丕显任正副政委。

江淮全区基本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江淮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曹荻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对三个问题的总结；中共中央华中局对江淮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对目前江淮地区的形势与任

务，曹荻秋指出：江淮地区全部收复，长江以北已经解放，党的总任务是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江淮则为大军南进基地之一，是过江的跳板，支援战争的重要补给基地。因此，江淮今后的总任务是支援战争，解放江南。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江淮党政军民要全体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共同来完成这一任务。他说，支前工作的具体要求，首先是完成征借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抢修所有铁路、公路、桥梁，架设电话，组织船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为支援前线服务。

在江淮区党委领导下，江淮军民对支援西路和中路大军胜利渡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五）

南京、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曹荻秋随第二野战军去西南工作。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在上海成立了随军南下的西南服务团，准备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培训一批入城接管干部，曹荻秋任服务团团团长。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加服务团，很快组成了一千多人的庞大队伍。曹荻秋十分重视对这批革命青年进行思想工作，既鼓励青年们热爱祖国，到大西南去建设祖国的革命热情，同时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专门给他们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谆谆告诫同学们在今后的斗争实践中，要准备经受严峻的考验，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建设大西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短期集训，七月二十三日曹荻秋等率领这支队伍到达

南京，与西南服务团南京团会合。九月下旬，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紧跟二野大部队，开始了全程三千余里的艰苦行军。在此期间，曹荻秋还为策动西康刘文辉等部起义，做了些工作。刘文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当我军向西南进军时，为了堵住国民党的退路，需要策动刘文辉等部适时起义。这时，曹荻秋的二哥曹梓楠任刘文辉部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军需处长，驻西康首府雅安。他的五哥曹惠文在西康刘文辉部任保安副司令兼任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军训大队长。他们都曾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是我党的同情者。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四川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刘连波来到上海，见到了曹荻秋。经曹荻秋请示党组织同意，派刘连波回四川参加策动刘文辉等起义的工作。刘连波回到四川后，很快和曹梓楠、曹惠文取得了联系，他们为和平解放西康做了不少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西南局认真讨论研究了进入西南以后的接管工作，并确定重庆解放后，由张际春任市军管会主任，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市军管会副主任，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①。

到重庆后，张际春、陈锡联军务繁忙，实际主持该市工作的是张霖之、曹荻秋。张霖之主持市委工作，他象一把钢刀，

^①1950年9月陈锡联调回部队，12月中央任命张霖之为第一书记，曹荻秋为第二书记，王维纲为第三书记。

锋利、有力、果断，曹荻秋主持市政府工作，他细致、稳重、全面。两人密切配合，带领全市人民为建设一个人民的新重庆而日夜操劳。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曹荻秋坚决执行中央和西南局“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紧紧抓住恢复生产这个中心工作。

为了恢复工业生产，曹荻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他在进城初期，每周有三天时间下工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走遍了全市主要工矿企业，到哪个厂里去事先不打电话通知，一下子扎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摆龙门阵^①，和工人同吃一锅饭，厂里负责同志要为他另做饭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要不得噢，工人吃啥子，我也吃啥子！”一次，有个工厂的工人反映伙食搞得不好，影响了大家的劳动情绪。曹荻秋就转告厂领导，要他多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并说，四川人嘛，菜要烧辣一点才合大家的口味。过了几天，他又来这个厂检查，了解工人伙食已有改进才放心了。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水上交通很繁忙，搬运工人数目很大。解放前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生活也最苦，吃的是汤锅，住的是棚户，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二”大火灾案，把朝天门码头一带烧个精光，使很多工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曹荻秋在多次深入码头工人调查研究之后，向市委、市政府建议盖搬运工人大厦，使昔日低人三分的搬运工人，首先能住上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大厦建成后，又修建了搬运电影院和文化宫电影院，使工人在辛勤劳动之余，得到很好的休息，享受到

^①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即谈家常。

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

曹荻秋白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大量的文件、报告则留在晚间批阅。他经常亲自起草下达的文件或作报告的提纲。当时，他爱人尚未来渝，他以办公室为家，以沙发当床，办公室的灯常常到深夜才熄。繁重的工作，日夜的操劳，使刚满四十岁的曹荻秋，几乎是满头银丝了。

重庆的私营工商户比较多，怎样做他们的工作？市政府首先把工商业者组织到工商联中来，而曹荻秋则着重做好工商联中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重庆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副市长胡子昂，抗战期间即担任重庆参议会参议长，周恩来曾和他有多次交往，因而和我党关系密切。曹荻秋对胡子昂真诚相待，遇事总是和他坦率商谈。胡子昂着重做工商联工作，市政府一些重要会议也都通知他参加。曹荻秋多次指示秘书，不要把胡副市长当客人，应该给看的文件要给他看，让他有职有权，多为人民做工作。

当时，在重庆工商界还有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因工作安排有些情绪。为此，曹荻秋特地约了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起，和这位民主人士进行了一次亲切而严肃的谈话。曹荻秋在肯定他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以后，也批评了他的缺点，指出他“器小易盈”，使这位民主人士深受教育，表示一定要搞好工商界人士的团结，为党、为人民多出力。

一九五〇年六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商业开始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曹荻秋考虑到重庆工商业的调整面广量大，应取得工商联的密切配合，经请示西南局以后，指示工商联党组书记，把七

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先一步送给胡子昂阅读。胡子昂很受感动，在以后调整工作中，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经过调整，重庆的公私营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

在公私合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下，曹荻秋很冷静，不断调查研究发现新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他担任市长。这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重庆市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他作了《关于重庆公私营经济的发展比重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公私营经济的发展比重问题。他指出：“按重庆经济原有的特点”，“在轻工业方面，私营经济则远远超过公营工业，商业亦相同。在目前公私营经济发展中，并未改变这种情况。相反，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大过公营，即是私营经济比重更加大了”。“为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应本着公私兼顾政策，采取公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但同时必须有意识的加大公营经济的比重，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以改变目前尚存在的私营经济大过于公营的情况。”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曹荻秋分工负责领导“五反”运动。为了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他工作深入细致，强调做好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并经常及时地亲自执笔向西南局请示汇报。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的大量“五毒”行为，以及在政治上向党进攻的种种事实。为此，曹荻秋写了《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的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①重要文章，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不法资本家的澜言，教育广大党

^①1952年3月1日《新华日报》。

员和干部提高阶级觉悟。到一九五二年六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全市人民应在“三反”、“五反”这个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来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曹获秋等主持的市人民政府，依靠全市人民的团结努力，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市政建设、人民民主建政等方面的工作，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五二年十月，张霖之调北京工作，由曹获秋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主持全面工作。

重庆的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一野、二野的，有四川地下党的和进步群众，有从延安和华东解放区来的，还有从南京、上海西南服务团来的。曹获秋对各方面来的干部，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大家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干起工作来有劲。

曹获秋和下级谈工作，亲切、诚恳，不管汇报工作的同志谈得正确与否，他总是专心致志地把话听完，使大家感到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曹获秋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仍兼管财经工作，每星期六负责财经工作的同志就到他家开例会，随意围桌而坐，汇报工作。曹获秋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表意见，对合理的部分加以综合、概括和补充，对存在的问题，启发大家进行讨论，然后既具体又明确地指出今后怎样工作。这一时期的财经工作，曹获秋着重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曹获秋很重视团结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每年除夕，他总是要代表市委、市政府，请教育界、文化界、医务界等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市委的

意见。会后请大家吃饭。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

曹荻秋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员、驾驶员，也团结得很好。他不摆首长架子，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使人感到可亲可敬。秘书要结婚，一时没有房子，他就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两间来给他们住；有位警卫员不是党员，就找他谈心，鼓励他争取入党；驾驶员老王，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常常忙得顾不上照顾爱人和孩子，曹荻秋经常关照秘书、警卫员去老王家探望。曹荻秋看到老王衣服破了，就要爱人石斌给老王做衣服。每周星期五晚上老王参加机关夜校学习，曹荻秋规定这天晚上不出车，保证老王学好文化。他很尊重司机的劳动，上汽车前，总是把鞋上的泥搓干净，在车上从不吐痰丢纸屑。曹荻秋这样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使老王从心底里感激。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在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曹荻秋非常重视领导方法的改进。这年五月，在重庆市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他提出：“在我们国家今天已开始大规模建设时期，应特别加强厂矿与经济机关的政治工作，要用政治工作去动员广大群众保证国家计划胜利完成。为此，就必须决心改进那些已不适于新情况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停止搞政治运动时期那些过时的方法，把我们的作风转变得深入细致。”他要求党的干部“精通各种业务，要从外行变为内行。不做到这一点，所谓深入是空的，不做到这一点，所谓政治工作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党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都必须从这个着眼点去考虑。”^①

^① 《曹荻秋同志在重庆市第八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3年5月15日）。

一九五二年十月，为了胜利地迎接并完成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重庆市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决定》。为加强对学习的领导，成立市讲师团，由曹荻秋任团长。他亲自抓市委、市政府部委办局干部的学习，每次学习他亲自点名，并作过多次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报告。

曹荻秋很重视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一九五二年七月，在重庆市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他指出：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应该大胆大量提拔干部。但是有些单位强调资历，这是很大的阻碍，这个框框必须打破。他还指出，凡是德才具备的干部，必须大胆提拔，只要工作胜任，可以越级提拔^①。曹荻秋对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乃至大型厂矿的负责人，都比较熟悉，了解他们的特点、长处和短处，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几年来，重庆市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重庆人民的赞扬。在成绩面前，不少同志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曹荻秋在言行中也偶有流露，影响了正确处理重庆和西南局单位及一些兄弟单位的关系。邓小平及时告诫他说，不少同志对重庆市委有意见啊！响鼓不用重锤，邓小平的批评，引起了曹荻秋的高度警惕。他认真反省了自己及市委这几年的工作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重庆市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上，曹荻秋检查了思想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并对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讲得很中肯，从历史讲到现

^① 《曹荻秋同志在重庆市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2年7月10日）。

实，把自己思想深处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全党面前，请同志们批评和帮助。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党中央调曹荻秋去上海工作。行程在即，但曹荻秋还是抓紧一切时间，和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及部委办局的一些同志谈了心，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曹荻秋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他受市委和陈毅的委托，主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当时，上海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夕，曹荻秋协助陈毅，动员市人民委员会各有关部门的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听取工人、干部以及资本家的意见，调查研究，切实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推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举行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曹荻秋代表陈毅市长，接受上海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这标志着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接着又根据市委的部署，曹荻秋主持的市人民委员会，对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股定息、经济改组和组织政治学习、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产核资工作，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全面展开，进展顺利。五月八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曹荻秋作了

报告，对上一阶段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工作做了初步的估计，并要求在五月份把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接着他布置了下一阶段的定息、人事安排和经济改组工作。

在全部完成公私合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一系列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改组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为了指导全市搞好经济改组工作，曹荻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上海市的情况，写了一篇题为《上海市新公私合营企业的改组工作》^①的文章，指出：经济改组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它包含着裁并改合、设备的调整、技术的改造、必要的改建和扩建、商业网的调整等。同时，在改组中涉及厂房厂址、宿舍、食堂、设备平衡、技术操作、企业内外协作、供销关系、商店的合理分布及工资福利、职工团结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慎重的进行，否则就达不到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适当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目的。这篇文章还对半年来作了哪些初步改组工作，今后的改组工作应从哪几方面去进行等，都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和工商界的积极参加，曹荻秋主持的市人民委员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方面进展较好，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九五六年，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左右，纯商业零售额增长百分之十九左右。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进展较好，同时资方人员在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也有了提高，有五万多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其中有五千多人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励。

^①1956年8月5日《解放日报》。

曹荻秋在主持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政权建设。他经常对市人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是通过各级政权组织和广大群众见面并贯彻下去的，我们一定要把政府工作搞好。”^①

有一个时期，市人民委员会和所属委、办、局、区、县，存在着任务、职责、体制、分工不清的现象，公文多、会议多、表报多、办事效率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有所抬头。曹荻秋认为必须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以充分发挥人民委员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但他不是把责任推给下面，而是首先作自我批评。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我来上海一年多了，来的时候陈毅市长说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要我负责把它抓起来，市委也委托我来管，而我有许多工作还没有抓好，应该负一定责任。”^②接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经过反复比较，及时提出了改进机关工作的方案，从而整顿和加强了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毅调中央工作后，曹荻秋即任常务副市长。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那个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一九五八年以后，更采取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做法，事无巨细，都要集中到市委，集中到他个人手中，使市委的领导陷入了事务忙乱之中。对此，曹荻秋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在当时的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讨论党政关系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不正常的。”“这几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很多问题，大小事情都拿到市委来，市委日常

^{①②}《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好市长》，1979年3月28日《解放日报》。

业务太多，不可能认真抓好工作”。 “党政不分的做法，既削弱了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 为了切实纠正党政不分的现象，曹荻秋组织了一部分市人委办公厅干部和有关部门的力量就党政分工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和大家一起，举行座谈，分析研究党政分工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经过市委会议集体讨论，终于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①。

曹荻秋很重视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意定期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上海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计划和财政预决算等重要事宜作出决议；定期组织人民代表参观视察、监督政府工作；定期召开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对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定期举行市长、副市长办公会议，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就委、办、局、区、县向市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市人委日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一次，曹荻秋对市人委办公厅的干部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订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他还经常说：“只有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上海一千万人的积极性，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②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处在困难时期。上海副食品的供应很紧张。譬如猪肉，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当时市民每天除能买到

^{①②} 《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好市长》。

少许青菜外，别的东西都难以买到。曹荻秋说：“城市人民每天只能买到的一点青菜，必须尽全力维持。”^①并把郊区种蔬菜的农田，从原来的十多万亩扩大到四十多万亩。为了使市民有时能吃到鱼，曹荻秋建议市委批准制造一百多艘渔轮，日夜在海上捕捞。为了供给上海人民的副食品需要，还派飞机从外省购运来鸡鸭和蛋品。

曹荻秋对上海市的建设和人民生活件件关心。为了绿化上海，他主持市人民委员会讨论绿化上海的会议，还亲自带领政府人员参加植树造林。为了搞好城市的卫生，他决定把原来在市区经营的养牛场，统统迁到郊区国营农场。市区工人居住的工房，原来已建设了一批，为了更适合工人居住，设计院又设计了各种样式。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市人委的有关同志亲自察看，实地研究评定哪几种样式好，决定后就一批一批在市区兴建。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曹荻秋经过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降低农村小学的学费。

曹荻秋很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这项工作当成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他要求政府部门各级领导，亲自处理重要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一再教育信访干部决不能沾染官僚主义的习气，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尽快地予以适当的解决。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总是抽出时间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凡是看过的人民来信，每件都有具体的处理意见。^②

曹荻秋主持下的市人民委员会，非常重视同市人民代表的

① 《人民的好市长，党政的好领导》，1979年4月14日《解放日报》。

② 《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好市长》。

密切联系。市人民委员会除经常派人登门访问、认真处理和接待人民代表的来信来访外，从一九五八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又采取了举行小型座谈会的方式，分别邀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民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和工人农民举行座谈会，使委员和代表们能更好地了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情况，经常参与对有关工作的研究，及时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开始时，这种座谈会每月举行一次，以后发展到每月二至三次。委员和代表们反映，参加这种座谈会，既能及时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情况，又能更好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有关的政策法规。

一九六四年，曹荻秋任上海市市长。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曹荻秋经常深入基层，到工厂和农村去蹲点。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他在上海缝纫机二厂蹲点，给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对厂里的干部说：“干部直接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①他经常参加厂党委会议，找党委成员谈心，并具体指导工作，每周还抽时间深入车间一边劳动，一边和群众拉家常。装配车间有个工人想找他谈心，又觉得不好意思。曹荻秋知道后，就主动找这位工人，一见面，就亲切地问他家住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生活有没有困难，并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象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曹荻秋热情诚恳的态度，使这位工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倾诉了自己的许多想法。他的一些合理意见都被接受，并逐步得到解决。以

^① 《回忆曹荻秋同志在我厂蹲点两三事》，1979年3月28日《解放日报》。

后这位工人又几次到曹荻秋家中作客，受到亲切地接待。这位工人回忆说：“曹荻秋同志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象亲人一样，他真是和我们工人贴心啊！”^①

一九六六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曹荻秋被打成了所谓“叛徒”，被监禁起来“审查”达六年之久，精神和肉体上均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沉着、坚定，坚信党和人民是一定会胜利的。他曾对被关在一起的同志说：“害人者不得善终，搞文字狱的人必定要受到历史的审判。”^②

一九七三年初，曹荻秋被转移到市五七干校，继续“审查”。曹荻秋虽身处逆境，但仍以满腔的革命热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有同志拿了小说送给他看，他却指着面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说：“现在学这个好，现在正是要读马列的时候，可以对问题识别识别。”他还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历史书籍。当“四人帮”把吕后、武则天的亡灵抬出来，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时候，曹荻秋敏锐地指出，他们那套史学“有论无史”，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来篡改历史的^③。

由于遭受“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长期迫害，曹荻秋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七岁。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为曹荻秋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曹荻秋的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① <回忆曹荻秋同志在我厂蹲点两三事>。

② <忆荻秋同志>，1979年12月20日<解放日报>。

③ <雪化方知松高洁>，1978年7月8日<解放日报>。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查阅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江苏省档案馆、盐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盐城地委办公室党史组、扬州地委宣传部、重庆市委档案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收藏的有关文档资料和报纸刊物；还通过个别访问、座谈会、通信等形式，联系了十省两市的一百多位同志，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得到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在此，深表谢意。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16

定 价： 1.50 元